

人类学找寻的并非传统，而是变迁

ASSAULT ON PARADISE
THE GLOBALIZATION OF A LITTLE COMMUNITY IN BRAZIL
(FOURTH EDITION)

远逝的天堂

一个巴西小社区的全球化

[美] 康拉德·科塔克 (Conrad Kottak) 著
张经纬 向瑛瑛 马丹丹 译

(第四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ASSAULT ON PARADISE
THE GLOBALIZATION OF A LITTLE COMMUNITY IN BRAZIL

**Mc
Graw
Hill** Education
<http://www.mheducation.com>

上架建议：人类学

ISBN 978-7-301-20189-3



9 787301 201893 >

定价：36.00元

Mc
Graw
Hill Education

培文书系 | 社会科学译丛

远逝的天堂

一个巴西小社区的全球化

[美] 康拉德·科塔克 (Conrad Kottak) 著

张经纬 向瑛瑛 马丹丹 译

(第四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1-2011-4737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远逝的天堂：一个巴西小社区的全球化 (第四版) / (美) 科塔克 (Kottak, C.) 著；张经纬，向瑛瑛，马丹丹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3

(培文书系·社会科学译丛)

ISBN 978-7-301-20189-3

I. ①远… II. ①科… ②张… ③向… ④马… III. ①农村人类学—研究—巴西
IV. ①C912.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21476 号

Conrad Phillip Kottak

ASSAULT ON PARADISE: THE GLOBALIZATION OF A LITTLE COMMUNITY IN BRAZIL

EISBN 0-07-353086-7

Copyright © 2006,1999,1992,1983 by The McGraw-Hill Companie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without limitation photocopying, recording, taping, or any database, information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This authorized Chinese translation edition is jointly published by McGraw-Hill Education (Asia) and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This edition is authorized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ly, excluding Hong Kong, Macao SAR and Taiwan.

Copyright © 2012 by McGraw-Hill Education (Asia), a division of the Singapore Branch of The McGraw-Hill Companies, Inc. and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版权所有。未经出版人事先书面许可，对本出版物的任何部分不得以任何方式或途径复制或传播，包括但不限于复印、录制、录音，或通过任何数据库、信息或可检索的系统。

本授权中文简体字翻译版由麦格劳-希尔(亚洲)教育出版公司和北京大学出版社合作出版。此版本经授权仅限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销售。

版权 © 2012 由麦格劳-希尔(亚洲)教育出版公司与北京大学出版社所有。

本书封面贴有 McGraw-Hill 公司防伪标签，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书 名：远逝的天堂：一个巴西小社区的全球化(第四版)

著作责任者：[美]康拉德·科塔克 著 张经纬 向瑛瑛 马丹丹 译

责任编辑：徐文宁

标准书号：ISBN 978-7-301-20189-3/C·0740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http://www.pup.cn> 电子信箱：pw@pup.pku.edu.cn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112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三河市欣欣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720 毫米 × 1020 毫米 16 开本 17.75 印张 350 千字

2012 年 3 月第 1 版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6.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谨以本书纪念

Cecilia and Charles Wagley

纪念

Atahydes Alves de Souza

与

Vandice Nascimento

中文版译序

康拉德·科塔克是中国人类学界耳熟能详的美国人类学家，其中最著名的当属他编写的大量人类学教材。他师从知名人类学家马文·哈里斯，从本科开始接触人类学，直至博士毕业，继而数十年从事人类学教学工作，此中对人类学的热爱与勤勉不言而喻。

本书即是科塔克教授专为人类学学生，和其他有志从事人类学研究的人士，写作的一本人类学研究入门读物。书中跨越了作者研究巴西萨尔瓦多渔村的四十多年时间，几乎囊括了当前人类学研究的所有主题：全球化、工业化和城市化对传统社区的冲击，旅游观光业与消费主义的兴起，现代化与文化变迁等。当代人类学中的所有关键词：性别、大众媒体、生态环境、宗教、生产、权力、社会分层、阶级、个体主义、旅游、消费，以及后现代等等，有条不紊地随着作者在阿伦贝皮渔村的亲身体验，徐徐化开。

作者写作本书的目的并不单单是提供一本民族志，本书也确实很难称作一般意义上的民族志，然而，就是这本称不上厚重的作品，其实蕴含了极其丰富的内容，完全称得上是数本民族志的合集——我们可以从中分别辑出发展人类学、都市人类学、旅游人类学、村落研究或是媒体人类学教材的相应内容。每一个主题在作者笔下都是张弛有度，既让我们了解了共时的社会结构，又使我们得以管窥数十年来文化与社会的变迁过程。更难得的是，作者将自己初涉田野的经历与体验，毫不吝啬合盘倾出，与我们共享，也能引起读者对自己人类学历程的共鸣。不夸张地说，本书甚至可以称得上是一本小型社区（村落）研究的入门手册，读者朋友完全可以按图索骥、按部就班地学会田野调查的基本

步骤和技巧，并意识到田野现场中可能遭遇的种种潜在挑战。

科塔克在书中为我们展现了当前人类学研究的方法和方向，阿伦贝皮既不以奇风异俗著称，也不与世隔绝，很多时候只是一个平凡如斯的小小渔村。可在作者笔下，却处处闪现与众不同，每个人物都生动如许，个性鲜明。此中自然离不开对现象的描述与阐释（解释人类学方法的应用）；同时合理使用统计工具，将数据与现象结合到一起；此外，跨文化比较研究、延伸个案法的运用也处处可见；当然，也离不开丰富的访谈材料（结构性 / 非结构性访谈）。最重要的是，作者将所有材料都融入“社会结构”当中：无论经济、政治、甚至亲属结构，每一项“社会事实”都是社会结构的具体投影。而且，书中也将人类学的视角，从不变、静止的小社区，带入了不断变迁、蓬勃发展的世界潮流；为人类学的传统社会研究，注入了新的动力（其中还包括在最后关于“马达加斯加比较研究”中提到的人类学对“散居 / 离散”的关注），从而表明人类学并不恋古，而是同样在与时俱进。

本书还带给我们另一些启发：科塔克研究的是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的巴西渔村，这个南美洲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 20 世纪后半程率先走上了现代化、全球化之路，走在了中国的前列。曾经摆在巴西社会、巴西渔村面前的社会、文化、生态、政治问题，今天同样摆在了追求现代化、面临社会转型期巨大变革的中国人眼前。工业开发对农村土地的开发与利用、传统生计方式在工业化面前的转型、城市扩张与乡村发展、工业进程与环境污染、旅游开发与商业化进程，以及新宗教的出现、新社会分层的涌现、外国人 / 外来移民者日益成为城市中不可忽略的一部分、包括亲属关系在内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等等，一切都似曾相识。相同的问题在追求现代化跨越式发展的中国同样涌现：工业与污染、农村征地、外来人口与本地居民，都是发展过程中引人注目的问题，如何借助人类学的视角，理解并认识中国飞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类新情况，或许是科塔克从南半球带给我们的一块“他山之石”。

同时，本书最难能可贵的一点是，科塔克毫不掩饰他对自己研究对象——生活在巴西阿伦贝皮渔村的居民——的热爱。无论是马林诺夫斯基“日记”中的真相，还是来自“小泥屋”的调侃，都让我们很难体会到人类学家与他们研究对象之间的深厚情谊。但在科塔克的阿伦贝皮，我们无时无刻不在感受到这种深深的情感，从他因看到渔村卷入现代化大潮，蜕去朴素之美，而表现得痛

心疾首，从他因乡人过世而内心悲恸，从他数十年如一日与村中朋友结为至交的用心，都能看出这种发自内心的深情。更令人欣慰的是，他对滨海渔村的情感，并没有转变为对“发展”本身的抗拒，人类学的智慧与理性让他始终相信：当地人的生存经验和乐观精神，终能帮助他们随机应变（而非格格不入），将自己与世界的潮流融为一体。而且，这种感情甚至没有以他而终，而是进一步传递到了他的孩子与下一代村民身上，这或许又能成为一个人类学世家的故事。

今天，人类学在中国日渐复苏，学科的发展离不开关注时代，关注当下，只有人类学及人类学家与时代发展的脉搏紧密相连，用人类学的知识去丰富我们对迅速变迁的中国社会的认识，才能让人类学为更多的公众所认识和熟知，利用人类学的智慧，在发展的迷思中找到生命的方向。而科塔克的这本书，正好也为我们的学科建设、知识积累与学术反思，提供了一本合适的指南。

在此谨向科塔克先生与阿伦贝皮之间四十多年来建立的深厚情感致敬，这堪受岁月磨砺、厚积薄发、历久弥香的积淀，对中国人类学无疑是种鞭策与勉励。

感谢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人类学研究所马丹丹老师与向瑛瑛同学对本书翻译给予的极大支持，向瑛瑛翻译了本书第一章至第九章初稿，马丹丹翻译了第十章至第十五章初稿，与我一同分享了翻译与学习的快乐。

张经纬
于上海博物馆
2012年元月

前 言

我在巴西巴伊亚州阿伦贝皮的研究已逾四十二个年头(2004)。在这个西半球第二大国家沿海城镇的研究伊始纯属偶然,但我的后继研究,则是因为见证了当地的剧变。阿伦贝皮的变化,展现了经济发展、生态恶化和全球化的影响——国家文化、世界文化和国际政治经济的扩张。本书便讲述了阿伦贝皮在此影响下的变迁故事。

在三十多年的教学生涯中,我始终不忘将这个故事告诉刚入门的学生。我这样做,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我从本科起便亲身参与阿伦贝皮的田野工作。本书讲述了我接触异文化,初涉民族志,并成长为一个人类学家的过程。我会在书中讲到,我的生活与事业,如何同阿伦贝皮、那里的人们及地方的转变交织在一起。身为教师,我深知学生们热爱个案研究,尤其喜欢那些描述中夹杂着人类学家本人看法、感受和回应的异文化研究。我在写这本书时,一直把这一点牢记在心。

我决定为入门者写作的第二个原因,也反映了我的教学经历。写教科书时,我通常会用至少两类民族志个案研究。一是描写部落社会的个案,二是描述“农民”文化、社会变迁或世界体系的个案。如《亚诺马莫人:暴躁的民族》(*Yanomamo: The Fierce People*)、《回到笑声中去》(*Return to Laughter*)、《森林人》(*The Forest People*)、《与世无争的人》(*The Harmless People*),都是关于狩猎采集者或部落农民的研究。相比而言,阿伦贝皮是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社区。她是当代世界体系的一员,我很高兴本书能为入门课程提供第二类个案范本,有助于学生的理解。

编辑们建议我用一种能吸引学生、寓教于乐的方式讲述故事。本书力图做到雅俗共赏，希望能是一本开卷有益的教科书。它还包括了入门课程里会讨论的很多主题，如民族志方法、亲属制度、社会组织、经济、政治、文化与人格、宗教、社会分层、种族与性别。冲击阿伦贝皮的现代力量同样显著，这些冲击包括工业化（及其对当地生态的影响）、城市化及全球化（旅游业和大众传媒）的影响。

用过本书的师生反映，本书旧版颇值一读，但我仍会尽力使第四版更具可读性。我新写了总结一章（第十五章），将我同样观察了四十多年、进行过民族志研究的马达加斯加和巴西加以比较，对比了两者的变化类型。第十四章描述了2004年的阿伦贝皮。其他章节也做了必要更新。

康拉德·科塔克

致 谢

读者们从本书“主要人物”表中可以看到，其中介绍的不仅有村民，还有人类学家。阿伦贝皮与人类学的第一次接触，缘于她被选为田野调查的基地。1962年至1964年间，很多来自哥伦比亚大学下设，哥伦比亚—康奈尔—哈佛—伊利诺伊夏季田野研究项目的学员们，都来过阿伦贝皮。感谢那些田野调查队的队友们，与我共同调查并分享了在阿伦贝皮的所得所获。这里我想特别感谢彼得·戈林和奈尔斯·埃尔德雷奇，对大卫·G.爱泼斯坦、艾里卡·布瑞斯勒和谢帕德·福尔曼同样致以谢忱。玛克辛·马戈利斯协助我完成了1980年的田野调查，同行的还有杰拉尔德·米拉尼克，1980年，他细致地为我绘制了阿伦贝皮地图，随后由他在佛罗里达州立博物馆的同事为我进行制作。杰里还为本书提供了很多照片。我要感谢带过的研究生道格·琼斯、珍妮特·邓恩、克里斯多夫·奥利里和约翰·柯林斯，我不在阿伦贝皮时，他们也和我定期保持联系。感谢朱丽叶·科塔克·马夫罗马蒂斯、娜拉·艾利斯·米拉尼克，尤其是尼古拉斯·查尔斯·科塔克的帮助。尼克对第十二章和第十三章提了不少建议，同时参与了第十二章的写作。

本书见证了贝蒂·韦格利·科塔克与我共同研究阿伦贝皮的经历，从1962年起她也成为这个故事的一部分。我深深感谢她的陪伴、支持、洞见与卓识。

马文·哈里斯鼓励、激励了我，使我从1962年时的一名年轻人类学家，逐渐术业有成，他还指导我获得博士学位。罗伯特·墨菲(Robert Murphy)和兰布罗斯·科米塔斯(Lambros Comitas)阅读了我博士论文的两版草稿，帮我解读了1960年代的阿伦贝皮。

我的巴西同事中，我要特别感谢泰利斯·德阿泽维多博士（已故）、Mariá de Azevedo、Maria & Paulo Brandão，以及 Azevedo 一家人持续多年的友谊、扶持和热情款待。巴伊亚联邦大学的 Carlos Caroso 教授，给予我和我的学生很大帮助。感谢 Carlos 的支持、见解和友谊。

本书显然离不开数百位阿伦贝皮人的友谊、帮助与合作。除了书中称作阿尔贝托、朵拉、费南多和托梅的村民，我还要感谢 Atahydes Alves de Souza、Vandice Nascimento、Aurino Alves、Francisco dos Santos 的特别帮助。

我同样要感谢读过本书并予以评论的人们，不论他们读的是手稿还是旧版。包括 Maxine Margolis、Niles Eldredge、Charles & Cecilia Wagley、Mariana Kottak Roberts、G. Harvey Summ、Charlotte Cerf、George Foster、Michael Chuse、Richard Polnac、Kathryn Kozaitis，以及密歇根大学的部分学生。

本书初版编辑是 David Follmer，感谢他对我鼓励与支持。Jeffrey Longcope 从出版业和非人类学视角，评价了前期稿件，提出一些建议，使内容更加生动有趣。比如，他鼓励我让村民讲述自己的故事。

麦格劳-希尔出版社方面，Phil Butcher、Sally Constable、Sylvia Shepard、Lori Pearson、Nancy Blaine 对旧版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和支持。在第四版中，我想再次向 Phil 致以谢意，数年来我愉快地与他合编了数本著作。我尤其想要感谢人类学责任编辑 Kevin Witt 对本书修订的帮助。同样要感谢麦格劳-希尔出版社人类学业务编辑 Thom Holmes、市场经理 Dan Loch、项目经理 Jean R. Starr，以及业务主管、资深平面设计师和版权编辑 Betsy Blumenthal。

一些机构和组织也对我们在阿伦贝皮进行的研究有所贡献。国家心理卫生研究所 (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 给予我博士奖学金，其后对“现代化的当地影响”项目还有小部分资助。外国地区奖学金项目，在 1973 年给予阿伦贝皮田野调查工作部分资助。Horace H. Rackham 研究院和密歇根大学主管研究的副校长办公室，也在巴西调查中给予我帮助。

我调查巴西“电视的社会影响”项目 (1983—1987)，得到 The Wenner-Gren Foundation、国家科学基金会和国家心理卫生研究所的支持。“生态危机和意识”项目，最初得到“密歇根记忆重建计划” (Michigan Memorial-Phoenix Project) 的支持。随着这项研究的深入，后来得到国家科学基金会的资助。1991 年我在阿伦贝皮的田野之行，得到来自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通

过国际地球科学信息网络中心 (CIESIN) 给予密歇根大学的资助。1992 年以后的研究, 则获得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 (NSF) 和密歇根大学资助。

本书献给我的岳父母塞西莉亚与查尔斯·韦格利, 他们都已去世。没有他们促成的种种可能, 一切都不会发生。塞西莉亚·韦格利给了我很多帮助, 她与我分享她的家庭和巴西朋友, 告诉我关于她的国家的很多事情。查克在非常必要的时刻给我提供了一些建议、想法和信息。我受其鼓舞, 立志成为像他一样的人类学家与人道主义者。人性伴随着民族志学者的分析与诠释, 在查克的《泪眼相迎》(*Welcome of Tears*) 一书中闪烁。他关于巴西塔皮拉佩印第安人^[1]的研究, 令我高山仰止。其中的风格和语言在我写作本书时一直引领着我。这段献词表明了塞西莉亚与查尔斯·韦格利在我的事业和生命中所占有的特殊位置。

从第二版到第四版, 我想纪念两位特殊的朋友: Atahydes Alves de Souza, Vandice Nascimento, 两位伟大的巴西人。

康拉德·科塔克

[1] 塔皮拉佩人 (Tapirapé): 生活在亚马逊雨林深处的南美原著民, 查尔斯·韦格利的《泪眼相迎: 巴西中部的塔皮拉佩人》(1977) 一书, 今天仍是了解塔皮拉佩人的重要著作。——译注

主要人物

康拉德·菲利普·科塔克(康拉多)：本书作者，1962年开始阿伦贝皮田野工作；分别于1964年、1965年、1973年、1980年、1982—1987年、1991—1994年、2003年、2004年在阿伦贝皮考察；密歇根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兼系主任。

伊莎贝尔·韦格利·科塔克(贝蒂)：1962年开始阿伦贝皮田野工作；每次都和康拉德回访；巴纳德学院人类学学士，密歇根大学社会工作硕士；密歇根州学校社工。

大卫·爱泼斯坦(David Epstein)：1962年田野调查队成员，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博士；现为加州尔湾市一名律师，1991年四获电视智力问答节目《危险边缘》(Jeopardy)答题王称号。

马文·哈里斯(Marvin Harris)：1962年哥伦比亚—康奈尔—哈佛—伊利诺伊大学人类学暑期田野调查项目巴西田野调查队领队；佛罗里达大学人类学研究生导师；2001年10月去世。

彼得·戈林(Peter Gorlin)：1964年田野调查队成员哈瓦田野点成员，帮助完成阿伦贝皮访谈大纲；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博士，哈佛大学医学博士。

泰利斯·德阿泽维多(Thales de Azevedo)：1964年巴伊亚田野调查队领队，副领队康拉德·科塔克；巴伊亚著名医师兼人类学家；现已去世。

奈尔斯·埃尔德雷奇(Niles Eldredge)：1963年阿伦贝皮田野调查队成员，纽约美国自然史博物馆古无脊椎动物馆馆长，和史蒂芬·古尔德(S. J. Gould)一起提出了进化间断平衡理论。

谢帕德·福尔曼 (Shepard Forman): 1963 年阿伦贝皮田野调查队副领队; 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博士; 一直担任福特基金会人权项目主管。

雷蒙德·拉帕波特 (Raymond Rapaport): 1973 年任康拉德·科塔克本科生田野助理, 现为生物化学家。

玛克辛·马戈利斯 (Maxine Margolis): 参与 1980 年阿伦贝皮田野工作; 佛罗里达大学人类学教授。

杰拉尔德·米兰尼克 (Jerald T. Milanich): 为 1980 年阿伦贝皮田野绘图、拍照; 佛罗里达州立博物馆考古学家。

伊兰尼·埃斯科拉诺 (Iraní Escolano): 巴西社会科学研究者; 1985 年、1987 年参与阿伦贝皮电视研究计划。

佩尼·麦基 (Pennie Magee): 参与 1985 年阿伦贝皮电视研究计划; 佛罗里达大学人类学博士。

朱丽叶·科塔克·马夫罗马蒂斯 (Juliet Kottak Mavromatis): 康拉德和贝蒂之女; 1973 年、1980 年、1982—1987 年到访阿伦贝皮; 现为开业医学博士, 医学助理教授。

尼古拉斯·查尔斯·科塔克 (尼克) (Nicholas Charles Kottak [Nick]): 康拉德和贝蒂之子; 1973 年、1980 年、1982—1987 年到访阿伦贝皮; 参与 1991 年对当地生态意识的田野调查; 哥伦比亚大学主修人类学; 2002 年获艾默里大学人类学博士学位; 他的博士论文来自多年对莫桑比克北部的田野调查。

珍妮特·邓恩 (Janet Dunn): 密歇根大学人类学博士; 1992 年夏与科塔克一同在阿伦贝皮田野, 并于 1996—1997 年在该地独立完成博士论文调查, 重点研究了在大众媒体影响下, 家庭生育策略的改变。

道格·琼斯 (Doug Jones): 密歇根大学人类学研究生; 博士论文以阿伦贝皮为田野点, 对女性审美标准异同进行跨文化比较研究; 也研究了阿伦贝皮种族名称的变迁; 现为犹他大学人类学助理教授; 仍在研究巴西人的种族分类。

克里斯多夫·奥利里 (Christopher O'Leary): 密歇根大学人类学研究生; 担任珍妮特·邓恩 1997 年夏季田野助手; 也研究了阿伦贝皮新教的兴起; 博士论文以食物搭配和营养学为重点, 研究了当地社会经济变迁; 现为加州理工学院人类学助理教授。

村民

阿尔贝托 (Alberto)：渔民转职为酒吧老板，康拉德·科塔克最好的报道人、朋友，兼 1973 年、1980 年田野助手。

托梅 (Tomé)：阿伦贝皮 1970 年代最成功的渔民、船长兼船主。

朵拉 (Dora)：多次担任人类学家们的厨娘；未婚母亲，曾被村里人视作“村妓”。

费南多 (Fernando)：小心谨慎的成功渔民；在阿伦贝皮的转型中诉诸仪式，染上酗酒。

艾德丽 (Edely)：克劳迪娅（可乐）的女儿；继承了她妈妈的餐厅生意。

达利娅阿姨 (Aunt Dalia)：靠嬉皮士购买力获得经济成功的女商贩；在后街开一家果汁吧。

卡罗琳娜 (Carolina)：阿尔贝托的妻子；从 1970 年代起就在下街成功地做起生意；仪式参与者。

克劳迪娅（可乐）(Claudia [Coló])：1970 年代初开设了阿伦贝皮最好的餐厅。

迪尼奥 (Dinho)：托梅的弟弟；1980 年时有五艘船，贩鱼，阿伦贝皮最有钱的创业者。

杰米 (Jaime)：巴西钛业工人；1964 年、1965 年田野调查队的送水工。

朱莉娅 (Julia)：有裸露癖精神问题的年轻村民。

劳伦蒂诺 (Laurentino)：特立独行，被怀疑崇拜恶魔的店主。

玛利亚 (Maria)：当地坎东布雷仪式中的“圣女儿”。

罗贝托 (Roberto)：萨尔瓦多的鱼贩；1964 年时一直走访阿伦贝皮。

普鲁登西奥 (Prudencio)：阿伦贝皮不在乡地主的代理人。

索尼娅 (Sonia)：托梅的嬉皮士妻子。

地主

豪尔赫·卡蒙斯 (Jorge Camões)：第一位受过大学教育的不在乡地主；主导了阿伦贝皮的地产业兴起。

弗兰西斯卡·里卡多 (Francisca Ricardo)：最后一位住在阿伦贝皮的地主；死于 1924 年。

目 录

中文版译序·····	7
前 言·····	11
致 谢·····	13
主要人物·····	16

第一部分 变迁的故事

第一章 前世：60年代·····	3
开始纯属偶然·····	4
60年代·····	6
马林诺夫斯基和小型项目·····	8
这是一个世外桃源·····	15
第二章 今生：通往1980年的道路·····	22
人类学客观分析的障碍·····	30
1980年：“整个世界都在向阿伦贝皮开放”·····	32

第二部分 桃花源

第三章 平等结构·····	39
开放的个体化社区·····	40
亲属关系的成本和收益·····	43
性别问题：大男子主义和男女不平等·····	47
种族关系·····	52

第四章	渔民精神	55
	船员的生活	58
	在平等社会中脱颖而出	62
	捕鱼地点之谜	67
第五章	更大的池塘	71
	保护人的荫庇	74
	在外部世界游历	81

第三部分 悸动桃花源

第六章	褐色的阿伦贝皮	87
	职业分化	91
	机动化与渔民合作社	92
	从技术到财产	95
	分层的兴起	96
	成功的魔力和宗教的发展	98
	创新和过度捕鱼之忧	102

第四部分 现实

第七章	梦想之地的新一轮新日	107
	土地细分	111
	人口增长	113
	熟悉的外来者	114
	租赁生意	115
	嬉皮士手册	115
	嬉皮村的状况和文化	118
	黯淡的象征	124
第八章	不在捕鱼，就在巴西钛业上班	125
	更大的渔船和远距离捕鱼	127
	机动化与合作社	128

市场	129
双重收益	130
分层的起因：资本和平地上的时间	132
新船员：陌生人和债务人	133
从同伴到利用	134
阿伦贝皮人在哪里？	135
新秩序的基础	136
在巴西钛业上班	138
第九章 政府的网络	143
福利和教育	143
公共卫生	146
婚姻和国家	149
男女性别比例和女性地位	151
第十章 社会差异与社会异常的原因	153
中产阶级的兴起	154
对抢劫者的非理性恐惧	155
酗酒和精神病	156
从个体特征到集体标签	159
种族关系与性别角色	160
宗教的诞生	163
第十一章 外来者的社区	169
老师	171
村妓——一旦偏常消失，曾经偏常的人又会怎样	176
外地人	180
创新者	185
那时，更好吗？	193
第十二章 整个世界都在向阿伦贝皮开放	196
国家与世界的联系	197
文化差异：电视和阅读	199
研究电视	200

	跃跃欲试加入世界体系	203
	图像、态度与渴望	206
	节日、地方文化和世界体系	210
	仅仅是表演者	212
	生活还在继续	215
	追忆阿尔贝托（作者：尼古拉斯·查尔斯·科塔克）	216
第十三章	下一代	218
	变迁在继续	221
	下一代	227
第十四章	2004 年的阿伦贝皮	229
	全球化与地方性	240
第十五章	社会变迁和全球化的比较	242
	1980 年到 1981 年：不同变迁过程掠影	244
	总结阿伦贝皮的转型	245
	1990 年代早期：马达加斯加的转型和后现代性	248
	历时性研究和比较研究的范围	251
附 录	252
参考文献	259
关于作者	262

第一部分

变迁的故事

第一章

前世：60年代

本书来自对阿伦贝皮^[1]（巴西巴伊亚州）所进行的多次考察：1962年、1964年、1965年、1973年、1980年、1982—1987年间、1990年代早期、2003年、2004年。全书架构基于20世纪60年代村庄和当代社区的比较。第三章至第五章，介绍了1965年至70年代中期，阿伦贝皮在受到外界文化影响之前的基本信息。改变的主要动力是渔业、旅游业、嬉皮士文化入侵、工业污染，以及通过修成一条连通州府萨尔瓦多的道路而实现的都市化。

1973年，我在离开阿伦贝皮八年之后重返这里（见第六章），正是从这一年开始，上述趋势及经济发展，大大改变了当地生活。我在1973年间进行的田野工作，描绘了阿伦贝皮的变迁景象。第六章描述了1973年的阿伦贝皮，提供了一个过渡，将第四部分（第七章到第十五章）联系起来，第四部分描述了当代社区发生的巨大转变。阿伦贝皮的改变，甚至可与萨尔瓦多（巴西第三大城市，拥有三百多万人口）相比较，她正是通过这种变化进入现代世界体系。本书讲述的就是变迁的故事：阿伦贝皮的全球化。

[1] 阿伦贝皮名声在外，纵有化名，也难掩其华，文中便不假别名。不过，村民的姓名与某些细节则稍加转换，以讳隐私。

开始纯属偶然

这虽说是一个关于变迁的故事，但一开始并未在预料之中。它的开始纯属偶然。1962年夏天（北美），我开始住在阿伦贝皮。那时正是我在纽约哥伦比亚学院（隶属哥伦比亚大学）念大三、大四的时间，我的专业是人类学。我当时参加了为本科生提供的民族志调查项目（这个项目现已结束）：亲身接触当地文化和社会生活并进行研究。项目有个冗长的名字，叫哥伦比亚-康奈尔-哈佛-伊利诺伊大学人类学暑期田野调查项目，顾名思义有四所大学参与并有不同的田野基地。其他三个田野点在秘鲁、墨西哥和厄瓜多尔。巴西萨尔瓦多周边地区是哥伦比亚大学的田野点。

田野调查队的负责人是马文·哈里斯教授，1963年我在哥伦比亚大学读研究生时，他是我的导师，也是我的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同样在萨尔瓦多的还有查尔斯·韦格利教授，他也是位人类学家，他与哈里斯等人共同成立了这个项目。哈里斯和韦格利通过他们与巴伊亚社会科学家的关系，选择了两个很有人类学旨趣但又接近萨尔瓦多的村庄，目的是与本科生们保持联系。两个村庄在同一条路上。阿布朗提斯（Abrantes）是一个靠近萨尔瓦多的农业村落，相对远离渔村阿伦贝皮的行政中心。我自己比较喜欢海边，就选了阿伦贝皮，和我同组的是大卫·爱泼斯坦。哈里斯让我俩租下一所城里人的旧房子，那个城里人只是偶尔来阿伦贝皮度假。

韦格利教授的女儿贝蒂（来自巴纳德学院，学的也是人类学），也来到萨尔瓦多，与父母共度暑假。她和我们一起走访了阿布朗提斯和阿伦贝皮，说她也想在阿伦贝皮做田野调查。贝蒂与一位当地妇女住在一起，但自从我和大卫雇了一名厨师，她也和我们一起吃饭并分摊食物和补给的费用。贝蒂的母亲是巴西人，贝蒂也出生在巴西，所以她也会说葡萄牙语（她的母语）。这使得她比我和大卫更能适应田野。很多时候她也好心地为我们做翻译。

教过三十年人类学，现在回头去看，我觉得自己的第一次田野调查经历很是独特。很多人类学家都不是从本科开始，而是在读完研究生为了获取博士学位才选择田野点。他们通常会根据自己日后的工作地点或研究主题而定。比如，我最长的田野调查项目，就是进入研究生院后才开始的。在调查过世界上很多

地区之后，我发现自己对非洲东南海岸附近的一个大岛，马达加斯加，很感兴趣。我把有关马达加斯加文化的书都读了一遍，觉得自己可以在那里研究：以灌溉农业的扩张为代表的经济变迁所具有的社会意义。

与此不同的是，在阿伦贝皮这个项目中，是别人（田野项目指导者）替我选定了这个地区，甚至是村落。我没有时间进行田野工作前期所需要的大量背景阅读，也没有很多时间学习田野地点的语言。

虽然一开始我无法控制对阿伦贝皮的选择，但我笃定坚持在这里进行研究，尤其是看到从1973年起，在不到二十年里，阿伦贝皮显著表现出，比其他地方一个世纪还要巨大的发展变化。本书的主要内容就是关于变迁过程的长时段（长期延续）田野工作。

我在1962年的大部分田野工作准备，都是在哥伦比亚哈里斯的田野前研讨班和科米塔斯教授的民族志田野方法研讨班上完成的。在哈里斯的课上，我们讨论进入巴西后将要进行的研究类型。哈里斯督促我们做小型项目，要求我们关注在三个月时间里容易调查到的社区生活中的有限方面。项目资助者也没想要我们作出一份传统的整体民族志，即一项建立在长期生活和参与观察基础上，囊括当地生活各方面的研究。另一方面，科米塔斯的研讨班，则教给我一些在长期和深度民族志中的技巧。1962年我做阿伦贝皮田野工作的困难之一是，我自己想做整体研究，而项目则更倾向小型项目。

项目的目标比较保守。现在我已意识到，项目的目标其实是比较实际的，因为我们是初学者。哈里斯和其他带队者希望我们自己亲身实地调查——来看看我们是否够资格将来在文化人类学领域求得一席之地。我们的调查经历也可为我们今后更长期的田野工作做准备。我们的小型项目训练，以及田野前研讨班的作业，就是通过查阅文献资料，写一篇关于我们计划在巴西研究的主题论文。

哈里斯建议我研究种族关系，这方面已有大量文献。关于巴西和美国种族关系的比较研究都很合适，因为两国都有奴隶制历史。两国都存在欧裔、非裔和美洲原著民大量融合的情况。为了准备研讨班上的讨论，我读了很多书。我了解了巴西和美国在种族角色上的主要差别，还写了一篇研究报告。哈里斯和我后来就巴西种族分类专门做了一项小型研究，具体情况我将在本章后半部分继续讨论。

虽然我准备调查巴西种族关系，但我的巴西葡语准备不足。语言是我田野

调查中最大的障碍。我从未出过国，不会说外语：高中（拉丁语）和大学（德语）几乎没有教会我如何发音。1962年夏天，我把大量时间都花在请求巴西人向我重复他们说过的所有内容上，结果被阿伦贝皮人称为鸚鵡（*papagaio*），意思就是说，我只会重复别人说话。我觉得，要是你的话还没五岁小孩说得好，要想透视当地社会可就没那么容易了。

60年代

1962年6月，我第一次来到阿伦贝皮，从萨尔瓦多到此的五十五公里旅程颇不平坦。我们坐着吉普车，花了三个小时，才到达目的地。阿伦贝皮海拔为零，位于赤道以南13度，虽然这里全年没有严寒，但六七月份却是阴雨绵绵，致使我们旅途艰难。雨水害得土路泥泞不堪，我们每次往返出行，都会至少受困一次。为了让沉重的吉普车爬出泥坑，我们常要一群田野队员和十几个路人协力推车。



“我们至少会被卡住一回。”1964年，从行政中心阿布朗提斯前往阿伦贝皮的道路。（康拉德·科塔克摄）



1960年代我们到阿伦贝皮去的土路碎成砂石。(康拉德·科塔克摄)

沙地连着泻湖，涉过泥泞之后是更大的沙地。大雨过后，穿过阿伦贝皮西边的淡水泻湖，一路驶来，吉普车看起来就像摩托艇。大水溅进座舱，有时发动机都会熄火。泻湖之后映入眼帘的就是沙丘，上面是密密麻麻的椰子树，这让我们的旅途遇上新的困难。我们必须沿着其他车子的辙痕才能找准进村方向。有一回，备受挫折的行程刚刚结束，我却无法在自己的租屋前停下，原来是刹车又坏了，我猛踩离合器，车子才没有一头冲入厨房。

但是，阿伦贝皮之旅绝对不虚此行。这是我能想到的最美的田野风光。村落介于海洋和泻湖之间，一家家紧密地一字排开（绵延近千米）。阿伦贝皮比我后来看到的南太平洋诸岛都要壮观。阿伦贝皮的房子漆成蓝色、粉色、紫色或橙色，边上立着高高的椰子树。房子北边是广垠的银沙滩，由大小不一的石块和大西洋海浪包围的游泳区。晴朗的八月天，阿伦贝皮流光溢彩：湖蓝色的海洋和泻湖，橙红色的墙砖和屋瓦，粉色和蓝色的房子，绿色的棕榈树，白色的沙滩。每到星期天及夜晚时分，中心广场和白色的天主教堂东边，各种颜色的渔船泊在港口。码头由水中或隐或现的大块礁石组成。每个清晨，渔船驶出狭窄的港湾，扬起阳光炙白的风帆，向着一天的目的地驶去。

阿伦贝皮美丽的自然风光，同时适于中产阶级品味，从1962年起，这个渔村就吸引了不少观光客与度假的游客。然而，即使在旱季（每年十二月至来年二月），颇不平坦的道路仍使得旅途艰辛。因此，只有少数镇上居民在阿伦贝皮有消夏住房，主要是中产或中产偏下阶层。虽然有限的公车业务在1965年已经开通，但直到1970年这里的交通状况得到改善，才带来少许游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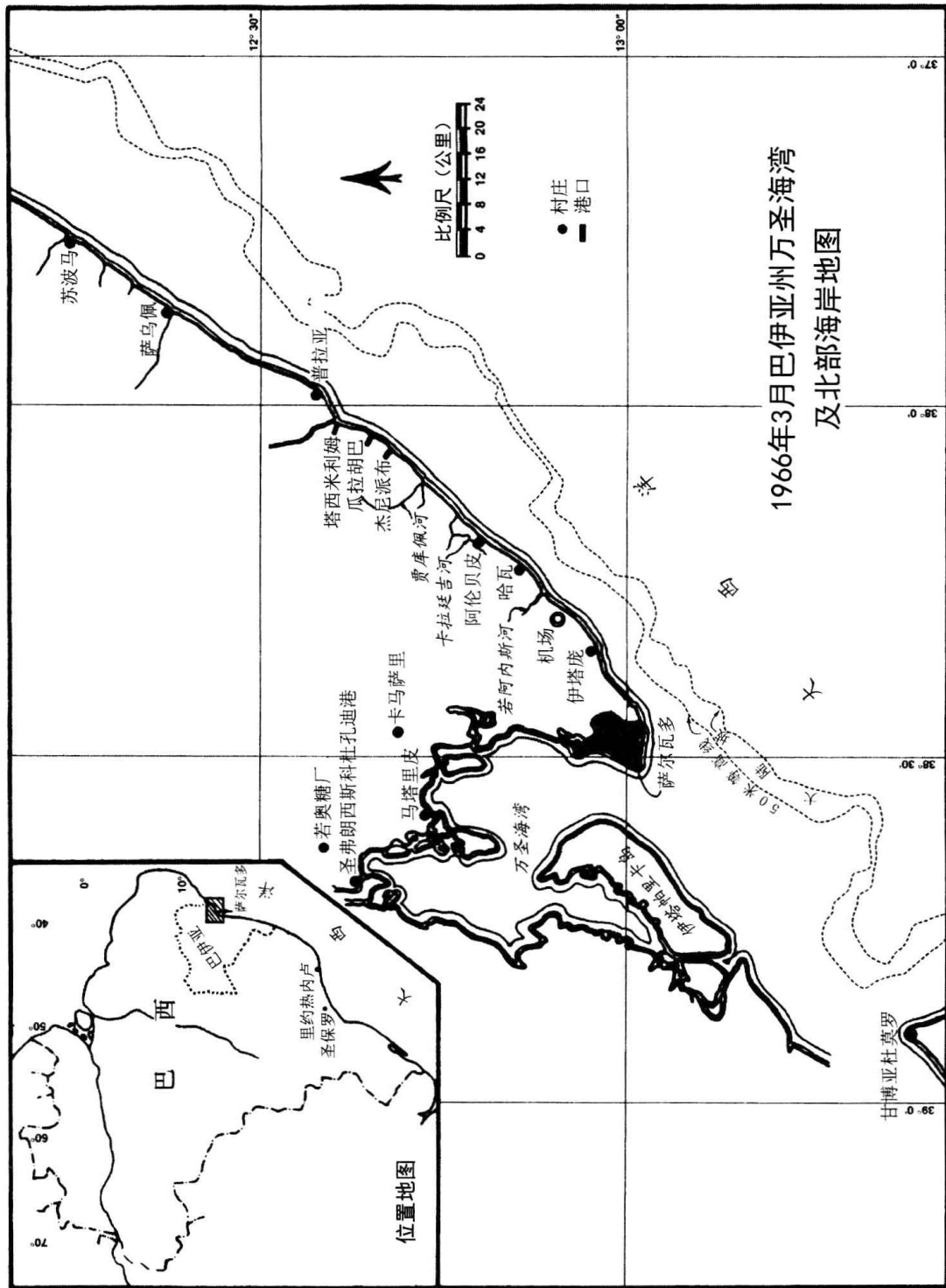
阿伦贝皮的贫困和公共医疗水平低下，与本书标题中所说的“天堂般的桃花源”相去甚远。按理说，阿伦贝皮人可从两公里外小村落的大井（Big Well）获取饮用水。那里有个有生意头脑的人靠卖桶装水给阿伦贝皮人来赚钱。井水供不应求时，村民们便会从淡水泻湖取水。有些母亲甚至用湖水给小孩冲奶粉。考虑到这些用水习惯，再加上村民们就在湖边灌木丛解手（雨季水位上升会淹没岸边），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阿伦贝皮小孩会罹患肠道紊乱和严重营养不良（后者大部分由体内寄生虫引起）。

马林诺夫斯基和小型项目

当时的我便是这样一个初出茅庐的民族志调查者，目标远大，带着巨大的语言障碍，进入这个浪漫而又困难重重的调查点。下面我要从两个方面讨论我在阿伦贝皮的工作：一是我的科学和专业目标；二是我在接触异文化村落时的个人反应。先说科学目标。

作为一个认真的人类学学生，我想将课堂所学付诸实践。我很希望自己能像马林诺夫斯基在其经典民族志《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一项对美拉尼西亚渔民和贸易所作的田野研究）第一章中所写的那样，进行我自己的田野工作。

为此，我经常将自己的经验与马林诺夫斯基相比较。我们的田野点确实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也曾在热带的南海（特罗布里恩德群岛）做过调查。尽管阿伦贝皮是在陆地，但是“南海群岛”这个词却不断在我脑海中闪现。我读着马林诺夫斯基驻足沙滩的民族志描述，想象自己就穿着他的凉鞋。马林诺夫斯基也和我一样，在田野初期与当地入之间存在沟通障碍。“起初我真的很难和他们谈得很细很深。我想能够弥补这一缺陷的最好方法便是收集具体数据，于是我对每个村庄都进行人口调查，写下谱系，画出亲属关系图，收集亲属制



度名称。”(Malinovski, 1961, p.5)

我非常想做马林诺夫斯基做过的事情，尤其想对村子进行人口调查，但是田野导师哈里斯却不让我那样做，他教给我另一样东西：在收集民族志所需要的细致而精准的数据之前，我需要先和村民建立密切联系，我要让他们认识并信任我，让他们认为我可信，对他们无害，可以毫无顾忌地回答我的问题。此外，我不熟悉当地农村生活，在人口调查过程中不容易抓住重点问题发问。因此，最终我还是遗憾地将人口调查放在一边，而去专心经营人脉。我的同伴大卫·爱泼斯坦和贝蒂·韦格利，也在做跟我一样的事情。

如何经营人脉？马文告诉我：“去认识当地人吧。”于是，我便开始加入渔民们的行列，跟他们一同跳入泻湖洗澡。在我第三次洗澡时，我不小心拨到一坨漂着的驴粪（我想我还是分得清这是什么动物的），这让我第一次怀疑这种“聪明的”参与观察法。后来听说泻湖水系有血吸虫感染，我就不再去那里洗澡，再往后更是小心地避开泻湖。我遵循公共卫生部门建议，每次接触过泻湖水，都会用酒精擦拭外露的肌肤。但在阿伦贝皮人眼里，却是觉得我这种防御措施非常可笑，他们告诉我：不用担心，咸水湖里的小鱼自会吃掉肝吸虫（其实都是细菌）。

泻湖去不了了，还有礼拜堂可去：每到晚上，渔船返港了，澡也洗了，一天中重要的一餐也吃了，男人们便会聚在那里聊天。这是男人的地盘，女性只有小女孩和老妇人才敢靠近。这时，大卫和我便会坐在一边与他们聊天。我的葡萄牙语很糙，村民们还老打乱我的问题。他们对美国很好奇，但是提的问题却很滑稽：“美国有骆驼吗？”“大象呢？”“猴子呢？”他们将人们从萨尔瓦多带回的彩票背面的动物一个个拿来问我。“看！天上，那是从美国飞往里约的喷气式飞机，”每隔一个晚上，他们就会望着天空看飞机，而这也反映了航班规律。我每次搜肠刮肚想出单词，问他们一个关于阿伦贝皮的问题，都会得到不可思议的反问，比如：“你以前见过熊吗，康拉多？”

“熊，熊，”我机械地模仿道。

“鸚鵡，鸚鵡！”他们哄笑道。

“对，我见过，在动物园见过。”

经营人脉真的很神奇。

当我对这种浪费时间的访谈心生抵触时，马林诺夫斯基闪过我的脑海，让

我很想做一些“更科学的”事情。哈里斯和我的小型项目，计划研究巴西和美国之间的种族关系差异。美国有正式法律规定种族身份，若是某个美国人的父母，一个是黑人（非裔美国人）一个是白人，他或她一出生就被自动分为黑种人，完全不考虑其体质特征。在巴西则由许多因素决定一个人的种族身份，而没有正式规定。然而，迄今也没有人正式指出巴西缺乏这样的法律，我们认为，像阿伦贝皮这样的混合社区，从遗传学角度和表型（体质）角度来说，是一个合适的测试地。

按照自动归属原则，亲兄弟姐妹属于同一个群体。所以，在美国，亲兄弟姐妹不能从属于不同种族。在阿伦贝皮，我们想要找到一些体质特征不同的亲兄弟姐妹，看看他们是否归为不同种族。我们找了肤色、发质和面部特征各有不同的三姐妹。给三姐妹拍过照后，我终于发现了比报告北美动物更具挑战性的事情。我选了一百名村民，将三姐妹的照片给他们看，让他们猜每个女孩的种族。结果大家结论各异，原来在巴西，亲姐妹也可以从属于不同种族。

第一份关于种族的调查，也产生了一些新问题。我们绘制了一些表型各异的个体图片，根据这些图片设计了另一些问题。对另一群村民进行抽样调查后，我发现阿伦贝皮人用了更多的种族名称，比之前调查的巴西社区多四十个。他们的用法各异，以至于对同一个人的种族分类会每天一个说法，甚至对自己的认同也很不固定。我在阿伦贝皮待满三个月时，已对巴西种族名称烂熟于心，哈里斯和我也以此为基础写了几篇文章。虽然我对自己没能像马林诺夫斯基那样去做人口调查而感到遗憾，但我坚信我的初次田野经历自有收获。

再次回到巴西田野时，我明白：必须学好葡萄牙语。当时我仅能谈论关于种族关系的话题。第二年夏天（1963年），当另一个田野调查队在阿伦贝皮时，我便去哥伦比亚大学上了个葡萄牙语强化班。同样是在1963年夏天，贝蒂和我喜结良缘，我们的爱情始于阿伦贝皮一个花好月圆之夜；同年秋天，我开始攻读硕士学位。

1964年春，我被任命为田野调查队副领队。7月，我回到阿伦贝皮，决定开始进行我的人口调查。但这并非仅是一个人口调查，当时我的人类学素养和葡萄牙语都有很大提高。我觉得自己已经做好准备，要做一个有模有样的访谈大纲（类似问卷）。现已成为医学人类学博士的彼得·戈林，当时是位于阿伦贝皮南部村庄哈瓦村田野调查队的本科队员，彼得也读过马林诺夫斯基的书，



日落时分，阿伦贝皮西面美丽但有微生物感染之虞的淡水泻湖。（杰拉尔德·米拉尼克惠允使用）

他也很想用马林诺夫斯基提出的“具体的统计性资料法”（Malinowski, 1961, p.24），来满足民族志调查者“对某现象进行全面调查的第一要务，而不是专挑那些耸人听闻[与]独一无二的事情”（Malinowski, 1961, p.11）。

我准备调查阿伦贝皮所有的家户，彼得同时在哈瓦做相同的工作。但是我们需要调查工具，我们的田野调查队领队，著名的巴伊亚医师兼人类学家泰利斯·德阿泽维多，给我们提供了所需：在巴伊亚南方用过的访谈大纲。我们针对渔村进行了相应修改，并打印出来。

“访谈大纲”与标准问卷的区别在于，民族志研究者与报道者面对面直接交谈，问问题，并用笔记下答案。问卷调查则是社会学家的通行用法，这种方法不那么直接，也不是面对面进行；通常来说，应答者只需填写表格。社会学家调查的常常是受过教育的人们，那些人可以自己回答问卷。人类学家遇到的却并不总是这样，我们需要自己记下访谈者的回答。

因为节奏为我们所控，我们可以随着访谈中出现的有趣之处，临时岔开访谈大纲顺藤摸瓜。因此，民族志研究者，可以使访谈内容不局限于基本问题，

而是更加开放深入，能够收集一些可比较、可计量的信息。这些开放式询问，让我获得了与问卷调查同样多的信息。

我们在阿伦贝皮的调查访问，也说明了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调查方法上的另一个不同。社会学家的研究对象通常是大规模人群，比如，在美国，他们必须用“抽样调查法”，这样他们可以从小群体的细致研究来推断大群体的情况。在阿伦贝皮，我们不需要做抽样调查，因为村里人少，我们可以把全村作为一个样本，也就是说，访谈村里 159 户人家。

最后我需要提一下文化人类学与社会学的区别，社会学家经常用邮件或是聘请一些调查助理来协助他们编写、执行或分析问卷。相比而言，民族志学家则是身处社区工作，在那里，民族志工作者会遇到一系列最真实的现实问题。我在阿伦贝皮访问工作遇到的障碍，并不在于少数村民在我面前紧闭大门，也不是一些淘气的小孩用我的裤子当手帕擦鼻涕。我真正遇到的障碍是跳蚤。忘了是第三次还是第四次访谈时，我走进一处建在沙地上的泥板房。我在那里对一个大家庭进行访问，十几张笑脸望着我，但我身上痒得让我挠也不是不挠也不是。我强忍到问题问完，但再也不想去问更多开放性问题。我一路跑回家，穿房而过，冲出后门，一跃跳入涨潮的泊湾。我是用咸海水冲洗跳蚤咬过的地方。夏天的时候，我们很多队员都为跳蚤所困，贝蒂作为女生最不幸；男生则好在还可以穿上长裤，在裤管撒上防跳蚤药粉。尽管有那些成群的小虫子添乱，我们最终还是成功地访问了阿伦贝皮大多数家户。

我们的访谈大纲有八页厚，我们的问题（对每个家户成员）涉及年龄、性别、种族身份、饮食、工作、宗教信仰和习惯、教育、政治倾向、财产、消费模式，以及家畜、船、椰子树、土地和农田的所有权。我鼓励彼得不要仅限于小项目，而是像我一样沿袭马林诺夫斯基的方法套路。他凭兴趣爱好来调查，两个月就调查完了哈瓦全部家户。后来他徒步来到阿伦贝皮，在八月份协助贝蒂和我共同完成访谈。

现在我意识到，两种方法都有自己的优势。小型项目容易掌握，能为调查论文做好充分准备，马林诺夫斯基的整体观也很有价值。我一直认为，如果在第一年夏天完成问卷访谈而不是仅仅局限在建立人际关系、理清种族关系上，我的葡萄牙语肯定能提高很多。彼得·戈林 1964 年在阿伦贝皮和哈瓦进行的调查工作，使得他的葡萄牙语水平进步很快，远远快于我在 1962 年哥伦比亚大



1964年的田野调查队员：彼得·戈林（左二）和埃丽卡·布雷斯勒，与阿伦贝皮南面瓦哈渔村的住家在一起。可以留意一下当地人的体质多样性程度。（康拉德·科塔克摄）

学所得。

直到1964年我才意识到这次调查给我带来的额外收获：当时每个阿伦贝皮家户都至少有一个田野队员进入。数年之后，我听说很多村民都欣喜地记得那些来访的田野调查员们。我们的调查问题，那些关于他们家庭的问题，让我们与阿伦贝皮人能够互相真挚交流，他们感觉到我们并没有看不起阿伦贝皮人。

在我眼里，阿伦贝皮人性格坦率，热情好客，他们的警惕性远远低于我们1966年到1967年间调查十四个月的马达加斯加贝齐寮人^[2]。大多数阿伦贝皮人都热情欢迎我们到家中，愉悦地回答我们的问题。只有少数家户很难接近，他们关上窗门，告诉邻居他们不会回答我们的问题。这时我便只能大致估算他们

[2] 贝齐寮人(Betsileo)：居住于马达加斯加岛中南部中央高地之一支马拉加什民族。操马拉加什语一种方言，居住于河谷地区，从事农耕，彼此间被浓密的山地森林所隔绝。贝齐寮人起初分为许多自治部落。19世纪沦入法国殖民地统治之下。精于修筑灌溉渠道，辟建梯田种植稻米，亦种植树薯、玉米、薯蓣、香蕉及甘蔗。另有部分人转业为木工、水泥工，或其他专业性工匠，或是迁居马达加斯加其他地区从商、任公职。——译注

的基本情况，估算他们的收入、消费水平、公共信息的使用和行为。幸运的是（因为1964年阿伦贝皮的调查数据是1960年代及后续的主要分析比较数据来源），整个村庄只有不到十户家人拒绝我们的调查访问。

不过，我在1964年所做的，不仅是问卷访谈。我刚到阿伦贝皮，便遇到一个极好的访谈者阿尔贝托，在后面的故事中我会经常提到他。他是一位四十岁的渔民，也是我们厨娘的大哥，他几乎每晚都来光顾我们的住处，热心教我关于渔业的知识。同时，我也在与海滩上其他渔民和渔商的交流中了解渔业知识，有时我还跟他们一起出船，我还遇到阿伦贝皮最著名的船长托梅，他的名字在阿伦贝皮晚近的历史上经常会被提到。

1965年我第三次研究阿伦贝皮。由于之前对问卷调查和渔业访谈的分析结果前景喜人，哈里斯和我都认为我应该再做一个夏天的田野，获取充分数据来写我的博士论文，事实上我也这样做了。这次我和贝蒂没有随田野调查队伍同去，而是单独前往。那时我有研究生奖学金和补助支持，当时贫困的阿伦贝皮生活也很便宜。1965年夏，我再次参考马林诺夫斯基的方法，但我已经有了很多统计和观察的数据来为我的社区组织及“其文化构成”，提供“翔实明确的大纲”（Malinovski, 1961, p.24）。

现在我需要做的，就是为这副骨骼充实血肉。因此，我在1965年夏天，“通过密切接触土著人的生活……经时时精细的观察”，收集了“现实生活的不可度量方面”（Malinovski, 1961, p.24）。此时，我已不需要再回到马林诺夫斯基那里，因为我知道，虽然有了骨架，我仍然需要找到更多的当地人观点、价值观和感受；听故事，调查案例，收集日常生活中点点滴滴的细节。我知道，我像调查委内瑞拉亚诺马莫印第安人的首席民族志研究者拿破仑·查冈（Napoleon Chagnon）一样，“多么喜欢阅读那些融入真人真事、有甜有苦、五味杂陈的文字”（Chagnon, 1977, p.xi）。我想在我的阿伦贝皮民族志中加入这些维度：真情实感。

这是一个世外桃源

以上是我的专业目标和研究方法。民族志的另一面应该更加人性。无

论人类学家希望自己多么客观和科学，人毕竟不是机器。我们必然是参与（participant）观察者，参与——并修正（无论多么微小）——我们正在调查和试图理解的现象。人类学家不是机械的记录工具，而是成长于一个独特的文化传统之下，有着特殊人格特点和经历，怀有自己动机、感受、价值和反应的人。我们的报道人也不是机械的工具，我们对他们也要区分对待。有些报道人总是让我们感到不快，还有些报道人则经常让我们感到嫌恶。

人类学家成长在某一文化氛围中，对其他文化心怀好奇，但他们仍会经历文化震撼，尤其是在初次田野之旅中。文化震撼（cultural shock）是指进入一个异文化情境，在与之互动的过程中所体验到的全部感受。这是一种由于离开司空见惯、念兹在兹的本文化而令人害怕不安的疏离感。

1962年，我计划去巴西时，一点都不知道离开了自己的语言和文化，我会变得多么一无所有。阿伦贝皮之旅，是我第一次离开美国，我是一个在乔治亚州亚特兰大和纽约市长大的城里孩子。我没有一点在美国或拉美农村生活的经验，只受过一丁点葡萄牙语训练。

我们从纽约市直飞巴西巴伊亚州的萨尔瓦多，途中只在里约热内卢有短暂停留；田野调查结束时，作为奖励，我们在这里多停留了些时日。当飞机抵达位于热带的萨尔瓦多，我几乎不敢相信眼前见到的沙滩。“这不是雪吗？”我问同行队友。哈里斯把我们的食宿安排在天堂旅馆，这里可以眺望巴伊亚一望无垠、壮观的万圣海湾。我对巴伊亚的第一印象是气味：熟透或是正在腐烂的芒果、香蕉和百香果的陌生气味，以及拍打无处不在的苍蝇。饭菜里奇特地混合着大米、黑豆、一块块认不出的肉，以及滑动的肉皮。那里的咖啡很浓，糖很粗。每张餐桌上都会放着装牙签和木薯粉（cassava）的罐子，像撒帕尔马干酪一般撒在每一样吃的东西上。我还记得燕麦粥和西红柿浓汤里的牛舌。有顿饭是一个切成两半的鱼头，鱼眼睛还在，眼神空洞，泡在一碗亮晃晃的棕榈油中望着我。由于我自己的文化中有“别喝饮料”情结，我花了几天时间才想通：矿泉水要比各种汽水都要解渴。旅馆楼下是夜总会，这个夜店的巴萨诺瓦舞曲^[3]，经常害得我们睡不好。

我只能大致记得在阿伦贝皮的第一天。我没有像很多在南美热带森林遥远

[3] 巴萨诺瓦舞曲（bossa nova）：一种类似桑巴的巴西爵士乐舞曲。——译注

部落或是在新几内亚高地做研究的民族志调查者那样，徒步或乘独木舟抵达田野点。相对那些地方而言，阿伦贝皮并不孤立——当然，只是与我之前去过的田野点相比。我与阿伦贝皮的初次接触只是一次造访，将自己安顿下来。我们找到一间破败的夏季屋，它的主人住在萨尔瓦多，我们把房子租下后收拾了一下。我们雇朵拉来帮我们做饭，二十五岁的她是两个孩子的未婚母亲，还有一位女士来帮我们打扫房间洗衣物。阿伦贝皮留给我的第一印象并不深刻。我知道，在进入田野草草行事之前，我能在这个有真正厕所和浴室的天堂旅馆歇上段时间。

回到城里，贝蒂用她熟悉巴西语言和文化的优势，为我们添置了行军床、水壶、煎锅、手电筒和其他必需品。我已不太记得那次来阿伦贝皮的目的，以及谁与我们一同来的。哈里斯给我们雇了一名司机，我们和其他几位田野队员在阿布朗提斯分开。现在我依然还记得我们去阿伦贝皮路上发生的趣事：一路上，一群小孩子跟在我们车后，从沙滩穿过街道，一直跟到车子停在位于中心广场的房子前面。因此，刚到那几天，我们一直和小孩子们玩在一起。一连几个星期我们都没有自己的私人时间。小孩子们透过我们的窗户，关注我们的一举一动，有时发出怪怪的叫声。大多数时候他们就待在那里，偶尔也会互相收拾头发，嚼一嚼头发里找到的虱子。

大卫和我来自都市文化，我们都会锁门。有次他去了萨尔瓦多，我独自过夜。

“康拉多很害怕”，我们的厨娘朵拉说，“他害怕外面的小怪物 [(*bichos*) 真的或想象的怪物]。”她安慰我说，真的没什么好害怕的。骇人的小怪物，从来没在阿伦贝皮害过人；大多数人几乎都是从不关门。

最恼人的访客是一些偶尔夜间造访的酒鬼，他们向我们要酒喝或者要钱。一次夜深（大概晚上九十点钟，大多数村民都已睡下），有两个男人敲门。就冲他俩的草率语气和大嗓门，就可知道他俩显然喝醉了。两人中比较年轻的那个说，想介绍我们俩认识另外一个从州府所在地卡马萨里来的访客，他说：“卡马萨里的美国人教会我朋友说英语。”

“哦，好吧，”我们说，“我们听他说两句。”

“John Wayne”^[4]，访客说。

[4] 约翰·韦恩 (John Wayne)：好莱坞明星，以演西部片和战争片中的硬汉而闻名，是那个年代所有美国人的化身：诚实、有个性、英雄主义。——译注

“很好，”大卫说，“你还知道别的吗？”

“知道，”这个男人答道，“我靠，我靠。”

阿伦贝皮生活的声音、感情、景色、气味和味道都渐渐变得熟悉起来。我也逐渐适应了没有餐巾纸的生活，当感冒过境，村里小孩的鼻子上就这么挂着一缕鼻涕。生活在这个世界，几乎毫不费力，妇女们头顶十八升水，还能腰肢轻摆，男孩们一边放着风筝，一边以徒手抓苍蝇为娱，老妪嚼着烟枪，杂货店主从早晨九点就开始卖卡莎萨^[5]（一种朗姆酒），男人们在不打渔的慵懒下午玩着多米诺骨牌。我身处的是一个以水为生的世界：大海，是男人们捕鱼的地方；泻湖，则是妇女们经常洗衣服、洗盘子和洗澡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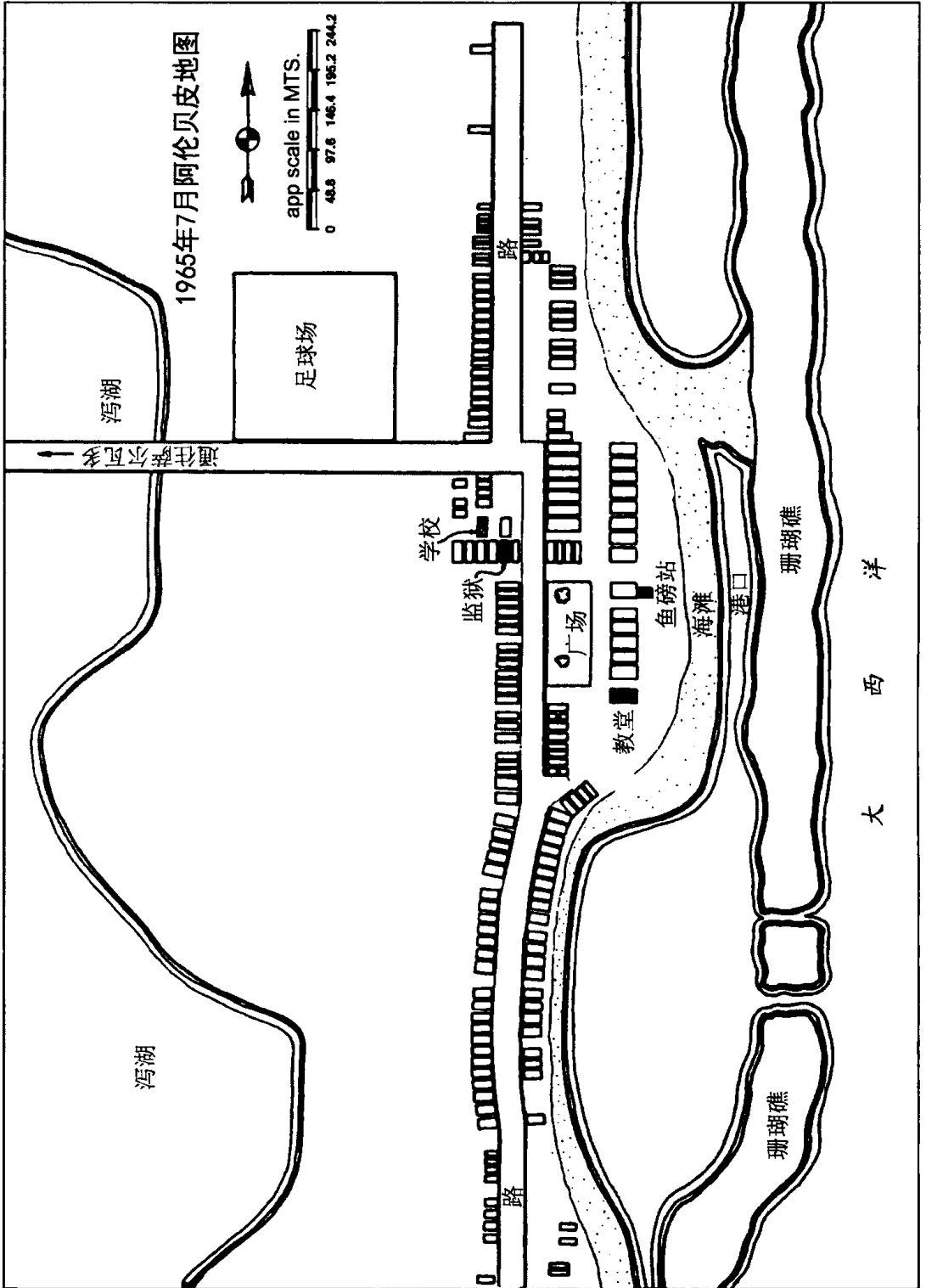
阿伦贝皮村庄紧密，房屋相连。私人空间几乎是稀缺品。难怪说村民们不用锁门——谁可以偷东西而不被人发现？年轻的情侣们只在晚上才有一定私人空间。

和许多没有通电的地方相比，更为戏剧化的是，每到月圆之夜，阿伦贝皮的夜晚就会大为改变。沙滩和水面反射出的月光，使得整个村子恍如白日。年轻人涌到街上，或是在沙滩上浪漫。渔人在礁石下寻找章鱼和“龙虾”（澳洲小龙虾）。习惯有电和人工城市环境生活的我，为这个遥远村庄的月光与夜晚生活所吸引。当然，没有月光的夜晚，同样给我很大震撼。我第一次了解了“银河”之为“银河”的原因。因为只有在天文馆，我才能看到群星闪耀的天空。向南望去，遥远的萨尔瓦多灯光，在漆黑天空为背景的星光映衬下，显得异常黯淡；而且我也是在这里第一次看到壮丽的南十字座。

就连虔诚的观星家，也会为这种月光照映下的天象所动容。与随后来临的岁月相比，这也是阿伦贝皮一段相对缓慢与自然的历史时期。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美好的月光和平静的海面，使人们偶尔还能在夜里打渔，但船队的主要模式还是早出晚归。渔船常常一星期出海五六天；作为基督徒，阿伦贝皮人以星期日为安息日。但阿伦贝皮人大多数时候的生活，都是在自然光下的规律作息。

另一个自然动力就是天气，它影响了当地生活的节奏。我访问阿伦贝皮时，

[5] 卡莎萨(cachaça)：巴西农村节庆、招待客人的常用饮料，由甘蔗酿制而成。饮用方式多种多样。一般兑上汽水和果汁，为巴西特色的开胃鸡尾酒，饮用起来别有风味。——译注



正值大雨滂沱、海浪汹涌之季。这个时候，渔船很难经得起狂风暴雨，而且返航途中，要在礁石密布的狭窄通道闪避骤风也很危险。暴风雨通常持续不到一周，但我仍然记得1964年某次持续三星期的经历。那时阿伦贝皮还没有天气预报，人们不停地推测天气什么时候会转好。村民们哀叹自己不能工作。最后，他们开始抱怨饥饿问题。于是便有人从农场运牛，杀牛来卖。然而，很多家庭穷到连牛肉也买不起。村民们说想吃鱼，想吃一些有肉的东西来补充咖啡、糖和木薯粉组成的食谱。天气甚至迫使我们停止了访谈。我们的调查日程充斥了大堆日常饮食——人们每日、每周、每月对各种食物的摄入量。其实我们觉得很尴尬，在村民饥肠辘辘之时却去询问他们平时或丰裕时都吃些什么，实际上，所有物品都要用钱来买。

热带雨季意味着长期较大的湿度，也是万物发霉的好时机。我的黑皮鞋霉变成白色。彼得·戈林在1964年去巴伊亚之前买了件海军蓝快干外套。由于我们在萨尔瓦多很少办正事，彼得便将外套挂在哈瓦的衣橱，等着要穿的时候。一次派对开始数小时前，彼得发现外套上长满霉菌，就在萨尔瓦多宾馆开了一间房，用淋浴对他的外套又抹肥皂又洗刷，穿着去了派对，没几个小时就吹干了。

我们在阿伦贝皮租的瓦房屋顶，在防潮（防蝙蝠）方面也不起用。一下雨，我们就要避开房间里漏雨的地方，但是房间里没有一处是完全干的。在一连三星期暴风雨的那一次，朵拉后来告诉我，她爱闻她小茅屋潮湿的木架泥墙（木条糊泥）的味道，她还记得小时候忍不住去舔，甚至从泥墙上剥点来吃。她告诉我们，阿伦贝皮人有时真的吃土。这种食土癖是一种缺肉时期铁质不足的症状。

除了每天在异域和异文化中的感受和经历，我们还参加了一些特殊活动。为了祭拜保佑家户的圣人和为逝去的亲属祈祷，一些妇女会在家里举办祈祷仪式。七月里最大的仪式便是查干察^[6]。渔民们在主广场“渔民协会”办公的房子里，用几个小时的正式歌舞重现了葡萄牙人发现巴西的历史。6月24日的“圣约翰之夜”，是阿伦贝皮全年第二重要的年度节日。（圣弗朗西斯庆典在二月份举行，由于这是阿伦贝皮渔业最丰产的时节，庆典也更盛大。）按照圣伊比利亚传统，圣约翰之夜，村民们会点燃篝火，喝着特制的卡莎萨（朗姆酒）调制酒。他们会做一些美味的甜品，如加糖的椰子糖（cocada），以及稍逊一筹、味道好

[6] 查干察（Chegança）：再现演葡萄牙人发现巴西的舞蹈剧，详见第十二章。——译注

似铅笔擦的玉米布丁糊糊 (*canjica*)。孩子出生时，要喝另外一些难以下咽的混合饮料，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一种融合了卡莎萨、洋葱、大蒜和各种异国浆果、草药的东西。

总结我在 1960 年代阿伦贝皮生活的感受，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深刻的远离感。那段日子，除了一个鱼贩一直开车从萨尔瓦多来到阿伦贝皮，几乎没有其他人从外面进村。我感觉与世隔绝。只有少数几个村民有收音机，很少收到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信息。每次去萨尔瓦多，我都一字一顿地读完《时代》周刊（拉美版）。有时我们还会赶在《时代》出刊的那天去萨尔瓦多。

即使对贝蒂这个（双重国籍）巴西人来说，阿伦贝皮也很陌生。这个村庄远离贝蒂熟知的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的世故、社会分层和风格意识。贝蒂熟识许多巴西的“大传统”（罗伯特·雷德菲尔德所指的“受过教育的城市精英文化”），而对巴西农民和农村贫困者的“小传统”文化不甚了解。所以，对我俩和其他田野队员来说都一样，阿伦贝皮提供了与我们以往生活状况的强烈对比。

我认为，阿伦贝皮的田野工作，同样让我们对晚近 1930 年代到 1940 年代的美国农村文化有了更深的了解。当时，在很多僻壤，尤其是穷乡，夜晚生活仍要依赖蜡烛和灯笼。这就是商业、政府和媒体尚未将工业社会的大量利润与成本引入农村人生活之前的景象。

我们直接了解了阿伦贝皮人的习惯和价值观，他们如何做到收支平衡，以及如何面对好运和厄运。我们与很多人成为朋友，例如阿尔贝托、朵拉和托梅，他们的话语、故事和经历穿插在阿伦贝皮的变迁史中，在我眼中，他们不仅仅是报道人，他们就像我在美国那些朋友和一些同事一样珍贵。而且，他们不是所有外来者都有机会遇上的人。下面我将怀着人类学家的责任感，来讲述他们的故事。

第二章

今生：通往 1980 年的道路

1973 年 7 月，时隔十一年，我再次来到阿伦贝皮，当地景观全然变样，我从萨尔瓦多过来一路上的景象同样变了样。虽然这期间来自巴西的信件和 1965 年以来同事们造访阿伦贝皮的报告，已让我对嬉皮文化侵入和社区向旅游业的发展有所准备，但我第一眼见到当地这些变化仍感震惊。我们从里约热内卢乘机到萨尔瓦多新机场，机场就位于阿伦贝皮到萨尔瓦多的路上不远。由于我们先要在城里花一段时间做些准备，我在进城的路上注意到：通往阿伦贝皮的道路已经翻修，拐弯处有个路标。可能只有一小撮人类学家能够体会到，当我看到“我的”社区名字堂而皇之地出现在路标上时内心所生的那番复杂情感。人类学毕竟是从小规模、非工业社会中孕育而生的，人类学家也至少保留了对偏远、非主流、异域文化这些传统职业偏好的痕迹。那一夜，当我沿着熟悉的海岸道路驶向萨尔瓦多，我预感到这个路标所预示的其他标志，将会继续增加我对社区孑然独立状态终结的不安。

遭遇始于第二天：当时我人还没到阿伦贝皮，而是在萨尔瓦多看电视、读本地报纸。我发现，新建的化工厂，正在污染阿伦贝皮西部和其他邻湖村庄赖以生存的淡水湖系统。电视台记者定期采访阿伦贝皮，访谈居民们对污染后果的看法。自阿伦贝皮在 1900 年代左右形成以来，居民们一直用湖水洗衣服、洗盘子，每天在湖里洗澡。然而，所有这一切都在 1973 年开始改变，曾经湛蓝、一望见底的泻湖水，如今变成漂浮着腐烂之花的一潭死水。如果肝吸虫和其他

湖水生物都死了，那些以它们为生的鱼类也会死去，这些淡水鱼曾在以往海潮大作无法捕鱼时，维持了村民的生计。工厂污染对整个湖水系统的影响可谓显而易见，但对阿伦贝皮和哈瓦（阿伦贝皮南面另一个渔村）之间最靠近工厂的内陆水域影响尤大。

1973 年去阿伦贝皮的记者们，听到阿伦贝皮人抱怨：湖水腐蚀了人们的衣服，刺痛了人们的眼睛和鼻腔。一个渔民诉说，有天晚上，他在泻湖洗澡时，发现眼睛和皮肤都刺痛得很难受，便赶紧冲回家，用井水冲洗眼睛和身体，在那之后他再也不去泻湖了。女人们抱怨道，她们长期用来洗衣物的湖水，如今使得衣物滋生出好大的黄斑和小洞。很多阿伦贝皮人现在都从大井提水洗澡。大井居民以前用骡子运桶装水到阿伦贝皮，后来发展到用货车运水。另一个阿伦贝皮商人自己也从大井进水，然后在一间摇摇欲坠的房子里提供收费淋浴，而这原本则是为了迎合旅游者的需要。

待在那里的头几天时间，也让我见识了横扫阿伦贝皮的另一个变迁。这就是很多城市中产阶级在阿伦贝皮急剧增长的度假屋和海滨别墅。由于我和贝蒂还带着两个小孩，我们决定在这三个月里租一间比以前条件好的房子。我们听说阿伦贝皮南部海边建了一些舒适的度假屋。我在萨尔瓦多的一个朋友安排我们一家人住进一间别墅，租金是我们以往房租的五倍（用美元计算）。一半是因为当时美元的波动，一半是因为我们现在需要更大更舒适的住处。不过，高房价也从另一个角度表明：阿伦贝皮俨然成为一个附近城市旅游目的地新宠，哪怕是在淡季。

我们的住房，实际上比我预计的离渔村的南边更远。这有点差强人意，因为离调查地点半公里远让我远离村庄生活，也打击了我在夜晚访问的积极性，在以往的田野调查中，晚上会有可观的收获。

一旦住房和汽车问题在萨尔瓦多落定，我便开始了重访阿伦贝皮的旅程。那年夏天，我顺利租来一辆大众甲壳虫汽车去了田野，这是当时巴西本土生产的两款性能很不稳定的汽车之一。这将是一次舒适的旅行。我想观察沿路的变迁。如果胆大点开，这段路连一个小时也要不了。在施工中的高速公路（*autoestrada*）上开过几英里，呈现在我眼前的是熟悉的双车道，从这里开始，将会一直伸展到我以往调查的阿伦贝皮村。萨尔瓦多的扩展及萨市发展为一个巴西主要旅游胜地的迹象一目了然。（它是巴西最古老、最美丽、最富色彩、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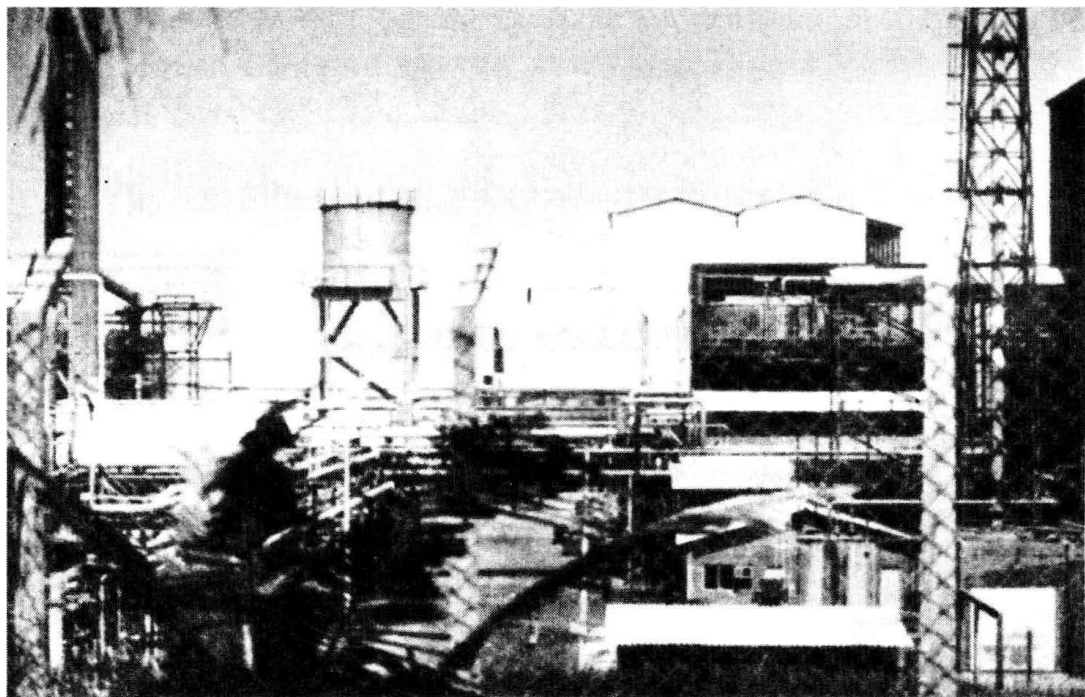
有趣的城市之一。)我驶过几家新建的面朝大海的宾馆和饭店,以及发展中的滨海社区(Pituba),在这个社区里,阿伦贝皮人现在可以很容易坐公交车去买生活必需品,不会再像以前去趟萨尔瓦多市中心好比旅行一样。

曾经和阿伦贝皮一样孤立的渔村伊塔庞(Itapoan),在1962年也发生了变迁,村子现在几乎紧靠萨尔瓦多,道路从海边延伸直抵内地。先前铺过的路面很快就压成了土路。不过,比起土路上遭的罪,若阿内斯河上失修的危桥,更让人心悸。行驶在1973年铺设的高速公路上,望着若阿内斯河,几乎让人难以想象,它的流淌意味着在没有公路的时代人们曾经的来来去去。走过之前满是泥泞的路段,我们沿着这条高速公路完成余下旅途,飞驰而去,一路无事。

我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就看见向阿布朗提斯农村和镇中心转弯的路标,1962年到1963年间有一部分田野考察队员曾在这里住过。然后就出现了指向哈瓦的标志,离柏油路三公里之外,就是彼得·戈林和埃丽卡·布雷斯勒1964年调查过的微小而迷人的海滨村庄。在转弯处,我惊奇地发现了一个鲜艳的指示牌(我看到的第一个嬉皮工艺品),上面写着哈瓦是一个“土著”艺术与工艺品制作中心。因为我知道阿伦贝皮和哈瓦只有一种本土手工制品,就是当地妇女编织的草帽,我很确定阿伦贝皮南部邻居已经受到花花世界的侵入(虽然它事实上受到的影响要小于阿伦贝皮)。

我还没准备好去迎接莫多沙漠,那里会让人联想到《指环王》。沙漠已经取代红黏土成为土壤的主要成分,从高处俯瞰,这片巨大的沙丘,使得巴伊亚海岸,看起来就像长满棕榈树的北极。然而,非自然形成的大片沙堆——显然是建化工厂期间挖掘的——堆在陡壁顶上高速公路的两边。穿过这片“人造地形”,我看到东边有家二氧化钛工厂——巴伊亚的“铁锈地带”:一条灰绿色的泥径烟尘四下弥漫。附近沙丘上堆积着二氧化钛(用于绘画颜料和燃料,就像一则美国电视广告说的“漂白我们的生活”)制造的硫化物废料。就在我的南海桃花源边上,巴西钛业(Tibrás)这家跨国企业,倾倒着大坨大坨的废料,好像好莱坞电影特效里捣碎的浇着浓油重酱的土豆。

随后,马路(商业发展的证据)到了尽头。柏油路在工厂停车场的入口处中止。接着便是坚硬的泥土路,进入了距离阿伦贝皮北部还有五公里的地方。虽然这条路比1965年的任何一条路都要好,但有些地段还是很糟糕。尽管如此,我在1973年的雨季里也没陷到过坑里。很快我便路过已经新装配了油泵



1980年的巴西钛业工厂。（杰拉尔德·米拉尼克惠允使用）

的大井村。接着，马路两边都出现了褐色的泻湖。右边是一些全新的景象，一个肮脏的小聚居区：卡拉努阿斯，这是阿伦贝皮当地房产出售和划分土地后出现的第一个贫民区。前面便是阿伦贝皮，马路只延伸到中心广场北部。

以前，阿伦贝皮在房屋位置和建筑材料上的不同，很少体现财富上的差距。瓦片砖房集中在主广场，一直向北延伸，北部地区的房屋开始形成另一个广场，但长度还不够合成一个封闭的三角形。向北前进途中，路边平行的两排砖房，逐渐被木架泥墙、上覆棕榈叶的房子取代。同样的变化也出现在中心广场南部，一直延伸到狭窄的街尾，街道两边滨海的房屋要比北边的房子更靠近海岸。这条街的南头再次出现棕榈叶屋顶的简陋小屋，那里住着最穷的阿伦贝皮人。大多数南部家庭住户都是独自带孩子、没有固定配偶一起生活的妇女，或是无法正常工作的酗酒男性。

1973年的变化显而易见。例如，很多曾住在木架泥屋里的人们，现都搬到卡拉努阿斯这个穿越泻湖的卫星村。他们曾经居住的“街尾”现在粉刷一新。居民们是一些嬉皮士模样的年轻人，他们在1971年到1972年大多数阿伦贝皮本地人离开时来到这里。现在的小屋里更干净，也更让人赏心。比如，一个法



1960年代，像这样的木架泥屋在阿伦贝皮很常见。村落边缘，房屋稀疏。如图为村北边缘。（康拉德·科塔克摄）

国女人在小屋里铺上稻草，把她和七岁的法-意混血儿子跟地面潮气隔离开来。

南方的变化更大，以前那里只有一幢房子。如今，每隔五百米便有几间中产阶级的度假屋和中高层阶级的“夏季别墅”（*veranistas*）。他们购买了当地房产中介最诱人的房产，这些房子是土地划分后，几家不在本地的地产所有者最近联合建造的。其中有四幢房子俯瞰大海。我们租的这幢靠近老阿伦贝皮，非常合我们心意，这里是个滨海村落，很多渔民从约1900年起便住在这里打渔。（随着打渔方式从竹筏变成帆船，很多渔民后来都搬到了现在的渔港，那里有更平静的码头，礁石间也有更多航道。）由于我们屋外俯瞰的海湾是阿伦贝皮最好的游泳区，很多游客都会在周末来海滩度假。我们南边的房子空着，要不是我们住到八月份，这间也会一直空着，直到这间房子的主人，那个城里的生意人到时来此度假。除此之外，左近的房子就属于来这里住了一年左右的居民，一个欧洲籍商人和他来自西印度群岛的妻子。他在卡马萨里（行政中心）工作。泥路的西边是些新房子，一直延伸到南方。

据说我们到来之前，这个新小区在假期里非常活跃，但我们住的这段日子



阿伦贝皮南部大量消暑别墅之一，1973年我们在此地租住。（杰拉尔德·米拉尼克惠允使用）

还算安静，而且我们经常有种与世隔绝的感觉。我们的日程安排需要我去阿伦贝皮做田野调查，村民们需要经过长途跋涉才能来见我一次。村里的老朋友们并没有减轻我们独居此处的不安感，因为他们一直比较关注我们的安全。这表达了一种明显甚于当地人的恐惧与不安全感。“带把枪吧”，一些村民告诉我们，强盗们肯定会来劫杀“有钱的美国人”。有天晚上，贝蒂和我准备离开阿伦贝皮去庆祝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就在我们离开之前，有人警告我们从萨尔瓦多来的警察当天正在搜寻两个持枪劫匪，嘱咐我们路上一定要多加小心，不要随便让人搭车（之前我们曾好心带过路人）。半夜里我们回到住处，一路上并没有碰到坏人，孩子们也睡得很香，除了偶尔响起几声爆竹。留下看门的村民担心有人会破门而入，就把燃着的爆竹从二楼窗口扔到后院地上，告诉胆敢擅自闯入者，房里可有枪子儿伺候。

阿伦贝皮最北面也开发了一些夏季旅游业，主要为一名萨尔瓦多人所有，他兴建的周末及假期住宅区，在收益上对当地社区投资者有所回报。该度假村及附近一些其他设施，与其他南部度假区有所不同，它与阿伦贝皮保持了联系。

阿伦贝皮较好的房子，并不仅限于外来者。整个村庄都有了更多的砖瓦结

构房子。很多村民也有了使用液化气的灯具和炉具、厕所、淋浴和冰箱等“现代化”设备。1973年的阿伦贝皮因为缺乏 *movimento*（夜生活，现在有了），还没通电。现在也还没有电话。

虽然阿伦贝皮的学校更新更大，但直到1965年，这里的师资力量才有所发展，在此之前，教师的教育水平不超过三年级。文盲现象仍很普遍，三分之一成年人不会读写，剩下三分之二的人勉强会写自己的名字。阿伦贝皮的学校系统是教育机会有限的表现，这也是当时巴西农村的普遍现象。阿伦贝皮儿童在只有一间教室的学校里“学习”，教课的是受过很少教育的妇女。

卫生保健也不完善。距离最近的药房也要坐一小时公车才能赶到。没有处方也能随意配药。很少有村民咨询医师。他们所谓的“专业”医疗建议来自药剂师。阿伦贝皮的健康状况，也是巴西底层人民与完善医保之间总体界线的体现。萨满巫医有时也会客串登场。

残酷的贫困数据也打击了阿伦贝皮。我最好的报道人阿尔贝托的妻子卡罗琳娜，生过十三个孩子，有十个都因传染性痢疾、流感、肺结核、麻疹和破伤风而夭折，这些情况又因严重营养不良而加剧。尽管在外人眼里可能会觉得这里充满热带风情，但是阿伦贝皮糟糕的公共卫生和较短的寿命，却让其桃花源形象大打折扣。

虽然1965年到1973年间，当地教育和卫生医疗发展缓慢，阿伦贝皮人的体质变化和差异却是处处可见。昔日那个单一而同质的社区，现在由于种种社会经济发展因素，演变为一个中心村庄（阿伦贝皮本身）和阶级分化的街区。中层及中上层居民住在阿伦贝皮南部和北部（以前并不住在那里），可怜的贫困人口搬到了卡拉努阿斯，他们以前却是住在阿伦贝皮的。第三个被称作嬉皮村（Hippie Aldeia）的卫星村，位于更北部两公里，靠近卡拉廷吉河。外国嬉皮士们加入了少数淡水渔民的行列，从前渔民们在那里搭建过临时棚屋。到1973年，这里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有着十六间棚屋的小村落。

阿伦贝皮在新生和移入中成长。外来者建起一些砖房，主要在中心广场。虽然这些度假屋装修得没我们租的好，但还是吸引了一些城市游客每年来此体验生活。现在有三套住所向游客提供食宿，当地还开设了一些小商店来迎合当地的旅游业。阿伦贝皮不仅向北、向南，而且也向西发展（东边的房屋太贴近海岸，无法推进）。如今，阿伦贝皮与泻湖之间建起了一排排房子。几条垂直

海岸的街道，笔直延伸到泻湖。

当地人口数量也在不到十年内有了较大增长。与1964年159户730口相比，阿伦贝皮现有280户1000多常住居民。加上在卡拉努阿斯的44户180口，以及卡拉廷吉的16户55口，1973年总计共有340户1200多人。人口普查很难算得精确，因为我们的普查工作是在周末、旱季和学校放假时间进行的。而且，阿伦贝皮1973年的人口还是低于1969年到1972年间的人口数量，在那期间，据说有上百名嬉皮士在这里租房借屋，或是在海滩和椰子林里露宿。

到了1973年，只有十几个嬉皮士还留在这里。阿伦贝皮人把嬉皮士分为男嬉皮士(*ippis*)和女嬉皮士(*ippas*)。我是在快中午时，在一家商店里第一次遇到嬉皮士。他穿着短裤，留着长发，显然不是本地人。他的样子让我想起我在密歇根大学暑期班上教过的学生。“嘿，哥们”，我闻声望去，他说着我的家乡话。这名男嬉皮士叫里奇，来自罗德岛，是个挺客气的年轻人，偶尔从家里离开，到这里靠存款过简单生活。他像其他嬉皮士一样，在海里游游泳，抽抽大麻，不给任何人添麻烦。

除了里奇，1973年阿伦贝皮的嬉皮士里还有一个年轻的英国女人、几个巴西南方人和一对阿根廷情侣。这一群人中最有四海为家精神的是位法国女人，她与第一任丈夫住在扎伊尔和马达加斯加，搬来阿伦贝皮之前，还和她儿子的父亲在意大利住过。村民们信誓旦旦地告诉我，这些嬉皮士文化侵入的遗迹，无缘回到詹尼斯·乔普林^[1]、米克·贾格尔^[2]和罗曼·波兰斯基^[3]到访阿伦贝皮时达到的程度；当时人们在沙滩上，裸体，做爱，吸食大麻。（和1960年代末到1970年代初主流美国社会对待嬉皮士文化的典型看法相比，村民们对嬉皮士生活的刻板印象更多是觉得有趣而非贬斥。）到了1973年，一对嬉皮情侣在工艺品厂上班，似乎融入了当地生活。到了1980年，其他一些嬉皮士们也渐渐成为阿伦贝皮的永久居民。

[1] 詹尼斯·乔普林(Janis Joplin)：美国60年代著名“嬉皮士”女歌手。——译注

[2] 米克·贾格尔(Mick Jagger)：“滚石”乐队主唱，引领摇滚乐史四十年。——译注

[3] 罗曼·波兰斯基(Roman Polanski)：20世纪欧洲著名波兰裔导演，成就斐然。——译注

人类学客观分析的障碍

虽然不在阿伦贝皮已有八年，但这并没有让我完全与当地的恶名隔绝开。我在里约和圣保罗的朋友们，曾在杂志上读到过一些有关阿伦贝皮和嬉皮士的报道，巴伊亚人也写信告诉我工厂建造的计划。然而，亲眼见到阿伦贝皮的变迁仍让我为之震撼，令我颇为厌恶。新建的工厂令我气恼，因为它破坏了自然之美，威胁到阿伦贝皮的生存。令我恼火的还有那些夏季来的游客们，虽然仅在这里待过短短数月、数周乃至几天时间，他们却很习惯向我说道，仿佛他们是当地生活的专家。我同样厌恶那些嬉皮士，尽管他们多少向我赞美了阿伦贝皮的美丽、朴实和与世隔绝，因为先前的阿伦贝皮给了我太多特别之处。还因为嬉皮士与那些老阿伦贝皮人太不相同，他们反而像我在北美大学校园中通常遇到的人们，在我眼里，他们仍是这个我先一步到达的热带桃源的入侵者。我把村民们新的恐惧和不安感，对未来的不确定感，和对外来生活方式的体验，都归因于外来者对阿伦贝皮的侵入。我悲伤地发现，我在村里最好的一些朋友，已经陷入由鬼魅、杂糅信仰、酗酒、糟糕的健康、带枪防身等新遭际组成的生活。

人类学家的训练，理所当然地要求我们对异文化保持客观中立的态度，但要做到客观并不容易。在我自己身上，我对变迁所抱的偏见，我想重拾昔日浪漫的愿望，已经在1973年影响到我的研究。我为评估阿伦贝皮变迁的规模、工作结构、消费模式和社会组织，新做了一份村庄人口调查和地图。但我发现自己更关注那些地方生活中熟悉的特征，而回避（虽然没有完全忽略）了那些新的变迁。比如，我像在过去一样调查了家户中的亲属关系构成，来标注那些主要变化。我派研究助手，我在密歇根大学带的本科生雷蒙德，去研究这里的渔业。雷蒙德记录了船员构成、渔获、市场和新成立的渔民合作社。我和阿尔贝托紧密合作，他也是我雇佣的当地田野助手，帮我记录出生、死亡，以及居址和工作的变迁。我访谈了以前的一些报道人，通常是在我租的消夏别墅里。为了避免伤及我的车，我会开车去离我不到二里远的村子。我避开了曾经待了很久的中心广场。我也不像过去那样尝试至少每家都至少入户访谈一次，现在我宁愿报道人来我的房子，而不是去他们家。

雷蒙德建议我最好去了解一下那些嬉皮士，他那时正在这么做。我当时本

该接受他的建议，但我在1973年甚至都没有到访过嬉皮士在卡拉廷吉河边的聚居区——阿伦贝皮北部的嬉皮村，步行只需十五分钟。我让雷蒙德和阿尔贝托在那里做普查，关于嬉皮士，我靠的主要是雷蒙德的报告。

我现在意识到，自己将嬉皮士当成了对手。他们的年轻，让我想起自己在1960年代的田野调查队。他们对于自然和原始的诉求，让人类学家感到既熟悉又不安。我感到自己渴望冒险的年华和机会已随时间飘逝。

在大多数人看来，人类学家是特立独行的调查者，他们热爱陌生地方和神秘人群，为了远方浪漫的简单生活，宁愿放弃自己文明中的舒适。民族志学者就像专业嬉皮士，嬉皮士则像业余人类学家。我希望这些业余人类学家离开阿伦贝皮。我希望“我的村庄”是为真正的人类学家（像我自己和我的田野队员）而保留。然而，当我逐渐意识到无法实现这个愿望后，我便开始避开那些嬉皮士，并无视他们对村庄生活的影响。

我同样远离那些游客们。他们究竟是拥有消夏别墅的城市精英，还是在当地酒吧里消磨整个周末的粗鲁醉汉，对我来说并无什么不同。我关注的一切是如何变迁，而且对那些全新的东西视而不见。调查的亮点则是一些像托梅这样老朋友的成功，他们的存在，使得阿伦贝皮的大部分都向外部世界开放。在我看来，这似乎是给了一些阿伦贝皮人走出底层阶级生活的新契机。然而，总的来说却是弊大于利。

很多进入人类学的人们，要么是对自己的社会感到不适，要么是有所不满，因此他们就转而关注异文化或是追寻过去。我在1973年的经历，让我思念起旧时的阿伦贝皮，也让我萌生了回到自己初涉的“人类学世界”这样一个无法实现的希冀。我第一次研究的阿伦贝皮，与当时现代化工业的美国完全不同，几乎超出我的想象。它成为我的民族志天堂。我与妻子在那里相遇，多次返回，它是“我们的村庄”。现在我们不得不与许多其他外来者分享阿伦贝皮。于是，我忽略了他们，好像这样我就能施法剔除他们。

这些反应在我1979年开始写作本书初版时体现得非常明显。讲述阿伦贝皮的故事需要另一次田野之旅。1973年至今已过去六年，我想看看那些之前未解的问题，特别是污染问题今天如何。我重访阿伦贝皮的第二个原因则是被动的。因为我需要补充一些1973年回避的信息：嬉皮士、旅游业和工厂。如今，比起1973年的自己，我已能更加客观地对待那些外界力量带来的变迁。

第七章到第十一章主要基于我 1980 年的阿伦贝皮之旅。(第十二章描述了 80 年代中晚期的阿伦贝皮,第十三章到第十五章则是 1990 年到 2004 年的新情况。)第七章到第十一章与第六章(基于我 1973 年的逗留)相比,表现了一种模糊的、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更开心的当地生活。到 1980 年,不仅阿伦贝皮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我这个民族志工作者自己也有所改变。我不再常怀怨怼,不再那么个人色彩,对迷人的变迁过程也更少主观判断,因为我意识到,面对这种变迁,可以研究,却不可阻止。

1980 年：“整个世界都在向阿伦贝皮开放”

我认为,经过 1973 年的失望之旅,任何一次重访都会有所改善。1980 年 8 月,我回阿伦贝皮待了三星期,与我同行的是一个非正式田野小组。包括两位人类学家:玛克辛·马戈利斯博士和杰拉尔德·米拉尼克博士,以及他们的女儿娜拉;贝蒂,她当时已是职业社工;还有我们的两个孩子,十二岁的朱丽叶和九岁的尼古拉斯。虽然玛克辛、杰瑞和娜拉只在那里待了十天,我还是觉得多几个人参与同一项调查是件让人愉快也更有效率的事情。这让我有点想起 1962 年、1964 年在阿伦贝皮进行的早期调查。玛克辛和贝蒂两人先前都在巴西工作过,并参与过访谈和其他调查。杰瑞运用其考古学家的专业技巧为村庄绘制田野地图,同时也为本书拍了不少照片。朱丽叶、尼古拉斯和娜拉则报告了他们观察和数过的事物,包括一个星期天下午数了三百辆汽车。

飞往巴伊亚之前,我们一家人在里约待了约两周。这让我们在重访阿伦贝皮之前有机会熟悉巴西的发展趋势,有益于我们了解 1973 年到 1980 年间巴西的总体变化。国家力量对阿伦贝皮的影响要比以前大很多。随着电力、收音机和电视机的普及,村民们对国内外大事也有更多的了解。我可以将阿伦贝皮的信息爆炸与 1962 年相比,那时的我,一个来自远方的陌生人,晚上坐在小教堂的门廊上,回答着问不完的问题:美国有哪些动物?

一个渔夫回忆道,1980 年“整个世界都在向阿伦贝皮开放”。和几年前被问“美国有大象吗?”相比,会有人告诉我法国的渔民罢工行动和波兰的劳动者工会。他们问我卡特总统和肯尼迪参议员的机会和人品,当时两人正在竞争 1980

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阿伦贝皮人对于世界体系的参与，真是与时俱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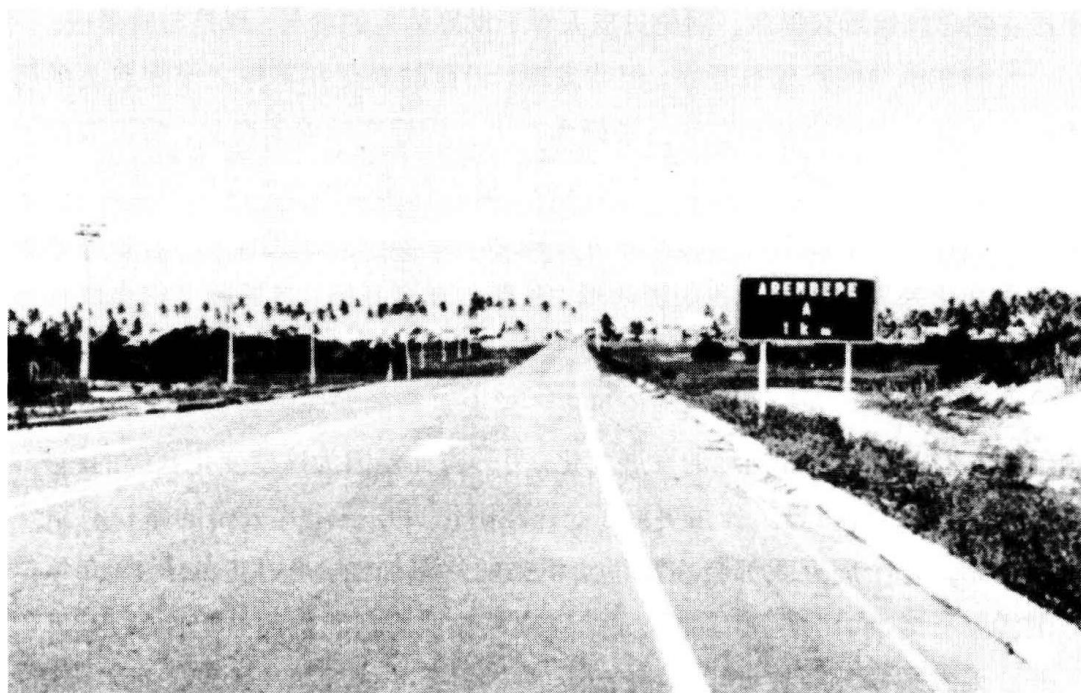
我们在里约的行程很开心，但我发现，巴西的变化并不像之前我在美国想象的那么大。交通噪音和空气污染颇为惊人。到处充斥着消费品，超市取代了小商店。沙滩上出现了慢跑者。“周六台”播放着葡语配音的《猫和老鼠》。我甚至可以在科帕卡巴纳海滩的麦当劳订购 *quarerao*（皇家芝士堡）。世界体系侵蚀着文化差异的印象与我如影随形，从萨尔瓦多开始，然后到了很多屋顶都竖起“鱼脊”（电视天线）的阿伦贝皮。

然而，我这次并未对前往阿伦贝皮一路上见到的变迁感到惊讶。一方面是由于朋友们一直在告知当地的发展变化，另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变化延续的趋势，在1973年就已很明显。公路更好了，在距阿伦贝皮仅十八公里的路口村新建了加油站。每个周五我都会在那里给租来的汽车加油：当时正处于1980年全球能源紧张时期，巴西所有的汽油站周末都停业。当我们到达巴西钛业工厂，我开心地发现沙丘现在一尘不染；工厂围栏里整齐地堆着一堆黄绿色的沙子。虽然工厂烟囱仍在排放，但已不再有好莱坞电影特效般的浓油重酱来污染沙丘的天然之美。

工厂位于一处能瞥见太平洋的高地上。1980年8月那个晴朗的周三，放眼远眺，一望无际的蓝色海洋令人难忘。尽管如此，我仍怀疑海边那些位处工厂东部沿海新区里奢华别墅的价值。虽然泻湖污染已经停止，但是硫酸仍被源源不断地排入大西洋，距离别墅不足三公里。

柏油路一直铺到阿伦贝皮，并继续往远方延伸。通过州与联邦共同资助，一条名为“椰子路”的沥青高速公路，已在阿伦贝皮北部建成二十公里。作为计划中滨海高速的一部分，它最终会将巴伊亚州与其北邻的塞尔希培州连在一起。

柏油路向阿伦贝皮转弯处的东北部转角，有一段俯瞰泻湖的山脊，山上新建起一个卫星村：鱼湖村。鱼湖村的发展，是地主土地细分计划的最新表现；有几家阿伦贝皮人在那里买了地，建了房。鱼湖村看起来要比1973年的卡拉努阿斯村繁荣，也要比阿伦贝皮人富裕。我们后来经过路右边的卡拉努阿斯村看起来也很不错。它的规模翻了一番，达到一百家，它也不再是1973年的木架泥屋，而是盖着瓦片的砖房。卡拉努阿斯村的四条平行街道里，只有最靠近泻湖，也就是盖第一批房子那条街上还是棚屋。最宜人的景色仍在泻湖，它已重



1980年通向阿伦贝皮的柏油公路和电线。(杰拉尔德·米拉克惠允使用)

回原先的湖绿色。妇女们在泻湖洗衣服，孩子们在这里洗澡、玩闹、学习游泳。

就在我们进入阿伦贝皮时，一个写着“街区”的路标牌映入眼帘。我们不得不为减速带而放缓。每个周末都会有数百辆汽车进城。公路入口依旧如前，但铺得更好。拐弯处还设有报刊亭，出售裸体封面的性感杂志，这是多年来巴西强硬军政府审查制度松弛后，新开放 (*abertura*) 政策的地方体现。

我们在中午时分到达，第一需要便是吃午餐。我们将车停在克劳迪娅餐厅（可乐餐厅）吃饭，这是我的调查助手雷蒙德 1973 年食宿过的地方。我们遇到的第一个村民是克劳迪娅的女儿艾德丽，她告诉我们她的双亲去年双双去世，从而给这场本该愉快的见面，蒙上一层厚厚的伤感。这个消息让我们颇感惊讶，因为克劳迪娅一直是阿伦贝皮最有活力的人，但她和丈夫都没活过六十岁。艾德丽传承了母亲成功的生意，随着阿伦贝皮与外界的频繁接触，地方财富增长，艾德丽也成为几个地位上升的当地妇女之一。在商店和餐饮业方面，妇女几乎和男人具有同等影响力。

阿伦贝皮融入了国家文化新潮流的象征，也体现在艾德丽的菜单中。我们注意到，在里约和萨尔瓦多巴西人当中普遍流行的朗姆酒（卡莎萨），在当地的

开胃酒系列中成为基酒的新宠。阿伦贝皮的酒保们了解如何用巴卡第朗姆酒、威士忌、伏特加和杜松子酒调制那些混合酒。有个村子，以前酒只供那些酒鬼或节日场合饮用，现在酒吧里则储存了老八威士忌、德雷尔白兰地，尤其是还有周末游客最爱的冰啤。阿伦贝皮现在的吃喝花费，已经达到城市消费水平。

1980年的阿伦贝皮，比我印象中的1973年要更大更干净。但是我对阿伦贝皮和萨尔瓦多地区的总体印象是，变化并不如以前那样让人震撼。可能这反映了之前提到的文化差异的消融。不过，我相信，所有变化的雏形都已在1973年奠定；1980年（而且一直延续到1980年代和1990年代）以来，一切变化都只是在充实这个框架。大量的酒吧、餐馆和出租房，都是旅游业发展对当地经济影响的实证。我们和工厂经理一起在克劳迪娅餐厅吃午餐时，他告诉我，巴西矿业现在关注的是自身形象和对附近社区的福祉。从餐厅的海景窗，我可以看到很多崭新的、更大的汽艇，它们现在是标准的阿伦贝皮捕鱼艇。我还看见很多各种新出现的经济形式，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变迁。这包括社会经济阶层、新的宗教现象，和以往所没有的社会分化的出现。

虽然世界体系对村庄不断增长的影响发生在所有国家，但很少有社区（在巴西内外）像阿伦贝皮这样，在如此短的时间里经历了这么多的变迁。这就是为什么阿伦贝皮值得人类学研究的特殊之处与价值所在。虽然一开始连计划都没有，但我能亲身体验、观察到这场堪与考古记录中需要数千年才能感受到的变迁相媲美的社会文化转型。短短二十年间，阿伦贝皮从一个相对孤立、平等主义和同质的社区，变成一个职业分化、信仰多样、社会阶级与地位存在高下的社会。在古代中东，从狩猎采集经济变为农业种植和牲畜驯养经济，用了四千年时间，才发展出社会分层。而在阿伦贝皮，主要经济变化和同期的社会转型只用了不到二十年时间。阿伦贝皮的经历，也为我们了解千千万万个渐渐融入世界体系小社区的进程，提供了一幅缩影。

然而，在我们想要描述和理解阿伦贝皮的转型之前，我们必须回到开始。我们要从1960年代阿伦贝皮人日常的思维与行为模式开始思考，来见证这段变迁史的“前传”。

第二部分

桃花源

第三章

平等结构

由于经济及社会结构相对比较简单，使得 1960 年代的阿伦贝皮与其他民族志工作者研究的巴西社区有所不同。除了某些例外（如 1971 年约翰逊的研究），人类学家在巴西研究的都是存在社会分层的社区（通常位于乡间）。与之相比，阿伦贝皮缺少财富、职业、教育和政治权力上的阶级对比。在这个下层社会中，轻而易举就能在地方上获得成功，但要想跳出下层社会身份，却是障碍重重。

村民的下层社会身份，在他们离开村子，遇到萨尔瓦多的中上层阶级时，变得尤为明显。举止、穿着和口音，向城市精英们透露了他们来自下层社会。在城市里，阿伦贝皮人被看成是贫困、无势、未受教育的人，被人称作“乡巴佬”。

在阿伦贝皮，收入、继承财产和生活方式的差异，与整个巴西现在的状况相比微乎其微。当地成功的上升阶梯非常有限，任何人都可以攀登。而在社会分层的城镇里，人们可以凭借继承财产在经济机会和社会地位上先走一步。阿伦贝皮的财富差异，的确划分了居民们的等级格局，但这并非分层。也就是说，这里的贫困群体和富裕群体之间，并没有巨大差异。

因此，1964 年的家户预算数据（基本上和年收入持平，见附录 1），显示了从最贫困到最富裕家户之间的逐渐递增，之间没有鸿沟。1964 年最大预算相当于 1000 美元的收入，远低于巴西中产阶级家户所得。换种说法，1960 年代的

阿伦贝皮有社会等级，而没有社会分层。换用人类学的说法，阿伦贝皮的社会系统分等级，但无分层。

聪明而志向远大、有商业意识的人们，可以从当地经济等级中的最底层爬到最高层。但要想走得更远，在外面世界也同样成功，就比较难了。阿伦贝皮人聚敛的财富极为有限，不足以推动他们的儿女进入国家中层阶级。有限的教育机会是另一个障碍。当地小孩只有在外地努力学习，才有望获得更高收入，比如说，石油巨头，巴西石油，就是个很好的去处。但只有少数当地人才能获得这种学习和工作的机会。

开放的个体化社区

虽然自 1965 年以来，阿伦贝皮与外面世界接触的规模巨幅增长，但这个村庄之前也从未真正与外界影响完全隔离。阿伦贝皮虽有平等价值观和非分层社会结构，但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开放的个体化社区。这是埃里克·沃尔夫 (Wolf, 1955) 划定的拉丁美洲农民社区的两种基本形式之一。阿伦贝皮拥有所有开放社区的特征。这体现在当地的现金和衣食生产都靠外来供给，以及接受国语，融入国家文化。几十年来，阿伦贝皮人一直将捕来的鱼卖给外面的人群。最初的购买者是一小撮骑着骡子收鱼去卖的人，他们主要将鱼倒卖给萨尔瓦多附近镇上的人。1960 年代初期，购买者开始从萨尔瓦多和附近郊区开着吉普车来到这里。阿伦贝皮另一种重要外销品，椰子，也进入了萨尔瓦多市场。

阿伦贝皮人长期依赖村子以外生产的物品。1960 年代，船队中的渔船大多是外地生产的，只有一位当地居民还知道如何制造渔船。渔业并不仅仅依赖于马达和燃料。阿伦贝皮渔民因此不甚关注成本、供给和维修等相应支出。村民们向当地商铺购买煤油、大米、食糖、豆类、咖啡、猪油、火柴、汽水、啤酒、朗姆酒和肥皂。1964 年阿伦贝皮有十二家小商店，全村 730 户居民中，每 60 个人就有一间商店。其中三间商店规模较大。

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主要体现在经济方面。有些人到外地学习或工作。一些男人在萨尔瓦多附近、里约热内卢和其他一些主要港口从事商业拖网捕捞。一些本地妇女在萨尔瓦多做佣人。其他一些人则在州府一间神庙里修习坎东布雷

教 (*candomblé*)，这是一种非洲—巴西混合的精神崇拜。在阿伦贝皮拥有土地的家庭都在外生活。除了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土地所有者，他计划细分家族地产，将土地分块卖出，使阿伦贝皮发展为一个度假地，其余那些地主很少来村子。他们与那里的生活没有关系。他们在当地的代理人是普鲁登西奥，一个上点岁数的人，他会象征性地收取村民们一点房租。这些 1964 年在 0.5—1 美元之间的房租，依法律规定应比实际稍高，但因通货膨胀而下调。普鲁登西奥也承诺过新建一些房子，他还负责地主们五千六百棵椰子树产出的市场。

一位船主总结了地主们和当地代理人在当地生活中的关系：“普鲁登西奥是我们应对的最近领导 (*chefe*)，只因他代表的是地主们。那些地主们并不怎么找我们，他们只关心那些椰子树。”

尽管阿伦贝皮的经济面向外部世界，人们还是被屏蔽在大多数底层巴西人每天经历的权力关系之外。糟糕的路况季节性无法通行，使他们与萨尔瓦多之间交往有限。想要去市里，人们需要走上十九公里才能乘到公车，来回需要两天时间。阿伦贝皮在经济和空间上都无法吸引有实力的外来者。土地产出和村里的椰子树，甚至无法维持土地所有者的中产阶级生活方式，最后一个地主也于 1925 年离开阿伦贝皮。她所有的继承人都在城里工作，他们也很少回到阿伦贝皮。1960 年代，其中一个叫豪尔赫·卡蒙斯的孙辈，也是他家里第一个大学毕业生，计划在阿伦贝皮发展旅游业。豪尔赫的知识、经营技巧、政治影响力和在国家公路管理局分局的地位合到一起，促进了阿伦贝皮后来的经济发展并加入世界系统中。

之前，阿伦贝皮的地理位置（为沙漠、泻湖和大洋所阻隔），以及有限的资源，使它一直处于边缘地位。土地生产力很低。一位村民说：“地里什么都不长，连西瓜和花生都长不了。”人们只能从西部一些小农场获得农产品，但沙质土壤同样导致减产。1960 年代，整个卡马萨里自治市（区）的主要经济活动便是烧炭、小规模农业生产和椰子种植。阿伦贝皮的土地只适合种椰子树。出口商品有鱼、椰子和当地妇女编织的草帽。椰子给包括地主在内的村民仅仅带来全年 5000 美元的收入。每年来自草帽的现金收入不超过 50 美元。捕鱼量也受技术落后所限：没有几个船员的渔船在白天用鱼钩钓鱼。1970 年开始发展旅游业之前，阿伦贝皮没有任何可以提供给外来投资商的物品。

阿伦贝皮的政治结构也和经济一样简单。村子从来没有当过行政中心，甚

至也没跻身乡镇。阿伦贝皮被官方划分为“小村庄”，位于所在自治市的六个乡镇之一，地处地区中心阿布朗提斯通往萨尔瓦多的路上。阿伦贝皮没有收税员、执法官、统计员、邮递员，连其他在镇上工作的行政人员都没有。如果有公务员，就会给阿伦贝皮带来更大的财富差距，并会影响当地等级格局。有位小店主说：“阿布朗提斯有些人比较有钱，因为他们能做公务员，但是阿伦贝皮一个也没有。我们这里只有渔民和小店主。”公务员职位还会将“政府”（通过权利和权力的对比）带给阿伦贝皮。但这样的事情从未发生。

在阿伦贝皮这样一个巨大而人口众多的乡村社会，令人吃惊的是，几乎没人具有政治身份。除了地主代理人，还有一个政府任命的警察 (*subdelegado*)。这个警察只有很低的薪水，并且不敢使用政府提供的左轮手枪。他没有逮捕过任何人；监狱一直空无一人，除了偶尔会有游客获准在里面睡上一晚。这位警察的父亲是村里唯一承担联邦职位的人。这位老人由于长期担任船长事业有成，后来成为驻港船长，在理论上他监督着南到伊塔庞港口、北到普拉亚多海港之间的运营。他可以在两个港口之间的区域自由打渔，很少渔民有这种执照。

驻港船长解释说：“阿伦贝皮人很难到萨尔瓦多领取捕鱼执照。大多数渔民连字都不识。不管怎样，他们何必一定要这个执照呢，根本就没人来查。”船长退休后也没人接替他，他便在这个职位上一直到 1973 年去世，在这期间，他只收到阿伦贝皮的联邦养老金。

当地领导权随着渔民协会和圣弗朗西斯足球俱乐部一起轮换。这个足球俱乐部里面有渔民，还有当地男孩们从外面叫来一起在周末与其他社区对阵的球员。最成功的渔民托梅，就是足球队长。渔民协会每年都会为阿伦贝皮的守护神，圣弗朗西斯（2月20日）和圣约翰（6月24日），组织节日庆典。最佳船长担任司库。通常来说，在一年里渔获最多的船长会被选为司库，而托梅就是 1965 年的司库。

在阿伦贝皮很少能看到集体、公社、政府或政治的影响。这个村庄也与韦格利 (Wagley, 1963, p.148) 描述的典型巴西农村社区有所不同，因为它并不是附近农村的中心。当地只有一个八间房的卫星村：大井。住在阿伦贝皮西边几公里外阿克乌 (Açu) 和科开亚鲁斯 (Coqueiros) 两片农田的居民，会到阿伦贝皮买鱼并卖些农产品。1964 年拥有椰子树的阿伦贝皮成年人中，42% 住在阿克乌和科开亚鲁斯，二十个阿伦贝皮人在当地租了一个小型农场。他们的庄稼

收成补充了他们来自渔业或商业的收入和饮食。

很多村民都是出生在西边的田地。1889年获得自由后，这些奴隶最初就耕作于这片田地，他们的后代成为1960年代阿伦贝皮的主要人口。他们的子辈和孙辈，逐渐从农业转入渔业，又从季节性变为全年捕鱼。

阿尔贝托说：“我记得我的祖母中有一个就是奴隶，她刚被解放便移居阿克乌，遇上了我祖父。他们种了一段时间地，后来祖父开始打渔。最后他们搬到阿伦贝皮，祖父也成为一名全职渔民。”

阿伦贝皮与掌权者之间的分离，同时也是它在经济定位（面向萨尔瓦多）和政治定位（面向卡马萨里）之间分离的结果。萨尔瓦多传统上吸引着卡马萨里的土地所有者、农村精英和有中产阶级理想的当地人，一如卡马萨里吸引着阿伦贝皮（Gross, 1964）。卡马萨里的资本面向的不是它自己的穷乡僻壤，而是首府，成为阿伦贝皮远离权力的另一个原因。由于村庄获得经济来源是一个地方，而行政命令又来自另一个地方，经济和政治影响互不交织。卡马萨里的官员无法控制渔业和椰子市场，也就影响不到阿伦贝皮人的经济。

亲属关系的成本和收益

许多因素交织在一起，使阿伦贝皮远离了巴西的权力结构。这也是尽管村庄在经济上依赖外界并被包括在民族国家中，它的社会关系却与人类学家研究过的世界上很多地方平等主义、以亲属为基础的社会相似的原因所在。在阿伦贝皮，人们之间的经济差距不大，权力分化也不明显，人们心里还保持着彼此之间都是亲属的想法。常挂在阿伦贝皮人嘴边的两种说法：“我们这里都是平等的”和“我们所有人彼此之间都是亲戚”，可以视为阿伦贝皮人对本地生活本质和基础的自我总结。大多数村民都像部落成员（共有同一个祖先，但却说不清彼此之间的关系），无法追溯自己与远亲之间准确的家支关系。“只要我们知道我们是亲戚，这有什么区别？”

在大多数非工业社会，亲近的人际关系，要么是基于亲属和婚姻关系，要么是模拟两者。比方说，我们假设每个人之间都是亲戚，由此便能促进一定程度上的社会团结。然而，我们需要指出的是，阿伦贝皮的社会团结发展程度，

比起其他靠氏族和亲属制度维系的社会要低得多——那些社会利用世系将成员汇集在一起，并将其他人从世系群中排除出去。紧密的社会团结通过排除无关的人来实现。阿伦贝皮人宣称所有人之间都有紧密联系，即不排除任何人，从而在不经意间弱化了亲属关系创造和维持群体团结的能力。

村民们在说到所有人之间都是亲戚时，大多是种半真半假的态度。这从他们有关亲属关系的其他谈话中也可以看出。阿伦贝皮人就像大多数巴西下层社会成员一样，和其他中层或上层社会成员相比，在计算亲属关系时会更加严格，这是韦格利 (Wagley, 1963, pp.196—8) 通过调查数百人之间的亲属关系得出的结论。尽管如此，阿伦贝皮人计算亲属时，仍要比典型的中产阶级美国人更含糊。例如，阿伦贝皮人通常将他们父母的第一代堂(表)兄弟姊妹统称为“uncle”和“aunt”，将自己第一代堂(表)兄弟姊妹的孩子统称为“nephew”和“niece”。

这种亲属计算，会在远亲增多时失效。远房兄弟姐妹被称作“表亲”(third cousin)或“远房”(distant cousin)，表示不是近亲关系。与人类学家不同，村民们不喜欢追溯世系和亲属关系。为此，我在询问渔民之间的特定亲属关系时，还惹怒了阿尔贝托，他不高兴地说道：“同一个船队的渔民都是表亲，并不能说明什么。近亲在一起打渔，只是因为他们的关系近。”

村民们也不追远。他们很少记得自己祖父母的名字，可能就知道一个。村民们也很少用姓氏。大多数人只知道彼此的绰号(少数人除外)，绰号来自个人的身体特征(“小黑何塞”)，性格特征(“脚碎椰子”)，或出生地(附近的“塞尔希培州”)。即使是近亲，也很少有村民能知道他们的全名。这是另一个与国家权力结构分离的特征。全名只用在法律文书中，这也是大多数阿伦贝皮人会极力避免的。

除了基于亲属关系上的权利和义务，阿伦贝皮人还有来自婚姻的其他权利和义务。情侣们结婚可以正式也可以非正式。大多数情侣(1964年有40%)都照习惯法成婚。另一些虽占少数(28%)，但却能获得更多声望，这些婚姻由治安官认可，并赋予遗产继承权。财产一般由配偶在世一方继承，另一半由孩子继承。拥有最高声望的婚姻(10%)，是通过教堂仪式并获得法律认可。接受宗教仪式婚礼的人很少(8%)。法律公证过的婚姻是一辈子的。因此，阿伦贝皮人用多样的婚姻形式来应付巴西离婚难这一问题。

一个退休渔民说：“我和一个女人生活了几年，后来我厌倦她，就离开她与另一个我更喜欢的女人在一起。但我还没准备好迎接法律婚姻，所以我们只在教堂举行了婚礼。后来，我离开她并与现在的妻子在一起，我最终决定，我已准备好举行法律婚姻。”

十六岁到四十九岁之间的妇女过多（占 54%），是一些妇女没有固定伴侣的原因。村里有八对走访者，“丈夫”同时还有另一个正式妻子。对男人来说，走访对象是次要的，但有些对象关系会维持数年。参与的女人们都被严重蔑称为村妓（*rapariga*）。“那都是些没出息的女人，她们靠其他女人的丈夫生活”，这是一个老妇人的评价，代表了当地普遍的看法。

法律婚姻所具有的权利和义务，与习惯法婚姻（甚至是那些稳定的）相比，有着质的飞跃。习惯法婚姻配偶没有权利继承。他们的孩子除非用父母名字登记，否则也没有继承权。只有合法婚姻能产生法定关系。一个缔结法定婚姻的男人，不仅对自己的妻子和孩子有权利和义务，若有必要，也会赋予对妻子父母和兄弟姊妹的权利义务。相反，缔结习惯法婚姻的男人们，则不承担对岳父母或配偶兄弟姊妹的权利义务。

与亲属和婚姻关系有关的权利义务，组成当地社会的安全系统，但人们会衡量系统的收益成本。最显著的成本是：村民们不得不平均分享他们的成功。当有志向的人们攀上当地成功的阶梯时，他们就会有更多家属。为了维持他们的公共形象，保证他们可以在老年时也有人可依，他们必须要与人分享。然而，分享是一种有力的“平均机制”。它消耗了剩余财富，制约了向上攀登的动力。财富和义务之间的关系，是阿伦贝皮人保持无分层底层社会的重要原因之一（Kottak, 1967a）。

确切来说，这种分层是如何运作的呢？与大多数分层社会一样，巴西全国文化准则是由上层社会划定的。中上层阶级的巴西人，通常在教堂里举行法定婚礼。就连阿伦贝皮人也知晓这是唯一“正当”的结婚方式。最有志向（通常也是最成功）的当地人，会效仿那些巴西精英们的行为。他们想通过这样做来获取一些名望（见 Kottak, 1966, p.101）。

然而，法律婚姻会消耗个人财富，比如说，要负起扶助姻亲的责任。这些义务是定期的，而且要有付出。生孩子的义务也随收入增长，因为成功人士要养育更多小孩。在 1960 年代，甚至是在 1973 年，村民们没有实施生育控制。

只有极少数妇女堕过胎。不仅因为堕胎风险大，而且因为小孩可为家庭添丁，最终会给家长提供经济收益。男孩尤其受到重视，因为他们的经济前景要比女孩子更光明。

1964年已婚妇女平均生育5.6个孩子，只有3.2个能存活下来，存活率仅为57%。婴幼儿死亡，是人口增长的主要阻碍。孩子的存活机会也因富裕家庭较好的饮食条件而有巨大差异。普通家户的饮食包括鱼，通常会和西红柿、洋葱、棕榈油、醋和柠檬一起炖汤。每周会有一次把鱼换成牛肉干。像木屑一样烤过的树薯粉(*farinha*)，是卡路里的主要来源，餐餐都吃。其他日常主食还有咖啡、糖和盐。香蕉、芒果和其他水果及蔬菜是季节性食物。家户间的主要差别就体现在饮食上。最穷的人们无法定期吃到鱼，他们经常靠树薯粉、咖啡和糖为生。只有最富有的人们才有能力购买大米和豆类之类，这是中上层巴西人眼中的巴西基本饮食。家境较好的家户会补充牛奶、黄油、鸡蛋、大米、豆类，以及更多新鲜的鱼、水果和蔬菜。

孩子们肿胀的肚子和略带红色的头发，是营养不良和肠寄生虫的临床症状。穷孩子们还特别容易得传染病，这是小孩主要的死因。营养不良也影响到胎儿，大多数妇女都流过产或死过胎。阿尔贝托和他的妻子卡罗琳娜，像其他渔民一样，由于营养不良和疾病失去了孩子，但他们去世的孩子是个特例（十三个死了十个）。

我亲眼见证了一件极其令人伤心的事情。1964年6月，阿尔贝托叫我开车送他和他两岁半重病的儿子去伊塔庞看病。一连数日腹泻，孩子开始呕吐，发高烧，无法入睡。孩子不住声的哭喊，使我在驱车前往伊塔庞的泥泞路上身心俱疲。到那儿之后，不巧医生那天不在。药剂师给我们开了药方，告诉阿尔贝托这些症状医生一直都开这些药。我试着说服阿尔贝托送孩子去萨尔瓦多的诊所，但他拒绝了。事后我很后悔当时没有强力说服他。回去的路上，孩子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但当天夜间便过世了；阿尔贝托把家里存的现金全都花在了买药上，最终只能接受我的几美元，去给孩子买一个光秃秃的纸板棺材。

充足的收入能改善伙食，给人们提供方法和信心，去寻求本地之外更好的医疗照顾。出生于富裕家庭的孩子大都活了下来。但这也意味着需要供养更多张嘴巴，加之这些家庭的家长通常想让孩子们接受更好的教育，这也意味着更多的村外教育消费。经济成功和大家庭之间的关系，是另一个财富吸收器，抵消了个

人经济优势。托梅是一位渔业承包人，他预想到，要想为他逐渐壮大的家庭提供衣食和教育，也就意味着辛苦操劳一辈子。托梅的收入是阿尔贝托的三倍，他妻子也没流过产。他意识到自己逐渐壮大的家庭，将会在短期内耗尽资财。“但最终，我这些成功的儿子们，会在他们的娘和我老有所需时给我帮助。”

阿伦贝皮人知道哪些人可以靠得上；在这个小村庄里，成功是掩盖不住的。村民对他人的期待，就建立在这种认识上。和穷人相比，成功人士需要与更多亲属、姻亲、远亲分享。成功的船长和船主，会为普通渔民购买啤酒；小店店主会接受赊账。所有富人都会被期望展现相应的慷慨。随着财富增长，人们会被邀请加入仪式上的亲属关系。在洗礼过程中——每两年随神父巡访举行一次，或者在外地举行——每个孩子需要两个教父。这些人会成为幼儿的干亲 (*compadres*)。

阿伦贝皮与其他拉美地方有所不同，那里的干亲关系比教父母本身更重要 (Mintz & Wolf, 1950)，在阿伦贝皮，这两种关系都很重要。孩子们每天第一次看见教父母，都会要求祝福。教父们偶尔也会给他们一些饼干、糖果和钱，遇到特殊场合则会给他们更隆重的礼物。等到年龄大些，孩子们可以通过主教认可，再认一位教父（只能有一个）。通过正式婚姻，夫妇可以获得最多四个教父，分别由新郎和新娘自己挑选。

关于仪式亲属关系，与我们在亲属和婚姻上得出的结论相同：仪式亲属义务随着财富增长，同时这也限制了个人经济优势。因此，在1960年代的阿伦贝皮，亲属、婚姻和仪式亲属关系，在运作的同时，既有成本，又有收益。成本是限制了个人的经济发展。基本收益则是社会稳定：确保可以获得来自亲属、姻亲和仪式亲属那里的帮助。不过，收益只有在付出成本之后才能获得，也就是说，对于那些想要过上“好”生活的人们，只有踏踏实实，不太偏离当地生活准则才行。

性别问题：大男子主义和男女不平等

1960年代，想要在阿伦贝皮获得成功，主要需要志向，努力工作，以及好的商业和投资策略。另外还有一点：必须是男性。从根本上来说，1965年阿伦

贝皮的大部分财富（来自继承或收入），都来自一些男性创业生产活动。我将村庄人口分为三个群体：主要生产者、次级生产者、被赡养者，这基于他们对家户现金收入和食物供给的贡献。大多数主要生产者都是男人。次级生产者包括少数男人，以及一半的女人，剩下的是十几岁的男孩。被赡养者包括为数一半的妇女和大多数小孩。

妇女的现金收入来源很有限。每年用棕榈绳编织草帽的现金收入总量约有50美元。为数不多的妇女是一些旺铺的全权业主。其他妇女则与她们的丈夫一起做生意或农作，有些是平等的合作伙伴。十个已婚妇女和男人一起操持家务：作主要的经济决定，打理孩子们的生活。

这些女人们脱颖而出，只是因为当地的总体形势是男人占据主导地位。比如，159户阿伦贝皮人家中，83%是男性当家。家庭收入和预算，更简单地反映了男人对财富的控制。在1964年的118家样本中（见附录1），女性当家的家庭垫底：118、116—111、108、103、101、97及67号家庭。这些女性当家的家庭中，没有一家位于较富裕的一边。她们的年均收入为109美元，相比之下，男性当家的家庭则为314美元。

更多的故事还有，28个女性当家的家庭中，只有2户能自给自足。其中一户当家的是个未婚店主，另一户则继承了一片椰子林。另有4家女性部分依靠其他家户，剩下22家主要靠其他家户帮助。22家中8家是多妻男性家庭的二房，她们的经济情况大多不好。

主流道德观不看好多妻，二房被鄙视为村妓（参见第十一章中朵拉的案例）。通常情况下，大房和她的亲戚会施加社区压力，阻止丈夫猎艳。二房关系破裂时，女方会依靠自己的亲属生活，直到成功吸引另一个男人。阿伦贝皮有一群这样的女人（她们被看做非正常人，处于村庄最底层），被迫进入结合与分离的轮回中。为了照顾小孩，女人别无选择，只能是延续这一模式，加之没有避孕措施，她要照顾新生儿的责任与日俱增。

1960年代，这样悲惨的日常生活，可以从沙滩上那些女性当家家庭中，每天傍晚等候归来渔船的孩子们身上瞥见。我们1962年的厨师朵拉，每天下午也派她最大的孩子去沙滩，一艘接一艘船去为他们的晚餐讨到一条鱼。这个四岁的小男孩（由于先天性心脏病在十三岁去世），经常能从妈妈的兄弟之一、一个船长那里讨到鱼。因为他的父亲远在行政中心卡马萨里，所以要是讨不到的



1964年阿伦贝皮北面矩形广场区的两个村民。(康拉德·科塔克摄)

话，他便去母亲其他亲戚那里。由于有心脏病，他的身子较虚，感到累时他便蹲会儿，等到体力恢复，起身吸引其他渔民的注意力。我在阿伦贝皮早期的鲜活记忆，就包括这个小男孩在沙滩上气喘吁吁、蹲下身，以及成功讨到鱼时的喜笑颜开。

私生子们有时会去找父亲讨鱼，或是一艘船挨着一艘船去找自己的亲戚，依靠亲戚当日的好收成，抑或是某位渔夫同情孩子们千篇一律的饮食：木薯粉、咖啡和糖。虽然没有正式强制约束，但海岸是禁止“正派”妇女进入的；因此，妇女们只有派孩子去讨鱼。这种索要食物或者亲属关系认同（以及被拒绝，特别是被他们的父亲们所拒绝）的心理结果多种多样。有些孩子长大后成了酒鬼，其他孩子决心永远不要再有这种童年经历，成长为志向远大的人。

阿伦贝皮最成功的商人说：“我最痛恨的童年经历，便是不得不在沙滩上乞讨。我父亲与另一个女人结了婚，他对我母亲很吝啬。于是她就找了另一个男人，然后就有了我弟弟。这个男人离开她后，我的职责就是为母亲和弟弟讨鱼。我要确保我的儿子们不用再去乞讨。”

虽然阿伦贝皮人宣称他们彼此之间有亲属关系，但村上缺少许多非工业社

会里的氏族和世系。也没有这类社会中确定世系群的正式的父亲系或母系承嗣制度。理论上，亲属关系既不偏向父方，也不偏向母方，而是平等的。但实际上，男方亲属关系要更重要，这也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出当地男性占据主导地位。原因是，从长时段模式来看，有更多的女性移居阿伦贝皮。1964年约60%的移民是女性，年龄多在十六到四十九岁之间，这是唯一高于男性（54%：46%）的年龄段。之所以会出现这一模式，是因为移居的女性（多来自附近农业区）来阿伦贝皮找丈夫。结果，所有妻子中42%是外来媳，与之相比，外来丈夫只占31%。

阿伦贝皮人一直将本地人和外地人区分开来。由于三分之二的人口至少父母一方出生于外地，只有三分之一的夫妻双方都是本地人，因此，1960年代的对比还不显著。男性和女性进入村庄的方式各有不同。女人们通常是以拜访亲戚的方式来到这里，跟着便在这里住下。男人们也是以拜访亲戚的名义，与亲戚朋友为邻。想要定居的男人，会在船队谋求一职。通常以跟着某位不那么成功的船长打渔开始，后来可以在其船长由于醉酒或懒惰而不来时，提出临时跟其他船长一起打渔。随着移民在当地的名声渐增，他可以拿到一艘好船。一些移民成为富裕的船长和船主。

男性移民比女性移民有更多机会加入村庄生活。他们可以在沙滩上与其他渔民聚会，和其他人一起在泻湖洗澡，酒吧集会，或是晚上在教堂畅聊。就像通常的地中海和拉美模式一样，男人进入社会空间的范围要比女人宽广（见Harding, 1975; Reiter, 1975）。成年女性也可以出门去外面洗衣服、取水、洗澡、购物或走亲访邻，但是女人的聚会一般规模较小且多在室内。

想要在阿伦贝皮站下，外来女性就要找到丈夫。但就算找到丈夫，这位女性的地位，也要比当地女性更加不稳定。由于在当地没有亲戚，外来女性随时需要面对伴随被丈夫抛弃而来的穷困潦倒。没有家人在旁提供至少是情感帮助，外来媳妇经常要比本地媳妇忍受更多辱骂。和本地小孩相比，外来媳妇的小孩对外面的亲戚也没那么熟悉。这就是男方亲属关系（例如船队成员之间）在当地生活中占主要地位的原因。

由此可见，男性和女性之间的机会对比，显示在经济上、公共空间上、亲属网络关系上。此外，也显示在政治生活中。阿伦贝皮几乎没有权威地位，仅有的也都是男性。大多数人家的户主和所有的船长都是男性。以上只是当地妇女



1963年阿伦贝皮的小礼拜堂和中心广场东边，镜头朝北。村里的男人都出海打渔，女人要么忙着在家做杂事，要么在泻湖洗刷。（奈尔斯·埃尔德雷奇惠允使用）

地位低下的许多表现的一部分。家长们喜欢男孩多于女孩，没生男孩 (*macho*) 会让男人不高兴。男孩得到的饮食和待遇都比女孩好。对女孩的偏见也体现在童年死亡率上。由于经常被忽视，女孩的存活率低于男孩。1964年，十岁及以下男孩与女孩的比例是 113 : 100。没人承认这种忽视会导致女婴夭折，这也是女性经济地位低下，在本地社会体系和观念中的表现之一。村民心里很清楚，男孩会得到比女孩更多的照顾：“男孩们若要长得壮，便要吃得多。”

男性从婴幼儿开始，便被鼓励要自由；女性则被层层束缚。从呱呱落地三个月开始，女孩们便开始穿衣，男孩们成年前都可以几乎光着身子走路。男孩出生第一年，母亲们便赞赏他，抚摸他，亲吻他的生殖器。父亲们则公然用手去抓稍大点儿男孩的阴茎，刺激它们勃起，并嘲笑男孩的反应。大人们还鼓励男孩子们手淫，模仿同性之间搞基，并与愿意的女孩、妇女、家禽、家畜发生性关系。

这种男性在性事和生活上的自由，与女性的受限制形成对比。阿伦贝皮人将处女视作商品。他们相信，女孩想要结成法定婚姻，必须保证自己是处女。

- Manage. J. , 1993, 11, 443 - 447.
- [4] Cusumano, M. A. , Manufacturing innovation: lessons from the Japanese auto industry. Sloan Manage. Rev. , 1988, 30, 29 - 39.
- [5] Ellegard, K. , Jonsson, D. , Engstrom, T. , Johansson, M. I. , Medbo, L. and Johansson, B. , Reflective production in the final assembly of motor vehicles—an emerging Swedish challenge. Int. J. Op. Prod. Manage. , 1992, 12, 117 - 133.
- [6] Flynn, B. B. , Schroeder, R. G. and Flynn, E. J. , World class manufacturing: an investigation of Hayes and Wheelwright's foundation. J. Op. Manage. , 1999, 17, 249 - 269.
- [7] Golhar, D. Y. and Stamm, C. L. , The just-in-time philosophy: a literature review. Int. J. Prod. Res. , 1991, 29, 657 - 676.
- [8] Hayes, R. H. and Wheelwright, S. C. , Restoring Our Competitive Edge: Competing Through Manufacturing, 1984 (Wiley: New York).
- [9] Hill, T. J. , Manufacturing Strategy, 1985 (Macmillan: Basingstoke).
- [10] Hoek, R. I. , Peelen, E. and Commandeur, H. R. , Achieving mass customization through postponement; a study of international changes. J. Market-Focused Manage. , 1999, 3, 353 - 368.
- [11] Hounshell, D. A. , From the American System to Mass Production 1800 - 1932: The Development of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in the United States, 1984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Baltimore).
- [12] Kano, N. , Seraku, N. , Takahashi, F. and Tsuji, S. , Attractive quality and must-be quality. Hinshitsu: The Journal of the Japanese Society for Quality Control, 1984, 14, 39 - 48.
- [13] Kidd, P. T. , Agile Manufacturing: Forging New Frontiers, 1994 (Addison-Wesley: Reading, MA).
- [14] Kim, Y. S. and Cochran, D. S. , Reviewing TRIZ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xiomatic Design. J. Eng. Des. , 2000, 11, 79 - 94
- [15] Koste, L. L. and Malhotra, M. K. , Trade-offs among the elements of flexibility: a comparison from the automotive industry. Omega, 2000, 28, 693 - 710.
- [16] Morris, D. C. and Brandon, J. S. , Reengineering Your Business, 1994 (McGraw-Hill: New York).
- [17] New, C. , World-class manufacturing versus strategic trade-offs. Int. J. Op. Prod. Manage. , 1992, 12, 19 - 31.
- [18] Ohno, T. , Toyota Production System, 1978 (Productivity Press: Cambridge, MA).
- [19] Pegels, C. C. , The Toyota production system—lessons for American management. Int. J. Op. Prod. Manage. , 1984, 4, 5 - 11.
- [20] Pine, B. J. , Mass Customization: The New Frontier in Business Competition, 1993 (Harvard Business Press: Boston).
- [21] Schonberger, R. , World Class Manufacturing, 1986 (Free Press: New York).
- [22] Shah, R. and Ward, P. T. , Lean manufacturing: context, practice bundles, and performance. J. Op. Manage. , 2003, 21, 129 - 149.
- [23] Silveira, G. A. and Slack, N. , Exploring the trade-off concept. Int. J. Op. Prod. Manage. , 2001, 21, 949 - 964.
- [24] Skinner, W. , Manufacturing missing link in corporate strategy.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1969, 47, 136 - 145.
- [25] Skinner, W. , Manufacturing strategy on the 'S' curve. Prod. Op. Manage. , 1996, 5, 3 - 14.
- [26] Spina, G. , Bartezzaghi, E. , Bert, A. , Cagliano, R. , Draaijer, D. and Boer, H. , Strategically



这些十多岁的村民展现了阿伦贝皮 1960 年代人口的体质多样性。(康拉德·科塔克摄)

征来区分黑人或白人), 还注意鼻子长度和形状、嘴唇厚度、眼珠颜色及形状、头发形状和颜色, 以及其他一些特征。我在调查中就九种个体之间表型差异的图片, 询问过一百名村民, 他们用了四十多种名称来回答我。我在种族名称上的调查 (Kottak, 1967b) 也表明, 阿伦贝皮人使用名称时并不一致。在我提供的图片中, 肤色、面部特征、头发都有不同, 村民们大体上对图片中个体的种族归属存在分歧。村民们对其中一张图片给出了十九个不同的种族名称, 所有图片中, 村民给出的最少的种族名称也有九个。

村民们在对真人的分类上也有分歧, 对他们自己也不例外。我偶尔说自己忘了他们以前的回答, 再度询问他们属于什么种族, 我经常会得到不同的答案。当我问他们我是哪个种族时, 有人说我是白人 (*branco*), 有人说我是轻度混血 (*light mulato*), 有人仅仅说我是混血 (*mulato*), 还有人说我是 *sarará* (一个搞笑的名称, 用来描述有着微红肤色微卷头发的人, 这是我刚刚晒伤的肤色)。(在美国, 我是白人。) 一些人某天这样称呼我, 过几天又会换个称呼。他们在判断其他村民时, 用的名称一样多变。如何将这一行为与其他地方的巴西人进行对比? 它有什么重要意义?

阿伦贝皮与其他巴西社会有所不同，在那里，较浅肤色与较高经济地位相连，而在阿伦贝皮，浅肤色和财富之间唯一的重要联系是土地所有权。黑人作为奴隶后裔，不如白人那样有机会拥有土地。不过，土地所有权在当地经济中扮演着微乎其微的角色。渔业和渔业利润上的再投资（投资到椰子树方面），是1960年代的经济主流。肤色与当地经济中这些领域内的成功没有必然联系，而这些领域才是地方经济的基础。

这就是为什么我的报道人，虽像其他巴西人共用一套种族名称词汇，却用得含糊不清又模棱两可的原因：种族差异在当地社会不是重点。两个同样成功的船长，一个轻度混血，一个深度混血，是挚友和对方孩子的干爹。他们闲暇时多待在一起。两个贫困的寡妇，一个白人，一个黑人，经常坐在毗邻的房前，一起编制草帽。渔民协会和球会的会长都是有色人种。肤色差别也不会给婚姻造成差异。没有白人嫁给白人、黑人嫁给黑人这样的分别。所有的已婚者都是跨种族婚配。地主代理人和卸任的县议员普鲁登西奥是轻度混血。他妻子是当地学校老师，为深度混血。两个最成功的商人是中度和深度混血。所有村民间的亲属网络关系，跨越了很大的种族分类。

社会行为和种族名称的随意运用表明，平等的阿伦贝皮没有种族歧视。在表型特征差异与财富和权力联系在一起的地方，人们对种族差异的敏感也同时出现在分类上。这似乎出现在一些存在社会分层的巴西社区（见Wagley, 1952）。当人们对种族差异的名称或真人的分类缺乏共识时，也就不会滋生出种族歧视所需的种族意识。这些在1960年代的阿伦贝皮肯定不存在，这也进一步表明了当地社会结构中的平等主义。

第四章

渔民精神

1960年代的阿伦贝皮人，禁锢在社会生活的底层，面临着糟糕的公共卫生、营养不良及较高的婴儿死亡率。既然如此，我为何又要将阿伦贝皮比作桃花源呢？这是因为，在我眼里，当地人要比我看到、听过的其他底层社会的巴西人幸运一些——那些人在缺乏充分就业收入（至少对男性来说）、缺少国家关注、没有生活所需也没有钱、也没有平等社会关系的情况下，与贫困带来的种种不利进行着抗争。

我们知道，阿伦贝皮远离外界影响力之外。掌权者并不关心这些遥远的村民。没人告诉村民要交税、参军、填写政府表格。发生争执时，大家互相和解了事，没人被捕系狱。也没有神父跑来告诉村民，他们是罪人，会在地狱焚身。阿伦贝皮人极少依靠自治村落以外的生活用品。他们有自己的动物蛋白来源。有位当地村民还知道如何造船。村民不用面对长期失业及巴西东北部城市更恶劣的公共卫生状况。阿伦贝皮还免受工业污染和犯罪之苦。

最突出的特点是当地经济自由。可以肯定，村民干的都是体力活。此外，他们在海上想捕多少鱼就捕多少。没人压价收购，所有渔获都可在市场上公开出售。这种开放经济，促进了企业家精神，形成了以个人为基础的社会经济等级分化。这样的开放经济，在渔民社会并不普遍。实际上，我们将会看到，1965年到1980年间渔业的兴衰，对阿伦贝皮的自我转型产生了显著影响。

简要的比较分析同样显示，阿伦贝皮村渔民不但比其他底层社会的巴西人

幸运,也比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单一渔民社区成员来得幸运。科米塔斯(Comitas, 1962)关于渔民社区的文献综述得出结论:人们很少会在有其他如农作或工资收入机会时选择捕鱼。因为捕鱼吸引力小,赚的钱也少。在我第一次研究阿伦贝皮时,谢帕德·福尔曼(Forman, 1967, p.170)研究了巴西北部三百公里远的另一个渔民社区,康奎莱尔村,他的研究更多地支持了科米塔斯的结论,而与阿伦贝皮相去较远。康奎莱尔只有一半男人是渔民,或是退休渔民,而在1964年,74%的阿伦贝皮男性劳动力(180人)将捕鱼作为主要工作,其余的8%将捕鱼作为次要工作。

因此,与其他渔民社区相比,阿伦贝皮处在一种悖论中。它是一个渔民社区,但却不是一个典型渔民社区。为了找到原因,我们必须思考阿伦贝皮渔业和市场特征带给本地渔民的好处,这些好处是其他大多数小型渔业社区所欠缺的,正是这些好处让村民把捕鱼视作有前途的事业。虽然阿伦贝皮人能选择的工作只有出卖劳力,但村民们还是可以选择自己谋生的方式。1960年代,男人们可以选择捕鱼(74%)、做生意(11%)、做手艺(5%)、雇工(4%)、外出打工(4%)和种田(2%)。女人们可以选择编草帽、为港口编渔网、卖吃的给游客、为富裕家庭洗衣或送水。

最有吸引力的是外出工作。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在巴西石油公司这家国有垄断石油企业工作。他们有些在阿伦贝皮买房,周末回来看望父母、妻子和小孩。1965年8月,我做了一个关于阿伦贝皮人经济目标及工作评估的小型访谈,大多人都认为,在巴西石油上班是最理想的选择。因为我的报道人的经济水平都还没超出工薪阶层,所以没有一个人提到中产阶级工作,如医师、律师,甚至连药铺老板和银行柜员都没提到。虽然萨尔瓦多的地理位置和发展给阿伦贝皮提供了比其他相对偏远社区更好的工作前景,但大多数本地男性最终还是选择在村里工作。例如,1964年每户人家中的长子只有26%在外工作。

捕鱼和做生意是村子里最容易成功的职业。虽然1964年时,一个普通渔民(非船长)的最高现金收入只有400美金,但是捕鱼产量最多的船长及船主托梅,当年收入1000美金。这几乎与当时最成功的三个生意人持平。托梅事实上拥有最高的实际收益,因为他的职业(像所有其他渔民一样)包吃饭。实际收益这一概念(指除掉食物开销后的现金数目),在评估阿伦贝皮相关经济成功高低时很有必要,因为有些工作提供食物,有些不提供。托梅当时的经济



阿伦贝皮最成功的船长之一：Zuca。（杰拉尔德·米拉尼克惠允使用）

状况非常好，他还拥有一个小农场可以种植蔬菜水果。

经济地位最高的是那些成功的生意人和船长兼船主。接下来是稍逊一点的生意人和船长兼船主，以及最成功船上的普通船员。位居经济地位最底层的是没有男人的独居女人。位居她们上面的是临时工和农民，以及最不成功的渔民，包括一些靠不住的船长。所有想过好日子的村民，都选择了捕鱼、做生意、外出种田或在当地做工。泥瓦匠和木匠一天能挣 1 美元。摘椰子、去壳、加工挣得更少，而且还是季节性的。

阿伦贝皮所有成功人士都有一份以上的工作。比如，1965 年的托梅是船长兼船主，拥有一个小农庄，还卖椰子。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渔业能提供食物，而做生意则不能，不做渔民的有更多时间耕田，选择各种挣钱行当。比如，其中一个地主拥有两个商店，运输饮用水，贩鱼和椰子，耕田，出售自己的椰子，并有三艘船的股份。只有 38% 的渔民有多份工作，相比之下，74% 的生意人做多份工作。

我需要再次强调，1960 年代的阿伦贝皮拥有开放的经济等级，只要有志向、努力工作、有卓越的商业头脑，很容易从底层爬向高层。阿伦贝皮相对的好运，

归因于萨尔瓦多的扩张，以及萨尔瓦多对渔业的供不应求。1960年代，阿伦贝皮人看到鱼价上升的速度快于通货膨胀，一些渔民从中获利、再投资，最终获取了暴利。

阿伦贝皮的财富累积，与福尔曼 (Forman, 1970) 的康奎莱尔村形成鲜明对比。在康奎莱尔，政府和当地渔业主席联合起来平抑鱼价，禁止渔民自行卖鱼。康奎莱尔不像阿伦贝皮那样临近城市，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依附于本地行政中心。康奎莱尔的情况突出了阿伦贝皮靠近市场，但在行政上又不受市场所在地控制的幸运。在阿伦贝皮，至少从1973年开始，渔民们对渔业生产和出售的控制权越来越大。我们可以从对渔业的描述中理解和体会到这种状况。

船员的生活

1960年代中期，捕鱼船都是（长六米最宽二米的）小木船：靠风力或人力带动的帆船。在逐年增加之后，到1959年，经常捕鱼的帆船数量稳定在三十一艘。渔船数量受到港口限制，港口由沙滩东部一个海水中时隐时现的礁石形成。渔船进出港口要过五处暗礁。

海上渔业都需要鱼钩和钓线。近海捕鱼则需要另一些技巧。有个经常在夏季海港边撒网的老人，就靠自己的独木舟和大拖网。1965年，村民开始试用三层刺网捕鱼，这种网垂直竖在海里。人们最终发现三层刺网在捕获龙虾时最有用。在短暂的龙虾季节，鱼网数量从1965年的250米，增加到1973年的4300米。妇女和小孩用抄网在泻湖里捞小鱼，但1973年因工业污染而停止。一些男人们在阿伦贝皮北部和南部河流区域筑围堰捉小虾。退潮时男孩们用杆子在礁石里找鱼，妇女和小孩则在暗礁处采集海蛎和海胆。

当地的经济支柱，一直是外海钓线捕鱼。最好的捕鱼地点就是大陆坡，大陆坡是大陆架边缘处陡降到深海的区域。大陆架是逐渐没入水中的海岸平坡，阿伦贝皮距离大陆架边缘仅有十一公里，世界平均则是五十公里。这是阿伦贝皮的另一个主要优势。由于大陆坡靠近海岸，上天赐予村民们可以捕获60—360米深各种鱼类的先天条件。尤其是让他们有机会捕获马眼鲷 (*olho de boi*)，这是一种每年都会大群洄游的鱼类。



阿伦贝皮礁石拱卫的天然小港。图中可见，渔船在潮水很低的一天（正午时分）出海。（康拉德·科塔克摄）

捕鱼分三季，一位渔民解释说：“六月份到九月份是冬季，这段时间不利于捕鱼；由于天气原因，我们只能近岸捕鱼。夏季从十月份延续到来年一月份，这个时期海平如镜，波澜不兴，我们很容易航行到远岸。二月份开始捕鲚鱼。我们一大早航到大陆坡，一直在那里捕鱼，有时可以满载而归。从二月份到五月份，我们整个秋天都能这样。”

夏季和秋季，村民们航行三四个小时到达大陆坡，很多鱼类都生活在 108 米深的石壁下。在经常出现骤雨激浪的冬日雨季里，渔船大多在海岸附近捞鱼。他们赶到不足一小时航程的礁石附近，那里距离沙床 10—36 米深。他们整个冬季都在近岸捕鱼，主要是怕糟糕的天气。

虽然渔船里有五个位置，并各有职司，但 1960 年代平均每艘渔船只有四个船员。这是劳动力短缺的结果。大多数渔民都在四人或五人船队有一席之地。其中部分人有第二选择：如果他们的主船不出船，他们可以在另一个船队捕鱼。

船员的主要区别是船长和普通船员。1960 年代中期，船长对船可以全权所有、合伙所有或受雇。每天捕鱼结束，“渔船”（即所有者（们））拿走当天渔

市销量的 25%。剩下四或五个船员平分余下的 75%。作为船主的船长，会得到 25% 作为分成，还有 15% 作为船员身份所得。除去维修费用（每年不到 100 美元），平均每个船主兼船长每年净得 500 美元，还有他每日吃的鱼。成功船长的收入是这个的两倍。与人合股的船长（合伙人通常是个当地商人），则与人分摊渔船的收入和开销。

1965 年，每个有志向的当地人都有机会从事捕鱼。虽然买一条装备齐全的全新渔船，差不多相当于一个普通渔民的全年收入，但买一艘船的钱，可以通过在外地从事商业捕鱼，也可以给人当一两年船长，靠这一两年里的一半分成购得。他可以用船长职务（25% 的红利）抵清一半购船花费。合伙所得和努力工作，使他有足够的额外收入为自己买船。1960 年代中期，渔民们一直都在这么干。

渔民也可以从鱼价的涨落中获益。1965 年的鱼价是 1962 年的五倍，而装备齐全的新船价格则只是 1962 年的 2.5 倍。换个角度来说，一艘船在 1962 年相当于 800 公斤鱼的售价，相比之下，1965 年只有 400 公斤鱼的售价。随着鱼价增长，渔民开始订购自己的船只。三个最大商店的店主，在 1964 年都持有船股。但到 1965 年他们的船长都自立了：他们不是卖掉了股份，就是放弃了渔船。一个中年店主 1965 年告诉我：“从接手我父亲的生意开始，我便拥有一艘船，但我找不到人来当船长。所有优秀船长都有自己的船。他们忘了像我这样的人曾帮他们起步，给他们一半收成。”

到 1965 年，三十一名船长有二十一名有全部（5 个）或者一半（16 个）船股。不止三个船长计划偿清余下一半船股。船价也因此降到 150 美元。每个合伙人每年可以得到 28% 的销售额，净收入约 400 美元。他可以用这些钱购买另一半股份，或者用低价收购新船，与不捕鱼的所有者解除关系。

这一新兴模式表达了渔民们，尤其是船长，不得不与那些不捕鱼的人分享自己劳动成果的愤愤不平之情。船长买船能力的逐渐增长，有力地阻止了不捕鱼的船主们获得渔业收入。“谁想跟那些坐在岸上什么都不做的人分享成果！我忙得晕头转向，他却什么都不做，”说这话的船长，就是之前我引用过的那位店主的合伙人。船长之所以与不捕鱼的船主分成或为其卖力，是因为：(1) 经济需要，(2) 亲戚，(3) 船长缺少志向或是没有恒心。

大多数船长们退出这种合作关系之后，不捕鱼的船主们只能吸引那些碌碌

无为的船长们。既然不靠谱的船长只能吸引不靠谱的船员，不捕鱼的船主们自然也就获益有限。由于船长和普通船员都有不足，不捕鱼的船主们只是这些船长和船员三天晒网两天打渔活动的依赖者，就像那些有志向的渔民曾经要与这些不捕鱼的船主们分享收益一样的感觉。

帆船并不那么珍贵，也不那么耐用，平均每艘船有十年使用寿命。船每年需要少许整修，用过七年需要进行一次大修。1965年一位报道人刚刚订购了自己的渔船，“现在大修的花费与买新船的花费持平。即使你买新船时加入了设备费用（船帆和桅杆、水桶和锚具），大修一艘老船，还是会花去相当于购买新船一半的费用。这就是为什么人们会卖掉老船（卖给北部渔村的买家）买新船。新船比维修过的老船要耐用得多。”

继承渔船的情况很少，从一代传给下一代的财富并不长久。渔船的价值并不体现在商品上，而是体现在充满热情的船长和船员的生产方式上。劳伦蒂诺这位不捕鱼的船主的故事表明：没有人力，渔船价值会降到零。

劳伦蒂诺有一间从父亲那里继承来的商店，还有一间自己开的小店，他曾有四艘船的股份。劳伦蒂诺比其他村民更难找到船长和船员，因为大家不怎么喜欢他。他不像其他店主那样允许赊销。人们认为他信奉坎东布雷教，这是一种仅于1960年代中期在阿伦贝皮流行过的非洲—巴西巫术。“他们说有一个魔鬼（cāo），是一只他锁在店里的恶灵犬，”我们的厨娘说。一天晚上，她叫我带她回家的路上告诉我：“我从来没见过，但是昨天晚上他的门半开着，屋里透出一道奇怪的光线。我到那里去完全是身不由己。”劳伦蒂诺不善交际导致他被孤立，正是闲言、排斥和其他财富流失，最终使得他无法在渔业中获益。1965年，劳伦蒂诺放弃寻找船长和船员。他只卖了一艘船，剩下的全砍成木材烧掉：这是捕鱼业中不捕鱼的船主无法获益的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例子。

即使在1970年代早期，（通过政府给成功的船长贷款）引入发动机，不捕鱼的船主仍然无法发展渔业。阿伦贝皮的简单捕鱼技术成本低，周期短，每个人都能通过努力工作获得成功。渔业经济的本质（特别是它的技术），便是这个社会等级保持分级而非分层的另一个原因。（我们可以参见第八章，1980年的阿伦贝皮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需要花费5500公斤鱼来买船，而不是1964年的400公斤鱼。）

在平等社会中脱颖而出

社会经济障碍，使得不捕鱼的船主很难获得和船长们一样的稳定收益。船长和普通渔民之间的差异也很大。在平等社会，这是日常生产单位（船队成员）中唯一显著的对比。船长的职责包括捕鱼，大多数船长还要完全或部分负起船主的责任。一个普通渔民这样描述船长的角色：

天气不好，或是看起来要变天，由船长决定是否起航。船长准备好后，渔船起航。一到暗礁的另一边，他会告诉我们他认为该开始捕鱼的地点。捕鱼量要是不够，他会决定我们何时换个地方捕鱼。船长决定每天何时捕鱼结束，然后我们便回家。他负责航海，通过地标定位我们的位置，下达指令，决定扬帆还是收帆、起锚还是抛锚。

我对几位船长的观察，证实了这个渔民的基本总结。船长的特殊角色，在捕鱼开始时结束：选好捕鱼点，沉下线锤确定岩层，定位船只，抛锚。在船长发出指令，起航回家，或是移到下一个捕鱼点前，他都和其他人一样捕鱼。有时船长会用尼龙鱼线，而不是普通渔民用的廉价鱼线，但他钓鱼的技术并不比其他任何船员高明。船长和船员一样，在太阳底下坐上数小时——我也跟着去过几次——随着大西洋海面起起伏伏，忍受骤雨倾盆，在风暴中共同与危险的暗礁搏斗。

哪怕海面动荡，也不会令熟练的水手晕船。“康拉多，你是不是想吐？”每次跟船出行，总会有人定时问我。有些人告诉我，他们以前捕过鱼，后来因为晕船，只好去做别的活。每个人都觉得我也会这样。一个炎热的下午，我差点晕过去，我忍不住想要呕吐，因为我坐在一堆腐烂的胡瓜鱼（*manjuba*）旁，臭味向我阵阵飘来。我想象着一些小小的目光呆滞的尸体从银色变成褐绿色。

海上生活会产生一种独特的情谊：数小时的共同等待，一次偶然的渔汛，在密布的礁石中幸运地上钩，孕育了一种同志之情。如果有人在一个捕鱼点成功捕到，其他人也可以在那里下钩。因此，所有船舶都加入了“合作线路”体系，将一天捕到的小鱼平分。偶尔捕到大鱼，在有些船队中也会平分。在其他船队则由捕获的渔民自己出售。

船长的特殊角色，在他起锚返航的时刻结束。连续几天遇上无法捕鱼的坏

天气，或是小港湾里船多，港湾外浪急，出航易遭大浪的情况下，船长有权决定靠岸。把船拖上岸是件紧迫、费力、需要一起出力的工作，赶上恶劣天气，上岸时间会比平常冬日下午还早。海滩上每个人都要出力。工作包括安排位置、放好巨大的木螺旋桨、把船拖到恶劣天气里最高浪头都打不到的沙滩上。

船长像所有其他船主一样，要将一部分渔获交给渔民协会组织的二月节。船主们则将每年 5% 的销售额献给守护神的节日。一个船长兼船主向我吐露：“人们的奉献没有超过 2% 的，大多数人交都不交。”船主们决定船舶何时填缝、油漆或整修。如果船只受损，船长兼船主就有可能失去生活来源，但这种事故很少发生。我听到的最糟糕的事情发生在 1961 年。唯一的幸存者告诉我，他当时紧靠船只碎片：“一条梭鱼在那几个小时里一直与我待在一起，直到我被海水冲上岸。那一定是我守护天使的化身。要不是它，我肯定被淹死了。”船主们支付修缮和维护费用。当然，拥有部分所有权的船长，也要与不捕鱼的船主分担风险和收益；但只负责某次捕鱼的船长的职责，在捕鱼结束时即告终止。

1965 年，平均每个船队每年有约 3500 公斤的捕鱼量。加上渔民和家庭每年吃掉 1000—1500 多公斤，船队每年捕鱼量为 5000 公斤。这只是一个平均值，一些定期捕鱼的船队比其他船队收成更好。

生产上的差异的确存在（表现为可见的生活质量不同），这一事实在平等社会中又如何解释呢？为什么阿伦贝皮人会在显而易见的事实面前，继续坚持他们一贯的看法，认为“我们这里都是平等的”呢？由于阿伦贝皮大多数财富差距都来自渔业获益，村民对于海上成功的解释，也就显得非常重要。

不过，我很快便发现，阿伦贝皮人对两个关键问题有不同看法：(1) 一些船比其他船捕到更多鱼的原因是什么？(2) 是什么造成船长和普通渔民之间的区别？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反映了回应者的参照群体。这里有四个相关群体：(1) 成功船长，年龄介于二十到四十多岁的男性；(2) 老船长，曾经属于“成功船长”的行列；(3) 最不成功的船长，各年龄段都有，不固定捕鱼，基本上都酗酒；(4) 普通渔民，包括退休船长和准船长。

我在 1965 年时意识到，这些群体划分上的错误观念，使他们对真正决定渔业成功的因素缺乏正确理解。同时我也注意到，这是一种根本上的困惑和误解。大家基本上都认为，人们要是都想加紧工作，提高生产力，最终将会威胁到阿伦贝皮的平等风气，他们坚持认为，尽管当前表面上暂时存在财富差异，但所

有村民实际上是平等的。

分歧出在哪里呢？普通渔民和不成功的船长们，安于用运气来解释一些船长比其他人捕鱼更多。“有些船长运气好，他们不管在哪里下锚都能捕到鱼，”一个普通渔民说。实际上，说到运气的这个人不想承认一些船长比其他人做得好，也不想承认人们在捕鱼、生活方式和对渔民协会的贡献上的差异，表现了不同程度的成就。普通渔民和不成功的船长看不出船长之间的差异。他们认为，虽然一些船长似乎现在比其他人运气好，但他们所有人还是平等的。

这些人将成功归于运气，拒绝承认成就大小的差异，与最成功船长们的想法有极大不同。那些属于群体(1)的最成功的船长们，有完全不同的侧重点。他们强调个人价值的体现，商业头脑，以及努力、计划、管理和再投资的回报。

成功的船长们并不吹嘘他们的成就，但却承认一些船长比其他人要优秀。托梅解释说：“捕鱼量最大的船只捕鱼最规律。那些船长出海最久，他们的船员工作最努力。”托梅像我之前一样将船长分为三个群体。“一流船长”指的是年轻、努力工作的船长兼船主（如托梅），或是给渔民协会作出贡献最多的渔船合伙人。托梅给成功所下的定义，也揭示了另一个主题：对捕鱼位置的准确判断（见下一节），这会和捕鱼技术混在一起。

从托梅的描述中，可以看到“二流船长”的困惑，他们“目光短浅”，没有“一流船长”对渔民协会的贡献大。在这一分类上，他还加入了以前成功的船长们，现在“不再能看清捕鱼点的位置”。他们大都是德高望重的老船长，十五或二十年前都属于“一流船长”一类。

托梅认为，“三流船长”是所有年龄段中从没成功过、永远也不会成功的人，主要因为他们灌了太多朗姆酒。他们大都不是船主，捕鱼对他们来说只是个任务，他们在船与船之间换来换去，对其他船员没有忠诚可言，有时也替其他船干活。由于醉酒或疾病，他们经常错过捕鱼，其他船员也是彼此彼此。除了托梅认为群体(2)“目光短浅”，他对成功的决定因素和同侪的分类，与我的想法一致。

不成功船长和普通渔民的观点则有所不同。他们眼中运气或机会这样的成功因素，只能解释短期差异。长期来看，好运不会对每个渔民厚此薄彼。客观分析还是支持成功船长的观点。真正决定长期产量差异的因素，是一些体质和人格特征，是这些因素，使得有些船长成为优秀渔民。

成功的关键是什么？因为正值二三十岁，最佳船长都有好身体，这使得他们可以定期出船。因为他们可靠，又能吸引努力工作的船员。好体力能使他们长时间在海上捕鱼，工作更努力，也无惧恶劣天气。就像社会学家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Weber, 1920/1958）一书中所推崇的早期新教创业者一样，阿伦贝皮最成功的渔民，能够承担预计的风险。他们在一个捕鱼季节里，能通过适当方式获得最大的捕鱼量。比如说，赶到冬季，他们会去有些鱼类集中的礁岩区域的大陆坡。有时他们会到阿伦贝皮人通常不去的北部捕鱼。他们的冒险，也使他们有更多渔获。

他们就像韦伯笔下的新教资本家，虽然级别较低，但把清醒作为一种美德。成功的船长较少喝酒，喝也只喝啤酒，只在节日才喝朗姆酒。啤酒酒精含量低，比粗制的朗姆酒要贵，是身份的象征，也没有朗姆酒那么容易醉人。成功的船长可以喝大量啤酒而不宿醉。他们从不因酗酒错过捕鱼。阿伦贝皮的最佳船长们，得到船员更多的忠诚，并吸引了更好的船员，船员愿意跟着他们干得更久，捕鱼也更努力。

成功的船长因其性格和付出而获得回报，他们比其他渔民有更好的住房，



1964年相当成功的船长 Francisco。（康拉德·科塔克摄）

饮食更丰盛，财产更多，生活更舒适。他们周末在村中闲逛，带着用赚来的钱买的短波收音机逛逛酒吧。阿伦贝皮人与早期新教资本主义创业者的不同在于，他们重视消费品和“好生活”，那些企业家则将他们的成功隐藏在朴素和中产阶级家庭禁欲主义之下。阿伦贝皮人接受生活方式上的差异，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和乔治·福斯特 (Foster, 1965) 笔下传统农民社会所谓“有限产品的想象” (image of limited good) 有所不同。按照福斯特的观点，这种世界观让农民认为，生活方式上的不同，是某些村民在其他村民身上获利的证据，并用平均机制来减少超出平均水平的“暴发户”。

阿伦贝皮的渔业经济，是它居于福斯特笔下农民社会“有限产品的想象”特征，和韦伯眼中早期资本主义新教伦理之间的主要原因。在好的情况下，就像当年在 1960 年代阿伦贝皮普遍可以看到的那样，捕鱼成功需要某种人格特征。巴里、培根和蔡尔德 (Barry, Bacon & Child, 1959) 调查分析了几个社会的人格结构，发现掠夺者^[1] 强调成就、竞争、自力更生和独立。这些特征对于海上捕鱼的渔民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很难在海上划分财产所有权，控制海洋资源，监督生产及存储产品。阿伦贝皮人能在有限的技术、劳动力、市场资源之下，以不伤害所需物种的方式，增加渔业生产。^[2]

对于阿伦贝皮的渔民来说，海洋是无边无际的。渔业方面的主要影响来自

[1] 就连技术先进的外海捕鱼也保留了这种掠夺形式 (foraging)：攫取自然或野生资源，而非安于养殖。即便最有经验的渔民也不会致力于海洋资源的增长。渔业养殖可以在有限的水域进行，如池塘和稻田，但在海上则无能为力。当然，渔民可以避免在某些地区过度捕捞，等鱼群恢复繁殖，再提高产量。雷达、无线电话、测向仪和回声探测器等电子设备，可以帮助发现鱼群。虽然阿伦贝皮人没有使用这些设备，但它们确实有助于保护和捕获鱼群。

[2] 增加产量最可靠的方式就是捕捞更多。我们从中发现了海洋捕鱼和其他掠夺方式的最主要区别。在狩猎采集社会，高强度生产的首要威胁在于，如果人们对自然界提供的战略物资 (尤指猎物) 开采过度，物资将有殆尽之虞。因此，马歇尔·萨林斯 (Sahlins, 1972) 就将狩猎采集社会描述为原初闲适社会，即原初“丰裕”社会。低度工作把对环境的开发，维持在环境所能供养人口的实际能力之下，有利于保护动植物资源。简单技术的海洋渔业，提供了一个对照。像阿伦贝皮这样的渔民们有着广阔的海洋环境，可以高度生产，而无所需物种匮乏之忧。现代国家之外的渔民们，如北美北太平洋海岸的原著民中的夸富宴 (一种攀比式的宴请) 会促进生产，人们提高鱼类和其他资源的生产，在盛大的宴会上消费或分发 (见 Harris, 1974)。而阿伦贝皮和其他现代渔村一样，增长的生产则流向外部市场。否则的话，由于鱼类易腐，如果产量增加，通常也会伴随相应的分配行为。

技术，比如说对风力的依赖。与之相比，福斯特笔下的农民社会中，农民的资源有限，他们的收益是一次性在丰收时获得的。阿伦贝皮人则像其他海上渔民一样，在现存技术和市场可能性之下，机遇和努力决定了生产水平。产品的生产没有限制，并能在不损害他人的前提下增长。

开放的渔业经济，及市场提供的机遇，赋予最成功的阿伦贝皮人通向成功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使他们有机会追求个人事业的成就。同时，阿伦贝皮又有邻近农村的一些特征，包括它们的总体贫困和“有限产品的想象”：平等意识、分享义务和平均机制。下面我们来思考一下，我们在这些世界观里所遇到的最奇特的领域。

捕鱼地点之谜

大多数阿伦贝皮人都误以为：某种体质特征优势，像好视力，可以解释为什么有些人是船长其他人则不是，可以解释为什么（除了运气）一些船长比其他船长优秀。尤其是这种特征，能使船长通过可见的三角地标测量系统，确定并记住确切的捕鱼地点。

渔民既能分辨海床上的大片区域，也能认出其中较小的地点。这些都被称为 *pesqueiros*。渔民们正确认识到，大多数鱼都在小鱼吃植物、大鱼吃小鱼的海底岩石区。阿伦贝皮渔民认为，海底岩石区比其他地方的鱼多，并用地标标示出这些区域。大多数冬季捕鱼（利用地标）都在距海岸四公里范围的四个岩石和沙底组成的海域内进行。大多数夏季和秋季捕鱼（不用地标）都在大陆坡上，渔船按照顺序在互相看不到的地方捕鱼。人们一直用测水锤来确定这些大陆坡上的捕鱼点。

虽然我一点都不怀疑阿伦贝皮是否真的存在地标，或是地标是否真的有用，但我相信，阿伦贝皮人多少夸大了地标系统的精度、规模和重要性。民族志学者经过缜密调查不难发现，他们自己的结论和一些乃至大多数报道人有巨大差别。本地人和人类学家之间存在不同解释的原因是什么？当然，其中一种可能性是，人类学家错了。另一种可能性则是，报道者有意在撒谎。或者说，可能本地人认为问题中提到的事情微不足道，不用多想，或者无需科学知识加以精

确解释。一般来讲，无论人类学家发现的夸大或不准确的信仰是否具有明确的功能，它对当地社会系统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有时，这一功能会阻碍或迷惑我们去全面理解当地认知体系，因为全面理解可能会对认知体系的正常功能构成威胁。这里我可以举一些美国社会中神秘化的例子，比如，政治学家认为，武器是“和平使者”，懒惰是失业的原因。这些美国人的故弄玄虚就有分散我们关注真相的功能和效果，比如使我们忽视了军工巨头的游说及其影响力，忽视了是工作岗位和机会不足才导致不可避免的失业。这种故弄玄虚，干扰了人们去认知现状，阻碍了人们去改变现实。这就可以解释阿伦贝皮人对地标作用的信仰，以及捕鱼点决定捕鱼成功与否的原因。

阿伦贝皮人的信仰，阻碍了他们去完整认识决定渔业成功更重要的因素（如，商业行为和价值观）。但是，这种混沌的信仰，实际上与无阶级、追求成功型社会完全共存，甚至不谋而合，就像莫顿·弗里德（Fried, 1960）眼中的“平等社会”，将所有差不多同年龄、同性别人们之间的成就差异，归因于个体无法掌控的个人特征。和平等社会一样，阿伦贝皮人认为某些人表现出色，是因为他们正好有某种天分、能力或特性——身体、精神或心理上的特质。平等社会与分层社会之间的巨大差异在于：在分层社会中，人们的阶级背景，在成年时期会影响他们的地位和机会。

大多数阿伦贝皮人都将运气和好视力视为渔业成功的条件。平等社会中的人们也抱持这种想法。毕竟运气是客观的，非人力所控。敏锐的视力是个人体质优势，个人（戴不戴眼镜）同样非人力所控。人们认可这些成功的条件，就可以帮助解决平等结构与个人奋斗精神这一事实之间的矛盾，因为个体可以通过努力工作，这一点显然是人力所及，去提高生产水平。

先前提到，船员之间唯一的显著差别是船长和普通船员。因此，村民认为船长拥有某种特殊技能，所以能获得较大份额的捕获量。能否定位和牢记捕鱼地点的能力，是对船长的初步检验。普通渔民也有了自己当不了船长的借口。并非他们懒惰、愚蠢或靠不住，只因他们视力太差，看不远，也不能排列地标。

从船只抵达捕鱼点时的情况中，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人们对地标重要性的强调有些夸张。在回到之前标记的地点前，渔船会一直在海面滑行，直到船长做好一排标记，接着沿着第一排地标滑行，直到看到第二排地标。抛锚和收帆前，会有人扔下锤线试探底层是不是岩层，由此可以看出船员是否到位。有

时，扔锤线这个过程会持续一个多小时。锤线用得太多后，人们通常便会忘记那些地标，定位也就只靠锤线的检测结果。

我发现，主要是老船长在夸大定位系统的精确性。有些老船长宣称自己能找到非常小的捕鱼点，比方说，一条船这么大的地方。年轻些的船长则说捕鱼点不可能这么小。我咨询的萨尔瓦多航海捕鱼专家，也持相同观点，他说：巴西沿海渔民运用的地标技术，能够区分最小八平米的捕鱼点，这是老船长所说大小的五倍。

我将老船长关于地标系统的话理解为，对老人权威（通常是种超自然能力）的表达，这一点在很多平等社会中都存在。在阿伦贝皮，老人们是不朽的，很多年轻人也接受了成功原因的神秘说法。在一个男权主导、男性力量受到高度重视的社会，船长们不会把捕鱼量减少说成是他们年老体弱。他们可以堂而皇之地找出一个肯定在人力之外的身体原因：好视力，也不会显得那么残酷。这给了他们一种文化上容易接受的解释，为他们提供即将或正在从船长位置上退休的理由。视力减退是老船长捕鱼量减少的方便借口，真正原因则是体力下降，村子看重男性力量，使他们觉得有必要在这上面稍作掩饰。

老年时的身体衰弱，限制了定期捕鱼和整体能力，能力下降就包括了视力减退，但他们不会为其所困。（事实上，到1965年，一些老船长配上了眼镜，但他们并没有再回去当船长。）老船长将视力减退作为退休的理由，仍能得到年轻人的尊重，因为他们曾因良好的先天优势获得大量收成。老船长们宣称视力减退，是因自己将一生献给了大海，告诉年轻船长们今后会有相同的命运。普通渔民也相信成功短暂而易变，生活方式上的不同，建立在运气和视力差异之上，并将绵延一生。

老船长们的神秘化，不仅体现在地标系统的精确性上，还体现在它的规模上。船长们宣称自己能够标记并记住五到二百个捕鱼点。老船长们一直说自己记的最多。一位五十五岁的老船长说：“我能记住约一百个捕鱼点，但这没什么大不了。有的船长能记住二三百个捕鱼点。”然而，最佳船长托梅却说自己只能记住二十个捕鱼点，另一个年轻商人也给出类似数据，他说：“二十个是平均数，没人能记住一百个捕鱼点，能记五十个就很不错了。”

尽管阿伦贝皮人的观念里都认为，船长需要有标记地点的能力，但我必须强调，很多时候捕鱼根本不需要标记捕鱼点。只有冬天在最靠近海岸的一些捕

鱼区域才需要地标。夏秋两季人们推测捕鱼点的海底是不是岩石区时，用的是线锤，而不是地标。一位渔民说：“大陆坡有地标，但就连有着老鹰眼力的船长也很难看到，这就是为什么人们经常用线锤的原因。”

如果捕鱼点没有大多数阿伦贝皮人眼里的那么多、那么精确，也没那么重要，捕鱼点是否还有经济利用价值？1963年的田野队员奈尔斯·埃尔德雷奇（Eldredge, 1963, p.27），研究了阿伦贝皮渔业，他根据自己的推理认为，渔民之所以标记和记住捕鱼点，是因为地标系统能减少花费在线锤上的大量时间。这一理性原因，再加上对整个海床区域（地区和大岩石区）定位的功能，可以充分解释视觉三角测量标记地标系统，在全世界沿海渔民中的广泛使用。

我们也应记得船长角色和捕鱼点的相关性，船长的价值体现在他对技术和经济的掌控上。像阿尔贝托这样的普通渔民就认为，凭他的破视力和破记忆，永远都成不了船长，“我要是有钱买艘汽艇，想什么时候去大陆坡就能什么时候去，我就很容易在海岸边捕到更多鱼，比那些最佳船长还多。就算只有一条小船和一个发动机，我还是可以成为整个阿伦贝皮最成功的渔民。”阿尔贝托的这些想法，在1965年到1973年间，得到部分实现。随着1970年代早期机动化的普及，以前只能夏秋两季捕鱼的地方，现在全年都能捕鱼，以前的船员也成了船长，其中有些以前甚至连渔民都不是。我会在第六章讨论这些变化。

地方和区域因素一同赋予阿伦贝皮这样一种难得的好运。我在本章和第三章讨论了地方因素。第五章将会讲到区域因素。各种因素合到一起，使得很多阿伦贝皮人的性格和韦伯所谓新教徒的资本主义精神如出一辙。这就是为什么说——虽然很多阿伦贝皮人对决定成功的因素存在错误认识——真正决定成功的既不是运气也不是好视力，而是韦伯式的企业家人格，但是，前者的平等主义、男性至上，却能与后者的个人主义、追求成功并行不悖的原因所在。这是第四章和第五章的重点：阿伦贝皮人的企业家人格特征，并不是村子致富的原因。正好相反：是阿伦贝皮有利的地方和区域条件，创造并培养了这些性格特征，尽管他们对平等、共享和平均同时有着相互矛盾的观念。“捕鱼点之谜”沟通了这些观念中的矛盾。这个谜团使得同一个社区能够保持两种不同的观念。不过，随后我们将会看到，这些灵验捕鱼点的传统信仰，曾在渔业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如今由于技术改变已几近消亡。

第五章

更大的池塘

随着渔业生产逐步繁荣，市场回馈进一步促进生产，从而在 1960 年代孕育了阿伦贝皮人不断进取的性格。阿伦贝皮渔民在市场方面也很幸运，福尔曼 (Forman, 1970) 总结道：世界上大多数渔民很少能进入市场，很少能控制他们售出的价格。阿伦贝皮之所以如此好运的原因，我们之前已经谈过。本章还要进一步关注渔业市场，因为这是阿伦贝皮与外部世界的主要联系，它在 1965 年产生了当地三分之二的现金收入。

阿伦贝皮的市场机会，在它的历史上一一直稳步发展，尤其是从 1950 年开始，司机开着四驱吉普第一次来买鱼。之前，一些鱼贩用骡子、驴子、小毛驴把鱼驮到十八公里外的路口村，而后用卡车运到萨尔瓦多。这种模式并未突然结束。1962 年我第一次研究阿伦贝皮时，雨季的道路仍然难走，很多渔民还是将鱼卖给骡贩。只有一半船只把鱼卖给开车过来的贩子罗贝托，他有辆四轮机车，但有时还是无法在冬季开到阿伦贝皮。很多人长期保持和骡贩的交往，渔民们可以信任他们，无论天好天坏，他们都会来村收购。

旧市场的日子历历可数。从 1964 年起，道路的改善，给阿伦贝皮带来两位新的货车买家。一位是伊塔庞鱼市批发商，派他的教子过来收鱼，把鱼卖给附近的空军基地，以及前往萨尔瓦多路上的餐馆。另一位批发商则把收来的鱼卖到萨尔瓦多。1965 年时，这两位批发商都在几艘船上入股。他们用更高的价钱抢走了先前买家手里的客户。



1964 年的一个下午，船队返航后，贝蒂和一个船主在沙滩上聊天。沙滩上的人是船主、卖鱼者和贩子。（康拉德·科塔克摄）

村民与骡贩之间的联系，既是社会的，也是经济的。干亲关系经常为经济往来加入社会联系。就连罗贝托这样自己有车、在 1962 年收购了阿伦贝皮一半渔获的贩子，也与自己的客户保持着良好的社会关系。他在村里有两个教子，并很认真地承担对他们的义务，后来在他们去萨尔瓦多上学期间提供食宿。没有鱼可运的时候，罗贝托会载上某位船长兼船主和妻子到萨尔瓦多，晚上给他们安排住宿。赶上雨季，待在萨尔瓦多的罗贝托很难了解阿伦贝皮的天气是否适合捕鱼。但因有十几艘船等着他在鱼烂掉前拉去市场，他无法拂了渔民的盛情。由于与阿伦贝皮人有着密切的社会关系，1962 年 8 月，罗贝托带着他的新娘在阿伦贝皮举行了第二场婚礼，并在此度过简短的蜜月。

从 1965 年开始，罗贝托脱离了与阿伦贝皮的经济往来关系，主要将时间花在萨尔瓦多的商业利益上。他渐渐退出往来。1964 年，他仍保有七艘船的购买权。他会派人运鱼，将鱼卖到伊塔庞的鱼行，店主再付给罗贝托劳务费。

虽然通往萨尔瓦多的道路逐步得到改善，减少了渔民对某些购买者的依靠，并提高了鱼价，但阿伦贝皮人一直都保留着一定程度的选择权，决定将鱼卖给

谁。市场机动化之前的旧模式是，每艘船都有自己的骡贩，把鱼运到路口村。这些贩子的数量，随着夏天捕鱼量增加和鲑鱼收获而增长。村民们从来不靠单一一个买家，这里始终都会有几位贩子。这些人就像阿伦贝皮人一样，处于社会底层，从中能取得少许毛利，在城镇和村庄之间技术含量很低的分配体系中苟且生存。

阿伦贝皮的市场优势，在1962年到1965年间发生的事情中得到充分体现，这段时期，外来中间商被直接批发商取代。尽管罗贝托有吉普，但他还是和其他人一样是个中间人。他还要将鱼转卖给城里的批发商。虽说罗贝托是迄今在阿伦贝皮最受欢迎的鱼贩，但他最终也被迫退出，因为他承受不了和批发商一样高的价格。当罗贝托逐步退出阿伦贝皮的经济体系时，一些新的中介冒了出来。之前提到来自伊塔庞和萨尔瓦多的代理商，便是1962年到1965年间五个货车买家中最成功的两个。

批发商进入当地生活引发了讨论，它为阿伦贝皮平等观念对村民与外来者互动的影响，提供了很好的例证。货车中间商是中层社会的下级成员，来自与阿伦贝皮存在明显等级差别的城市环境。他们给阿伦贝皮带来一套自己如何对待下层阶级和受后者对待的标准。然而，外来者马上便发现：这些标准与村民的标准反差强烈，而要想在阿伦贝皮取得商业成功，就要适应村民的价值观和标准。

在阿伦贝皮，罗贝托便是一位阿伦贝皮人。后来的外来者则从未将自己深深嵌入这个社会体系。他们也不需要将自己嵌入其中，因为他们作为批发商可以提出更好的价位和收益。然而，他们的行为在进入当地经济时显得非常突兀。萨尔瓦多来的批发商，用高价吸引了他的第一批客户，但是由于他的冷漠，客户越来越少。他不像之前的贩子，拒绝在紧急情况下给村民搭车，并且他从不和当地人对答。有两件事极大地影响了他的名声：一是，有人杀死了一个以前路口村的贩子；二是，这位购买商的儿子开车碾死了一位当地小孩。为了重塑形象，这位批发商雇了一位司机代理，好与村民交往起来更方便，这位代理也力图表现得平易近人。虽然如此，他在阿伦贝皮的一举一动，还是被一个本地商人全看在眼里，这位商人非常清楚阿伦贝皮人心中对市场商人的标准。到1973年时，这个当地人取代了那个萨尔瓦多人的位置。

保护人的荫庇

阿伦贝皮人和外来者的这种遭遇，包括后面将会讨论到的一些事情，与不同社会等级之间的关系，以及大多数发生在巴西保护人和庇护人之间的关系，形成了对比。比如，在下面这种典型情况下，大多数阿伦贝皮人都会有陌生感或不适感。

与较高等级成员说话时，巴西农民一定会降低目光，把帽子拿在手上，谦卑地挪着尴尬的脚步。他每每服从地主、店主、收税员，认为这是正确合理的，而对方表现倨傲也同样合理。

(Forman, 1975, p.76)

在与外来者的互动中，阿伦贝皮人也形成了不平等的社会关系，但这也证实了与福尔曼所说“保护人-依附关系”(patrondependency)相对的“保护人-庇护关系”(patronclientship)。按照保护人-依附关系，农村巴西人被迫与社会上层维系一系列交换。而对于保护人-庇护关系，下层社会的成员可以从潜在的“保护人”中进行选择，这些“保护人”会为他服务和忠诚给予报酬(Forman 1975, p.69)。福尔曼(Forman, 1975)认为，向保护人-庇护关系转化，是巴西农村社会体系的主要变化，并把这种保护人-依附关系的瓦解归因于商业主义的增长。农村人口不再扎根土地，开始流动。保护人失去了曾经集中于土地的追随者。

阿伦贝皮人淡薄的保护人体系，及其与保护人-庇护关系的相似，并不令人奇怪。毕竟，当地经济一直都不是建立在土地或永佃基础上。邻近州府，也意味着阿伦贝皮人要比大多数农村，更早一步体验到从城市辐射出的商业主义。确切地说，阿伦贝皮人需要增加他们从资本、收入、信誉、信息和其他外来者那里获得的好处(见Gross, 1973, p.134)。但两者之间有一巨大差异：阿伦贝皮人从不阻止自己前进的脚步，从不阻止自己从更有实力者那里讨得营生。尽管长期遮蔽于国家权力结构之下，但是，这种已经影响到阿伦贝皮的保护人关系，现在就要发挥作用。

历史上，最符合保护人(压迫者)角色的，可能就是阿伦贝皮当地的地主

们。然而，第三章提到，地主们在萨尔瓦多寻求财富，与村子很少有联系。当地最后一个在乡地主是弗朗西斯卡·里卡多，她于1875年到1924年间居住在阿伦贝皮，直到去世。弗朗西斯卡是一个奴隶主，是一个拥有土地的农村贵族。她在奴隶制废除之前的1880年代，让奴隶们种了五千棵椰子树，这些椰子树的果实在1960年代给她的继承者每年提供1000多美元的收入。弗朗西斯卡是最后一个靠土地为生的地主，她的土地绵延海滨六公里，伸入内陆两公里。

在她去世时，她的地产和树被她的三个女儿和她们的继承者分成三份。三个女儿都涉入萨尔瓦多乡绅阶层。直到1960年代晚期，当弗朗西斯卡的曾孙豪尔赫·卡蒙斯，开始将土地细分出售时，土地还由弗朗西斯卡的（十四个）成年继承人所共有。这些地主们此时才意识到，之前非正式的分份，源于弗朗西斯卡的三个女儿们：阿伦贝皮南部、北部各一块，以及包括村子在内的一块。

继承阿伦贝皮南部的那个女儿，从未参与过村子生活，只对自己的土地和椰子树的经济利益有兴趣。另外两个女儿先于母亲去世，但是，她们的女儿们，艾米丽（豪尔赫的母亲）和诺拉（特别是后者）在当地历史上产生了很大影响。失慈的诺拉，在外祖母弗朗西斯卡的抚养下，于阿伦贝皮长大。年长的村民们回想起当年男孩子捉弄这个古怪女人时，颇有几分歉意，因为她也要忍受弗朗西斯卡日益暴躁的脾气。诺拉因为嫁给前神父而成为村民心中的浪漫人物，他是一个德国人，因为爱诺拉而离开了教堂。后来，这对爱侣和他们的三个孩子，在阿伦贝皮保留了一个度假别墅。很多村民都记得，自己是和诺拉的两儿一女一同长大的。

从第一次拜访开始，我便对阿伦贝皮人与外来者相处时的态度感到惊奇，他们性格直率，缺乏我在别处底层巴西人那里看到的夸张顺服和礼貌。很多村民确实尊重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外来者、从事专业或管理工作的人们，以及政府高级官员。但是，他们拒绝只为了钱而服从外来者，强烈厌恶外来者期望他们表现出的样子。我非常想看一下村民们与地主打交道时是不是也是这样。可以肯定，我发现，大多数居住在阿伦贝皮的地主，在弗朗西斯卡去世后，都参与了当地社会体系。除了阿伦贝皮最明显但也是社会距离最远的保护人豪尔赫，人们对待地主，就像对待当地同年龄、同性别、同性格的人一样。

比如说，诺拉的德国丈夫就非常受人尊重：他是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学者、大学教授、会说七种语言。村民们一谈起他都是情绪激昂。他们颂扬他的成就

时,就像是对豪尔赫的学士学位(地主家庭里第一个大学生),及对一个做中学老师的女地主那般自豪。村民们还开玩笑说,所有放弃神职的人都值得敬佩。1964年,我和几个村民前往住在萨尔瓦多市里的前神父的公寓,拜访他和他的儿子们。我的同伴们对这个老师表示出深深的恭顺之态,比对阿伦贝皮的老人还要恭敬,但他们和他同辈的儿子却可以随便开玩笑,使用熟人间的语言(例如口语里的你[*you*])。

弗朗西斯卡的另一个孙女,也就是豪尔赫的母亲,与她的两个兄弟共享包括阿伦贝皮在内这中间三分之一的地产。三兄妹主要对椰子树感兴趣。他们将土地处置权交给豪尔赫,让他安排土地细分,只要保证他们的最终收益就行。豪尔赫的母亲从未在阿伦贝皮待过。她在萨尔瓦多市出生、成长并嫁人,她父亲,即弗朗西斯卡的孙女婿^[1]米格尔·卡蒙斯,在那里有一份中产阶级工作。

米格尔有丰厚的退休金,丧偶后于1920年搬到阿伦贝皮。在他妻子的外婆^[2]去世后(在他搬来后不久),做了二十年阿伦贝皮的村长,一直到1942年。米格尔取代弗朗西斯卡成为在乡地主,他是阿伦贝皮最后一个地主村长。他监督椰子的收割、出售,批准房子和泥屋的建造。他有一艘帆船的股份,并领导过1940年左右短暂成立的渔民合作社。在人们的印象中,米格尔对当地村庄生活的影响,并没有限制村民自由,或是过多干预村民经济活动。虽然米格尔处于中层阶级,但在人们的记忆中,他以乐善好施的形象参与了社区生活。

他的两个儿子,像父亲一样从公务员岗位退休,并在他去世后移居阿伦贝皮。其中一个在阿伦贝皮与第二任妻子生活了约十年,之前与前妻生活了三十年。另一个儿子对当地生活产生了较大影响。他开了家商店,有渔船股份,致力于渔民协会。但他没有像他父亲那样扮演领导角色。两兄弟最终都回到他们出生、成长的萨尔瓦多市,但由于小儿子在我田野调查期间仍回来阿伦贝皮,我得以观察到他与村民的互动。这个地主的举止很像是老阿伦贝皮人,人们也如此待他。在阿伦贝皮时,他知道如何修饰自己生活的城镇分层中的文化准则。他的“风格变化”,借用一个社会语言学学术语(见Labov, 1972)来说,在他所言中表现得非常明显。例如,他会热烈拥抱(*abraço*)某些村民,这是巴西

[1] 原文为女婿(son-in-law),但依照亲属关系,当为孙女婿,因改。——译注

[2] 原文为岳母(mother-in-law),同上,因改。——译注

会见礼仪中社会平等的表现方式。他也会像村民一样，使用“你”(you)的熟人和正式形式。与年龄相仿的人或年轻人说话时，他使用熟人称呼；和年长者说话时，他会用正式称呼(*o senhor, a senhora, Seu, Dona*)。村民也用正式或熟人间的称呼分别作答，将其当成乡人一样。例如，地主不在时帮助管理椰子树的普鲁登西奥，就用对待朋友的熟人称呼和他讲话。

地主要在当地经济中获得成功，得像鱼类批发商收鱼一样，符合阿伦贝皮的行为准则，平等待人。阿伦贝皮人待人如友，尊重他人，嘲讽地主们的行为举止，不会因为他们是地主而刻意尊崇。这部分是由于当地观念中明显缺乏阶级意识，本章后半部分会详述这一问题。村民们对待地主的开放与直率态度，也反映出地主们放下了自己保护人的架子，从不限制佃户的自由和流动。

1965年，村民们对豪尔赫的土地细分计划感到有些不安。尽管如此，我经常听到大家对阿伦贝皮与其他渔村地主所做的正面比较。阿伦贝皮北部鱼湖村的居民，是靠旷日持久的诉讼，拖住了他们的地主。一个渔民讲了这样一个故事：“那些混蛋地主们，想把祖祖辈辈住在那里的人赶走。他们想拆掉房子，把村子变成椰子树种植园。其中有一家地主的儿子在大学里学过农业。他想牺牲渔民利益，试用新方法种椰子。”法院允许村民继续居住，但却剥夺了人们的自由。市场商人无法进入被铁丝笆篱墙围住的村子。渔民们只能把鱼运到外面去卖。法院禁止村民用瓦片铺屋顶，连维修都不让。村民在法庭上获得了名义上的胜利，但是，地主仍在村里继续纠缠。

阿伦贝皮人很清楚其他地主和自己村里地主的区别，他们认为自己的地主是“最好的”。但是，他们还是担忧豪尔赫的计划，豪尔赫告诉我，所有土地划为三组：靠海区域、村子和泻湖之间区域，以及泻湖水域以西区域。（这种分法在1973年的阿伦贝皮非常明显；泻湖以西后来变成卡拉努阿斯，一个新出现的极其贫困的卫星村。）这是村民们第一次拥有自己的土地。先前只有住房为自己所有。宅基地名义上的租金，还要通过普鲁登西奥这个中间人交给地主。阿伦贝皮大部分更值钱的房子，那些有着砖墙、屋瓦和水泥地面的房子，由市政官员估价，房主每年上税。这种方法可以保证他们的利益。地主若想驱逐房主，也要依照法律支付估价作为赔偿。当然，这只是部分保护，因为房产价值会随通货膨胀而变动。

豪尔赫向我保证，他没打算霸占村民在自己住房上的大量投资。他计划把

他们目前的宅基地卖给他们，除非转让费高出他当时能接受的小块土地售价。豪尔赫还计划（确实这样做了）鼓励住在木架泥屋更贫困的村民们，搬到他在泻湖西面提供的土地上。

1980年，大部分土地细分都已完成，只有少数村民感觉受骗。很多村民都购买了他们的宅基地。其他人则将靠近海滨的房子换成更大的房子，或是靠近泻湖用同样材料建造的房子。这一次，阿伦贝皮地主没有冷酷无情地凌驾于佃户之上，虽然他确实在为自己的利益考虑。我们可以进一步考察这里与巴西农民更普遍的状况。福尔曼在讨论1960年代巴西东北部农民改革联盟形成的状况时强调，佃户们

一直受到驱逐威胁……农民们在被富人雇佣的枪手驱离土地时孤立无援，枪手们毁坏农民的庄稼，有时还有房屋，来催促农民们执行命令。由于法律规定佃户拥有永久使用权的相关规定，地主们绝不允许佃户在土地上待上十年时间。

(Forman, 1975, p.55)

阿伦贝皮人显然免受了这种危险和暴力行为的威胁。

豪尔赫和他的代理人普鲁登西奥，只是丹尼尔·格罗斯(Gross, 1973)描述过的、掌握巴西农村权力的上校或地方寡头(*coroneis*)的影子。豪尔赫支持普鲁登西奥参选议会席位，普鲁登西奥则确保阿伦贝皮人在州和国家选举中把选票投到“豪尔赫一边”。

豪尔赫尽量使自己的行为不引起当地人的反感有几个原因。即使在1964年军事政变，全国性的党派政治沦为一党专政的摆设之后，豪尔赫仍希望在州的政治舞台上担任角色。不论多小，阿伦贝皮终究是他的基地。保护人“最重要的资本是他的名声，所以，某种程度上，他最重要的任务是要他的依附者加大力度，在乡间传颂他的‘良好’口碑。”(Forman, 1975, p.77)既然豪尔赫不能预测巴西政治的未来，那他还是要保留支持者，尽管选举政治在独裁统治下只是走走过场。

豪尔赫也知道，购买阿伦贝皮地段的商人，会看重下层社会的人口提供的廉价劳动力（如雇工和仆人）及廉价产品（如鱼和椰子）。他意识到阿伦贝皮的迷人和美丽之处，并如实预见到城里人将会为它的景致而赞叹。

不幸的是，豪尔赫没能预见，弗朗西斯卡表亲的继承人们（像他的祖先们一样是贵族，但更需要金钱），会同意把阿伦贝皮南部土地卖给一家跨国公司，建造一座化工厂而毁掉这个乡村。这家德国跨国公司，在巴伊亚海滨四处寻找地方建工厂。尽管许多案例表明，由于工厂潜在的污染，周围土地的收益和这些地主与政府的瓜葛，会阻挠土地出售者的决定。但豪尔赫本人的政治影响，还不足以阻止他的远亲进行这场将会影响他的利益的交易。

对阶级之间鲜明对比深有体会的读者，现在应该能更清楚地理解，阿伦贝皮人和他们地主之间的差距其实微不足道。弗朗西斯卡的继承者们，在巴伊亚中产阶级中有不同成就。但豪尔赫是整个家族里第一个拿到大学文凭的人。只有他拿到了“博士”学位，这提高了他身为有抱负保护人的地位。豪尔赫的叔叔和母亲小学都没毕业。一些阿伦贝皮人的教育程度则比他们要高。无怪乎村民们会以平等态度对待那些地主。阿伦贝皮人没有把巴西历史上留下的地主观念当成社会地位高低的准则。村民和地主在教育、行为、乃至生活方式上都没有明显差异，令村民无需服从地主。

但村民对待豪尔赫的态度确有巨大差异。我们从中发现了阿伦贝皮与典型保护人关系最相近的情况。豪尔赫与其他地主和鱼贩不同，他从未完全了解当地社会系统。他没有采用平等观念，也不改变自己的风格，他不会阿伦贝皮村外下层人一种样子，而对阿伦贝皮人又是另一种样子。豪尔赫就像保护人一样，村民们则不得不改变他们的处世之道，顺从豪尔赫。虽然阿伦贝皮人没有保护人—庇护关系的实际经验，但他们这次学得很快。

一些村民想让豪尔赫更多地参与到他们的生活中，但却没有成功。到1965年，他在当地收了五个教子，但却没有记住他们的名字。在我问他这些信息时，豪尔赫则让普鲁登西奥帮他说出那些教子的名字。豪尔赫和普鲁登西奥的关系，不像他叔叔和普鲁登西奥之间用熟人称谓并平等相待，豪尔赫用熟人称谓和普鲁登西奥（一个大他二十五岁的男人）说话，普鲁登西奥则用正式称谓回话。豪尔赫对待村民时，不经意间使用的就是上层巴西人对待社会“下层”的态度，虽然他这样做纯属无意，且无恶意。说到了，豪尔赫只是无意去了解当地的生活方式。他不打算像一个阿伦贝皮人那样参与村子生活。

虽然豪尔赫已经熟悉了他的保护人角色，但他没有意识到，村民们需要训练才能配合。普鲁登西奥作为豪尔赫的代理人，承担起教导的责任，他以自己

的行为作为表率，示范对待保护人的举止。普鲁登西奥也体现了被保护人受到的回馈。豪尔赫让普鲁登西奥在1964年到1965年间出售他两艘船的鱼。虽然普鲁登西奥从未承认自己领过薪水，但他可能也会从他代取的租金里抽取一部分佣金。普鲁登西奥的妻子，虽与村里其他女人相比水平相差无几，但从1964年起，就成为市政安排领工资的学校教师。更明显的是，他们的儿子也利用豪尔赫和他叔叔们的资助，在外面找了份好工作。村民们通过普鲁登西奥知道了，想要取得这些好处，就要像普鲁登西奥那样。

普鲁登西奥是阿伦贝皮村与外部世界的关键纽带。除了经济利益，豪尔赫的支持，使得普鲁登西奥能够实现自己在村里的政治志向。尽管如此，普鲁登西奥的财富、收入和生活方式，却从未使他走出低层社会。他和成功的渔民差不多，只是站在当地成功阶梯的顶端。他的志向主要体现在政治上。普鲁登西奥的儿子们，显然比他更热衷经济利益。村民们承认普鲁登西奥的特权，承认他在地方政治上享有威望和影响，但他始终认真遵守当地文化准则。他认真承担各种社会义务。毫不奇怪，他在1965年收了比其他村民更多的教子。普鲁登西奥始终小心遵从平等观念，在生活方式和行为上，严格遵循当地社会法则。

普鲁登西奥是那些天赋使然，能在平等社会中脱颖而出，为自己谋求利益的人之一。普鲁登西奥在村民和土地所有者利益之间，扮演了中间人的角色，并以这种政治身份影响了村民们的命运。普鲁登西奥不仅将阿伦贝皮与地主及外界政治联系起来，他也给村民作出榜样，描绘了一条通往成功的道路。其他阿伦贝皮人则在不同的道路上做了榜样，比如，立志成为船长兼船主或商人。这些人的生活都有所改善和提高。

虽然很多村民从普鲁登西奥那里获得了豪尔赫的帮助，但他们知道，自己无望获得与普鲁登西奥及其家人同样的好处。因此，按照保护人—庇护关系的原则（有别于前面提到的保护人—依附关系），村民想要自己的保护人。当地人都想与外来者建立个人联系。例如，所有在阿伦贝皮拥有度假别墅的人，都与某个村民维持着保护人关系。

1960年代，中产阶级外来者通过在阿伦贝皮或萨尔瓦多的帮佣工作，给地方经济注入了少量金钱。未婚女性和女性户主，比起在萨尔瓦多帮佣，更喜欢在阿伦贝皮的同样工作。虽然薪水较少，但妇女可以为家人准备更好的饮食。我们在1964年到1965年间租住的那家中产阶级下层户主，坚持要我们雇佣两

个当地妇女来做厨娘和洗衣妇。她雇了我们厨娘的妹妹做针线活，并想要我们付的那份工钱也归到她认识的那户人家去。户主也希望要一些她能信任的人，好确保她的房子和财产安全。

我们房东的需求给我们出了道难题，因为我之前已雇了另两个当地妇女，她们的保护人是我1962年住的那家房主。从那时起，她们便认定我是她们的保护人，并希望能被重新雇佣。我的解决办法是，将任务分给这三个妇女，以及第四个女人的成年儿子。这种分配给几户人家都提供了现金收入。

我们在阿伦贝皮工作期间，很多村民们对我们和其他田野队员非常友善，并担任我们的报道人。每个人类学家都会与某些村民建立密切关系。其他村民在意识到这种联系之后，也开始专注不同的田野队员。这些村民都在不同程度上，寻找一些外来者的资助。因此，在我1973年回来时，我当时的研究经费（第一次）允许我雇用当地田野调查助手，我很自然就雇了我最信任的报道人阿尔贝托。我们1962年的厨娘朵拉与贝蒂建立了密切关系，便问贝蒂能不能继续为我们煮饭。

在外部世界游历

虽然对贫困深有体会，但没有踏出阿伦贝皮的村民们，从未发现自己是国家下层阶级的一员。我们之前看到，外来者要在阿伦贝皮获得经济成功，便要修正自己的行为，符合当地的平等观念。这阻碍了外界社会模式的引进，比如说建立在阶级差异上的社会行为。^[3]了解国家阶级构成的主要方式便是在外生活。当然，村民离开村子后，也会带着以往的平等观念。这种观念能坚持多久、能有多强烈，取决于他们外出的频率、去的地方，以及在外待多久。一些偶尔外出去萨尔瓦多商店、去妓院或是超市的村民，可能会抱怨城市居民的粗鲁，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处在一个等级分层的国家体系中。做过仆人的妇女们会学到城里人期望的“礼貌”。但很多来阿伦贝皮旅游的中产家庭则抱怨阿伦

[3] 豪尔赫和其他人通过高等教育、提供保护人恩惠变得与众不同，获得特殊尊敬，他们会因为阿伦贝皮人的完全顺从而给予赠予，如果没有这些外来者，当地人就不会对赠予关系有所认识。



1962年贝蒂信步走过阿伦贝皮北面一排房子，和往常一样，有一群孩子围着她。（康拉德·科塔克摄）

贝皮人服务不周，而且还常常辞工不干。1960年代，大多数村民都安心在村内度过大多数时间的生活。尽管一半家户中至少有一人在外工作过，但大多数人这样做的原因只为赚钱回家，过上更舒适的生活。

由于阿伦贝皮人很少去市里，所以他们一进城就很难分清东西南北。去一趟至少要两天一夜。先要步行十八公里到路口村，接着挤很长时间才来一趟的公共汽车。去城里的人不会被轻易放过。阿伦贝皮人会叫他们的亲戚和邻居进城时顺便帮忙，比如，去买些布，用村里少有的几台（手动）缝纫机来做衣服。一到萨尔瓦多，村民们就会在商店和汽车站附近的小贩之间忙开了。

阿伦贝皮人有一种缺乏礼节、忽略外面规则的表现，让我们感到不快。在我们最初进村的日子，村里的小孩子们对刚来研究的年轻陌生人着迷，也弄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不能像其他村民那样靠近。在我们待在这里的第一个月，每次只要一开窗，我们的隐私就会被打破，十几个小孩趴在窗边关注着我们的一举一动。我们问他们想要什么，他们常常说什么也不要。我们发现，其中最调皮的那个小女孩像是在觊觎我们的巧克力棒（只要我们离开房间，它们便一同

消失)。剩下的小孩只是观察我们这群奇怪的白皮肤、有打字机的年轻人在屋里干些什么。“懂礼节”与充分发展的阶级结构密切相关。阿伦贝皮人没有告诉过孩子们不要去打扰美国人，因为在这个同质的社区中，每个人都与他人相熟多年，因此，与新来者尽快熟识又有什么不对呢？

对外部世界有充分了解的村民，是那些曾在萨尔瓦多或里约热内卢做过商业拖网捕鱼的人。在里约生活过的人抱怨那里犯罪率高、过度拥挤，尤其是吃饭和住宿费高。他们说想念妻子、父母、孩子，想念他们出生的巴伊亚小村庄。这些男人体验了里约棚户区 (*favelas*)、尼泰罗伊附近的贫民窟，和萨尔瓦多内城棚屋与牲口棚的贫穷、不便、冷漠和肮脏。

他们见到无技能劳工和精英们生活方式之间的鲜明反差。一些当地妇女在萨尔瓦多舒适的公寓和家庭中工作。阿伦贝皮人在里约，走过科帕卡巴纳和伊帕内玛的海滩，经过高耸奢华的公寓——华丽的大厅里摆满了丛林植物、大理石桌和抽象画——每幢建筑都有重重保安，隔绝犯罪侵入。我听说在里约捕了七年鱼的托梅说起过，他把衣服和手表随意放在海边下海游泳时衣物被盗的事情。即使那些村民眼里在萨尔瓦多郊区国家石油公司有很好工作的男孩们，也要明白自己属于下层社会一员的身份，尽管他们已属下层阶级中的上层。

哈维格斯特和莫雷拉 (Havinghurst & Moreira, 1965, p.100) 把巴西社会分为五个阶层：上层、中产上层、中产下层、劳工阶级上层和劳工阶级下层。作为农村渔民，阿伦贝皮人属于劳工阶级下层，这个阶层还包括农场劳工、没有技能的城市工人和农民。劳工阶级上层（石油工人也属于其中）包括工厂、公共服务、铁道、公路、运输和通讯行业的技术和半技术工人。十五个本地男孩 1960 年中期在石油公司工作，拿到年均 1700 美元的工资。他们的工资，就是和最成功的本地船长兼船主及商人比也要更高且更稳定，是普通渔民现金收入的十倍。他们的收入可以使其维持阿伦贝皮最富裕的生活方式。一个男人有一辆开了三年的吉普车，是 1965 年当地唯一有机动车的人。另一个则计划买车。他俩都是村里为数不多有煤油冰箱和液化气灶的人，这些物件都是用车运到阿伦贝皮的。

大多数村民都认可，巴西石油是阿伦贝皮人能找到的最好工作。进入石油公司工作的要求并不严。让地主豪尔赫打个招呼，有三年级教育水平，就能让申请者获准参加考试。通过考试的当地人，每年能拿到 500—2500 美元的工资。

他们的工作要去萨尔瓦多及其附近郊区，并在附近城市钻井工地干活。经历过社会分层化城镇的生活后，这些人知道，虽然他们比本地阿伦贝皮人成功很多，但仍处于全国下层社会。虽然他们能够购买大多数阿伦贝皮人没有的财物，他们的薪水仍够不上中产阶级生活方式。他们的礼仪、行为、说话方式和教育程度与下层社会也没有显著区分。因此，虽然能去巴西石油上班是阿伦贝皮人的最大向往，但石油工人在外面的实际经历让他们明白，他们只是巨大池塘里的一条小鱼。

我们现在可以总结一下 1960 年代中期阿伦贝皮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村民与外界体系的联系，和巴西东北部其他农村社区相比优越很多。阿伦贝皮和萨尔瓦多的交通正在改善，更多的市场机会，意味着当地渔业销售从未受到垄断。外来者也没有剥夺阿伦贝皮及其居民的根本收益。阿伦贝皮的经济政治相分离，与巴西农村的总体情况形成强烈对比 (Gross, 1973, p.141)，是商业活动发达的另一个原因。与巴西其他农业和渔业社区相比，当地经济提供了一种更富裕的生活方式。

这就是我 1965 年离开的这个相对平等和孤立的村庄。然而，本章对鱼贩运输机动化和豪尔赫出售土地计划的讨论则表明：阿伦贝皮的孤立（从未完全如此）即将走向尽头。1962 年我们田野调查队的到达，可以算是即将到来的全球化浪潮的第一波之一。毕竟，还有比人类学家更早与遥远村庄展开联系的人们，他们是传教士还是商人呢？这些是 1960 年代中期进入阿伦贝皮的陌生人最主要的职业。

1960 年代末和 1970 年代初，我正忙着调查描写另一个更遥远地区（马达加斯加岛）的文化多样性之时，一波新的外来者，其中很多都是外国人，重复了我对阿伦贝皮的发现。很多人在我 1973 年第二次回来时已经离开。其他人和他们的制造物（最显眼的是二氧化钛工厂）一同保留下来。我们将会看到，这批外来者在不到十年时间里成功地毁掉了我的村庄。第六章中我们会主要讲到，我在 1973 看到的阿伦贝皮，为这个社区如今翻天覆地的变化做好了铺垫。

第三部分

悸动桃花源

第六章

褐色的阿伦贝皮

本章将具体谈到 1965 年到 1973 年间，当地经济与外部世界不断增长的联系，以及变迁对阿伦贝皮社会关系和处世方式的影响。阿伦贝皮与大城市毗邻，可以想见，将会比其他偏远地区更早体验到“巴西经济奇迹”的影响。1964 年政变推翻民选总统后，军政府集中规划的经济做法，创造了巴西国民生产总值在 1968 年到 1974 年间年均增长 11% 的奇迹。

几十年来，巴西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都是来自政府和跨国公司。两者都影响了阿伦贝皮的生活。巴西的发展策略是重视公路，1970 年铺好的连接阿伦贝皮附近巴西钛业到萨尔瓦多的公路，是 1965 年到 1973 年间巴西公路网数量翻番的地方体现。巴西汽车生产（主要由跨国公司控制）翻了五倍，到 1975 年，每年生产近一百万辆汽车。

阿伦贝皮的人口在膨胀（特别是移民人口），经济形态更加多样。发展迹象随处可见。所有这些都为 1980 年代显而易见的主要变化铺好了舞台。

度夏的中产阶级，在村庄北部和南部造了房子。新定居点卡拉努阿斯，有五十座房子和二百人，位于褐色泻湖以西。建筑业也在阿伦贝皮蓬勃发展。由于东朝大海几乎没有空间，大多数房子都是朝向泻湖，向村子西面延展。来自州府的下层中产阶级，在阿伦贝皮中部广场和北部矩形广场区域买了很多房子。他们通常都会拆掉以前的旧房子，建造更好的寓所。由于进城交通改善，一波城市新富者开始来海边置产。距离柏油马路只有一小时路程的阿伦贝皮，似乎

是个盖房子的好地方。

村民们也从繁荣的经济中获益。很多人都将多余资产投入房屋出租，而不是投到农田或椰子树上。随着豪尔赫土地细分计划的实施，一些村民在买下的宅基地上，在原来的房子后面又盖了一间。有两座房子的村民们，自己住在后屋，空出凭海临风的前屋，租给消夏游客。

得到改善的公交和汽车，也带来了每周度周末的游客。城里人来阿伦贝皮享受周末野炊、海水浴和狂欢，主要是在星期天。和整个巴西一样，星期天是巴伊亚地区全家外出用餐日。（对那些雇佣人的巴西人来说，星期天通常是佣人休息日。）

周末游客也来吃鲜鱼，或煎，或焖（*muqueca*，把番茄、洋葱、椰子肉、棕榈油和鱼一起焖煮的巴西焖鱼）。阿伦贝皮现在有了冰柜和冰箱（用液化气供能），这样可使时鱼保鲜，直接零售给游客。一些村民开了餐馆和酒吧。有了冰箱，又有了冰啤，周末饮酒这一活动便在1973年开始兴起。商店、酒吧和餐馆，如一夜春风般在整个镇上涌现，反映了阿伦贝皮正在从一个遗世独立的小渔村，向海内皆知的大景点飞跃。

阿伦贝皮转型的糟糕一面，则是工业污染和嬉皮士。这两个跨国侵入彼此相连。早在1960年代中期，后来在阿伦贝皮仅五公里之遙建成巴西钛业的德国-巴西合资企业，就来巴伊亚州看过厂址。巴西钛业最初计划建在巴伊亚南部，但迫于政治压力，以及那里用水、道路及电力不足，最终落户阿伦贝皮。

制造二氧化钛（颜料和染料的一种基本原料）时，巴西钛业不用当地资源。主要原料是从澳大利亚运来的黑砂，及从墨西哥和委内瑞拉运来的硫黄。与巴伊亚南部相比，用水、道路、电力和政策，在阿伦贝皮附近区域，没有造成巨大困难。泻湖水系的淡水，提供了充足的水源。配套的柏油公路已在建设，计划还包括阿伦贝皮的旅游开发。巴西钛业承担了80%的筑路成本，加速了道路建设。虽然工厂在1970年经由其他渠道通电，但国家电力系统直到1977年才接通阿伦贝皮。

当地社会体系是决定厂址的最终因素。衰落的卡马萨里士绅阶层，对国家媒体业已曝光的潜在工业污染，既无影响之力，也无联合抵抗。巴西钛业从当地小块土地所有者那里统一征地，土地所有者大都认为自己幸运拿到的地价，比想象中非海滨地块的价格要高。工厂建立的地方不归阿伦贝皮地主所有。

自从1967年巴西钛业加速铺路开始，关于巴西钛业对旅游业及村庄生活好坏影响的不倦讨论，就一直萦绕当地历史。一方面，如果没有巴西钛业介入铺路，阿伦贝皮的旅游业就会迟来多年；另一方面，工业污染随后又威胁到阿伦贝皮的旅游声誉。最初的协议是，巴西钛业和国家道路部门，平摊这条以阿伦贝皮为终点的道路铺设费用。最后，由于国家资金不能与巴西钛业的完工进度一致，巴西钛业承担了大部分。因此，是巴西钛业主要负责了这条联系阿伦贝皮与外部世界的道路，让游客更容易来到这里，其中包括那些嬉皮士，他们来到阿伦贝皮的高峰（1970年到1971年）就在工厂公路铺好之后。

但巴西钛业也成为污染之源，这在1973年引起媒体很大关注。巴西钛业排出的废物：硫酸亚铁和硫酸，不仅渗进泻湖，还倾入近海，这影响到多年来维持阿伦贝皮村生计的渔业。虽然阿伦贝皮人知道公路有利商业，虽然十几个当地人在工厂打工，虽然巴西钛业工人在阿伦贝皮吃饭、租房、买鱼，并带动其他商业，但当地观点在1973年时开始反对工厂。村民们对他们寻常洗衣沐浴其中的泻湖被污染尤为恼火。

随后的媒体报道，给阿伦贝皮人带来一股新的影响力，最终制止了最严重的污染。整个巴伊亚和巴西的人们，都从媒体那里得知，一家跨国公司毁掉一个“自然”、“简单的”渔村的事情。有人开玩笑说，拥有巴西钛业38%股份的德国拜耳公司，故意策划这场污染来增加病患——增加巴伊亚对拜耳生产的阿司匹林的需求。（事实上，阿伦贝皮人更多抱怨的是灼伤而非头痛。）国家和公众舆论对工厂的一致抨击，使事情发生了明显改观。（最终的改变发生在1980年，工厂制定了更有效的污染控制办法。）

污染事件是阿伦贝皮与媒体的第二次相遇。伍德斯德克摇滚音乐节之后的外国嬉皮士潮，通过巴西版《时代》周刊和《新闻周刊》的报道，引起国人对阿伦贝皮的关注。阿伦贝皮最早的嬉皮士，可以追溯到1966年到1967年。最初来这里过夏的主要是巴西人。随着嬉皮士运动的国际化，及1969年伍德斯德克摇滚音乐节（伯特利，纽约）以后花之子^[1]的传播，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人，包括很多美国人，都开始流入阿伦贝皮。

[1] 花之子(Flower Children),20世纪60年代走上美国街头的嬉皮士自称,他们高喊“要做爱不要做战”的口号反对战争,张扬个性。——译注

1970年到1971年，这股细流变成洪水。很多嬉皮士都住在阿伦贝皮本地，但是嬉皮士的主要聚居地，则成为后来的嬉皮村(Aldeia)。此处聚落位于卡拉廷吉河畔，河水被砂岩阻挡，无法直泻大西洋，向南汇聚成湖，形成该地区独特的淡水泻湖体系。嬉皮士们使用指代巴西本土南美(印第安)部落村庄的 *aldeia* 一词，象征着他们想要重新发现大自然，并创造一种简单、公有、原始的生活方式的愿望。

嬉皮士不仅喜爱自然之美，也喜欢阿伦贝皮便宜的食宿。村庄北边和南边的棚屋村庄，可以一直租下去。做饭和洗衣可由当地妇女完成。大多数嬉皮士都是些不愿工作的城里人，通过随身带来的钱财和亲戚的偶尔赞助，可以勉强维持一种快乐悠闲的生活。嬉皮士从阿伦贝皮搬到嬉皮村，不单单是寻求孤独。随着萨尔瓦多下层中产阶级游客的到来，嬉皮们出于经济需要，让位给愿意支付更高房租的人们。随着旅游业发展，房租、食品和生活费用都在提高。

嬉皮村发展的地方，一直有一个距离海边或泻湖三十分路程的小村庄。夏天泻湖干涸时，阿伦贝皮人总会到卡拉廷吉河洗衣沐浴。此地孤寂、全年有水、生活费低、秀美的风致，吸引了外国嬉皮士和巴西学生们一起在此过暑假。1973年冬天，虽然很多人来此度夏，但却只剩下二十个嬉皮士还待在阿伦贝皮和嬉皮村。

我们已经无法获知，嬉皮运动高潮时，到底有多少嬉皮士来过阿伦贝皮。村民们说有成百上千。曾有巴西摇滚明星在嬉皮村开过音乐会。米克·贾格尔(Mick Jagger)的一次造访，对住在嬉皮村的流浪者来说，是历史的一部分。1980年，人们指给我看太阳之屋(House of the Sun)的遗址，据说贾格尔和詹尼斯·乔普林(Janis Joplin)曾在那里睡过。一个嬉皮士接一个嬉皮士对贾格尔-乔普林故事的仪式性重述，让我想起人类学家在其他社会里遇到的创世神话和神话学特征。在嬉皮村这个曾经辉煌而今已是碎片化的社会体系中，贾格尔、乔普林留下的，仿佛是亚当夏娃般的传说。

虽然我已克服自己1973年对嬉皮士的厌恶之感，但我仍认为媒体对嬉皮士来袭的报道，过高估计了他们对当地生活的影响。我们应该把嬉皮士看做阿伦贝皮旅游业整体繁荣的一部分。旅游业和工业化共同改变了当地生活。嬉皮士与其他数以百计的过客、度夏客和永久居民一道，将外部世界的文化模式引入阿伦贝皮，与此如影随形的还有新的恐惧、渴望和不安全感。

职业分化

1973年，渔业在阿伦贝皮占主导的日子显然已快走到尽头。它逐渐变为第四章里提到的那些职业分化更鲜明的渔村之一。捕鱼仍是最普遍的职业，但它在男性选择的主要职业中所占的比例却是急剧下跌，从1964年的74%降至53%。当地商业机构数量渐增。妇女们对新商机的反应比男性更敏锐（见附录6）。商业一直是阿伦贝皮妇女比较在行的少数领域之一。1973年，阿伦贝皮一些最成功的商业就由女性经营，像达利娅阿姨（嬉皮士这样称呼她），她迎合了阿伦贝皮南部花之子的喜好，还有克劳迪娅，她拥有本地最佳餐厅。1973年，四分之一有工资收入的妇女都是商人。女性商人数目（16）几乎和男性（20）持平。

阿伦贝皮处在旅游业和商业繁荣的边缘。然而，很多男性都不愿放弃其他工作，因为他们担心污染，及其对旅游业的影响。污染问题解决后，旅游业再度兴起，许多男性都可通过商业养活家人。但在1970年代，主要是女性在开拓旅游产业。（附录2、6提供了1964年、1973年、1980年当地工作的数据。）



达利娅阿姨，到1973年时，她的商店因为成功地迎合了阿伦贝皮南部嬉皮士的口味而生意兴隆。（杰拉尔德·米拉尼克惠允使用）

建筑业在 1964 年到 1973 年间蓬勃发展，从占男性主要职业的 5% 增长到 15%。泥瓦匠、木匠和砖匠都从村外引进，一些村民开始学习这些技艺。其他村民为夏季游客做看门人。村民们客源不断，从而可以通过房租收入补充平常所得。工厂岗位在 1973 年也开始增多，排在建筑业之下位列当地男性最常见职位（11%）的第三名。十几个村民在巴西钛业工作，其他人仍在国家石油公司工作。

对租赁的投资，代替了农场和椰子树，这既能避免增加的收入受通货膨胀影响，还能补充基本收入。到 1973 年，大多数渔民都把他们的十多年前还种过的农田卖了。他们用这些收入改善和扩建房屋，租给外来游客。一些西面田地（三小时路程加劳力）的收益，已经不敷所出（新鲜水果和蔬菜）。现在要获得新鲜产品，只需坐直达巴士去趟皮图巴（Pituba）镇上的超市。当地商人也在继续出售水果和蔬菜。商人比渔民有更多时间经营田地，耕地时间也更方便。他们与西面田地的居民一样，增加田力产出，迎合当地需求的增长。

当地经济两个常见的特征正在消失。先前，大多数家庭都养鸡。耕作的家户还有牛、驴和其他家畜。到 1973 年，差不多所有的鸡都像超市买来的一样，给煮了吃了。第二个变化则是椰子树的所有权。1964 年时，约 40% 的阿伦贝皮家户有椰子树，1970 年代，随着豪尔赫清理宅基地，买下椰子树，随土地一起出售，椰子树的数量有所减少。

虽然阿伦贝皮始终没有一种纯粹的生计经济，虽然家畜和椰子树所有量的下降很小，但这都在一定程度上表明，随着对外来产品的依赖和收入增加，村庄自给自足的状况正在逐步打破。对外部世界渐增的依赖，在 1973 年当地经济的很多方面都可看到。一言以蔽之，我注意到旅游业、商业、建筑业和工厂雇佣的比重渐增，耕作、家畜和椰子树数量的重要性则在下降。因各种外部因素而改变的社会网络，也制约了渔业，尽管它仍是当地经济支柱。渔业模式和技术方面的某些分化，也贯穿了社区生活。

机动化与渔民合作社

1960 年代，捕鱼业最昂贵的物品是装备齐全的帆船（1965 年值 150 美元），

有志向的渔民可以通过几条途径成为船主。传统模式是：从船长和不捕鱼船主的合股，渐变为全权渔船主。这一转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市场优势：1960年代，鱼价上升的速度比新船价格涨幅还要快。但到1973年，买一艘装备齐全的汽艇则要花1700美元。相应的还有汽油、涂料和维修费。（渔民日常航行时仍习惯用帆。）

有地产的商人率先买了汽艇，但不参与捕鱼的商人要控制渔业还条件不足。第一，鱼价上涨速度还是快于总体通货膨胀率。这反映了萨尔瓦多都市化和旅游中心化发展，对鱼类增长的需要，以及随着阿伦贝皮交通改善，竞争日趋激烈的结果。渔民继续控制渔业的第二个原因是，来自渔业发展监管局(SUDEPE)的低息贷款，这个机构负责巴西渔业的发展。

1970年，渔监局通过一系列走访，说服阿伦贝皮人组成渔民合作社。他们告诉村民们其他地方成功合作社的情况，让村民了解了渔船机动化贷款和其他好处。在阿伦贝皮建立这样的组织，最初以失败告终。后来取得成功，是由于合作社开始提供一些加入的奖励措施：贷款、冷藏、鱼饵、汽油、涂料和其他材料。合作社用较高的价格（延续到1973年），并用合同贷款给渔民为船只安装马达，鼓励渔民入会，并将鱼卖给合作社。合作社社员只有偿清贷款才能退社。

合作社买下每天的鱼获，将鱼存入冰库，决定是当地销售，还是运到市区鱼行。合作社和冰库都位于礼拜堂南面的小屋，靠近渔民卸鱼的海滩。一些当地男性受雇记录渔获，发钱发补给，扣除还本。一个萨尔瓦多来的渔监局雇员，负责每月监管，并确保贷款及时偿付。他还把每日捕鱼量按月统计，给我提供了当地全年捕鱼生产的有用数据（见附录3）。

合作社的介入，在捕鱼的时间和劳动效率方面产生了立竿见影的影响，随之也带来了不少变化。比如，有了冰库，就可保存鲜鱼，刺激生产。合作社的榜样也推动了本地创新。一个商人建造了巨大的冰库。另一个商人也仿效其法，给他店铺附设的小餐馆兼旅店游客提供冷藏的鲜鱼。之前，很多渔船在雨季泊岸，滞港数日，或是只在近岸为自家捕鱼。船长说过，渔民们一旦没法确保鱼贩会在坏天气时从萨尔瓦多来村中，就没法全天捕鱼。有了本地冰库，大家可以随时捕鱼，随时冷藏。

冷藏和机动化，一同在时间和空间上拓宽了捕鱼机会。机动化减少了到达熟悉、丰产渔区的时间，这些区域原本只能在海面最平静的几个月（从12月到

来年4月)才能前往。现在一俟暴风突至,就可迅速回港。托梅是我第一次访问阿伦贝皮以来最亲近、最富创新精神、最有进取心、现在也是最成功的渔民,他买了一艘更大、封闭的机帆船。他驾着这艘船远抵塞尔西培州海岸——向北三百里。托梅在船上带上冰块,有时在海上待上四天。(这一冷藏捕鱼模式,直到1980年都还是阿伦贝皮渔业的主导方式。)

机动化与冰块相结合,更加促进了远距离捕鱼、鱼类新鲜度及有效保存。冰库也能保存鱼饵,这是合作社最受欢迎的产品之一。之前每个捕鱼日,当地擅长撒网捕鱼的家,就会捕捉沙丁鱼、胡瓜鱼和其他近岸小鱼。这种鱼饵捕鱼既费时又不稳定,因此,合作社和冰箱打破了渔业羁绊。现在村民已能获得本地和进口的鱼饵。

1973年搜集的数据(见附录3)表明,由于出现了这些变化,渔业生产从1965年开始显著增长,过去的季节性限制也不再明显。雨季不再制约捕鱼。1972年6月到8月,月均捕鱼量几乎相当于年均水平。最显著的变化是,市场年均捕鱼量增长了约60%:从3500公斤增长到5500公斤。

小结:机动化、冰块和购买鱼饵,在时间和空间上拓展了捕鱼范围,对渔获量的增加有显著影响。这意味着,最有进取心的渔民,能比之前更好地迎合购买力。捕鱼量和收入的增长超过通货膨胀速度,使船长兼船主们能够付清机动化贷款,并减少了对不捕鱼船主的依赖。

1973年我在与托梅的一次长时间访谈中发现,他不仅拥有阿伦贝皮最大的船(加他两个弟弟使用一艘普通机帆船),还买了一辆厢式货车,把他的鱼运到萨尔瓦多附近的鱼行。他的鱼在那里(每公斤5克鲁赛罗^[2])能比合作社1973年4月的收购价(每公斤3.4克鲁赛罗)高出一半,当时他就退出了合作社。托梅一发现自己卖鱼盈利更多,就迅速付清贷款,不再把鱼卖给合作社。除掉汽油费和其他市场费用,托梅每年大约可以多收入2000美元。

托梅与外部世界打交道的自信和成功都在快速增长。他从萨尔瓦多一家银行获得货车贷款,后来还从这家银行获得商业帮助。到1973年8月,他的年收入(1964年仅为1000美元),超过了我这个密歇根大学副教授的薪水。

托梅只是引领了这条路。看到从渔业中获得新收益的机会,其他船长兼船

[2] 克鲁赛罗:巴西货币单位。——译注

主也步其后尘，偿清了合作社贷款，提高了合作社从他们手上拿走的鱼价。韦伯式新教伦理价值观，进一步推动着阿伦贝皮 1973 年的成功。托梅和其他商人从进入萨尔瓦多更方便的交通中获益，他们取代了来自萨尔瓦多和伊塔庞的鱼贩，自己成为批量供应商，将鱼卖给（萨尔瓦多市区）中心销售点的批发商。他们也能把渔获零售给来度假的外来者，在当地人眼里他们会在固定时间出现，尤其是在周末和夏季。

从技术到财产

随着土地所有者和有雄心的船长兼船主之间差距的减少，社会经济整体分化加剧。其中一部分原因，与渔业技术变化对船长和船员关系的影响有关。尤其是，船员和船长兼船主之间的社会联系少于经济关系。船长兼船主和他的船员的差距，因机动化的成本而扩大。随着更多船长成为船只全权所有者，船长获得渔船每日渔获的份额也在增加。渔船所有者之前的份额，只是每日捕鱼量的四分之一。到 1973 年，这一份额上升到三分之一，反映了马达成本、投资回报和汽油方面的开销。（阿伦贝皮另一件秘而不宣的事情是：渔民并不真正了解船主获得了多少鱼。船主的份额一直被称作 *o quinto*，即渔获的“五分之一”，表示低于渔民实际获得的份额。到 1973 年，船员们不再像过去那样交掉五分之一后拿到 25%，而是要交出三分之一的鱼。）与其他三个船员一起捕鱼的船长兼船主，现在分到总渔获的三分之一（因为船是他的），加上自己分得的总渔获的四分之一（均分），总共是一艘船的 50%。^[3] 每个船员只获得 17%，还不到 1960 年代的 20%。这一变化更明显地表现在，船长兼船主现在得到的是船员的 3 倍，是 1964 年船长兼船主的 2.3 倍。这一差距，在 1973 年到 1980 年间变得更大。

我们再来看船长和船员之间另一个逐渐分化的方面。之前，船长像阿伦贝皮人一样，只属于分层的社会经济等级。有志向的年轻船长们处于顶级。年纪大些、不那么重要的船长们处在下一等级，“懒人”和酒鬼们则处于最底层。最佳船长有最忠诚的船员，捕鱼最多，全权或部分拥有船只。成功船队里的普通

[3] 1973 年，年均捕获 5500 公斤，按每公斤 3.4 克鲁赛罗计算，约合 3050 美元。

渔民获得渔船丰收的公平分配，比糟糕船长们有更高的收入和更好的饮食。相比之下，1973年渔业生产的财富，不成比例地分为两个鲜明的分组：(1) 创业者（船长兼船主和不捕鱼的机动船主）；(2) 其他渔民（普通船员和为不捕鱼船主雇佣出渔的船长）。逐渐鲜明的等级发生分化，形成分离群。社会分级转化成社会分层。（就像后两节提到的，这些变化产生了巨大的张力。）

机动化也意味着，先前区分船长之间、船长和船员之间的个人能力（视力和地标记忆），已不再那么重要。如今大多数捕鱼都在从不使用精确地标技术的夏秋两季进行。因此，对在购买帆船之前连鱼都没捕过、没给船长干过活的人来说，船长们的传统技能不再是必备。1973年，赞成船员之间明显区别的，其实是不同的生产方式。很多船长在马达和渔船上投资颇费，普通渔民则没有投资。这些船长之所以有更高收入，是因为他们的资产，而非技术。

分层的兴起

过去会被弭平的社会差异，现在成了更显著区别形成的基础。渔民之间的社会经济差异，随着生产方式上的制约，显著拉大。可以承担马达费用，或是有足够担保能贷到款的人，必须是(1) 有地产的业主——但还是无法留住好船长和船员；(2) 成功的渔船船主——有好船、好名声及足够的财产担保贷款。

从渔业变化中受益最多的，正是那些在经济与社会发生巨大变化时，处于社会等级顶端的人们。先前他们获得的成功被平均机制弭平：积累的财富在他们死后就会消散，阿伦贝皮继续保持分级而没有分层。不过如今，一些村民似乎能从下层阶级中脱颖而出。

1970年代阿伦贝皮发生的多次变化，使社区从平等社会转化为分层社会关系。这也就是说，传统体系中会被抹平的差别，固化成特权人群与无特权人群之间具体的差异。

过去，船长之间的区别主要基于年龄和性格差异。现在，成功船长和懒人之间的差别，渗入整个社会生活。1960年代确实如此，最希望成为不捕鱼船主的船长的人，并不那么有志向，也没那么稳妥。一些老酒鬼船长还为任务出海；但有一些雇佣船长，像其他普通渔民一样，成为阿伦贝皮逐渐增长的移民人口



1980年，从变清的泻湖对岸拍摄的卡拉努阿斯。（杰拉尔德·米拉尼克惠允使用）

的一部分。大多数移民都不住在阿伦贝皮本村，而是住在比较一般的卡拉努阿斯。这些渔民缺少建立在亲属、婚姻和仪式亲属关系上，能在社区中提供支持的社会纽带。移民由于缺少这种纽带，住处偏远，很难在当地找到最佳船队，也无法和能给他们带来最多帮助的村民经常来往。阿伦贝皮的不同等级，变为不同的社会空间。

最穷的村民在生活上远离社区生活，并割离与祖辈社区的关系。业主和打工者之间的差别在增加。贫困移民不断迁入，与经济增长的节奏保持一致，但他们面临着无法完全融入当地生活的新困境。现在的阿伦贝皮，在生活方式上有很大差别。托梅和其他创业者能盖起有室内卫生管道、冰箱和燃气灯的优质砖房。而新出现的下层雇佣船长和普通渔民，晚上则住在卡拉努阿斯，与被污染的泻湖周围弥漫的恶臭和蚊子为伍——这是刚出现的城市贫民窟的翻版。

虽然很多普通渔民仍在成功的渔船上占有一席之地，能够继续生活，并逐渐翻新在阿伦贝皮的住房，但他们也注意到，船长兼船主与普通船员之间的差别越来越显著。渔船中的社会关系，变得越来越像雇主和雇员之间的关系。一位渔民说：“自从船主开始拿走三分之一的鱼后，一切都不再像从前那样。”

与非洲或大洋洲建立在氏族和世系基础上的社会相比，阿伦贝皮从来都不是一个靠社区精神凝聚而成的地方。我（Kottak, 1980）在马达加斯加社区研究的村落，有更成熟的社会观念。他们把一个由过去、现在和未来成员发展中的社区，想象成一个超越成员个体的社会集体。而即便是 1960 年代的阿伦贝皮，在社会凝聚力测试上也是得分很低。亲属义务只限于近亲：父母、兄弟姐妹和孩子。到 1973 年，个体主义的兴起与社区精神的衰落，变得越来越明显。渔民开始谴责船长兼船主们只对钱感兴趣，谴责他们为了获得更多钱去向“圣母”（*mães de santo*）祈求，这类神灵是 1965 年到 1973 年间在阿伦贝皮勃发的坎东布雷教神祇。

成功的魔力和宗教的发展

坎东布雷教是一种非洲—巴西巫医信仰体系，之前它在当地没有发展起来，但现在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村民。它在当地的传播，是乡村城市化（村民们在外地更久，外来者则涌进阿伦贝皮村）的另一个体现。乡村社会迅速吸收城市文化。1960 年代，一些阿伦贝皮人会去附近农村咨询巫医。大多数村民都去那里看过医者如何通过神灵附体施展法术。萨满并不全靠运气：除了借助神灵世界，他还有一些医药知识，能开些寻常的药方。

1973 年，神灵世界与家庭有了近距离接触。坎东布雷教在阿伦贝皮流行开来，其中的“圣母和圣父”（*mães and pais de santo*，其字面意思就是，圣徒的父母亲），是萨尔瓦多有影响的宗教人物。1960 年代，一些在萨尔瓦多某家传教点修习过的女人们，偶尔会组织小规模坎东布雷仪式，伴着动人的旋律和动感的舞蹈，随之就是舞者的降神附体。当时没有太多村民参加：就算参加，也不是为了祈求神助，而只是像参加庆祝活动一样。1973 年，一位来自萨尔瓦多的圣母搬到卡拉努阿斯，开始为阿伦贝皮人解惑，并组织了一些参与范围更广泛的仪式。一名当地男性在萨尔瓦多生活数年后，也搬到卡拉努阿斯来传播坎东布雷教。

我听说阿伦贝皮现在有了真的坎东布雷教，便热切地想要参加一回。这也是我在 1973 年逗留时举办的唯一一次。那是八月间一个星期六的晚上，由卡

拉努阿斯的圣母和圣父共同组织。参加者中有很多熟悉的面孔，包括一个在萨尔瓦多学过坎东布雷教、1964年回到阿伦贝皮的女人和她的女儿，女儿给1963年的田野队员做过饭，收拾过房间。其他参与者还有据称有一条令当地人生畏的“恶灵犬”的店老板劳伦蒂诺，和他曾因发疯而裸奔的兄弟。还有很多我不认识的参与者。他们是组织者认识的人，包括从萨尔瓦多过来参加这个仪式的人。当地参与者们都衣着华服，从而在另一个层面上体现了当地新貌。过去，阿伦贝皮人可买不起如此考究的衣裳。

马文·哈里斯曾经带着我们1962年的田野调查队，去过一个萨尔瓦多的坎东布雷传教点，我们在那里亲见过正宗的庆典仪式，因此我多少心里有数。阿伦贝皮的活动，排场没那么大，跳舞蹈的“圣女儿”（圣父、圣母的助手）也少，让我有些失望。舞者们一小时接一小时，在空地上舞步散乱。当时我还在想：什么时候会有人附体呢？阿尔贝托告诫我：“不要相信有人会被附体，我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开始假装附体。”鼓继续敲着。一个女人开始静静呻吟，有人告诉我，这意思是她被圣徒附体了。这跟萨尔瓦多的坎东布雷教一点都不像，那里会有六七个狂热的女人倒在地上，像儿童公园的碰碰车那样互相碰撞，像女妖那样嘶叫，让人确信她们被神灵附体。凌晨两点，我觉得不会看到什么新东西，便回去睡下。第二天，那些熬到最后的人告诉我有些人上身了。我的报道人告诉我，他觉得这个仪式既不可信，又很乏味。

我在1973年与阿伦贝皮人谈论坎东布雷教的过程中，渐渐对这个信仰体系的流行有了认识。村民们既不完全接受，也不完全拒绝与坎东布雷教相关的信仰和行为。谣言盛传参教村民受到卡拉努阿斯圣母的庇护。这种说法是村民之间渐增不安和疑虑的象征。阿尔贝托的妻子卡罗琳娜生了场病，他们将其归因于巫术所致。就在我1973年6月到达不久，卡罗琳娜病情发作，搬去与她在卡拉努阿斯做圣父的哥哥同住。阿尔贝托十三岁的女儿证实了恶灵附体的怀疑。一天晚上，激动的阿尔贝托叫我开车送他女儿去伊塔庞的药店。她的圣父叔叔没办法驱散那年第二次上身的恶灵。后来药剂师的方子起了作用：他给她注射了大量药剂，足以吓跑最黏人的恶灵。

坎东布雷教在1970年代盛行的思维模式，在1960年代就已存在，但却一直都是隐而不发。我当初遇到的村民们，对待仪式都相当随意。所有阿伦贝皮人都受过天主教洗礼。人们结成的仪式亲属关系（教父、教母和干亲），以及个

人对圣徒的崇拜，都是天主教信仰的主要地方性表现。这里每年都会有两次大型庆典仪式 (*festas*)。每年6月24日祭拜圣约翰，每年2月20日祭拜阿伦贝皮人的守护神圣弗朗西斯。后者的庆典在渔获最丰的季节举行，比圣约翰的庆典隆重得多，吸引了很多外来者。但天主教并不为圣约翰和圣弗朗西斯举办酒宴。

到1973年，当地人接触天主教的机会并没怎么增加。虽然去外面教堂方便了很多，但神父到阿伦贝皮的次数并不比1965年（每年两次）更多。理论上，巴西是世界上最大的罗马天主教国家，信仰者超过85%。然而，在阿伦贝皮，只有妇女和孩子才去教堂，男人并不参与正式的教堂礼拜（除了洗礼）。我在神父少有的几次拜访中，听他责备人们无意参加宗教活动。男人们嘴上说要为自己的家人和圣人而祷告，但是没有仪式高于捕鱼，哪怕是在暴雨惊涛时节，他们也不想去。

虽然明显的宗教信仰行为在1960年代的阿伦贝皮并不常见，但村民们仍然表达了对巴西民俗形象，像无头骡、火球及狼人含糊的信仰。更显著的是，他们还分享了普遍的农民信仰：当地人利己必损人（有限产品的想象），财富可能来自与魔鬼立下的契约。村民们特别害怕和怀疑那个据信豢有恶灵犬的店老板。

我们不应把1973年与坎东布雷教相关的信仰和行为视为一种全新的现象，而应将其视作业已存在的信仰系统，在一个社会经济结构从分级向分层转变的社区的延伸和普及。尤其明显的是，村民们把对从超自然力量获益的指控，从店老板扩展到成功的渔民。我认为，这种超自然主义信仰的增长，是阿伦贝皮快速转型的直接反映。经济变化，与外来者的更多接触，以及新出现的不安感，让一些村民求助超自然力来解决新出现的问题，推动了宗教的发展。对坎东布雷教增长的信仰，也是村民们用来解释他们眼中有神秘因素的事物——当地财富比以往任何时候增长得都快——的认知手段。当然，增长的金钱本身是新仪式行为的支柱，过去的阿伦贝皮根本无法承担。

阿尔贝托的妻子卡罗琳娜及他们女儿的例子，表明了财富、心理不安感和超自然主义之间的关系。卡罗琳娜开了间小店铺，卖些像饮料、柠檬和煤油之类便宜物品给邻居和游客，小店开了不久她便感到精神苦恼。卡罗琳娜成功的小商业活动，是旅游业和现金流向城郊的众多回应之一。历经多年贫困，卡罗琳娜的新生意，很快就赶上了她丈夫这种普通渔民的收入。他们的家庭收入翻

了一番。

虽然患病，但卡罗琳娜的生意仍很顺当。1973年我重返阿伦贝皮不久，她的病情加重，女儿也受疾病困扰，阿尔贝托认为这是超自然力影响所致。虽然并不知道我会在八年后重返，但阿尔贝托说，就在我回来之前，他做了个梦，梦见我带着很多钱回来帮他建成砖房。我怀疑阿尔贝托是否坚信我的重返（我后来雇他当助手并支付可观费用）也有超自然因素。

我认为（但不确信），阿尔贝托的妻女都在心理上惩罚自己家庭的经济成功。过去在阿伦贝皮，成功的声望，如好船长，都是逐渐获得的。财富骤增非常罕见，通常都被认为是超自然力量作祟。1970年代，财富迅速增长是日常生活中的事实，也是“巴西奇迹”的地方性体现。

如何解释这个奇迹？大多数阿伦贝皮人都受某种价值观束缚，不相信显著的经济发展，而将其归因于恶灵契约。从小就有这种观点和价值观的人们，很难理解新的成功。像卡罗琳娜这样来自相信超自然观念的家庭，就会生出心理疾病。他们将这些疾病归咎于同一恶灵作祟，之前其他村民的成功，也是恶灵积极出力的结果。实际上他们会对其他村民说：“不，我才不会和恶魔有那种交换，虽然我现在生意很好。因为我不和恶灵立约，恶灵就会伤我比伤其他村民多。”且不谈卡罗琳娜的具体个案，单是越来越多的村民都开始信仰坎东布雷教，就可让人肯定，它有化解变迁压力的功用。我们在1980年还会看到，坎东布雷教继续在为平等稳定的过去和剧变新状况之间的矛盾，提供一种表达的文本。

阿伦贝皮人用巫术观念来使新秩序变得合情合理。先前他们指责只经营产业不事渔业的商人们与恶魔立约。随着现在普通渔民将这种解释延伸到同侪的成功上，船长兼船主们也就变得像老板们了。

一些船长开始紧张起来。先前已是成功船长兼船主的费南多，后来买了汽艇获得新收益。他也偏离了曾使他成功的道路。他开始酗酒，信仰坎东布雷教，这令其他村民对他成功的解释更加言之凿凿。他的不安感，让他养成一个危险的习惯：携带枪支，以防劫匪、危险的陌生人，和其他想象中夜间潜伏的威胁。

创新和过度捕鱼之忧

虽然社会关系和个人心理在 1970 年代中期都在忍受变迁之殇，但阿伦贝皮的经济仍在蓬勃发展。这种势头会持续多久？新技术（随之而来的还有附近工厂排放的工业污染）是否会导致当地海洋资源枯竭？

阿伦贝皮村的渔业生产，一直都是种类繁多，季有所出，年复一年。比如，合作社的记录显示：1972 年 7 月，船队捕鱼量是月平均值的 125%，但 1973 年 7 月的捕鱼情况则总体不佳。1972 年到 1973 年冬季捕鱼量下降，可能是过度捕捞的结果。当然也可能受距离阿伦贝皮港南部仅三公里处，流向大西洋的工业废水污染的影响。糟糕的天气与此无关，渔船几乎每天出海，但仍捕获不多。尽管如此，我怀疑捕鱼量的跌落是受每年波动的影响。如果全因过度捕捞，那么 1973 年第一季度的捕鱼量，便应比 1972 年同季略高。

不论是什么原因，1973 年冬季捕鱼的萧条，也引起捕鱼业在多样化和尝试性方面的迅速回应。新技术在之前提到的那些领域兴起；如果传统方式维持以往的收益，很多阿伦贝皮人就会从新兴方式（晚间捕鱼和捕捞龙虾）中获得大量利润。先前，有些船在一年中会有几次夜晚捕鱼，他们用煤油灯的亮光引鱼上钩。液化气使村民们能够置备更多强光灯具，安装在机动船上晚间捕鱼。

整个捕鱼模式都发生了巨变。1960 年代，船队在清晨起航，晚间归航；丰收则晚归，不丰便早回。1973 年冬季，一天中不拘什么时候都有渔船起航返航。这种比较随意的方式，在冰箱（让鱼运往市里之前一直储存保鲜）到来之前还不可行。

经济转型也影响了社会关系。以前渔船都是一起起航、归航。把渔具卸下，分好收成，男人们一起在泻湖洗澡，而后悠闲地走到小教堂门廊上聊天。1973 年，渔船各自出航返航，渔民们在陆地上的活动也各自分散。年轻人还是会在星期天一起踢球，但是，泻湖污染和一些新的捕鱼方式，让人们不得不放弃一起洗澡的传统。当地教堂门廊则被老男人和一些酒鬼占据。这是当地社会生活逐渐崩析的一些表现。

和夜间捕鱼一样，捕捞龙虾成为 1973 年淡季中的创新适应。十几个村民如今有四千多米长的尼龙鱼网。沉在水下的三重刺网，最初使用是在 1965 年，

对当时还用鱼钩和钓线的传统捕鱼益处不大。但五个渔民发现鱼网捕捞龙虾很方便。之前，一些渔民自己摸索出夜晚退潮、暗礁大幅浮出水面时捕捞龙虾的技术。但1960年代，捕捞龙虾量很小，也没有向外输出。

1972年，有鱼网的渔民扩大了龙虾捕捞范围，这大大增加了他们的收入。比如1972年8月到11月间，每月平均有一百五十公斤龙虾卖到渔民合作社，卖价是普通鱼类单价的三倍。当时是1972年鱼钓最不景气只有年均月捕鱼量一半的时期。这五个渔民在1973年6月重新开始捕捞龙虾，捕捞量在8月开始飙升到三百二十公斤。虽然合作社将鱼价保持在1972年11月的水平，但是龙虾价格到1973年6月已涨到鱼价的四倍。这是另一个进一步刺激龙虾捕捞的因素。1973年6月，渔民们捕捞龙虾获得的收入，占到他们从合作社获得鱼类总收入的80%。

合作社的数据显示，龙虾捕捞在鱼钓重新兴起时暂停。大批渔汛一在海岸出现，传统捕鱼量就会有明显提高。消息传得很快，渔民们一听说传统近岸捕鱼开始，便立马扔下家附近礁石区捕龙虾的网，跑去海边。

龙虾捕捞的兴盛期很短。因为龙虾捕捞区域非常有限（近岸礁石区），和海上捕鱼相比更易枯竭，后者由于新技术的引进，范围更大。捕捞龙虾之所以受欢迎，只因投入收益高：低劳动高回报。鱼网容易撒也容易收。这些工作只需坐汽艇两个来回，而不用辛苦一天，曝于海上。

1980年，曾经能捕捞好几公斤龙虾的刺网，如今一网只能获得一两公斤。龙虾价格也跌到和鱼类持平，几乎不抵鱼网价钱。龙虾捕获难有复兴之机。即便捕获量持续下降，阿伦贝皮人也无视捕获小龙虾要放生的国家保护法。村民们只要捕到龙虾，不论大小，照吃不误。

随后几章我们将会看到1973年最与时俱进的变化趋势。阿伦贝皮的职业结构变得更加多样，船长兼船主和普通渔民间的社会关系变得更加疏远。渔民们航行更远，更加依赖外来产品。人口继续增长，分层更加明显。移民和游客不断到来，新房在聚落之间建起。虽然巴西钛业采取了一些措施来停止对淡水泻湖的污染，但海洋污染仍在继续。1980年代，人们又像1960年代那样在泻湖洗澡、游泳。阿伦贝皮的对外开放无人可挡。如今，这里是通向巴伊亚北邻塞尔希培州高速公路的必经岔道。现在也是该向大家讲讲最近发生的故事的时候了。

第四部分

现 实

第七章

梦想之地的新一轮新日^[1]

我与阿伦贝皮 1980 年的第一次遭遇，欣然将我带回心中 1962 年初见时，那个恍如黎明中惺忪醒来的村庄，而不是 1973 年低级庸俗的小镇。我们从萨尔瓦多海景酒店驶入平坦公路，一路飞驰（约五十分钟），我期待自己会在八月份那个周三的中心广场看到更多汽车。要是我选在周日返回，我的第一印象就会截然不同。比如，我最信任的报道人兼田野助手阿尔贝托，会忙于经营自己位于下街蒸蒸日上的酒吧和店铺。我会花一天时间，闪躲、接受那些已有啤酒肚的老友和熟人的拥抱。我会一眼看到，1980 年阿伦贝皮的度假村已经成为一个酒吧遍地的海滨小镇，成为萨尔瓦多工薪族和中产阶级下层人们的周末胜地。我会在村民中看到，周末酗酒（1973 年已有雏形）由于经济变化而愈加严重。

渔业模式也发生了剧变。大多数老旧的无篷帆船 (*saveiros*) 不是被卖就是被扔。稍大一些的帆船，则改装成封闭式机动捕鱼船 (*barcos*)。出海捕鱼现在是从周二或周三市里冰块运来时开始。持续四天，船员们把船开到比以前捕鱼区域更北的地点。周五或周六返航，很多渔民都会在周末跟市里来的游客一起喝酒。

1980 年我在阿伦贝皮度过的第一个周六，清晨有雨，下午放晴，车流往来不断。星期天场面更加壮观，我们数了数，共有三百零九辆汽车三辆巴士，接下来的周一则只有十六辆汽车和一辆巴士。1973 年，我被竖在路边的“阿伦贝

[1] 之所以把阿伦贝皮形容为“梦想之地”，来自玛克辛·马戈利斯发现的一面墙上的涂鸦。



1980年8月一个周日，我在下街都很难找到停车位。（杰拉尔德·米拉尼克惠允使用）

皮”标志所震惊。1980年给我的震惊则是，星期天我很难在阿伦贝皮村里找到停车位。

有个周六，阿尔贝托向我抱怨某个特别忙碌的周五夜晚，人们坐在他家台阶上喝啤酒、烈酒喝到早上七点。从中心广场飘来的迪斯科音乐，整整折腾了周六一天。嘹亮的舞曲从晚上九点开始，直到次日凌晨四点。广场上和海滨，甚至还有巴伊亚人（装点萨尔瓦多街头的盛装妇女）在这里出售巴伊亚食品（非洲-巴西烹饪食物之一）。我们以前的厨师朵拉，现在成了许多在酒吧、餐馆服务游客的女人之一。她的劳动可以换取每周末10美元的报酬。

阿伦贝皮与我1960年代研究的渔业占主导的渔村之间，已经毫无相像之处。1980年，只有40%的成年男人，三分之一的全部劳动力，靠捕鱼为生（见附录2和附录6）。阿伦贝皮如今已经变成一个旅游小镇。

酒吧散布也导致社区凝聚力涣散。1960年代只有几家酒吧。杯装卡莎萨朗姆酒，可以在靠近中心广场的两家大型商店买到。捕鱼归来的渔民们，经常会畅饮一两杯再去泻湖洗澡，接着回家吃晚饭，然后再加入教堂门廊前男人们的闲聊中。到1980年，男人们开始染上在附近酒吧饮酒的习惯，在那里与邻居



一个巴伊亚人在中心广场卖熟食，边上的周末游客在等巴士。（杰拉尔德·米拉尼克惠允使用）

和酒家一家聊天。然而，他们很少再去教堂门廊，如今的门廊空遗夜色。邻居们（说得更确切些则是，十几户会去同一家酒吧喝酒的近邻），代替了过去整个社区的夜生活。

如今的阿尔贝托和卡罗琳娜，已经适应了曾在1973年因商业成功而困扰他们的心理问题。他们的大女儿，玛丽亚·何塞，已出落成一个二十五岁聪明勤劳的姑娘，与伊万住在一起，伊万是来自巴伊亚内陆有志向的移民。他想开拓属于自己的事业，最好是在阿伦贝皮开家餐馆。同时，他搬到阿尔贝托的小房子里一起住。虽然玛丽亚与伊万结成了习惯法婚姻，但他睡在客厅的长沙发上，她则与两个妹妹共睡一间卧室。

卡罗琳娜、阿尔贝托、玛丽亚、伊万和珂丝玛（玛丽亚十八岁的妹妹），卖着不同的东西。阿尔贝托卖啤酒，他卖的啤酒是全阿伦贝皮最冰的啤酒，因为他有最好的冷柜。冬季周日一般每售出一百公升啤酒，就能获益25美元。他和卡罗琳娜还卖香烟、杯装卡莎萨、水果、蔬菜、辣椒、香草、剃须刀、阿司匹林和火柴。珂丝玛卖汽水。玛丽亚卖面包、糖果和烤花生。伊万则卖鸡尾酒赚钱（他来阿伦贝皮前就在酒吧干过）；我们住在阿伦贝皮期间，他和玛丽亚负

责我们的饮食。伊万还做些兼职赚钱，主要是为度夏游客刷油漆、铺管道和修电线。

伊万建议阿尔贝托在房后修一条可以远眺大西洋（浪高时海浪会拍到房基那么高）的长廊，他的商业智慧使他相信，这会使他们在旅游业中获得成功。船队现在阿尔贝托房后停泊，场面壮观。大船需要比老船更深的锚地。所以，现在不得不抛弃暗礁环绕的老港，换到南部稍大的区域，就在后街朝海的一边。伊万和阿尔贝托认为新鲜空气、面朝大海会吸引游客的想法完全准确。每到周末，城里人就会坐在阿尔贝托的露天酒吧，喝喝啤酒，吃吃海鲜。

几间房子开外，是达利娅阿姨的果汁吧，她也卖啤酒，但主营果汁和冰淇淋。达利娅也有长廊和海景。她的成功建立在1960年代末和1970年代初针对嬉皮士所做的生意。年轻外来者和十几个一直留下来的老嬉皮，是1980年达利娅的主要顾客。

之前那条在建中、分开后街和更南面消夏别墅的沟，现在已被填上了。阿伦贝皮奴隶主弗朗西斯卡以前看护椰子树防备村里男孩的地方，开了家新餐馆，这是全阿伦贝皮最新潮的餐厅，里面有躬身迎宾的侍者。一个老嬉皮在不远处开了家餐厅、酒吧兼公寓，他如今已是当地的长期居民（*morador*）。他把（不太干净的）里屋，和餐厅面海一边椰子树下竹子搭的凉棚租了出去。所有这些都是我在一个周日下午看到的。因为靠近大西洋海边很少看到泳客，所以我觉得这些凉棚是萨尔瓦多和里约热内卢海岸“高流动率汽车旅馆”的当地版本：可牵露水姻缘之地。

有人告诉我，与夏季观光客的人数相比，八月份周日里来阿伦贝皮的城里人不值一提。经营克劳迪娅餐厅（可乐餐厅）的艾德丽说，她的客人们几乎全是外来游客。巴西钛业官员们几乎每周都会来两三次，全年如此。虽然艾德丽从来不会事先知晓他们何时会来，但电力和冰箱能让她只要客人一到，就有鱼可做。艾德丽说，不像冬天旅游淡季，夏天就连工作日的生意都很好。她冬季大约要做二十五到三十份周日餐。夏季的这个数字会翻倍。他们关于1980年因汽油短缺导致旅游和商业下滑的抱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村民对外来者的经济依赖。阿伦贝皮也感受到1980年全球能源短缺危机。人们说，1979年冬天的生意要比现在好得多。

土地细分

随着土地划分的进行，地主豪尔赫也在阿伦贝皮村设立了房产办公室，但他自己很少着手，大都交由他的弟弟和妹夫去打理。由于豪尔赫与阿伦贝皮有着诸多社会关系，如果村民要求特殊照顾，比如延长每月交房租的期限等，他很难拒绝。他的妹夫经常扮演“唱黑脸”地主的角色。

豪尔赫受过教育，来自阿伦贝皮著名的世袭地主家庭，并向社会上层流动，因此永远都被认为是村子的保护人。但他长期的当地代表普鲁登西奥，在我们离开期间去世了，少了这个可以替他出面的良师益友，豪尔赫发现保护人的角色比以前麻烦很多。他告诉我们，毕竟“我是专业的（工程师）”。他的工作需要经常出差，很多时候还要出国。豪尔赫被地产搞得很烦，抱怨道：“我从地产中赚不了多少钱。价格很低，还有各种细分支出把我的利润都吃掉了。”

村民们先前曾对土地计划感到疑惑，如今已大体接受，他们转而向外来者出售，期待价格上涨。一些人有所不满。一位妇女认为土地出售有利于外来者。她说，一些人买了两到三块地，让那些想跟亲戚们住在一起的村民们几乎没有选择余地。“你能想象他会把土地留给这里的人吗？”她说。豪尔赫跟我说，他曾考虑过把土地留给当地人，但亲戚们都比他对生意更感兴趣，他们在意的不是社会纽带，而是经济利益。

1980年8月，土地售价为3.5万克鲁赛罗（约600美元），但是大多数买者都会欠下1万克鲁赛罗，而后两年内每月支付2000克鲁赛罗按揭。由于第八章提到的经济变化，使得这个价位超出大多数渔民所能承受的范围。

当地地产价格涨幅高于通货膨胀率。只要巴西经济奇迹继续（尽管速度有些放缓），金钱向农村流动，就能使很多村民改善住房。1980年阿伦贝皮南部调查的房屋中，只有15%还是木架泥屋（1960年代大多数房屋都是这样），大都是砖墙瓦房。卡拉努阿斯的房屋也有所改善。当地一百所房子中（从1973年开始数量翻倍）大多是砖墙。我们逗留那段日子，其中一间以折合600美元的价钱卖给城里人，远远超出普通渔民的收入。卡拉努阿斯的住房更受欢迎的原因之一，是工薪阶层数量增多。他们中有很多人都是巴西钛业当地员工，现在有四十人，占阿伦贝皮成年男性劳动力的17%。外来者也开始购买卡拉努阿



斯的住房，主要是新卫星村鱼湖村，在他们眼中，整个海边划分过、未经开发的地方都是很好的投资。

椰子公路靠近阿伦贝皮转弯处路两边也有地产出售。鱼湖村东北面已建起两排房屋，其中二十五栋已建成，剩下二十栋在建。一个成功的船长兼船主刚在鱼湖村能俯瞰泻湖处建了一栋房子，还给他的孩子们买了三块紧邻地块，让他们共享风景。他设想能有一排连一排的房屋一直延伸到泻湖的最高水位处。高速公路两边立起的房子，还有鱼湖村和泻湖之间计划建设的房屋，让阿尔贝托认为，阿伦贝皮不久就会变成城市。夜幕降临，我和阿尔贝托从公路上看着数百盏灯光映衬下的椰子树，预见到阿伦贝皮不久之后的城市化，还有它逐渐逝去的美丽。

人口增长

1980年我在阿伦贝皮只待了很短时间，来不及对阿伦贝皮村进行人口普查。我从和市里统计局负责人的谈话中了解到，根据1977年的一个样本分析估计，阿伦贝皮村到北部十一公里的贾库佩河之间有两千五到三千人。统计学家预估，到1980年，阿伦贝皮的人口会超过两千五百人。我认为这个估算比较合理，因为阿伦贝皮村和卫星村已有六百多间房屋。1980年的精确数据显示，有六百一十七间房屋，一千五百六十一人，低于我的估计。

很难准确普查阿伦贝皮的人口，因为很多在当地有房的人，一年中只待一阵子。我自己做了一份快速人口普查^[2]，调查了阿伦贝皮南部一百三十间房子。这包括下街的两边，加上新街延伸到西面，造到泻湖最高水位线的房子。一百三十处住所中有58%属于非本地人，证明了外来者的重要性和所有权。只有47%的房子全年有人（房主或租客）。整个村里，阿伦贝皮南部房屋租金最高。1973年冬，旅游业和假期偶居刚刚开始时，只有10%的房子租了出去，

[2] 我在阿伦贝皮南部的抽样区域普查了一百三十间房子里的313人。调查显示，(六十一间)有人住的房子里平均住着5.1人，一百三十间房子平均住着2.4人。 2.4×617 (1980年政府统计的阿伦贝皮家户数) = 1481人，没有比政府统计的1561人低多少。

只有 34% 的房子租住一次以上。到 1980 年，这两项数据分别提升到 30% 和 50%。

熟悉的外来者

周末游客和那些来阿伦贝皮消遣的富有外来者之间的差异还在继续。村北和村南的舒适别墅是那些富有外来者的，他们属于一个遥远而孤立的社会领域。他们与村民和外来观光者都保持着一定距离。

在村里盖房、购房或租房的外来者，不属于村北和村南那些格格不入的有钱人。他们大多来自中产阶级下层，与周末游客及和村民们打了几十年交道的落寞乡绅并无不同。虽然与外来者的交涉更多，且有各种原因，但村民们与他们的交往方式与 1960 年代仍无二致。

从阿尔贝托的酒吧观察到的情况可以看出，大多数阿伦贝皮人还没习惯对城里人卑躬屈膝。一个星期天，一群陌生人从海滩走到阿尔贝托的长廊，问他有没有冰啤。阿尔贝托的女儿和“女婿”没搭理他们，继续和一个叫米尔顿的常客（他是一个在对街租了间房子度周末的城里人）聊得兴高采烈。阿尔贝托的女儿最后决定给他们点单，他们还要点海味下酒。她告诉他们，阿尔贝托每周日从河上渔民那儿买的螃蟹，那周刚好没到货；听到这话，那些游客便离开了。

阿尔贝托和他一家人与米尔顿的关系，也反映了村民们保持的习惯：对大多数外来者并不顺从讨好。阿尔贝托把米尔顿称作哥们（*camarada*），他们之间的玩笑也表明他们有着长期友好关系。米尔顿告诉我，他第一次来阿伦贝皮是在 1940 年代，那时便与阿尔贝托相识。村庄刚对外开放，他就租了间房子度周末和度夏，他常常流连阿尔贝托的酒吧。但是，米尔顿那粗糙、黝黑的皮肤，稀疏的牙齿，很是让我怀疑他所谓的中产阶级身份，尤其是他在阿尔贝托的长廊后面小便被我看见，还向我装成是在“看大海”，更是令我生疑。

下街西面有几幢新房子，大都是城里人的。很多人只在夏季来住，有些房子还用大门紧锁春色。户主遵循的是巴西城里人的防盗习惯，有些房子外面还有高墙围住，墙顶插上碎玻璃碴。用考古学家杰拉尔德·米拉尼克的话说，这营造了一种集中营的氛围。类似的房子在阿伦贝皮老街西面也有很多。

租赁生意

阿尔贝托的哥们和周末邻居米尔顿这些外来者们，都签了周末和夏季租房的长期协议。1973年，很多阿伦贝皮人都把他们面海的房子出售或租给萨尔瓦多来的游客。一些人还延续以往建造前后两栋的习惯；但到1980年，大多数村民都决定自己住在更舒服的前屋，而把后面的房子租给外来游客，一改1973年房子供不应求时的模式。

1960年代和1970年代早期极其成功的渔业翘楚托梅，离开自己的妻子，改娶女嬉皮索尼娅（见第十一章）。他们与另一户人家共租一所房子，中间只用帘子隔开。托梅提到了住房紧缺。他和女友为找每月最高租金125美元的房子，找了几个月。但外来者已经垄断了市场。

阿伦贝皮的永久移民人口，从1964年的24%，增长到1980年的41%。有些人租了海边的房子在外面工作。比如，一个租了北面矩形广场区后面房子的小伙子，就在卡马萨里繁荣的石化企业上班。如今镇政府离这里只有四十分钟车程，这在1973年可要两三个小时。其他租房者还有公车司机、巴西钛业工人、工匠和其他受当地经济发展所衍生工作吸引的人们。

有些村民开始对自己与外来者之间签署长期租赁合同这一方式产生疑问。一位户主向我抱怨，“有钱的外来者”租下村民的房子，然后就真当成是自己的房子。一些城里人还雇了律师，声明他们的合同是按揭买房，而不仅仅是租房。虽然还没有人因为这种租赁合同而失去什么，但租客们援引外界法律体系的力量，却不由令人生惧。

嬉皮士手册

阿伦贝皮的嬉皮时期终于1980年。村民们还记得，第一批嬉皮士出现在1966年到1967年的夏天，高峰是1968年到1971年，尤其是1970年到1971年。1980年我还能分辨出的嬉皮士要比1973年少，只有九个还留在当地。在很多村民眼中，这些人已不再是嬉皮士，他们已然是这里的永久居民。

1980年，我开始克服自己以前对嬉皮士的鄙视。我不再漠视他们的存在，

而是花时间调查他们当前的生活方式和活动，尝试理解他们在当地历史中所起的作用。嬉皮士的到来对村民生活的影响仍然隐约可见。对阿伦贝皮人来说，嬉皮士的侵入将当地历史分为前后两个时期。1980年，很多村民都表达了对往昔的伤怀与怀旧 (*saudades*)，怀念嬉皮士到来之前未曾改变的那个阿伦贝皮。他们不再期待新的阿伦贝皮，而是忆起了我们这群人类学调查队，忆起了过去那些浪漫的生活。

具体来说，阿伦贝皮人现在怎么看待嬉皮士和他们的历史地位呢？首先，他们如何分辨嬉皮士？我发现，村民们对嬉皮士有一些刻板印象，而那些老嬉皮士们身上体现的行为和思维方式，也确实有别于其他村民。从另一层面来说，嬉皮士亚文化在阿伦贝皮仍然依稀可辨。一个周日下午，我在“下街”和一位六十岁的妇女坐在她家砖房边聊天。从对街一扇敞开的窗户里望进去，我看到一位金发女郎，像是我前几天在嬉皮村（北面的嬉皮士聚居地，下一节会详细讲述）遇到的里约来的女嬉皮。我的报道人否认她是嬉皮士。不过，几分钟后一对男女向我们询问托梅污名化的嬉皮情人索尼娅（我报道人的邻居），她毫不犹疑地给那对男女贴上嬉皮士的标签。那个一口阿根廷口音的男人，衣着考究，在我看来不像嬉皮士。我的报道人则从他的胡子和他要找索尼娅这两点，把他认作嬉皮士。这种想象真尴尬！出于对嬉皮士，特别是对索尼娅的敌意（她说索尼娅“抢了别人的男人”），她回答时故意误导了那个男人。

对村民来说，嬉皮士的重要特征是头发和衣着。嬉皮士留着长发，大胡子的男人便是嬉皮。周围的嬉皮士们都“半裸着身体”；男人只缠个腰布；女人则穿吊带衫，不戴乳罩。男女都在卡拉廷吉河里裸泳混浴。（阿伦贝皮的男孩们也喜欢去那里游泳，去偷窥裸体女嬉皮。）

说话和饮食习惯是另一些线索。外国嬉皮士多有口音。最明显的是，嬉皮士比普通人说话更慢，更轻柔（那些慵懒的美国“冲浪者”回忆说）。嬉皮士在饮食和消费模式上也有不同。他们告诉我：“嬉皮士只吃面包。”村民们回想起嬉皮士潮的高峰期，阿伦贝皮的嬉皮士们就靠面包和苏打汽水过活。村民们还知道嬉皮士喜欢抽大麻。

村民们比1973年时更加讨厌嬉皮士。随着新鲜不再，麻烦日增，自我上次来访之后，村民们对嬉皮士的抵触情绪更加普遍。一个男人责备我不该把阿伦贝皮北部聚居地称作嬉皮村（Aldeia）。

他说：“别用那个嬉皮士的叫法，卡拉廷吉才是正确的叫法，该那么叫。”

村民们看不起那些跟嬉皮士们混在一起的少数年轻人。朵拉说起一个二十岁的当地人，“她居然跟那么低级 [ruindade] 的嬉皮士们混在一起，真丢人！”

很多村民都鄙视嬉皮士的道德观。他们告诉我：“嬉皮士连自己人都要偷。”（我去嬉皮村路上遇到一个葡萄牙来的嬉皮士，他向我抱怨刚来几天，昨晚就被偷走 300 美元旅行支票。）在传统阿伦贝皮人眼里，盗窃是被高度污名化的反社会行为。1973 年和 1980 年不断有人告诉我要小心防盗。小偷是村民们对外部世界的恐惧和不确定的象征性总结。将嬉皮士认作盗贼，就是把他们置于正常社会生活之外。他们常常告诉我，阿伦贝皮人彼此间不偷东西，也不害怕对方：“我们可能真的很穷，但我们不做小偷。”相比之下，嬉皮士们不仅抢劫，还互相偷窃。在我听来，阿伦贝皮人就像素食者在区分吃肉还是嗜食同类。

另一个特征：说话方式，也被用来说明嬉皮士缺少人性。从我们自己的文化中可以发现，与和自己说话方式相同的人相处最感舒适。阿伦贝皮人用嬉皮士的说话方式来分析一些更微妙的东西：嬉皮士们不仅社会行为不同，人性也有缺陷。吸毒者、另类者或兼而有之的人，说话时含混不清，词不达意，好比鸚鵡 (*papagaios*) 能言，不离飞鸟，不解其意。

嬉皮士到来之前，村民们唯一知道的外国人，就是一位德国神父和一些美国人类学家。我们一开始都被视作鸚鵡。在我来访的 1960 年代，一直感觉语言是阿伦贝皮做田野工作很大的障碍。我想我在里约和圣保罗葡萄牙语听说无碍，为什么到了阿伦贝皮却沟通不能？直到后来我才知道，阿伦贝皮人说话与巴西官方葡语之间的不同，就和利物浦工人说话与 BBC 英语的差别一样，甚至更大。传统阿伦贝皮人的语言，远离外国人、外来者，甚至连今天可从收音机和电视上听到的国语也接触不到，这让他们的语言沙文主义与其他那些类似的孤立人群别无二致。说话就该像阿伦贝皮人那么说，任何其他入说话都像鸚鵡学舌。

1980 年，阿尔贝托得知我回来的消息，冲到克劳迪娅餐厅欢迎我时，激动而笨拙地喊道：“天哪，我的鸚鵡回来了。”在我准备离开的最后一天，他告诉我，我以前是个鸚鵡，现在说话“多少有些像样了”。这一评价可能是因为我的说话方式有了实质进步，但更可能是反映了阿尔贝托（及阿伦贝皮人）已经逐渐熟悉了外来说话方式。

下面一则故事，是传统阿伦贝皮人对外来说话方式污名想象的最后一点思考。村里现在流传说：1964年我们要完成一百五十九份家户访谈大纲，当时有个女人不愿给我们提供完整信息。村民们一再提到，我们走后不久，她生了个女儿，但女儿从不会像本地阿伦贝皮人那样说话。她说话“混乱”，就像她母亲之前不待见的外国人那样说话。女孩的情况便是对她母亲的惩罚。这则故事的寓意就是，在传统的阿伦贝皮，鸚鵡虽不如人，但还是应受礼遇。

虽然人们认为嬉皮士是强盗、鸚鵡、懒汉且不如人，但很多村民仍自然而然地对嬉皮士生活方式抱持一种积极态度。一名妇女叹息过村里一些与嬉皮士混在一起的年轻人后，也说到其实也有好的嬉皮士。那些人也做手工艺品，行为端正，说话有礼，也有自己的生意。这些好嬉皮不像那些不靠谱的过客，他们后来大都变成当地人。他们即便没有参与全部村落社会，至少也不会嘲讽当地的价值观。

嬉皮村的状况和文化

嬉皮村坐落于卡拉廷吉河畔，从阿伦贝皮往北步行只需三十分钟。沿着海滨或陆地，穿过泻湖就可到达。夏季泻湖干涸，也可开车过去。一个周五下午，我在阿尔贝托和1980年田野调查队的陪同下，第一次走访了嬉皮村。看到那里人数稀少，阿尔贝托大吃一惊。他之前估计这个聚落应有二百人，和卡马萨里统计局估计的差不多。

嬉皮村分为三块。南边是聚落核心区，有十间内部是木架泥糊的棕榈屋。这块区域北面有一片椰树林，为所有棕榈屋提供了斜坡的屋顶。再往北一点是条河，两顶帐篷支在那儿。

两对嬉皮士情侣和二十一岁的若奥（通常一个人）住在南面。他们靠手工艺为生，其中一个男人还会画画。我们去那天，三个人正好去萨尔瓦多看病，剩下两人将做好的东西卖给市里发展红火的旅游中介。两个当地男人——两兄弟（一个单身，一个已婚）——也住在这儿，还有一个阿伦贝皮当地妇女给嬉皮士们洗衣、缝纫、做饭。

在阿伦贝皮人眼里，这个女人有点精神错乱，她总是对着海洋和树木祈祷，



嬉皮村南部，美丽的风景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年轻人。（杰拉尔德·米拉尼克惠允使用）

偶尔还会在阿伦贝皮村因为喝了太多卡莎萨，在公共场合脱掉衣服，嬉皮士也这么看她。刚从萨尔瓦多来的创业者，最近开了家卖朗姆酒的酒吧。他靠一群牲口拉车，给嬉皮村运来第一台液化气制冷的冰箱，计划在节假日里卖冰啤给游客。

嬉皮村的第二部分，是一片穷人版的青年旅馆。这些棕榈叶遮盖的棚屋不收房租，几乎挡不住阳光和雨水。这里是暂居区，一个阿伦贝皮嬉皮士告诉我们，可以找到美国、英国、德国、意大利和丹麦的嬉皮士。这里是村民们鄙视的“低级”嬉皮士的聚居地，也是那个葡萄牙过客旅行支票被偷的地方。我在这里访谈过的每个人都衣着褴褛，棚屋的墙内飘出一阵阵大麻烟味（阿尔贝托和我之前从未闻过也没意识到）。

再往北便是卡拉廷吉河，河岸上支着两顶帐篷。一顶是萨尔瓦多来的年轻人在周末野营。另一顶帐篷前站着一个穿连身裤略年轻些的小伙。这个圣保罗人（*paulista*）来阿伦贝皮度假和减肥。他每天的功课便是向北走到贾库佩河口，来回大概三小时。据他说，他的体重从九十公斤降到了六十五公斤。后来又来了两个体形魁梧的女人，是他的野营伙伴。现在我知道他为什么需要节食了，



1980年嬉皮村的一个嬉皮士居民。(杰拉尔德·米拉尼克惠允使用)

因为这个帐篷仅够一人容身。其中一个女人坐着，翻着一本画报，上面袒胸的女人和她的胸部差不多大。另一个妇女进入帐篷，对男人发号施令。

阿伦贝皮人眼中的这些嬉皮士，确切说来应该是露营者。他们加入国际化潮流，冬天里旅行到巴西北部更温暖的海边，就像那些年轻的美国人到佛罗里达春游的道理一样。虽然我很难确认这些嬉皮士和年轻旅客的社会经济背景，但阿伦贝皮人坚持认为做嬉皮士需要不少钱。村民们认为很多嬉皮士都很富有，所以这让他们很难理解为什么那些嬉皮士居住如此简陋，排斥消费品；直到最近本地人开始弃绝消费品带来的恶果，才终于如梦初醒。

要过嬉皮士的生活确实费钱。二十一岁的若奥常年待在嬉皮村，但他用修车刷漆挣的钱，旅行到其他嬉皮士的海边聚落。他从亚马逊河口的贝伦市，一路跋涉超过三千公里到达巴西的最南端。若奥上一次见到一个也从圣保罗过来的朋友，是在巴伊亚南部一个海边聚落，这个人1980年在嬉皮村住过一段日子。这个年轻圣保罗人懂一点人类学，告诉我他曾参加过马托格罗索（巴西中西部）的考古挖掘，这说明他来自中上阶层。

暂住若奥家里的年轻女性，无疑也有不俗的家世。女嬉皮自述生于埃及一个犹太家庭，五岁时移民巴西，在里约的法语学校念书，十几岁时住在以色列

一个基布兹农场。她除了会说一口流利的葡萄牙语和英语，还能和父母用法语交谈，还懂一点希伯来语和意大利语。她告诉人类学家玛克辛，她之所以会说这么多语言、去过这么多地方，是因为她是犹太人。令玛克辛（她也是犹太人，也会说几种语言，也去过很多地方）好笑的是，女嬉皮把这些解释成“所有犹太人都会说多种语言，都爱旅行”。（巴西犹太人没有美国多。我的报道人觉得应该启发我们认识犹太人特征。）

这个年轻女人说了她怎么放弃了取得大学文凭后在里约的工作，只为离开城市寻找“纯净生活”。这是她第二次来到阿伦贝皮。她相信世界文明将会在三年内被核战争摧毁。她在寻找一个能远离核辐射的安全地方，一个能够平静生活的集体农场。她知道嬉皮村不适合农作，但决定在世界末日到来时，定居在内陆的戈亚尼亚市附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巴西第一次核放射事故就于1987年发生在戈亚尼亚。）

除了抵制城市生活，追随纯净生活和集体生活方式，她的饮食习惯也有助于她融入嬉皮士亚文化。她像若奥和很多其他嬉皮士一样，崇尚素食主义。她和若奥一起在城里超市购物，那里可以买到杂粮，价钱也比阿伦贝皮便宜。她很注重健康，煮热水（喝茶）并穿鞋防止足虫病（巴西农村很常见）。与其他阿伦贝皮嬉皮士崇尚素食的原因不同，她是因为相信通灵教，该教在巴西城市精英中日渐流行（见 Brown, 1979）。

这个女嬉皮与阿尔贝托之间的交往，显示出她对当地社会体系的漠然，并多少流露出来自南部城市的居高临下之态。太阳西下，我们离开嬉皮村时，我惊讶地发现西面五十米远一幅不同寻常的景象：我之前以为是刷白的椰子树桩，其实是身着白色衣服跪下的妇女。那是嬉皮士的洗衣妇露西娅在祷告；据我们所知，她这么做显然是对着树木或落日祈祷。我和阿尔贝托问起若奥的女访客，露西娅在做什么时，她告诉我们是因为星期五。

“星期五？”阿尔贝托说，“星期五有什么特别的？”

“你说什么？”女嬉皮答道，“你这个巴伊亚的黑人，竟然不知道星期五是奥克萨拉（Oxala）之日？”（奥克萨拉是坎东布雷教里的神祇。）

“我不知道，”阿尔贝托有点生气地说道，“我与坎东布雷没关系。”（阿尔贝托的妻子信坎东布雷教，但他自己则经常表示坚决抵制。）

女嬉皮这样说是由于刻板印象：因为阿尔贝托是黑皮肤的巴伊亚农村人，

她认为他肯定是坎东布雷教的信徒。但她不了解，虽然坎东布雷教正在蓬勃发展，但在过去的阿伦贝皮却很少为人所知。她还想给阿尔贝托一种她不但很懂通灵教，也很懂他所信奉的坎东布雷教的印象。除了这些错误印象，这个女嬉皮也用一些不合适的种族词汇来形容阿伦贝皮。巴西南部城市居民认为，种族分为黑人、白人和黑白混血，总体上少于巴伊亚和阿伦贝皮的词汇和分类，尤其少于阿伦贝皮。虽然阿尔贝托的肤色比大多数村民颜色要黑，但村民们通常称他为深黑色的人 (*mureno escuro*) 或是简称深色人 (*escuro*)，并不叫他黑人 (*preto*)。

除了这些文化礼节上的不足，若奥的嬉皮士客人们，也和住在棕榈棚屋里那些面有菜色、营养不良的嬉皮士移民形成鲜明对比。她是个高雅、受过教育、非常健康的过客。因为她和若奥有一些让他们向往嬉皮士生活的共同目标，可以说她比若奥更为老练。年轻人若奥以温柔、清晰、慢条斯理的话语，很好地阐释了阿伦贝皮的嬉皮士观念。他十四岁时离开在圣保罗的父母，随着另一家人于1974年来到阿伦贝皮。

他在对阿伦贝皮过去和现在不太相合的比较中，表述了嬉皮士思想的关键内容。若奥是少数几个和我说到没有通电、周末旅游尚未勃发的阿伦贝皮更好的嬉皮士之一：“那时一切都更自然、简单，也更平静。”当我告诉他我早在1962年就开始研究阿伦贝皮，他好生羡慕。“当时有嬉皮士吗？”他问。我说没有，我在如今所有这一切出现之前就来了，听了我的回答，他用他惯用的缓慢语调惊叹道：“你在一切都很天然的时候就来了哇。”

若奥继续缅怀起阿伦贝皮，尤其是嬉皮村一度蓬勃发展的社区精神。他又讲起原初神话，河边沙丘“太阳之屋”的故事，詹尼斯·乔普林和罗曼·波兰斯基相遇的故事，还有米克·贾格尔在英国和阿伦贝皮之间游走的故事。若奥有一次提到，阿伦贝皮曾是巴西的毒品之都，有各种各样的毒品：可卡因、大麻、印度大麻、海洛因、麦角酸二乙基酰胺 (LSD)、致幻蘑菇和其他迷幻剂。现在毒品和摇滚明星都消失不见，社区精神也萧萧然。（考古学家杰瑞对垃圾堆的发掘，证实了嬉皮士曾大量消费白兰地和卡莎萨。）若奥记得我在1973年认识的一些嬉皮士，如今大都杳无音讯。他和那些睡在斜顶棚屋里的移民没甚交往，对他们还存有戒心。他与老渔民们一起捕鱼，爱听他们的故事。他更喜欢那些真正的老船长。甚至就连已经四十七岁的托梅都不合他口味。年轻渔民知道

的传说太少。

阿伦贝皮的社区精神和慷慨之风，就像若奥看到的那样，已被利己主义和资本主义所取代。村民们和他初到时截然不同。比如说，若奥曾经的好友兼房东达利娅阿姨的丈夫都变了：“他现在最好的朋友是资本主义。他一直坐在他家房前，数着那卷 500 克鲁赛罗 [10 美元] 的账单。”

若奥抱怨说，虽然他努力去为村民做点什么，与人行善，但最终还是选择了放弃，因为他们对他的所作无动于衷。他与他们之间保持着比以前更远的距离。

他把阿尔贝托尊称为“阿尔贝托先生 [Seu]”的互动方式，对文化价值冲突颇有启发意义。我们到嬉皮村时，若奥正把从泻湖捡来的海贝和蜗牛壳串在尼龙鱼线上，制成窗帘。阿伦贝皮南部的嬉皮士告诉我们，这种悬在门口或窗户前的窗帘，能卖 150 美元。相对于简单的劳动投入来看，这一价格颇高。收好贝壳，若奥花六个小时就能做好帘子。两幅制作完成的窗帘悬在那里，一幅挂在窗前，一幅吊在屋里。

阿尔贝托看了看那些窗帘，问若奥是否要给贝壳上色。若奥说不，自然最美。阿尔贝托建议给贝壳涂上鲜红色，那样会显得更美。随后他将我拉到里屋，但仍用若奥能听到的声音说，这些就是游客们买的玩意儿（他意为垃圾）。阿尔贝托揶揄道：“你为什么不买一串，带回美国去？”

阿尔贝托对若奥的住处同样评头论足一番。在我看来，即便算不得精致，却也干净，很有嬉皮士味道。用棕榈叶编成的草垫铺在地上，边上是两张吊床。阿尔贝托觉得这个场景很荒唐。为了装点自然景象，若奥还搬进一段枯木，（难看地）横在起居室里。“那棵树还活着吗？”阿尔贝托问。他会意地冲我眨了眨眼，就像在说：除了发疯的嬉皮士，谁会将一棵死树放在起居室？若奥和阿尔贝托开始争执一些污染问题，若奥提到了海洋（明显的）污染，像黄色泡沫，阿尔贝托则（不正确地）辩说，泡沫一直都有。阿尔贝托淡化了巴西钛业硫化物污染的危险，若奥则认为巴西钛业是对桃花源的冲击。

年轻嬉皮士与老村民之间的互动，让我想到列维-斯特劳斯 (Levi-Strauss, 1967) 讨论许多社会的神话时提到的自然与文化之间的对立。这位法国结构主义人类学家指出，世界上所有地方的人们都关心，自然和制造物（人造物、文化产品）的比较。阿尔贝托和若奥的互动，就是在讨论文化与自然的价值问题，经济发展和传统保留之间的问题。阿尔贝托站在文化这边（照明、电力、马路、

汽车、旅游业、商业),认为变化使他的生活变得更好。若奥则缅怀自然、简单、原始的逝去。他保留了他所未知的传统阿伦贝皮的浪漫幻想,阿尔贝托则深刻体验到自己生活的改进。一些村民们支持阿尔贝托的观点。其他人则出人意料地站在若奥一边,保留了1973年新状况的印象。第八章会更详细地讨论人们对变迁不满的原因。

黯淡的象征

随着嬉皮士运动在全世界的消退,阿伦贝皮的嬉皮士时代也渐告终。这种亚文化在若奥、阿伦贝皮和嬉皮村的嬉皮士手艺人中尚有迹可寻。他们成为这里的永久居民,像很多村民一样,迎合旅游业的发展,制作手工艺品,经营酒吧。我们在“下街”做家户调查时,连洞彻秋毫明察社会差异的阿尔贝托,也无法分辨过来租房的新来者是不是嬉皮士。区别变得不再那么明显。与嬉皮士相熟的村民们说,他们不喜欢人们叫他们“嬉皮士”。住在阿伦贝皮的嬉皮士,更愿被当成普通村民。不仅如此,外来者如今很难辨认阿伦贝皮的嬉皮士,因为一到周末都会有各种人来村里转悠。

对今天被阿伦贝皮美丽景色、海滨风光、便利交通和旅游经济吸引而至的人们来说,嬉皮士只是一部分,而且是很小一部分原因。然而,嬉皮士有着决定性的象征意义,正是他们的到来,将当地历史一分为二。他们提供了阿伦贝皮从传统过去到现在的参考坐标。1970年以来的媒体报道,只关注嬉皮士,给予他们在村落人数和影响上不相称的关注。甚至在1980年,一个来当地采风的摄制组,也是径直开进阿伦贝皮南部一间嬉皮士酒吧。对巴西城里人来说,嬉皮士形象仍比那些农民工和有着下等酒馆的城镇的周末游客更有吸引力。一位政府官员告诉我,每当报纸和电视上出现嬉皮村摇滚音乐会、毒品交易和裸体方面的报道,就会掀起一阵狂热的激情。既然污染和嬉皮士吸引着媒体眼球,村民们被忽视自然也就合乎情理。

其他很多变化虽没那么敏感,但也影响着阿伦贝皮。接下来几章会说到更多媒体没有察觉的深远改变,其中渔业方面发生的主要转型,是当地经济与社会生活总体变迁的一部分。

第八章

不在捕鱼，就在巴西钛业上班

1980年的阿伦贝皮，当地财富增长不均的状况一眼可见。过去没有阶级的社区，已出现社会阶层。穷人愈穷，富人巨富。变化最明显的莫过于渔业。相较1960年代，渔民每天花在捕鱼上的劳动力要少得多^[1]，船主们获得的利润却比以前增长十倍。

阿伦贝皮已在世界政治经济领域确立了自己的位置，亦步亦趋地融入全球文化一体当中。连最简陋的家庭，都装上了电视天线，传递着来自大洋彼岸的信息。不久之后，国际电话网络也将延伸到阿伦贝皮。这些变化反映了整个巴西的发展趋势。全国安装电视的家户从1964年的7%增长到1979年的51% (*The Economist*, 1979)。几乎所有巴西家户都有至少一台收音机。巴西成为世界第五大通讯卫星（用于电话和电视传输）使用国。有了电力，村民可以使用电熨斗、抽水机、电冰箱和冷藏柜。当地人享受着他们自己需要的消费品。未来的考古学家在挖掘1980年的阿伦贝皮时，必然会发现几千公里外公司产销的数百种产品。

阿伦贝皮与外界的成功接轨，公路的铺设功劳最大。公路最初是由野心勃勃的地主计划修建的，目的是促进旅游发展，提高土地价值。公路因化工厂老

[1] 历史学家伯恩斯(E. Bradford Burns, 1980, pp.534—5)提到，整个巴西的穷人都有相似的体验。工人阶级即便付出更多艰辛劳动，也仅能糊口。每月维持生计(获得同样数量物资)所需的时间比率，从1965年的87小时，增长到1976年的187小时。

板的资助提前完工，与1969年到1971年间国际嬉皮士散居潮恰好同时。从那以后，来自巴伊亚州的游客大潮加入了嬉皮士的潮流，对阿伦贝皮的物价和租金上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隔离局面的终结，改变了整个阿伦贝皮的经济，在改变自然和渔业地位的同时，也带来了职业的多样化。直接面向游客销售和与批发商洽谈的便利，让那些有志向的村民代替了外来的鱼贩。

盈余的获得再投入更高昂的渔业技术，其中包括更大更贵的渔船。由于财产价值提升，船主的渔获份额也随之增长。这种财富差异增长之巨，令传统的财富平均机制失去效用。渔业中的社会关系弱化，更倾向纯经济关系；船主们变身老板，不再身兼船员。传统平等观念的存在，让阿伦贝皮人厌恶这些变化。很多村民停止捕鱼，一股移民潮填补了这一空缺。

经济变得越来越复杂，地方社会结构也是如此。阿伦贝皮现在被社会阶级、职业、街区、祖籍地和宗教划分开来。这种趋势朝着社会分化更加明显、更加复杂的方向发展。本章着重介绍最显著的经济变化。第九章和第十章将会讨论相应的社会变迁。

我在前面已经讨论过职业分化的原因。旅游业衍生出新的工作，包括建筑、餐饮、住宿和销售。附录2比较了1964年、1973年、1980年的男性工作情况。调查显示，1980年阿伦贝皮只有40%的男性从事捕鱼，而在1964年这一比率为74%。1980年最有可能位居第二的是工厂工人（17%），建筑（16%），做生意（14%）。现在有四十个阿伦贝皮人为巴西钛业工作。其中只有几个是渔民转行。大多数都是受过比上代更好教育、第一次工作的年轻人。工人们月工资介于100美元与500美元之间，比1980年的渔民收入多很多。在工厂工作也有更多额外收入，并会按时付酬，不像渔民那样收入起伏不定。

村民放弃捕鱼的原因，不单是有地面工作的新机会，还有渔业本身的巨大变化，最明显的是生产关系上发生的变化。船主和普通渔民间的鸿沟急剧拉大。虽然销售、设备和渔船开销的成本都有提升，但可以肯定的是，船主的利润提升得更高。1965年，船长兼船主获得普通渔民每日收入的230%。1973年涨到300%。1980年，这一数字是800%；船长兼船主现在获得捕获量的75%。要理解当地传统平等主义的严重分裂，需要讨论渔业出现的主要变化。村民们被其他更好的陆上机会吸引的同时，也因渔业生产和销售上的变化而与渔业渐行渐远。

更大的渔船和远距离捕鱼

过去与现在的明显差别是，船队规模缩小，渔船体积变大。1980年只有十九艘船在捕鱼（1973年有二十六艘，1965年有三十一艘）。1980年，只有一艘老式帆船还在捕鱼，装了一个小马达。剩下的都是封闭式机动船（*barcos*）而不再是无篷帆船（*saveiros*），这是一个曾在渔民口中念叨了十几年的词儿。虽然新船比老船大很多，有更大的马达和船载冷藏库，但主要区别是有了封闭船舱，挤挤能睡三个人。

1980年的大部分渔船都是1973年后买的。1980年8月一条新船光马达就超过2500美元，整船至少需要5000美元。托梅的弟弟迪尼奥现有五艘船，并刚花了一万美元买了艘更大的。这一数目远非1960年代任何一个村民所能承受。包括迪尼奥在内有四个村民拥有三艘以上渔船，堪称百万富翁（按克鲁赛罗算）。

虽然捕鱼模式现在更为固定，但1965年到1973年间的一些渔业新尝试仍在继续。少数旧时代的探索也在继续，迪尼奥买了一张鲨鱼网捕捉最近出现的红鲨。村民用一半鱼价购买这种鲨鱼肉，这种鲨鱼据说聚集在巴西钛业废水排放的海域。

1973年开始的煤气灯夜间捕鱼，现已整合为更普遍的长距离捕鱼模式：冷藏捕鱼。1973年，托梅买来第一艘有封闭船舱的大型机动船后，开始了冷藏捕鱼，这要向阿伦贝皮北部航行八到十个小时。渔船周二或周三装上货车从萨尔瓦多运来的冰块后起航。出海的三四天里，捕鱼大多使用液化气灯在晚上进行。鱼被储存在船上冷库里。渔船返回阿伦贝皮后，鱼就放入船主的冰箱、冷柜或冰窖，等着卖给当地或伊塔庞（现在只有二十分钟车程）来的批发商。大多数渔船都在周六晚上返港，为周日的社交活动做准备，并兼顾周一的休息及陆地上的义务。

1980年，船队在萨乌佩和苏波马村之间的近海水域探测水深，标记捕鱼点。这两个北部渔村都没有港湾拱卫帆船或机动船，当地流行的是小船队筏钓捕鱼。随着阿伦贝皮的捕鱼区域跨越这些水域，这里的渔民（尤其是萨乌佩的渔民）都移入阿伦贝皮。1980年，他们组成阿伦贝皮渔民的一大部分。大多数捕鱼活动仍和阿伦贝皮一样，在距巴伊亚北部海岸不到十五公里的大陆坡进行。

虽然大多数渔船都是远航捕鱼，但有两个船长兼船主仍在坚持旧时的捕鱼模式。其中一个为费南多，第六章里提到他过度饮酒、惧怕外来者、谣传别人参加坎东布雷教，并有随身带枪的习惯。费南多为1973年产生的不安感所困。他满足于一种悠闲的捕鱼模式，早晨八点半起航，傍晚五点归航。马达能让他在九十分钟内赶到大陆坡，在1960年代则要花上四到六个小时。费南多经常在海岸附近捕鱼，他在这里捕获小鱼，卖给冷藏捕鱼者们在大陆坡捕捉大鱼时作诱饵。捕来的鱼给费南多和其他两个跟他一起的普通渔民提供了食物和一些现金收入，但是他们的年捕量还不到冷藏法捕鱼的一半。阿尔贝托说费南多是“蠢法”捕鱼，虽然这样做有几十年的历史。新的捕鱼方式更高产，比1960年代年捕获量翻两倍都不止。

新模式也减少了当地海岸的压力，使阿伦贝皮附近的鱼类种群有所恢复。1980年，过去每年提供超过十万多公斤鱼类、维系一百多户渔民家庭的海岸，只有两艘小船进行日常捕捞。

机动化与合作社

熟悉阿伦贝皮历史上平等社会关系的人们会发现，比渔业模式转变更猛烈的，是鱼类收益分配与生产关系上的改变。政府贷款通过渔民合作社，为船队迅速机动化提供了条件，促使勤劳的渔民装上昂贵的马达。获得成功的渔民很快清偿贷款，退出合作社，自行卖鱼。

1973年给我留下的印象是，由于合作社的鱼价涨幅落后市场，加上阿伦贝皮的传统创业模式一直鼓励追求个人利益，合作社的日子历历可数。由于合作社一直没有充分的集体精神，因此以集体财产为目标的合作社在阿伦贝皮无法实现。只有个人相信能获得自身利益时，合作才能成功。村民希望获得贷款提高自己的生产力，购买冰块、诱饵、汽油、油漆和渔具。不过，一旦出现其他更加有利可图的选择时，人们对合作社的忠诚便不再有效。

1973年我离开这里之后，合作社的解散便如预料发生。托梅和迪尼奥放弃合作社的协议资助，去追逐个人利益后，所有成功的船长兼船主都最终退出合作社，去寻找自己的市场。

市场

1960年代开始，托梅就是阿伦贝皮最富创新精神的渔民。他第一个拥有自己的渔船，第一个买了有封闭式船舱的渔船，第一个进行冷藏捕鱼，第一个用海床图确定新捕鱼区。托梅也率先进入新市场体系。但由于一些会在第十一章讨论的原因，积聚起财富的不是托梅，而是他弟弟迪尼奥，一个同样富有创业精神的追随者。1973年末，迪尼奥不再把鱼卖给合作社或本地生意人，而是将渔获运到伊塔庞能给更高价的鱼行。迪尼奥将利润再投入第二艘（大型）渔船。随后他利用新的收入来源退出了之前也是断断续续参与的捕鱼业。迪尼奥不像托梅那样每周花四天时间到遥远的阿伦贝皮北部捕鱼，他现在可以全心经营鱼市。迪尼奥和另外两个不捕鱼船主一样，买了有封闭船舱的渔船，雇了船长带队到新的海域捕鱼。

迪尼奥将所有精力都放在渔业生产和销售上。1980年，他成为阿伦贝皮最成功的鱼类批发商和最富有的当地人。他有五艘船，还刚以相当于一万美元的价格买了最大的船。他的两层小楼（二层小楼是当地身份的新象征），一层是鱼铺。这里有阿伦贝皮唯一的冰窖，还有冷柜和冰箱（其他鱼商只有后两样）。除了自己的五艘船，迪尼奥还从其他人那里买鱼，并将当地不售的鱼运到伊塔庞。

由于伊塔庞和阿伦贝皮本地市场商机很大，鱼贩不再从萨尔瓦多赶来阿伦贝皮。但两个伊塔庞的鱼商代表，还是会在每周五和周六船队返航时来此买鱼。另外一个鱼贩从市中心过来。还有个移民将自己的小货车租给迪尼奥和其他本地鱼贩，在伊塔庞鱼行没派人来时，将鱼运到伊塔庞。

从迪尼奥的房子穿过街道，曾属合作社的地方，现在是另一家鱼铺。这间小铺里放了三台大冷柜，可以储存五艘船的渔获。这间鱼铺和迪尼奥的铺子一样，也有些规模，相关部门定期来此检查。（这是国家权力逐渐渗入村落生活的许多范例之一。）鱼还是在老港卸船。然后渔船在南面新的、更深的港口抛锚停泊。过去，鱼是摆在海滩上，由渔民和船主分配，现在则是直接运到鱼铺，放在水泥地上。与过去不同的还有：每个渔民渔获的一半（按重量计）要归船主所有。和以往均分小鱼的合作体系一同消失的，是渔船收成分成五份的传说。1980年，船主的份额几乎是渔船所获的一半。

双重收益

就像阿尔贝托解释的那样，船主现在可以得到双重收益：

第一，他拿了每个渔民一半的渔获。船长能拿到自己作为渔民的全部渔获，所以说，船长得到的是普通船员的两倍。但船主在其中还有收益，因为船长要像普通渔民一样，将鱼以每公斤 70 克鲁赛罗（1.17 美元，60 克鲁赛罗合一美元）的价钱卖给船主。船主总是以比渔民更高的价格再次出售。有时他会以每公斤 120 克鲁赛罗的价钱卖给当地购买者，有时则仅以 100 克鲁赛罗的价钱卖给伊塔庞的一家鱼行。

我们假设一半在当地一半在外地出售，船主的平均转售利润（以每公斤 110 克鲁赛罗计）便是 40 克鲁赛罗。

1980 年 8 月一次四天出海周六归来的五个船员间的分配，为我们展现了这种渔获分配上的差异。船主同时也是船长。在鱼铺称重，总获量差不多正好 200 公斤。每个渔民都确认这个数字，分别称重自己的捕捞量。称重由鱼铺一个领薪的伙计来做，称重结果记在本子上。每个渔民最后（减掉借款后）以每公斤 70 克鲁赛罗的价格得到自己渔获的一半收益。（渔民通常会找船主预支周薪，给妻子在他们不在时买吃的。）简单来算，就是包括船长兼船主在内的五个渔民，每人应获 40 公斤。但每位普通船员几近 100 小时外海辛苦劳作的回报，只能拿到 1400 克鲁赛罗（不足 25 美元）。船长兼船主在他自己的 40 公斤外还获得船员返还的 80 公斤。按每公斤均价 110 克鲁赛罗计，这 120 公斤给船长兼船主带来 13200 克鲁赛罗收入。加上这 3200 克鲁赛罗——船主付给渔民 70 克鲁赛罗而以 110 克鲁赛罗转售的差价——船长兼船主的收入总计 16400 克鲁赛罗。刨去船主开支（每次来回需要在燃料、饵料、冰块、食物和饮用水上花费 4000—6000 克鲁赛罗），剩下利润为 11000—12000 克鲁赛罗，约合 200 美元。这是普通渔民收入的八倍。两者全年累计之比为 10400 美元：1300 美元。

船只贬值及船主遇到的更大风险（没有一艘船投过保险）没有考虑在内。渔民的生计份额也没有计算在内：船员在与船主分成前可以提留三到五公斤鱼。然而，迪尼奥和其他拥有两艘或更多船的船主，比普通渔民的收益高太多。从



把鱼运到伊塔庞的货车体现了新的市场体系。照片最左面是卖给当地鱼铺的鱼类。照片中也可以看到 1980 年代新港中的船只。（杰拉尔德·米拉尼克惠允使用）

1980 年 7 月迪尼奥用一艘船一年的收益就能再买上一条一万美元的渔船来看，这一点毋庸置疑。

1960 年代，有志向的渔民可以期待靠捕鱼攒够钱买一条自己的渔船。到 1980 年，这个梦想已成镜花水月。现在购买一艘船需要花费普通渔民年收入五到十倍的价钱。1980 年 7 月，仅一艘船的维修就要花费 300 多美元，比普通渔民三个月的收入还多。

阿伦贝皮总是会有一些睿智、成功的创业者。无论何时，这群人总是能在正确的时机聚敛财富：只要进入村子的财富超过往昔，创业者的努力便能将这些增长变成固定资产。随着财富增加及传统平均机制失效，这个曾经平等的社区也开始出现个人社会经济分层，人们越来越在意自己的存在。随着财产和阶层的出现，韦伯式新教资本主义伦理，也就不再能确保渔民的成功。

分层的起因：资本和平地上的时间

1965年到1980年间阿伦贝皮的成功人士，差不多还是那些人。托梅被他弟弟迪尼奥代替，因旅游业滋生的产业也创造出一些新财富。然而，1980年最稳定的成功者还是1973年那些，甚至追溯到1965年亦是如此。大多数1980年的船主都有十多年船龄。从社会等级差异，向社会分层的转变过程如下：那些在1960年代努力工作并且智慧创新的人们都获得了丰厚的积蓄。他们在1970年代早期，都贷到了风险较低的贷款，买了机动船。机动船比帆船贵得多，船主为了弥补较大的投资（反映了高成本和使用费），在渔获分配中获得更多。船只成本和渔民收入之间的差别一直都在拉大。

随着资本（初始财富）变为维系成功的因素之一，新渔业模式强调一系列地面活动新投入，即时间的价值。迪尼奥决定退出捕鱼专做地面上的渔业生意，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他成功的关键。首先，新模式要求包括船长兼船主在内的所有渔民，每周花三到四天在海上。这仅剩下一个工作日（周一）来参与陆地上的渔业生意。一天时间显然远远不够。

阿伦贝皮的渔业，已经失去了由风力、当地自产、低消费需求和产品直接消费组成的生产自主性。阿伦贝皮的生活方式，像成百上千个第三世界的社区一样，逐渐放弃了自给自足，和我们自己的越来越像。整个捕鱼方式现在都依赖外界供给。比如，每趟出海捕鱼需要30袋冰块，总费用为35美元。船员们必须等待萨尔瓦多总是迟到、延误捕鱼的运冰货车。1980年用的大多数鱼饵，是从遥远的圣保罗运来的小虾。村民们不再抛洒港口的小鱼作鱼饵。当地撒网行家和鱼网织匠的手艺渐渐失传，没有年轻人继承。

购买一艘新船或马达可能需要来回跑几趟萨尔瓦多。无论是从银行借钱，还是政府项目，都要时间。如果某人想卖自己的鱼，需要监督称重、记录、安排到伊塔庞的运输，并要与那边鱼行维持良好关系。1980年，还有其他数不清的琐事需要船主操心。托梅向我抱怨，他身兼两艘船的船主和销售者及其中一艘的船长，从来不得好好休息。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平地上逐渐增长的需求，改变了船长兼船主过去寻常的双份职责。从经济上来说，船主也不需要付出船长那么大的投入。我们按照

之前对 200 公斤渔获的计算来看，船主雇了船长，只减少了他 17% 的收益。而船长兼船主身上的双重角色，从来都不仅是经济上的，还是社会价值上的。身兼船长的船主，每天与普通渔民打交道，同甘共苦，比不捕鱼的船主需要团结更多的忠诚。

新船员：陌生人和债务人

1980 年的一切并非那么简单。由于人们都到陌生海域捕鱼，今天大多数捕鱼活动都在大陆坡进行，船长的专长不再像以前那么有价值。昔日区分船长与普通船员的地标体系已经不再。船主和普通船员收入上的差异之巨，已难以维系船长与船员间的同侪关系。当所有人都知晓船主拿到的是普通船员每日工作的十倍，连船长都是他们的两倍多，人们还怎能掩饰彼此间的紧张？

生产关系上的另一个变化是，渔民不再有固定位置。由于船员与船长或船主间的忠诚业已消失，所以变动更多。变动的程度反映了捕鱼策略的不同，短期出海捕鱼中的船员流动率最大。我亲眼见到一些船员聚集起来在白天或通宵捕鱼。

长距离捕鱼有更稳定的船员。船主和船员数着四天一周的频率。船主们需要在冰块、鱼饵和食物这些消耗品上进行更大的投资，因此他们更需要确保捕鱼如期进行。保证船员忠诚的方法之一是预付薪酬。这种债务关系成为船主确保船员的新方法。这是生产关系从社会向经济不断转变的另一个例子。也就是说，到 1980 年，很多人捕鱼不是因为亲戚、朋友或干亲关系，而是因为欠了船主的债。

除了这些变化，1980 年的渔民还受电视上报道的法国南部渔民罢工（正好发生在我 1980 年访问期间）的吸引。“我们也受委屈”，渔民告诉我。比如，鱼价涨得不够快。虽然阿伦贝皮人同情法国罢工，但他们仍旧无法理解那些渔民怎么能在罢工的日子里生存下来。“他们一定有某种保险，”一个村民推测说，“阿伦贝皮可没这种东西。”

另一种委屈便是长距离捕鱼途中的生活条件。“成年人需要在嘈杂的马达旁挤作一堆睡觉。船舱里只能容下三人，另外一两人不得不坐在外面。有时很

冷，尤其是有风时。”渔民还要面对遥远水域突如其来的风暴。虽然船主不直接承担这一风险，但他们还是会担心自己的投资。

1980年8月一个满月之夜，阿伦贝皮在周期的满潮中，遇上一场不期而遇的风暴，这是我所见过的最可怕的风暴。大多数船只都在8月29日晚上回港，但还有一些船只在外。咆哮的巨浪将巴西钛业排出的废物推到岸边。黄色的海洋汹涌澎湃，使船只进港之路步步惊心。一位渔民告诉我：“在这样的天气里，冰冷的海浪就像在扇你的脸。”

阿尔贝托说：“有些人还在海上，我觉得，要是他们的马达坏了，必死无疑。”

阿尔贝托的侄子在他的长廊上站了好几个小时，想要看到他的渔船，这是他第一次让没经验的船长驾船出海。这个年轻人刚从萨尔瓦多的银行借钱买了新马达。他还没有开始获得收益，也像所有阿伦贝皮人一样没有保险，面临着失去生活所依的危险。（渔船最后安然回港。）

从同伴到利用

阿伦贝皮的渔业从社会关系向经济关系的转变，在1973年已有雏形，而后迅速发展。转型从开始到完结，捕鱼成为一种商业活动，（通常不是渔民的）船主取得渔民大半劳动成果。渔民不再是独立生产者，而是变为雇工。他们厌恶船长和船主，彼此之间缺乏信任。现在渔民不再像1973年那会儿一起加入合作体系，而是自己单独计算捕鱼量。每个船员都有自己的标记，有的在鱼尾上划一刀，有的两边划刀，有的划头上，还有的在腮上划一下或两下。传言说，有的渔民在鱼脖子或尾巴上多划一下，弄成好像他们自己的，偷取了别人的捕获。这会影晌返回陆上的收益，因为称重由个人分开进行。

渔获的分类和称重移到里面，从公共领域（海滩）移到私人空间（陆上商人们的棚屋和鱼铺）。随着渔船在不同时间往返，1960年代的日常公共仪式消失了。村民们不再在渔船傍晚返航时聚到海滩问候，看着渔民卸船，议论要卖掉多少，留多少给家人，多少分给边上贫困的围观者。村里的穷人今天仍会乞讨，但却是相互诅咒或视而不见，且很少能讨到鱼。

不断有人告诉我，1980年阿伦贝皮的大多数渔民都是移民，主要来自北部滨海村庄萨乌佩。我们之前提到，萨乌佩没有好的港湾，唯一的捕鱼工具就是小筏子。随着阿伦贝皮的捕鱼范围扩大到从萨乌佩开始的大陆坡，这些北方人开始移入阿伦贝皮；从阿伦贝皮开船到他们自己的渔场，能比以前捕更多的鱼，增加更多收入。萨乌佩不如阿伦贝皮这样的市镇，它的传统渔业经济不那么商业化。萨乌佩人愿意拿比阿伦贝皮人少的薪水工作，因为他们的收入还是比回家干活高。

阿伦贝皮人在哪里？

只要移民不断到来并接受低工资，新的生产关系便可维持下去。但有一件事没有改变：没有渔民，船主就无法从渔业中获益，而村民们则一致认为，阿伦贝皮人正在抛弃捕鱼转向其他工作。1980年的本地渔民人数（57），还不到1964年的一半。^[2]

很多村民觉得，这股潮流是因为渔民们去为巴西钛业工作，但数据显示并非如此。附录4列出了1973年一百零五名男性渔民^[3]在1980年时的职业情况。这些人中只有八个在巴西钛业上班。^[4]

当然，阿伦贝皮经济转型的一个方面是，有更多当地青年（虽然大多不是渔民）在为工厂工作（1980年17%，1973年11%，1964年2%）。1980年，为

[2] 渔民（包括船长）总数从1964年的一百二十八人缩减到1980年的九十人，充任十九艘经常出海的渔船（每艘船五名船员）。

[3] 1973年有一百一十三名渔民在阿伦贝皮捕鱼；这一百零五人住在阿伦贝皮和卡拉努阿斯。其他人来自附近村落，包括西面的农村。

[4] 这和过去形成鲜明对比，过去渔民没有退休金，需靠亲属和投资收益为生，1980年时1973年的渔民有13%有政府退休金。这些相当于每月40美元的收入，在领取年限下降后，更受欢迎。渔民们还可以依靠配偶退休前缴纳的社保金收入（但不是人人都有）。

1973年的渔民中，有十二个（19%）去世、搬走、酗酒或无法工作。七十一个仍在劳作的人中，五十一人（72%）仍在捕鱼，七人从事商业，八人在巴西钛业上班。其余五人从事其他行业。（此处数据与附录4有出入，请读者对照阅读。——译注）

和过去相比，差异明显。工作的人中，换工作的情况，1973年到1980年间高于1964年到1973年间。1973年的渔民除了过世和退休的，到1980年还在捕鱼的不足一半。

巴西钛业工作的四十个阿伦贝皮人中 80% 都是当地人。这与渔业形成鲜明对比，渔业只有 63% 的当地人。大多数巴西钛业工人都不到三十岁。当然，其中有些人也曾捕过鱼。但是大多数人都在阿伦贝皮或外地选择捕鱼以外的工作。巴西钛业工人中，有渔民家庭背景的人少于没有渔民背景的。

新秩序的基础

我们现在可以从更大的背景上（阿伦贝皮的普遍经济转型、逐渐增长的移民人口，以及越发明显的异质性），考察渔业从社会关系到经济关系这一巨大转变。1960 年代船员们建立在亲属关系基础上紧密的社会关系已随风而去。1980 年船员有近亲关系的船只有四条，1960 年代则至少超过二十条。过去在一条船上挨一个坐着捕鱼的村民们，现在则在工厂、建筑业、商业和旅游业各自不同的地方工作。船员中新移民所占的比例越来越高，地方社会联系则在减弱。移民也没那么多时间经营社会关系，因为他们每周有四天待在上海。移民之间仍是陌生人，聚到一起只是为了周末一同喝酒。相反，外来者厌恶其他村民，特别是那些剥削其劳动力的不捕鱼的当地人。船员间普遍不信任的关系在村里也一样。

这些变化还降低了渔民协会的重要性。聚会次数减少，1980 年的主席候选人都是不捕鱼的村民。船只不再成为一个整体。每个渔民都支付 200 克鲁赛罗（不到 5 美元）举办二月份的圣弗朗西斯节。村民们惋惜道，这个节日如今主要是为旅游业而办。“庆典以前是渔民的事情。现在则是办给外面人看。”商人现在在渔民协会和节日组织上扮演主要角色。当然，他们从中也获取了更大的利益。

因此，1980 年，渔业技术成本的增加和人性的贪婪，滋长了船主的渔业利润收益。更高产的渔获也提升了利润。每艘船的年捕量从 1965 年的 3500 公斤增长到 1973 年的 5500 公斤，再到 1980 年的 9000 公斤，这要拜长距离捕鱼所赐。1965 年，一艘装备齐全的帆船的成本，相当于 400 公斤鱼的卖价。1980 年这艘机动化的庞然大物，相当于 5400 公斤鱼的卖价。然而，最令人瞩目的是，船主和普通渔民在年捕量分成上的对比：船主每年获得 6750 公斤，普通渔民仅



拿着钱包的人是三条船的船主，他正在查看、帮助渔船卸货，渔船刚刚出海四天捕鱼归来。（杰拉尔德·米拉尼克惠允使用）

有 500 公斤，而在 1965 年他们则分获 850 公斤和 600 公斤。

阿伦贝皮 1973 年到 1980 年间的历史，是巴西同时期普遍发展的地方版本。人们幸运地在经济奇迹甫一出现时便享受了繁荣的恩泽。然而，阿伦贝皮乃至整个巴西最穷困的人们，在实际收益增加了几年后才突然发现，自己在很多方面都要比 1968 年时还糟糕。1980 年，阿伦贝皮普通渔民出售的鱼比 1965 年还少（500 公斤：600 公斤）^[5]，船主的份额却增长了八倍。所以看到阿伦贝皮人将捕鱼让给外来人做，并不让人奇怪。看到那些过去否认贫富差异的人们，现在人手一个钱包，称呼对方百万富翁，同样不让人奇怪。

如果化工污染继续威胁鱼类供给，就会发生更糟的事情：它所影响的不仅是阿伦贝皮的穷人，同样会影响那些暴发户。渔民们说，阿伦贝皮传统捕鱼点的鱼没以前多了。过去占年捕量一半的马眼鲢，1980 年已降到正常水平之下。

[5] 虽然渔民个人的生产力从 1965 年的 850 公斤，提高到 1980 年的 1450 公斤，但 1980 年的人均出售量却低于 1965 年。1980 年九十个渔民的产量高于 1964 年的一百二十七人。他们每年生产 13 万公斤，而当年三十艘渔船近海捕鱼，每年为 10.8 万公斤。

村民们辩称更远的海岸能比传统捕鱼点捕到更多的鱼。船队的年捕量从1965年的10.8万公斤增长到1980年的13万公斤，证实了这点。

一些渔民责怪巴西钛业导致鱼类产量下降。一个船长在与一个巴西钛业熟练油漆工的争论中谴责巴西钛业正在毁掉当地渔业。他见到死鱼，认为是污染使鱼减少。巴西钛业工人用其他渔民的观察反驳说：鲭鱼现在聚集在巴西钛业管道出口附近，显然说明它们以废料为食。“难道说鲭鱼现在的捕获量没以前更好吗？”他问道。其他人则说（覆盖硫黄的）黄海龟和红鲈似乎也很享受硫黄味的食物。

我咨询了一些萨尔瓦多的专家，他们说巴西钛业排放的硫酸在海里蔓延两公里半，离阿伦贝皮南部只有三公里远，肯定影响了北面 and 南面的大西洋海域。黄色泡沫漂浮在阿伦贝皮附近海面上，离岸几公里远都能看见。这可能也影响到萨乌佩那么远地方的产量。一位海洋生物学家将近来一系列海鸥之死归因于巴西钛业污染，认为污染影响马上就会反映在鱼类上。阿伦贝皮人只是抱怨产量减少，而没有意识到捕获的鱼类已经畸形。

海洋污染问题没有1973年的泻湖丑闻传得那么快，因为海洋更宽广，对她的毁坏作用需要更长时间才会显现。然而，很多游客还是会说在阿伦贝皮游泳不卫生。鱼类和吃鱼人受到污染的证据终会浮现。巴西钛业污染可能会在渔业模式转型上产生影响，一如这个工厂给村民提供工作，改变了地方经济。比起1973年“不管阿伦贝皮死活”的巴西钛业，它在1980年代及之后的时光，已经更加致力于改善自己的地方形象。

在巴西钛业上班

离阿伦贝皮五公里远的巴西钛业，是一家生产二氧化钛的工厂，它在1980年雇佣了四十个阿伦贝皮人，为中学毕业的年轻人提供了收入较高的工作。工厂工作力压商业和建筑业，排在捕鱼之后，成为第二个最受男性欢迎的职业。大多数在巴西钛业工作的村民做的都是没有技术含量的工作：厨工，园艺，打扫和清洁。工厂公关部主任告诉我，巴西钛业会优先聘用当地人做这种下层工作。大多数技工都是从萨尔瓦多坐汽车来工厂上班。

公关主任还告诉我，他从1974年起就和阿布朗提斯镇上（该地到巴西钛业和阿伦贝皮的距离一样远）一名德国神父合作。他俩的目标是想给当地小孩提供更好的教育，使他们将来能拿到薪水更高的工作。公关主任抱怨说，从城里来的八百名技工成本很高，每天有十八辆巴士接送，从早晨八点到下午四点。公司的一个减少油耗和巴士费用的计划，是要在阿布朗提斯附近建一座有四百套两到三人间住房的新村。在那里购房的工人，会得到巴西钛业的资助。这样做的目的是使技工们离工厂更近。

巴西钛业的名声从1973年起有所改进，主要原因是它给附近村落提供的服务。就像之前提到的，工厂与神父合作来提高阿布朗提斯（即他教区）的教育质量。虽然阿布朗提斯的教育质量确有提升，现在有师资充沛的中学，但某些科目，如物理课，只在阿布朗提斯教授。巴西钛业每周两次用巴士把一百多个孩子，从阿伦贝皮村送到阿布朗提斯上物理课。

工厂还提供其他一些服务。虽然阿伦贝皮现在有自己的医药站，一位萨尔瓦多来的医生每周都会在这里待上两天，但村民更喜欢选择巴西钛业的医疗。工厂每个工作日早晨有两个医生值班，下午有一个。专业护士换班工作，从下午四点到午夜或从午夜到上午八点。巴西钛业的医生不仅给工厂员工看病，也兼及村民。理论上，巴西钛业诊所是急救性质的，但实际上人们日常有点小病也都会去那里。有医疗急救时，工厂货车会将医生送到附近村庄出诊，并有一辆救护车能将人送到萨尔瓦多的医院。

1980年，阿伦贝皮尚无电话业务，但不久便亦出现。公路拐角和通向巴西钛业的转弯处都立着投币电话机。电话坏了的时候，人们可以在工厂（免费）给城里打电话，甚至是长途。水污染问题敏感时期，巴西钛业在大门口安装了一个水龙头，人们可以随意获取由国家卫生部门认证达到直接饮用标准的水。公关人员向我解释说，泻湖污染问题通过废物处理、排向大海的方式得到解决。排污管延伸到海里五里远，深达三十米。他将目前的海水污染问题轻描淡写一番后又告诉我，公司正计划“一劳永逸”地解决海洋污染，他们将用油轮把废物运到二三十里远处的外海。

社区服务宣传是巴西钛业改善自身形象的主要方式。人们可以参观工厂，我觉得公关人员对我的访谈非常配合。工厂本身是个独立王国，由武装警卫保护。要进入工厂，需用护照或身份证抵押。阿伦贝皮人提醒我要穿长裤，厂里

不许穿短裤和阿伦贝皮人的日常休闲装。一进工厂，我便被厂房吸引。花园让工厂里看起来很不错。连银行业务都可以在里面办理。路过餐厅，身穿白衬衫别着领结的服务生在分发西瓜、煎鱼和大份的米饭。精美的碟子、花瓶和干净的桌布，共同营造出一种愉悦的氛围。接下来是活动室，工人们可以在这里打台球；一些男人在外面桌上下棋。在这个舒适的环境里，没有硫黄渣也没有工作危害；它们属于另一个星球。我路过的是工人們的休息区。

阿伦贝皮人杰米，是1960年代人类学调查队的老朋友，1964年我第一次遇见他时还只是个八岁大的小男孩，如今已经成家，并且是巴西钛业工厂的半熟练（三级）技工。杰米的母亲在他两岁时去世，而后他父亲续弦，把杰米和他弟弟交给一位年老的姑婆照顾。1963年指导过哥伦比亚大学巴西田野调查队的人类学家卡尔·威瑟斯（Carl Withers），发现杰米聪明又可爱。他知道杰米离开外界支持很难获得良好教育，遂多年来一直给杰米寄钱，供他在萨尔瓦多上学读书。

1980年的旅程，让我有机会看到卡尔的资助结果。杰米已经中学毕业，并在巴西钛业谋得一职，每月拿到300多美元的薪水，如果加班还有双薪。杰米已在巴西钛业工作五年，1979年成家（依法并举行了宗教婚礼），有一个刚满月的儿子。

杰米因为受过良好教育，也就不必从初级工做起。大多数阿伦贝皮人都是初级工人，从事没有技术含量的看护工作。然而，即使是初级工（每月115—150美元），也是最低工资的两倍。二级工，也就是杰米开始做的等级，每月薪水215美元。最高级别（四级）、技术最全面的技工每月500美元。一些员工从事危险工作期间还有特殊津贴，并且工资指数每年还会以1%—3%上涨。

杰米对自己的工作性质既没不满也没那么满意。他像阿伦贝皮其他四十个巴西钛业工人一样，每天乘坐从工厂发出的货车上班。他通常上日班，有时为了得到双倍收入也会选择上夜班。巴西钛业的员工福利体现在他的生活方式中。公司提供的丰富午餐助长了他的腰身。他在卡拉努阿斯（和1973年比，如今已是颇具规模的社区）的新砖房配备了冰箱、黑白电视、煤气炉和浴室。房子的管道系统还没通水，他的水井马上就要竣工。在我走访他家时，他那位穿着人时的妻子正在用电熨斗在垫板上熨衣服——过去的阿伦贝皮可是从来没有这些新东西，那时妇女们都是在桌面上用烧炭的熨斗熨衣物。

杰米变成投资人和消费者。他买了一些地，下一步计划买车，他向我打听某些车型的价格。他知道一部二手大众甲壳虫车差不多 1500 美元。他花了 250 美元买了台冰箱，又花了 125 美元买了台电视机。杰米没有最高产的船主挣得多，但是他的工作也不用冒船长们那么大的风险。杰米的薪水很有规律，不受波动影响。他的额外福利包括丰厚的退休金、丧偶和子女补助，以及伤残保险。杰米的收入也不需要扣税。他解释说：“阿伦贝皮人都不用缴税，人们挣的都不到交税标准。”（他对这点的认识有误，不过村民确实都没缴税。）虽然所得税直接从杰米的工资里扣除，但他可以到萨尔瓦多申请退税，因为他的工资在纳税标准之下。杰米认为所有人都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拿回税款，在他眼里，收税是件可有可无的事。

像其他村民一样，杰米对外部世界的了解比以前多了很多。他向我问起波兰罢工情况，还有 1980 年美国总统选举。他一直关注圣保罗的罢工新闻，但却认为巴西钛业和萨尔瓦多地区没有工会活动，也没有严重不满。杰米像许多其他村民一样，正走向工人阶级上层。他的生活方式与多数普通渔民形成鲜明对比。阿伦贝皮人觉得在巴西钛业工作，和 1960 年代在国家石油公司一样，是生活的提高。

有个周日下午，两位村民，一个是船长兼船主，一个是巴西钛业技工，让我评评他们是在巴西钛业好还是捕鱼更好时，更明显地展现了这一点。

巴西钛业工人佩德罗说：“我很骄傲自己的工作比父亲的好，我希望自己受到比父亲更好的教育，就像当初我爸爸想比他父亲更好一样。难道你不想让自己的孩子比你做得更好？”

船长兼船主瓦尔特针锋相对：“可能你在巴西钛业做得很好，但这对阿伦贝皮来说并不好。鱼都走了，鱼都死了。”

佩德罗说，捕鱼总有一天会在阿伦贝皮消失，因为新经济形式更好。他说自己的爷爷曾是个渔民，但他祖父会为佩德罗现在的进步而骄傲。“捕鱼不是技术活，所有人都会捕鱼。”

瓦尔特则捍卫自己的工作，他问佩德罗：“这张执照可以表明我是一位专业渔民，你有这种卡吗？”

为了捍卫自己的捕鱼职业，瓦尔特还多喝了几瓶酒，他坚持自己工作的价值所在。“明天我就带你出船，看看你会不会捕鱼。我们击掌为定。”

他们没有击掌，虽然这场争论以平局告终，但佩德罗显然并不太服气，并说自己不反对捕鱼（这是他一些好朋友的工作）……

巴西钛业确实影响了人们的行为、生活方式、价值观和对阿伦贝皮的各种看法。村民们（不仅仅是那些工厂雇工）依靠工厂服务和工作。阿伦贝皮人每天早晨卖早餐给从萨尔瓦多来的工人们，他们在酒吧和餐馆里招待那些巴西钛业工人，有的还租船去给巴西钛业在海床上铺设管道。

虽然巴西钛业恢复了泻湖，远离了污染丑闻，但旅游业和渔业这两个当地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在污染面前还很脆弱。这也影响到阿伦贝皮人和其他巴伊亚人的健康：从海滨小村的居民，到萨尔瓦多雅致的海鲜餐厅（那里的鱼都是从阿伦贝皮及附近海岸捕捞的）。

巴西钛业填补了国家石油公司停止招募阿伦贝皮人（由于缺乏中等教育）后留下的空缺。不仅如此，巴西钛业还提高了当地村民的教育水平，在附近开发储备了低成本劳动力资源。但当我听到杰米谈到电视和大众汽车时，我在想，如果已故的卡尔·威瑟斯看到自己在杰米身上的投入结出的果实：一个生活自得、饮食无忧、和美国人消费品口味别无二致的工人时，会有几多感慨。杰米的故事可能是本书中较令人愉快的章节，但这也一定程度上体现出阿伦贝皮对外部力量的依赖性，以及文化多样性的迅速销蚀。税收、政府表格、退休金和全国工资指数，所有这一切都是国家力量在当地生活中日趋明显的体现。巴西国家的影响，尤其是对阿伦贝皮公共卫生和家庭生活方面的影响，将是第九章的主题。

第九章

政府的网络

1960年代和1980年代最鲜明的对比，就是阿伦贝皮人对外来公共部门和机构的逐渐熟悉。这反映出整个国家在交通运输和通讯上的进步，以及政府在卫生、教育和福利上的投入。随着阿伦贝皮与萨尔瓦多的交通改善，当地人可以利用更多新的国家项目。政府在村民生活中起到的作用越来越大。各种进步从行政中心流向乡间。如今在阿伦贝皮和卡马萨里之间开通了巴士线路，一个本地人用他的皮卡来回收费驳客。十多个村民会到地方中心领取每月退休金，平均每个退休渔民能领到40美元。

福利和教育

能够领取退休金的年限从六十五岁降到六十岁。能拿政府退休金是很多男人（一百零五个渔民中的十四个）放弃捕鱼的主因之一。1960年代，约有10%的阿伦贝皮渔民超过七十岁，另有31%超过六十岁。新捕鱼模式的专项税收有利于老人。退休金使他们能够选择一种更闲适的生活方式。

妇女们同样能领取政府补贴，一些是渔民的寡妻，其他的包括退休的从事商业的妇女。将来还有很多人也会如此。比如说，阿尔贝托的妻子卡罗琳娜和她两个在父母店铺工作的成年女儿，每人每月挣10美元，能保证获得社保和退

休金。大多数本地商人也是如此。工厂提供的更高福利，之前已经提到。

村民们因为各种原因而赶往卡马萨里。自我 1960 年代访问以来，这个城镇发展巨大。石化工厂在市郊兴起。工厂将石油转变成聚氨酯一类的产品。一些男人从阿伦贝皮坐通勤车（一小时路程）去石化厂上班。卡马萨里现在有几条双车道，两家超市，一座商贸中心和几间药店、诊所、化验室和其他医护服务点。城市统计局主任告诉我，全国人口普查计划在 1980 年 9 月开始。我问他能不能将阿伦贝皮的调查结果给我。“当然可以，或者也可以这样，记下我的号码，来年给我电话。我会在电话里告诉你想要的信息。”这让我想起这个 1960 年代还一无所有的城镇，我几乎无法想象自己会在安阿伯尔的办公室里给巴西卡马萨里打长途。^[1]

卡马萨里也开设了十多家律师事务所，这表明诉讼增加，扩及阿伦贝皮。比如，我们以前的厨娘朵拉就和我一起到卡马萨里见律师，帮她起诉前邻居。这个案子的起因是，朵拉决定拆掉自己以前在阿伦贝皮北部的旧泥屋，在这块从地主手里租来的土地上盖座砖房。就在动工之前，她房子前面的男人建了幢砖房，并用篱笆将她的宅基围起来，声称这也是他的财产。为了避免她的亲戚和邻居家庭发生争执（他们在当地都有很大一家子），朵拉将案子起诉到法院，而这一勇气之举，很可能也是她缺乏法律经验并最终败诉的原因。

现今很多阿伦贝皮人都要为自己的商店、酒吧和餐厅给政府缴纳执照费用。这是与 1960 年代的又一反差，当时只有两家最大的店铺缴金。市政官员检查重量和度量，还有固定邮政服务。现在街道已有正式名称、路标和门牌。这些名称来自村里拥有某些土地所有权的地主的名字。连下街的居民也抛弃了传统名称，改用一个缘自地主的新名称。

阿伦贝皮人本身也从更细微、更具体的角度产生了对民族国家的认同。在法律文件中使用全名，对村人的姓氏更为熟悉。大多数成年人都有身份证。阿尔贝托一家人，包括他十二岁的女儿，也在离开阿伦贝皮时随身携带身份证。人们可能会因没带身份证而被拘留。

另一个新情况是，有许多阿伦贝皮人参军。中学毕业后，很多当地男生都投身军旅，加入陆军、空军或海军。（理论上讲，每个健康的巴西青年男性都要

[1] 感谢卡马萨里统计局主任 Nelson Pinheiro 惠寄 1980 年统计报告。



民族国家渗入阿伦贝皮的一个例子就是渔船登记。(杰拉尔德·米拉尼克惠允使用)

服兵役。)除了高于小学的教育水平,军队服役的经历和材料,能帮他们在巴西钛业或是其他外面的机构找到工作。第八章提到的巴西钛业工人杰米,就曾在中学毕业后参军。这两段经历帮助他在巴西钛业获得了一份半熟练工的工作。

国家和市政当局共同促进了阿伦贝皮的教育机会。这反映在1971年《基础教育改革法》补充条例中,条例中规定了八年义务教育(小学和初中)。新法律也规定了普通教育的核心课程,包括从五年级到八年级开设实践课程,决定职业方向。职业教育是教育改革的主要目标。阿伦贝皮的新初中和两座小学总共有五位合格教师:两个本地人和三个外来者。其中两位是州聘的,两位是市聘的。1980年代的教室与1960年代大有不同。过去,孩子们是在只有一间教室的拥挤学校里进进出出,只有一个受过三年级教育的本地妇女随意授课。

1980年开始,上学成为一件更加严肃、需要花钱的事情。孩子们现在身穿校服,要交学费,要买课本和文具。他们将注意力放在教室里,接受训练有素的老师的指导。初中后的教育还远离大多数村民的视野。只有一个本地人,通过艰难的“入学”考试(这项考试在整个巴伊亚州通过率只有10%),大学毕业。

公共卫生

卫生服务也有所改进，但还不够。除了巴西钛业诊所，1978年由农村基金(Fundo Rural)资助设立的一个当地医疗站，负责渔民的社会公益事务。两个护士在站点全天工作。农村基金聘请一位萨尔瓦多的医生每周在阿伦贝皮坐诊两天。阿伦贝皮人更偏爱巴西钛业诊所，他们抱怨这个医生，说他无助于村民健康问题，只知道开药方。遇到急诊，村民还得去巴西钛业或市里医院。虽然医疗站可以免费领取一些药品，但阿伦贝皮仍缺一间药房。阿司匹林和其他简单药剂可以在当地商店买到。很多药方仍要坐车到伊塔庞的药房去配。

尿液、血液和粪便要送到卡马萨里的化验室检验。医生根据化验结果开方，当地常见的主要卫生问题还是寄生虫。医疗站护士长认为，当地小孩大都患有寄生虫，主要是孩子们在泻湖玩耍受到二次感染引起。护士也提到痢疾、麻疹、血吸虫病等卫生问题。随着巴西钛业对泻湖的污染停止，螺蛳重现。伴随而来的又有很多血吸虫病患。1980年当地的血吸虫病发病率，比1960年代还要高。

常识和习惯上的许多变化，提高了当地公共卫生水平，但问题仍然存在。始终绵绵不绝的污染丑闻，更加引起人们对泻湖的关注。很多村民从村中的深井里打水，用电泵抽水。其他人选择鱼湖村的井水（远离海洋和泻湖），或是从巴西钛业的水龙头中取水。很少有居民会冒险饮用泻湖水，但很多人会回到以前的浴场。其他人继续远离泻湖，他们在自己家里修建淋浴，用井水洗澡洗盘子。比如说，阿尔贝托照看对街的消夏别墅，就用房子的井水洗澡、洗盘子甚至冲厕所。其他像阿尔贝托一样在海边建房的村民，需靠其他人家里的井水。这些海景房坐落在砂岩上，地基太硬不能挖井。这些村民希望市政当局能在中心广场修建公共取水口。

环境卫生问题依然存在。市政局雇了四个男人做村庄保洁，但很多丢弃的垃圾还是按传统方式交由动物和潮汐处理。秃鹰会吃海滩上的鱼内脏。海浪会卷走村民们扔在海滩上的垃圾。厕所数量远远超过化粪池数量。阿尔贝托的厕所只是将废物排到海滩，每月两次的满潮则会将废物堆到他家房基下面。

没有厕所的村民依旧在泻湖边的树丛里解手，但是，建筑业的兴起清理了很多受人欢迎的灌木丛。于是，礁石变成另一个解手地点。一天杰瑞看见一个男

孩在阿尔贝托房子附近的暗礁大便，接着用石头擦屁股。几分钟后，一个男人拿着盆子走过来，在同一个地方用海水洗盘子。这些公共卫生方面的不良行为，是寄生虫、痢疾和营养不良并发症在阿伦贝皮继续流行的原因。

不过，人们也在与某些疾病的斗争上取得了进步。政府资助开展用灭蚊喷雾控制疟疾。1980年8月我们来的时候，媒体正在劝告全巴西的父母给孩子口服第二剂小儿麻痹症疫苗。医护人士纷纷带着疫苗下乡，取得这次战役的成功。

虽然阿伦贝皮缺少全面产前监护和生育医疗监督，但分娩的风险比1960年代降低很多。当时大多数分娩都由两个当地自学成才的接生婆帮助完成。贝蒂在1964年的一次分娩中在场。那次是一场难产，生产的母亲费力数小时。在她忍受阵阵宫缩时，整个房间都弥漫着接生婆烟管中的烟雾。接生婆以为即将临盆，便用酒精擦手，发现只是虚惊，又拿起烟管。结果等到婴儿出生时，却没有了酒精。

现在的情况更加卫生，更加规范。1980年，政府所在地阿布朗提斯可以进行盆腔检查，但妇女们只有在妊娠出现危险时才去。大多数妇女从未进行过盆腔检查，因为她们害怕。两个本地接生婆，有一个还在帮人生产，另一个1975年退休。现在大多数妇女都是去前往萨尔瓦多路上不到二十分钟的妇产中心分娩。村民们唯一的抱怨是，妇产中心一般都做外阴切开手术帮助分娩，这令阿伦贝皮人很是不解。

1980年，阿伦贝皮人定期去外面很多其他相关卫生机构。他们到伊塔庞最近的牙医那里拔牙，但那里没有牙科预防保健，也不能补牙。现在就连贫穷的村民也开始给小孩买多维糖浆。这有助于克服前面提到的1960年代的营养不良。抗生素的使用也在增加（如果1960年代就投入使用，可以拯救很多人的性命）。避免使用泻湖水，带来其他卫生方面的好处。大多数母亲现在都用母乳哺育婴儿。奶瓶和奶粉用得比以前少。戴眼镜的村民数量令我吃惊，这些眼镜多在萨尔瓦多验光、配制。新政府项目和其他发展项目，使村民能在市医院里得到专业照料。其中有些村民还在萨尔瓦多治疗过精神问题。

医护意识的增长，是阿伦贝皮与外部联系日趋紧密的另一方面。一位妇女告诉我，她父亲死于心脏病，母亲死于肺水肿。村民们在1960年代绝不会用这些专业术语，当时的人们也不会知道自己亲戚的死因。阿尔贝托的父亲是个七十岁的老人，1965年的一个早晨他在海边运渔具时猝死。村民们怀疑是心

脏病引发，但没有验尸，因为最近的医生在萨尔瓦多，当时离这里三小时路程。阿尔贝托的母亲虽与他父亲依法成婚，但因缺乏死亡证明，最终也未能拿到自己应得的孀居抚恤金。

除了新的诊疗手段，还有新的死亡原因。交通事故和周末酗酒滋事，让阿伦贝皮像所有“文明”世界一样，深罹安全隐患。1962年给我整理房间的一个妇女，是后来两名被道路施工车碾轧身亡的村民之一。交通事故也影响到儿童照顾。先前，小孩子都由稍大的孩子照料，因为阿伦贝皮很少有危险。1980年的一天，我听到一个渔民向一对嬉皮士吼道，他们应该好好看着他们蹒跚学步的小孩，当时那个小孩正在车辆进入阿伦贝皮的路口乱走。陌生的人和陌生的机器，使得照看小孩也越来越难。

从1960年开始，生育控制方法一直没变。已有四个村里妇女做过输卵管结扎手术。其中一个分娩过二十次养活十二个小孩，包括四对双胞胎。一个三十岁妇女有五个孩子，第五个孩子出生后，她要求进行输卵管结扎（可在妇产中心完成）。医生试图劝阻她，说她还年轻，以后有天可能会后悔自己没生一大家子。

医疗站医生曾开过避孕药。在国家公开宣传这种药片的危害后，他像其他很多医生一样，开始停止开药。他提醒一位妇女说，这种药丸可能会导致她静脉曲张。这个妇女四十二岁，怀过十六次孕，刚出生的女儿比她最小的孙女还小一岁，她希望马上绝经，在她看来这是最好的避孕法。另一个妇女听说有种男性避孕药，但她怀疑当地男人会不会吃。收音机广播也不鼓励避孕：“别吃药”，国家首席播音员用浑厚的男声说道，“我想要我的孩子活着来到这世上。”

既然无法更人性化地控制生育，一些村民便采取极端措施。1980年刚到村里不久，我向村民询问一个老朋友的情况，她差不多三十奔四样子，但村民告诉我她已不在。这个可怜的女人嫁给一个酒鬼，她发现自己怀孕后一直想通过酗酒打掉。后来她确实流产了，但却因此身患重病。她一直没有痊愈，几个月后便去世了。

除了这些不幸的例子，这里总体还是在向卫生改善、生育下降和儿童夭折率降低的趋势发展。移民给阿伦贝皮带来快速人口增长，不到二十年时间人口翻了一倍。逐渐增加的政府影响和移民，改变了人们过去基于亲属和婚姻基础上的关系。

婚姻和国家

1960年代到1980年代之间，阿伦贝皮的婚姻方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些变化的主要原因是，阿伦贝皮逐渐进入包括国家社会福利计划在内的外部体系。与1960年代相比，当时村里几乎一半（47.3%）婚姻都得到正式认证（由州政府或教堂认可，通常两者兼备），而在1980年只有少数（34.8%）是法律婚姻（见附录5）。一些村民告诉我，法定婚姻在下降；令人称奇的是，这发生在人们前往州政府和教堂的交通更方便，距市中心政府官员和神父所在地仅有几分钟路程的时候。一个女人回忆起，婚礼举行得越来越少，近两三年内当地人只举办过三场婚礼。阿尔贝托大女儿的未婚夫（*noivo*）伊万，说他没有计划举行法定婚姻。他觉得法定婚姻没有任何意义，只是给“老年人”准备的。他说：“如今的年轻人都是通过习惯法约定终生 [*amaziado*]。”

法定婚姻减少有几个原因。最明显的原因是，政府关于抚恤金的新规定使人们不想结婚，因为夫妻双方不能同时获取两份退休金。比如说，阿尔贝托作为一个退休渔民有权获得“农村基金”的补助。他的习惯法婚姻妻子卡罗琳娜每月给国家社会保障部（INPS），即国家社保基金交钱。她希望能从六十岁开始拿社保金。阿尔贝托不清楚，如果他和卡罗琳娜依法结婚（他们并无计划）是否都能拿到退休金。他觉得，因为他们参加的是不同的政府项目，所以都可以拿到。其他村民则肯定地说，寡妇不能既拿自己的社保金，又继承丈夫的农村基金。我的报道人也认为，两个配偶也无法同时从国家社会保障部拿到社保金。

村民显然无法控制国家福利法。他们也不确定正式婚姻衍生的法律细节。正因如此，政府规定（就村民们的理解而言）反而强化了传统模式。习惯法婚姻在阿伦贝皮很常见。虽然这种生活方式缺少正式婚姻的权益，但也没有特别不受重视。习惯法婚姻现在反而能保证双方领到退休金。由于妇女在变迁经济中的参与日增，这种考虑越来越多。很多妇女不满于渔民遗孀抚恤金，想要让自己以商铺、餐馆及酒吧老板和管理者的身份获得（更高的）社保金。因此，阿伦贝皮的单身妇女更加回避正式婚姻，因为这可能威胁到自己未来的收益。

除了社保金，阿伦贝皮人在决定结婚时，还会考虑继承权问题。巴西法律赋予法定夫妻平等生存权利。1960年代，阿伦贝皮的妻子们通常比丈夫和主要

男性生产者寿命更长。这意味着年轻女性希望以法定方式结婚。她们试图保持自己的贞洁，以此作为一种商品，来交换保证最终继承权。这种想法在1980年代已不再那么强烈，因为新的商业机会使妇女能够更好地掌握自己的权利。

阿伦贝皮人一直很清楚夫妻双方哪个掌权。妇女总是对哪些东西属于女人不属于男人记得特别清楚。比如说，朵拉提到，很多村民都认为船只是属于她兄弟的，实则属于他（合法的）妻子。他用妻子的继承权从她父亲手里购得。朵拉抱怨她的弟媳，说她是个支配欲很强的女人，一直给她丈夫找事。在他妻子获得继承物之后，朵拉的兄弟抛弃了自己维持多年的习惯法婚姻，虽然他还雇了一个他的私生子来当船员。不论在阿伦贝皮还是其他地方，婚姻中不同的财富赋予夫妻双方不同的权利。

法定婚只能保证配偶的继承权。如果习惯法婚姻的孩子在双亲名下登记，可以继承双方财产，另一方父母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获得继承权。这样的话，阿尔贝托告诉我，他和卡罗琳娜就没必要去登记法定婚姻。他们唯一的重要财产便是两栋房子，一栋在他名下，另一栋在他妻子名下。由于他们的孩子在双方名下都登记过，所以无论他俩谁先过世，女儿们都可一同继承。如果卡罗琳娜先去世，阿尔贝托仍可通过孩子们获得她在鱼湖村的房子。

法定婚姻减少的另一个原因，则是嬉皮士生活方式对村民的潜移默化。即使在1960年代，阿伦贝皮人也在一定程度上按照外界标准调整了他们的婚姻方式。富裕些的阿伦贝皮人比贫穷的村民更倾向缔结法定婚姻^[2]，而这并不仅仅是为了确保继承权。他们也在效法中上层阶级的做法。后来，村民们与那些他们眼中较富有的嬉皮士们保持固定交往。这些外来者对法定婚和永久关系的无视，使村民们改变了他们对外界关于性和婚姻标准的看法。

人类学教科书上的一条名言说到，婚姻是一种创造结盟的机制，超越具体配偶之外的社会关系。在过去的阿伦贝皮，只有正式婚姻能产生配偶和他们家庭之间的义务关系。习惯法配偶并不是对方的丈夫或妻子，而只是对方的男人或女人。只有正式婚姻关系才能缔结法律关系。避免婚姻便也避免了受到法律约束的延伸的社会义务（尤其是对妻子家庭所负的社会义务）。1980年代更多

[2] 1964年，阿伦贝皮财富与正式婚姻的相关系数（弗里曼文中的系数 θ ）是0.31（见Freeman, 1965）。计算结果来自附录5的数据。附录中的其他数据显示，1980年的相关性有所下降。

人避免婚姻的同时，也避免了社会义务，更甚往昔。

某些社会惯例也会维持稳固的习惯法婚姻。比如，给孩子取名的习俗，可被看做加强婚姻关系的象征。父母双方名字中各取一字便可组成孩子的名字。比如说，有长期习惯法婚姻的 Aldo 和 Odete，给他们孩子取名 Alzete、Valdete 和 Crispina。只有双胞胎中 Crispina 的名字没有结合父母双方的名字。双胞胎的名字通常来自神话，像 Cosma 和 Damiana（男孩就叫 Cosme 和 Diamiao）或者 Crispim、Crispina 和 Crispinana。命名系统象征性地将双胞胎（很难同时成活）和其他孩子区别开来。

仪式亲属关系 (*compadresco*) 提供了对习惯法婚姻的一个支持。费南多二十一岁的女儿没有正式嫁给她两个孩子的父亲。但这对同居的情侣说计划办理依法婚姻。我问费南多对这种关系是否满意，他表示他最爱的就是女儿的第一个孩子，因为女儿的配偶是他的教子。这类结合缺少法律地位，但费南多仍是他女儿配偶的教父，并是自己孙子的教父，女儿及其配偶的干亲。因此，仪式亲属关系为女方家庭和配偶及孩子之间，在没有法律约束的情况下，提供了紧密的社会纽带。

虽然仪式亲属关系可以提供补充性社会关系，但正式婚姻的减少（其所产生的结盟也因之减少），可以归结为前几章中提到的社会原子化和裂变加剧的结果。这在 1980 年代已有雏形：船队成员之间（法律上）的姻亲关系随着亲属关系一同减少。不过，还有另一个变化：男女性别比例的翻转，男性人口数量超过女性，可能抵消了婚姻不稳定带来的压力。

男女性别比例和女性地位

男性人口过剩反映了另一个 1960 年代到 1980 年代间，改变婚姻和家户组成的终极因素：移民。1964 年阿伦贝皮的人口组成是男性 49% 和女性 51%^[3]，村里一百五十九户 17% 是女性当家。1980 年，在阿伦贝皮南部抽样区域，有一百六十四名男性 (52.4%) 和一百四十九名女性 (47.6%)。在调查区六十一

[3] 不过，十岁到四十九岁之间的人口 54% 是女性，加大了丈夫的稀缺性。

户人家中，只有四户缺少同居成年男性。只有六户（9.8%）是女性当家。这些数字在我数天后跟老朋友聊天中得到证实。几乎所有1960年代中期缺少长期同居伴侣的妇女，都在1980年找到归宿。比如，朵拉现在和一个萨乌佩来的渔民共同生活。以前为我们工作过的另一个人则和一个泥水匠，维持了暴力相向但却稳定的习惯法婚姻关系。

蓬勃多样的经济把男人们吸引到阿伦贝皮，也给女人们带来养家糊口之人。虽然这些结合中很少有正式的，但妇女的社会地位较以前有显著提高。她们中很多人曾被其他村民（尤其是妇女）诬为村妓，因为她们依靠其他女人的丈夫生存（与多妻男性保持从属、不稳定的关系）。她们有了“丈夫”，便不再对其他家庭造成威胁，像朵拉（见第十一章）这样的女人也不再被称作妓女，而是成为正常村妇。一夫多妻现象，也随着男性移民增多而逐渐减少。妇女们经济地位的提高，伴随成年男性过剩，维系了婚姻和家户的稳定（尽管也面临着相反的压力）。

第十章

社会差异与社会异常的原因

由于新近出现的男性过剩现象，村妓在一定意义上已不再是一个单独的社会类别。这与阿伦贝皮社会日趋分化、更渐复杂的趋势背道而驰。很多因素导致这个曾经同质的共同体产生新的分化。例如，搬到卡拉努阿斯和鱼湖村的人们，不再认为自己是阿伦贝皮人。职业的多样性，对村民而言，同样意味着不同的活动和联系。许多不同类型的外来者，在当地生活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阿伦贝皮的社会变迁过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线索，让我们得以观察到一个平均主义或单纯的等级社会，向社会秩序阶层化的转变。这不仅出现在阿伦贝皮，同时也是社会文化发展过程中的普遍现象，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在于，以往属于具体个人的特征，现在成为不同社会群体的标志。

例如，1960年代，相当一部分村民存在心理问题。他们被视为“怪人”，其他村民不知道怎样理解他们，怎样解释他们的行为。“精神病人”这一类别在1960年代还未普及。但到1980年代，精神病的一般行为特征，已为社会分类所默认。

宗教领域同样如此，个人特殊的感受能力与天赋，过去在阿伦贝皮并不受社会重视。但到1980年，情况发生了改变。比如，1965年的时候，若是某个女人宣称自己能在黑暗角落看见别人看不见的面孔，被神灵附体，没人会在意。可在1980年，像她这样和其他有着类似能力的人，就能在坎东布雷教中找到属于他们的位置。

到1980年，另一项个体特质发展为社会分类，这与社会经济分层脱离财富关系等级的发展有密切关系。虽然阿伦贝皮在1960年代中期有相对富裕的居民，但是村民总是坚持认为村里没有一个真正的富人。而在1980年，“富人”亦成为一个默认的社会标签。

中产阶级的兴起

阿伦贝皮人使用中产阶级(*burguês*)一词表示富人，其中包括某些乡民。阿尔贝托说，中产阶级是那些月收入超过5万克鲁赛罗(约合850美元)的人们，他提到了一些船主的名字，并有点开玩笑地说，一个巴西钛业的工人也属于这一行列。

虽然包括阿尔贝托在内的很多人对他们取得的成就较1973年看起来更为满意，但其他人则对迅速拉大的贫富分化忧心忡忡。有人抱怨：“现在一下子有这么多富人，让你有点吓一跳。”

阿伦贝皮过去流传着两句俗语：“我们所有人彼此之间都是亲戚”和“我们这里都是平等的”，只是现在再也听不到了。移民、游客、度夏游客和嬉皮士，当然不是本土阿伦贝皮人的亲戚，像迪尼奥这些揣着钱包、拥有汽车和大船的人，显然与普通渔民不可同类而语。船主与船员之间(这是传统经济的核心关系)巨大的收入差距，给村民们留下相当深刻的印象。这让某些村民夸大了船主收益与地方经济的对比。阿尔贝托的估算总是很精确，他告诉我，富裕船主能从他们的渔业收成中每天获取10万到20万克鲁赛罗(相当于1700—3400美元)。我告诉阿尔贝托这些数字可能估计过高。我们计算实际收益之后(见第八章)，他发现了自己的错误所在。他的错误表明，当地村民在很大程度上高估了地方经济的差异。

由于这种财富差异几乎来不及实现代际传递，所以当地还是用一些熟悉的说法来解释个人取得的成功。人们仍旧沿用“运气是经济(尤其是渔业)起伏的主要原因”等说法。经历一系列微小事件，运气会变差。阿尔贝托提到，“一个人的船装着冰，一出港口，马达就坏了。他的冰全化了，这意味着他失去一天或是一星期的鱼。这件倒霉事就发生在托梅头上，他不得已换用另一条船打

渔，几个星期后同样的事情又发生了。”阿尔贝托说，托梅运气下降的时候，他兄弟迪尼奥的运气却在上涨。

村民们是对的：运气（更确切来说是机会）伴随着创业者的活动，的确为成功作出了贡献。当然，我们会在第十一章看到，托梅在财政上的不自量力，过于依赖外部资源，酿成了他的失误。他的两个马达同时失灵绝对是不幸的。如果没有从萨乌佩来的渔民替代本地人的位置，船主不可能这么富有，因为本地人对那些不捕鱼本地船主往往心存疑虑，而且本地人尚能在陆地上找到更多赚钱的工作。甚至阿尔贝托和卡罗琳娜的生意成功，在依靠运气的同时，也离不开他们的勤奋、远见和创新。他们是第一批家庭电气化的村民，随后买入性能可靠的电冰箱、冷柜，开始出售冰啤。不过，电气化的到来与港口的转变却不在个人掌控之中，而正是这些变化打开了他们的眼界，让他们的酒吧能吸引更多外来者。

对抢劫者的非理性恐惧

使用“中产阶级”和“富人”这类词汇，说明当地阶级差异意识正在发展，但是村民仍在捍卫阿伦贝皮的社会整体。很多村民都把对富人的敌意投向外来者。某个周五下午渔船回港的时候，我看到一个矮个男人抓着钱包，站在鱼磅站边。阿尔贝托认出来他是伊塔庞来的鱼贩。“要是枪匪来了，就会抢走他的钱包，”阿尔贝托提了句，但是抢劫者绝对不会是阿伦贝皮人。那个说富人吓到他的男人也把矛头指向外来者。他们觉得只有一个当地男孩误入歧途。他先是成为一个抽大麻的嬉皮士，然后沦落为浪荡子继而是小偷。不仅如此，他最后离开村子，成了一名外来者。虽然村民们每天看到彼此生活的差距令其相互嫉妒，但他们却把无意识中劫富济贫的愿望投射到外来者身上。劫富的穷人不是本地人，而是外来者。

我在1973年和1980年这两年都发现，当地人对抢劫者的恐惧，已经超出了现实中的发生率，最明显的是，其实没有一个阿伦贝皮人被枪匪劫持或侵犯。当地只发生过一起外来者实施的持械劫案。某个周日，一对夫妇在达利娅阿姨的水果吧被一个持枪歹徒搭上。他要走他们的车钥匙，把车开走，把他们抛在

路边。过去几年里仅有的另一起案件暴力程度更低：住在阿伦贝皮北部沙滩别墅区的一些周末游客，发现行李箱被撬，钱和证件被洗劫一空。

1980年代的阿伦贝皮仍旧缺乏法律约束。当地“警察”更逊往昔。外来警官只是偶尔来查，例如，1980年6月，当地配合进行大规模搜捕，追捕一个在萨尔瓦多市郊涉嫌强奸、抢劫和谋杀的男人。他后来在伊塔庞附近被捕。

要是发生在阿伦贝皮，我宁肯被神灵附体一百次也不要被打劫。而且，我的老朋友一再叮咛：“别给任何人搭车。”他们说，尤其要小心那些扮成女人搭车意图打劫的男人。阿尔贝托坚持让我把车停在他的房前，或是停在一个任何人都能看见的熟悉位置。达利娅阿姨告诉我：“以前根本用不着锁门，现在每家每户都锁门，就算过趟街也要锁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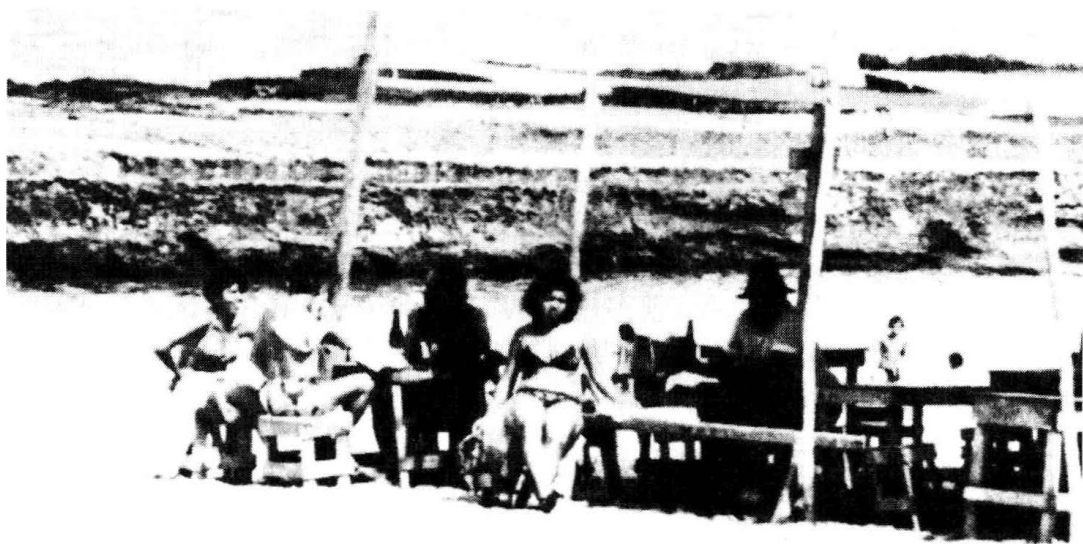
我想当地人之所以夸大对抢劫的恐惧，原因之一是，这种对外来威胁的先人之见，化解了村民对乡人的嫉妒之心。福斯特关于“有限产品的想象”的观点（见第三章^[1]），在一定程度上认为，如果财富差异来自村子之外，这种差异是可以接受的。自1970年以来，阿伦贝皮产生的所有财富，几乎都来自外界：游客、嬉皮士、度夏游客，工厂做工，外来渔民的廉价劳力等等。这可能也是，为什么在一个有着平等主义和平均机制历史传统的村子里，随着阶级意识出现的嫉妒仍旧指向外来者的主要原因。正因当地生活发生剧烈变化，对抢劫者的恐惧可能也表达了对外来者的怨怼。

当地的恐惧还有另一个原因。1980年我造访了里约热内卢，通过对巴西城市居民的访谈，浏览报纸，收看电视新闻，让我确信大多数巴西人比从前更加担心犯罪。不知是因为真实的犯罪，还是主流媒体的关注，造成抢劫报道的增加。不管什么原因，通过大众媒体对它们的曝光，村民分享了国家关注犯罪的价值观。

酗酒和精神病

尽管阿伦贝皮人害怕外来者，但他们还是保留了对乡人异常行为的宽容。没有针对最富有船主的明确社会约束。对村妓的厌恶有所减退，因为大多数有

[1] 福斯特的观点其实出现在第四章，疑误。——译注



图中展现了1973年到1980年愈演愈烈的周末饮酒这一生活方式，游客在一个俯瞰老港口的棚屋里喝了好几瓶啤酒。（杰拉尔德·米拉尼克惠允使用）

过相关经历的女性都与移入者建立了固定关系。酗酒比以前更普遍。村民总是经常指出那些喝得烂醉的人们。他们用醉汉 (*bebado*) 一词形容那些老是喝个没完以致无法固定工作的人。截至1980年，酗酒者与日俱增。新出现的周末醉酒生活方式，正在把渔民变成酒鬼。

酗酒在1980年到处可见。醉鬼们在附近游荡，打个零工，捞点救济，再买一杯。对我而言，走在阿伦贝皮撞见他们几乎是家常便饭，连工作日也不例外。村民开始把酗酒视为一种具有独特（角色）行为的社会分类，而过去他们只把过度饮酒看成是少数个体才有的个别问题。当地对酗酒的看法刚刚形成。某些村民把酗酒看成是种病，但是大多数村民都把这看成是种性格缺陷，如果那些酗酒者想戒掉，还是可以戒掉的。

阿尔贝托报告说，有些人早上五点就开始从他那里买卡莎萨，喝到十点醉倒。阿尔贝托说，其中一个人是没工作的孤家寡人，就等死了。阿尔贝托认为这个老人和其他酗酒者应受谴责。不过，周末烂醉还没有被当成恶行，这么做的人们（包括某些船主、渔民、生意人）也不会被贴上酗酒的标签（若是在美国，这里的很多人都会被视作酗酒者）。

阿伦贝皮人相信，包括酗酒这样的性格缺陷，会在家庭遗传。有好几对兄弟和至少一对母女深罹酒瘾。酗酒也和坎东布雷教的参与联系起来，这将在本章最后一节谈到。

精神病似乎也是家庭遗传。村民把两个中年兄弟看做精神病。一个从他之前工作的工厂中每月领取伤残金。需要的话，他每月都会去萨尔瓦多的精神病院把自己里里外外检查一遍。他哥哥从来没被收容过，总是把自己关在屋里自言自语，是个不折不扣的隐士。村民总是用家族精神病史责备他们姐姐的异常行为，以及她某个儿子的心理问题。

很多精神问题都可追溯到母亲的死亡或是孩子的出生。一个船主的妻子在1960年代第一个孩子出生后就“疯了”。到1980年，她恢复健康，被当做正常人。阿尔贝托的两个侄子在母亲死后不久就开始出现与精神和酗酒有关的问题。

当地最戏剧化的精神病案例，莫过于朱莉娅的故事，她是一个像嬉皮士一样有裸露癖的年轻村民。1980年我们进入阿伦贝皮的第一天，就遇到了朱莉娅。当时我们正在克劳迪娅餐厅吃午饭，惊讶地看到一个近乎裸体的女人在窗口附近闲逛。一开始我怀疑这个头发剃光、身体涂成橘黄色的年轻女人也许是个外国女嬉皮士，受人误导以为《国家地理》摄影组来到了镇上。实际上，她是个本地姑娘，妈妈死后，从青春期开始就变得精神错乱。

朱莉娅被收容了好几次，我们调查的时候也被收容了一回。理性时期她努力说服自己不要这样，但一回到阿伦贝皮她又故态萌发。朱莉娅烧掉她父亲的身份证件，进入别人家破坏财物。她最常见的异常行为就是裸体，嘲弄阿伦贝皮两性穿着的双重标准。村民们虽然把女性的裸体看做比男性更有冒犯性，但好在他们已经习惯了朱莉娅的行为。当她每天裹着一条可怜的毛巾或者更少衣物，在镇上中心地带游荡时，没有人会刻意去看她。

朱莉娅先前也挺正常，她是在其母亲1975年死后才开始在公共场合脱下衣服：一开始还只是偶尔如此，后来生下孩子后便经常这样。村民们告诉我，朱莉娅曾全裸着带着孩子在阿伦贝皮游荡。出生和死亡在阿伦贝皮和其他地方一样，会让人产生匮乏感和负罪感。事实上，我们应该看到，坎东布雷教从亲属关系和生殖中提取的意象非常重要，使之吸引了很多缺乏安全感或异常的人们。双胞胎的负罪感尤其严重。双胞胎在阿伦贝皮很常见，但很少有双胞胎能成对存活。幸存下来的双胞胎特别容易有心理问题，也许是出于对双胞胎兄弟

或姐妹死亡负责的非理性情感。例如，阿尔贝托的女儿就是个存活下来的双胞胎，她的精神状况在第六章讲述过，有轻微的精神紊乱（歇斯底里）历史。她在坎东布雷教重要的双胞胎神灵中找到了安慰。她的叔叔，也是个幸存下来的双胞胎，是阿伦贝皮坎东布雷教等级最高的成员。另外一个双胞胎是个真正的疯子。每到满月之时，他就开始打人并威胁要杀掉别人。他在其他时候则都挺正常，还在渔船成员中有一个固定位置。

从个体特征到集体标签

大多数关于社会趋同与异化的研究（学者们通常认为好比硬币的两面），都是在比阿伦贝皮更稳定的社会体系内进行的。而对社会异常原因的研究则较少。阿伦贝皮对该问题有了新的启示。阿伦贝皮的发展启发我们认识到，之前没有差异的社会体系中，出现了包含潜在异常个体的新群体（这在过去只被当成个体特征），这些人被当做新（异常）社会分类的例子来看待。因此，某种个体行为就成了人群具体分类的依据。一旦人们被划入某一类别，他们就接受了新的标签或社会认同，行为变得越来越受束缚，他们的分类也越来越典型化。借用标签理论中的术语，他们获得了一种“角色人格”（见 Lemert, 1951; Becker, 1963; Farrell & Swigert, 1975）。（有关这一过程，参见第十一章朵拉的个案。）

对社会进化感兴趣的人类学家，通常把他们的文化变迁理论建立在，从考古数据或历史文献年表中建构起来的长时段、代际变迁的基础之上。当然，研究社会文化的**微观进化**，即阿伦贝皮正在经历的变迁过程，也有价值。个体经验、态度和行为中某些更微妙而渐进的变迁，要经过多年积累，才会最终成为可以感受到的结构性变化，但这些细微的变迁在阿伦贝皮活生生的环境中就能观察到，因为变迁的力量迅速而巨大。比如，它就像是从个体特征中塑造一个社会分类（我会在讨论社会偏常产生的原因时谈到），是社会微观进化普遍存在的重要特征。它也许是社会复杂化过程中最有效的机制之一。

因此，到 1980 年，人们异常的行为在阿伦贝皮不再被看成个体特征，而是当做一个全新可辨的社会群体：富人，酗酒者，精神病人，坎东布雷教参与者，

等等。社会分化过程正在出现，而不是完成。新的分类既不完全契合，也非一成不变，标准和看法都在变化。人们也没把分类中的成员视作完全独立的社会类别。村民们还在为新的标签塑造典型特征。

村民们没有对与众不同的乡人提出批评、感到愤怒、生出怨怼，但是乡民们超出社会认可之外的行为，换作别人就明显是一种堂而皇之的违规行为。阿伦贝皮人看不起社会上的两类人，但这两种分类都不适用于本地人身上。有点看不起的是嬉皮士，和其他那些词不达意不会说话的“鸚鵡”。真正激起民愤的只有一类，就是劫匪，通常都是外来者。阿伦贝皮人关于嬉皮士和劫匪的印象，帮助他们把自己的社会体系与外部世界区分开来，因为这类标签不适用于本地乡民的内部分类。

社会偏常并未完全成型的另一个原因是偏常需要趋同，而阿伦贝皮总是未能形成趋同的一类。阿伦贝皮并不完全符合雷德菲尔德 (Redfield, 1948, 1960) 的“乡民社会”或“小社区”模式。过去的阿伦贝皮的确像乡民社会一样，是个小型、相对孤立、同质的无文字社会。但它又不像乡民社会，因为它缺乏强烈的社会凝聚感。要标示、指摘偏常行为和个体，需要有很强的社会团结。人们必须遵从社会规范，遵循正确的行为。然而，阿伦贝皮从来没有这种一致性、凝聚力和共有的标准，来建构对内部差异的标示。阿伦贝皮一直是一个有着多样观点的个体化村落。而且，1970年以后，通过接触各种外来群体的各类行为方式，阿伦贝皮经历了飞速的变迁。

1960年代的阿伦贝皮，人格差异极大，以至于有多少人就有多少种个体类型。没有谁是典型的阿伦贝皮人。但到1980年代，谁能肯定哪一类是普通还是典型的阿伦贝皮人：生意人，船主，渔民，船长，移民，工厂工人，建筑工人，嬉皮士，周末观光客，度夏游客，酗酒者，双胞胎，精神病人，坎东布雷教参与者，地主抑或人类学家？

种族关系与性别角色

传统的社会结构、种族关系等显著特征，似乎最有可能远离社会分化进程。村民们始终没有因为肤色或直系的奴隶祖先而产生种族歧视。例如，阿伦贝皮

最富有的本地人迪尼奥，有着黑色皮肤。给他干活的运鱼工兼洗衣工则是镇上肤色最白的人之一，他是一个有名的零售店老板的兄弟。其他两个肤色很白的人也在给他们的黑皮肤船主做家佣。有个老师（在美国应算是白人）和一个肤色很深的商人按习惯法结合，生了一个孩子。虽然村民们在1980年代仍在使用各种种族标签，但这些词汇和1960年代相比，在日常生活中已是越来越少。随着与外来者的接触，当地的种族用语似乎发生了变化，那些外来者的种族用语较少，但其观念则要更为根深蒂固。

性别角色的变化更加显著。妇女穿衣比1960年代更加随意而暴露，那时贝蒂连穿着连体泳衣在大西洋里游泳都觉得不好意思。到1980年，比基尼和三角文胸早已司空见惯。一天下午我看到阿尔贝托二十五岁的女儿穿着泳衣在外头洗碗，年轻邻居则穿着紧身背心和短裙在自家门廊上跳迪斯科。

女性的工作变得像男人一样更少公共性。之前，男人离家捕鱼走后，女人就要把先天晚饭的盘子和碗拿到泻湖去洗。下午渔民回来前，女人们就在泻湖里洗衣服、洗澡。到了1980年，清洗不再是社会性的；女人都用附近的井水在家里洗。

男人仍旧控制着公共空间，这从一天下午我在鱼铺附近观察到的行为可见一斑。渔船卸货时，我正在小教堂北部两个鱼磅站之间徘徊。这整块区域总是属于男性的地盘。男人过去晚上常常蹲在小教堂的门廊前。唯一接近他们的女性，便是上年纪的女人和受差遣找爸爸的小女孩。

到1980年，断掉的风筝线和电线在这里缠成一团。只有小男孩在这个地方玩耍，青少年的行为预示了成年人与之相关的性别特权。男人们在这些棚屋里模仿同性恋的嬉闹，称呼彼此 *viado*（酷儿 [queer]）。阿尔贝托指着一个路过这里不穿裤子小男孩的生殖器说：“如果你敢这样从我门前过，我就把你阉了。”男性地盘，只有某些女性才能进入。

迪尼奥的妻子就是这样一个人敢坐在她家鱼铺门面的女人。这个富有的女人戴着眼镜，穿着华丽的衣服，好像已经把过去限制女性接近外界社会空间的性别角色抛到了一边。另外一个在外面生活自如的女人是艾德丽，她是阿伦贝皮最成功的餐厅创立者克劳迪娅的女儿。随着餐厅的经营，艾德丽继承了她母亲出入男性社会空间的权力。艾德丽大步走进鱼铺，很快选好了鱼。鱼铺的雇工负责切鱼、卖鱼，柜台上坐着他五岁的继女。有些老姑娘过来买鱼，但面有羞



成功的女商人艾德丽，在她的旅馆餐厅里。（杰拉尔德·米拉尼克惠允使用）

涩，买完便走。一个酗酒的老女人站在买鱼者中，不断让鱼铺雇工给她施舍一文，可他厌倦了她沙哑的乞讨声，骂她荡妇。

进入男性空间，给人留下最震撼印象的，还属患有精神病裸露癖的朱莉娅。她又一次找借口离开了精神病院，从萨尔瓦多坐公交车回来那天，她像往常一样衣不遮体，开始（随着并不存在的音乐）在鱼铺外跳舞。跳着跳着，她把裹着上身的毛巾摘了下来，点了支烟，继续跳舞。一辆赫然印着“民警”的面包车转移了我的注意力，那车就停在朱莉娅边上。三个警察跳下车，我预感到朱莉娅要被带回城里。但政府人员的出现并不是来干涉阿伦贝皮的内部事务的。这三个警察是来买鱼的。他们对朱莉娅睁只眼闭只眼，而朱莉娅也不想碰运气，走开了。朱莉娅回来并差点触犯法律的消息很快就传开了。包括朱莉娅阿姨在内的其他村民都说，他们和我一样担忧。

这些女人：迪尼奥的妻子、艾德丽、朱莉娅和酗酒的乞丐，说明了当地性别角色的有限。公共空间仍旧是男性领域，只有少数女性才能适应。能够最大限度接近公共空间的女性是女商人，小女孩，酗酒者，以及精神病人。在过去的日子里，村妓也敢于介入男性地盘。

宗教的诞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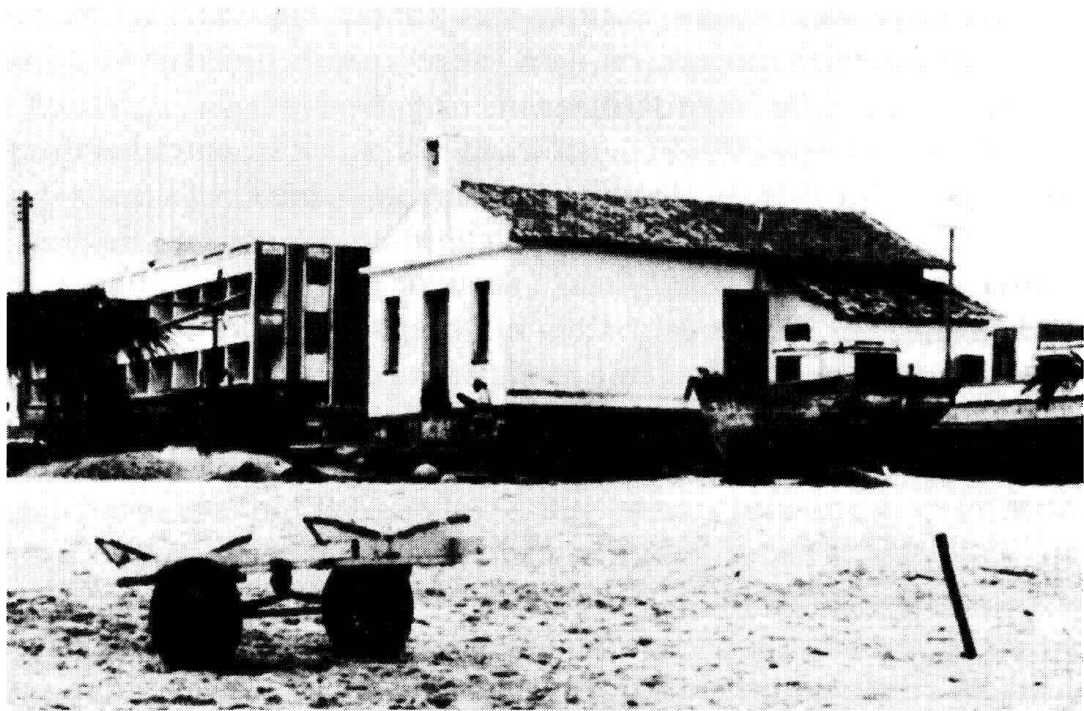
虽然异化类别没有完全形成，但偏常个体有一个共同点：他们比其他人更愿意参与坎东布雷教。坎东布雷教的参与者包括酗酒者、双胞胎、以前的村妓、对礼俗无所谓的女性、阿伦贝皮唯一出柜的本地男同性恋，以及像费南多那样对外来者怀有强烈恐惧感的移民（见第十一章）。

对坎东布雷教日益增长的兴趣，是阿伦贝皮对外部世界开放的一个主要方面。不少坎东布雷教参与者 1980 年都住在阿伦贝皮，相比 1960 年还一个都没有，不过当时有两个当地人在萨尔瓦多学习坎东布雷教。克利斯潘是其中一个，他于 1973 年回到阿伦贝皮，1980 年已成为当地主要的坎东布雷教长老。克利斯潘是个很有经验的圣父，声名远播阿伦贝皮之外。辅助他的圣女儿们 (*filhas de santo*)，来自阿伦贝皮和附近村庄。还有一位来自里约热内卢的游客，跟随克利斯潘学习坎东布雷教，学费约 165 美元。

另外一个 1960 年代在萨尔瓦多参与坎东布雷教的当地人是玛利亚。1964 年她回到了阿伦贝皮，但她直到将近十年后圣父（克利斯潘）到来，才得以展示神灵附体的能力。1980 年，玛利亚成为二十一个神灵的灵媒，是克利斯潘十二个助手中最有天赋的一个。

克利斯潘享有阿伦贝皮精神领袖的名声。一位和他对等的圣母，1970 年代中期开始在卡拉努阿斯执掌坎东布雷教，但她是一个萨尔瓦多人，尚在建立当地社交网络。而克利斯潘这样阿伦贝皮的当地人，则能利用他的本地社会联系。其他两个圣母有时会来这里拜访。其中一个在卡拉努阿斯有一个传教点，一年里有时会去活动。另外一个妇女只在萨尔瓦多组织坎东布雷教活动，她在阿伦贝皮只是一个度夏游客。

坎东布雷教显现出地方与外界体系不断增长的联系，其程度让我吃惊。我发现，坎东布雷教成员并不是自我个体，而是一个有相当规模群体的一部分。克利斯潘等人要把自己称作圣父或圣母，并开设坎东布雷教传教点，必须获得执照。他们从萨尔瓦多的坎东布雷教中心组织那里获得官方证明。执照经成员培训获得。玛利亚和其他圣女儿缺乏这些证明。她们只有通过和圣父、圣母的联系，才能参与坎东布雷教仪式活动。



手头有了更多的闲钱，阿伦贝皮在 1980 年代能够支撑天主教和非洲—巴西宗教活动（坎东布雷教）。照片展示的是几十年的老教堂和阿伦贝皮新建的旅馆。（杰拉尔德·米拉尼克惠允使用）

宗教的新发展，反映了地方和地域的双重变化。1960 年代期间，阿伦贝皮人很少看到有组织的宗教机构。连在阿布朗提斯附近改宗的灵恩派信徒，也不到阿伦贝皮来，因为当地只有一个新教徒。1974 年，一个天主教神父在阿布朗提斯设立了一个天主教会，开始经常走访阿伦贝皮。他每周一晚上举办一次弥撒，每月一次周日白天弥撒。同样是在 1974 年前后，一群修女群体搬到了卡拉努阿斯，村民们给她们建了一所房子。阿伦贝皮人开始认识到修女们是共同体生活的一部分。（修女每隔几年轮换一次。）没人对修女们经常参加坎东布雷教感受节日气氛感到奇怪。很多村民都把天主教和坎东布雷教（都是更大规模宗教的在地化体现），看做是不同的体系而非竞争性的宗教。巴伊亚的天主教堂似乎吸收了当地盛行的认为坎东布雷教是传统巴伊亚文化一部分的观点：坎东布雷教就像当地的烹饪，对观光业大有好处，而无碍于罗马天主教。事实上，天主教、非洲、美洲本土行为和信仰与坎东布雷教的融合，可谓举世闻名。

当地更盛大的纪念行为，不仅来自与外来宗教体系更密切的接触，还来自

新经济的繁荣。1960年代，村民几乎没有现金支持圣父或降灵指导的费用。像在其他社会一样，纪念性活动在丰收季尤甚，而夏天的阿伦贝皮便总是处于节日时期。村民抱怨说，纪念守护神圣弗朗西斯的二月节 (*feira*)，对观光客来说已然成为一件盛事。现在它主要由当地生意人掌控，而不是与渔船为伍、向大海的超自然力量献祭的渔民们。而且村民们现在参加的是11月和1月举办的坎东布雷教大型活动。在这两个月里（其他月份则非常少见），卡拉努阿斯的圣父和圣母会被女神奥克姗 (Oxun) 附体，这位女神在坎东布雷教神殿中，代表比那些经常附体的（卡布克罗^[2]或印第安）神祇更高的神灵。

当地的坎东布雷教节日，就算在夏天也维持不到三天，不可能与萨尔瓦多的节日相比，因为那里大概要持续将近一月。和城里的长老相比，克利斯潘是个微不足道的圣父。他住的几乎是木架泥屋，毫无繁荣气象。他的“圣人之屋”倒是挺受公众推崇，但妇女们仍旧抱怨他应该对助手更加慷慨。他和玛利亚发生争执，玛利亚抱怨他只在需要帮助时才叫上她，却没有任何回报。人们往往希望坎东布雷教教领，能与他精神共同体的其他成员一同分享，就像部落社会的“大人物”一样（见 Harris, 1974）。

一个妇女在1970年代也做过克利斯潘的助手，虽然她确实受过神灵附体，但后来渐渐退出，因为他什么都没有给过她。“他从来没有让我受圣徒附体，”她抱怨道，“他的圣徒啥也不给我，附体到其他人身上的圣徒也啥都不给我。”让她尤感怨怼的是，一次举行仪式时，有个圣徒叫她去“杀牲”。那些杀牲鸡或牲羊的人通常都会从供奉者那里得到一点钱，但她一分钱也没得到。

坎东布雷教经常还有治疗仪式的成分，这一般需要几天戒斋。圣父或圣母给操办坎东布雷仪式的主家，列出一份需要提供的清单，包括食物和金钱。精神领袖被默许使用部分现金购买仪式物品，并和他或她的圣女儿们使用购买仪式物品的钱。

阿伦贝皮人把坎东布雷教看做与其他治疗技术互补而非对立的宗教仪式。很多人仅在治疗不成功的情况下才求助坎东布雷教。同样，很多信仰宗教的人，特别是女性，通过参加弥撒，参与坎东布雷仪式，为天主教圣徒举行祈祷会 (*rezas*)，避免参加赌博。祈祷会往往是女性邻里和亲属参加的小范围祈祷会，

[2] 卡布克罗人 (*cabôclo*)：(巴西) 印第安人与黑人(或白人) 混血儿。——译注

是1960年代最常见的当地宗教活动。

一些坎东布雷教长老自己给信徒开药治疗，但像克利斯潘等人，则让他们的神灵诊断施治。虽然卡拉努阿斯的两个长老都有好几个神灵，但他们还是让一个卡布克罗人来负责日常治疗。诊断通过晃动贝壳、研究贝壳来完成。病人不能说出他们的痛苦，得从诊断意见来看。如果坎东布雷教长老在诊疗过程中，从贝壳方式中正确指出问题所在，病人就会遵从长老的医嘱。这往往需要为坎东布雷教戒斋和供奉。随后，病人就会通过向神灵奉献啤酒、葡萄酒、朗姆酒，或者小鸡、羊羔血等，得到治疗过程的具体信息。有时神灵也会索要现金。其中一个妇女说：“神灵就像小孩子，不管环境是否允许，都想满足自己的要求。”治疗只是坎东布雷教仪式的一个因素。还有其他情况，往往在特殊场合举行，例如教领的生日。很多供奉者一般都会对夏季大规模的坎东布雷节日进行布施。

坎东布雷教既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阿尔贝托声称不少人利用坎东布雷教致富。他提到劳伦蒂诺，即第四章描述的那个特立独行的店铺老板，尽管劳伦蒂诺已经抛弃了坎东布雷教，但却仍在用恶灵犬维系他的生活。坎东布雷教能够召唤恶灵(*diabos*)，引发疾病和死亡。曾做过我们厨娘的朵拉听说过丢魂的事情：当一个不幸的灵魂被坎东布雷教长老摄走或囚禁时，这人就会变得衰弱起来，直至死亡。只有通过坎东布雷教才能释放、获救。

阿尔贝托对我表达了有关坎东布雷教非常负面的言论，他承认自己有时参加坎东布雷教“只是为了好玩”。但他为妻子的参与感到羞耻，他把坎东布雷教称作“一个会造成毁灭的坏东西”。他断然怀疑那些说他们被神灵附体的人们。

只是偶尔参与其中的朵拉的态度就要积极得多。她、玛利亚和其他人告诉我坎东布雷教的社会结构和宇宙观。坎东布雷教唯一正式的当地男性角色是圣父(但很多神灵都是男性)。虽然克利斯潘曾有过一个男性助手，但通常没有圣子，只有圣女儿。坎东布雷教就这样延续了当地男性回避宗教的传统。

女性通常被男性和女性神灵附体，不过克利斯潘只接受一个女性神：女神奥克姗。当男性神灵附体到女性身上时，女人的声音就会变得低沉起来。同一个神灵也许会从这个人身上移到那个人身上，同一个人可能会在一个仪式中接受几个圣人。附体要经过长达数小时的敲鼓、喝酒和跳舞的酝酿才有可能到来，而且总是已经快到筋疲力尽的极点。有时附体极快，有时则要数个小时。

“风来了，迷醉了圣女儿。它让她进入一个入口，开始被神灵世界接纳。”

“每个人的守护天使里都有一个神灵，”朵拉解释道，“但是某些人还有神灵附体的能力。不幸的是，我没有。”

神灵附体所赖的天分，某些人是与生俱来的，其他人是后天获得的，大部分人则从来没有过。某些人认识到他们的天赋，决定加入坎东布雷教。比如玛利亚告诉人们，她还是个女孩时，就有一种熟练辨认神灵的能力。她能在家里的阴暗角落里分辨出神灵的面孔，其他人则从来没有看到过。虽然她承认自己的超自然能力，但这些能力直到她女儿成年后才苏醒过来。玛利亚就这样无比热切地进入坎东布雷教，到1980年，她已附体过二十一个圣徒。

坎东布雷教宇宙观有个有趣的特点，就是它的生殖和亲属意象。与天主教一样，坎东布雷教也为它的神灵共同体准备了一个亲属关系模式。教领（圣父和圣母）经由神灵附体，象征性地生下圣徒。圣父和圣母也有血肉诞下的孩子。她们是帮助她们“父母”的“圣女儿”，会被较低的神灵附体，就像是教领的孙辈。

玛利亚的个案，使生殖与神灵附体之间的关系变得清晰起来。虽然她总是声称自己有超自然天赋，但直到她唯一的女儿十二岁她自己开始感到疼痛时，才参加坎东布雷教。她从（城市）坎东布雷教团体寻求安慰，从那以后比之前更加积极。玛利亚对再要一个孩子已不抱希望。她和大多数当地妇女不同，只怀过一次孕。但玛利亚的神灵附体已经生产了二十一个象征性的孩子。（可以发现，神灵的孩子气，反复无常的需求，恰与孩子相对应。）

玛利亚自己的女儿在她儿子生病后成为一个圣女儿。她在坎东布雷教里寻求治愈。在仪式上想象她的儿子将要康复，她将会得到一个圣徒附体的景象。这两个想法都实现了。玛利亚的女儿和她母亲不同的是，她虽然只是接受了一个圣徒，但她有很多真正的孩子。一个积极参与坎东布雷教的女人在生孩子期间往往会被附体，这就使我们再次把这一宗教体系和生殖联系起来。让神灵拥有孩子也是对付疼痛的一种积极方式。

村民们的评论提醒我们，坎东布雷教蒙受了轻微的污名，即便对参与者来说也是如此。（他们也许认为我不赞同这种当地宗教生活的新形式。）阿尔贝托义正严辞地谴责坎东布雷教，对我掩饰了他妻子和女儿都接受圣徒的事实。因为有了那些经常参与其中的人们，阿伦贝皮的坎东布雷教可能会被视为“偏常行为的专属地”。

还有一些例子。特立独行的村民劳伦蒂诺现在只能依靠恶灵犬，他曾加入

过坎东布雷教，而他的兄弟仍然有此信仰。玛利亚能看见想象面孔的灵异能力，也许在我们的社会中会被看做是精神病的征兆，但她的案例却展示了她的天赋在宗教行为中大放异彩。玛利亚和她女儿是轻微酗酒者。人们都曾把她们当做村妓。母女两个都豪爽、彪悍，没有任何一点符合村民期望的女性行为。她们喝酒，讲荤段子，接受神灵附体。当硕大的玛利亚 1980 年再次看到我时，她隔着一条马路就开始欢呼着欢迎我，一个熊抱老练地把我举起来（我重达 162 斤）：“哦，康拉多，你回来接我去美国啦！”

女人也更积极地加入坎东布雷教，因为在阿伦贝皮，女人总是比男人弱势。有精神问题史的双胞胎，以及阿伦贝皮唯一出柜的同性恋者，也是坎东布雷教的常客。但其他与众不同的人，如富人和近来的移民，是不是同样热衷坎东布雷教呢？

我没有发现村民还像 1973 年那样，将经济成功与坎东布雷教的巫术联系起来。没人把船主称为坎东布雷教参与者，连称信徒的也没有。也没有迹象表明，来自北部渔民村庄的移民更多地参与了信仰活动。低收入工人可能出于对阿伦贝皮本地人的嫉妒，会通过坎东布雷教的巫术证据，获得心理平衡，但是他们并没有这样做。相反，他们把大量时间都花在漫长的捕鱼旅程和周末的喝酒发泄上。坎东布雷教还是保持了以少数偏常男性和众多偏常女性为主体的范围。

虽然无权的偏常者在坎东布雷教的参与者中占据支配地位，但它还是有些为人不齿。在过去的阿伦贝皮，流传过坎东布雷教信仰体系零散的观念和信仰，但却找不到真正的仪式和节日活动。到 1980 年时，大多数村民都相信，如果天主教修女能够参加并分享坎东布雷教，它就不会有多大坏处。所以，随着地方经济对宗教活动的扶持，村民们正在接受外来仪式，补充、增益他们之前已有的信仰。宗教的成长，作为阿伦贝皮社会文化变迁的另一个方面，反映了它日益增长的社会复杂性。

第十一章

外来者的社区

社会变迁 (social change) 的学术解释是：人类生活的真实过程。我从那些与我亲善、分享见识的阿伦贝皮人中，选出了四位前几章提到过深受社会变迁影响的村民。我希望能通过细节上对少数人真实生活变化的思考，用人们具体的生活来讲述飞速变迁的故事。

我非常了解这四个人。我在 1962 年遇到朵拉、费南多和托梅。朵拉为 1962 年的田野工作队成员（贝蒂、大卫·爱泼斯坦、田野调查队领队哈里斯和我）做饭。费南多是一艘帆船的船长兼合股船主，他是朵拉唯一亲姊妹习惯法婚姻的丈夫。托梅则刚结束七年商业捕鱼，从里约热内卢回来。我们到来不久，这位有事业心的船长兼船主邀请我们参加一个生日派对，派对办在他位于阿伦贝皮北面矩形广场区装修精致的砖房内。我们在那里喝苦艾酒，听音乐，播放音乐的是一架小型电池留声机，这在当时是个稀罕物。

刚到的时候，我们很少看到托梅；但是 1965 年我和他一起出海打渔，在 1973 年和 1980 年我们有过多次长谈。朵拉在 1964 年、1965 年、1980 年为我们洗衣服，1973 年又做了我们的厨子。费南多总是喜欢和我们聊天，1973 年拜访最为频繁，那时我们住得离他最远。在我们借住南部相对偏僻的消夏别墅期间，他以我们的保护者自居。从他开始酗酒到 1976 年这段时间，费南多也喜欢来喝我们储存充足的啤酒和百加得朗姆酒。

1962 年时我还不太认识阿尔贝托，但他后来却成了我最信任的报道人、最



Atahydes Aleves de Souza——很多与我友善并乐于分享知识的阿伦贝皮人之一。（康拉德·科塔克摄）

好的朋友和田野助手。我从奈尔斯·埃尔德雷奇（1963年田野调查队的一个成员）那里知道了阿尔贝托，他发现阿尔贝托是一个很优秀的报道人，建议我拜访他。让我和阿尔贝托相识、建立彼此间人类学家和报道人关系的是1964年我们雇他妹子做厨娘一事。我们那年的女房东坚持让我们雇佣这个她信任的本地女人。沿着他和奈尔斯已经建立起来的交往方式，阿尔贝托几乎每天晚上都会拜访我们，交流、教导我有关阿伦贝皮的方方面面，特别是渔业。

我们从第十章已经注意到，阿尔贝托、多拉、费南多、托梅这四个人，没有一个是典型的阿伦贝皮人，他们都不属于某一类。他们共有的一个特点是对外来者的吸引力，见证了他们和我们的友谊。虽然没有一个单独的故事能够包罗阿伦贝皮变迁的典型经验，但这四段个人史的故事，将会提供多种力量对地方生活影响的真实写照。阿尔贝托的故事，提供了从渔业到旅游业及更加多样化经济转变的样本。费南多的个案也展现了这些变化，但是加入了新经济的成分：他的一个儿子在巴西钛业上班。同时费南多的个案也以极端的形式展现了村民对外界力量的敌意。朵拉在1962年到1980年间的生活，体现了男性移民对婚姻结构的影响，这让“村妓”标签不再明显，并展示了普通渔民和他们家庭的

持续贫困。托梅也许是其中最有意思的案例，托梅是个与众不同、雄心勃勃的男人，他的案例展示了创新的回报与风险，平均机制的力量，以及巴西东北部社会阶级流动一直存在的阻碍。

这些对照鲜明的故事也说明，即使在阿伦贝皮这样一个传统上信奉平均主义的社区，也存在广泛的个性差异。人类学家必须关注这些个性的对比。它们会影响报道人的选择和田野中的个人关系，以及民族志调查的方向和结果。

老师

阿尔贝托生于1923年，他是本章讨论的四个村民中年纪最大的。阿尔贝托是阿伦贝皮本地人，乐于做他家乡社区的报道人，尤其喜欢在渔业方面教导奈尔斯·埃尔德雷奇和我。阿尔贝托二十四岁才开始出海打渔，这个年纪出海已经相当晚了。之前他在萨尔瓦多待过半年，在那里做商店店员和佣人干得不错。进城之前，他在阿伦贝皮已经做过各种临时工作。当他发现自己不喜欢城市生活时，他便决定回到阿伦贝皮当个渔民。

他一开始跟着父亲（一个普通渔民）在一个船队打渔，但很快便加入了他教父叔叔的船队，叔叔是渔船的合股人，而且是船长。这人倾囊授给阿尔贝托所有打渔知识。后来，阿尔贝托在六七个船队打过渔，有时和亲戚，有时不是。到1973年，他不再经常打渔，而是花费越来越多的时间和他（按习惯法结婚三十年的）老婆卡罗琳娜一起打理几年前开张的店铺。阿尔贝托厌倦了打渔，他很高兴在1973年7月和8月做我的田野助手，为我工作，领一份固定工资。

阿尔贝托在1965年到1980年间的故事，是许多有所进步但又波澜不兴的命运之一。他的成功来自创新和幸运，符合阿伦贝皮传统。1980年，阿尔贝托说他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你的生活还没提高吗？”他问我。他把他的成功归功于电力，尤其是他的电冰箱。阿尔贝托和卡罗琳娜两口子，是阿伦贝皮第三户通电的家庭，随后他们买了电冰箱，后来还买了冷柜。阿尔贝托解释说，电冰箱比很多店主之前拥有的煤油冰箱性能可靠多了。

运气帮了他大忙。老一代生意人在电力到来前投资煤油冰箱，他们坚持老套，没有立刻购买电力装备。这就为阿尔贝托和卡罗琳娜精明的生意创造了契

机：他们卖掉用商店盈利购买的农场土地，用这笔钱买了台电冰箱。第二年又添了台冷藏柜，这让他们卖起了阿伦贝皮最冰的冷饮，这一有利资源增长了酒精饮料消费，尤其是村民和外来者都喜爱的啤酒。

1976年阿伦贝皮通了电。阿尔贝托和卡罗琳娜一开始买了两箱啤酒（每箱十二瓶，每瓶一升装）零卖。到1980年冬天，他们每周末卖一百升，获得约25美元收益，夏天是这个数字的四倍。公路的铺设对他们的成功也有帮助，不仅带来了周末和度夏游客，也便于装载啤酒和饮料的卡车把阿伦贝皮加入他们的运送路线。

因此，阿尔贝托和卡罗琳娜的成功，靠的是幸运和生意技巧的结合：事业，远见，机遇和努力。阿伦贝皮人并没有把电力或公路带到乡村。阿尔贝托和卡罗琳娜对港口的变动也无可作为，因为更大的渔船需要更深的港口，船只停靠点南移，使得阿尔贝托的房子占据了一个有利位置。面对幸运，他们还得抓住发展机遇：把一块很远的小农场转换成电冰箱这样一个足不出户的收入来源。阿尔贝托和他的女婿伊万说服卡罗琳娜，扩建了他们面海的房子，为周末观光客建造了一个可以喝啤酒的露台。另一项创新策略再次把他们推向了成功。阿尔贝托一家继续把利润投资于生意，添了冷藏柜、露台酒吧上的音响系统，第一台电冰箱出故障后又买了第二台。

持续的收益让阿尔贝托和卡罗琳娜在鱼湖村买了一块地，盖了一座房子，1980年他们把房子租了出去。这座房子挂在卡罗琳娜名下，但他们在阿伦贝皮的家仍属于阿尔贝托。阿尔贝托和卡罗琳娜很明智，并没有像很多村民那样，把他们在阿伦贝皮海边的房子卖给外面的人。这个观景位置，让他们有一个卖啤酒的好地段。啤酒销售在附近唯一的竞争对手是达利娅阿姨的酒吧，她以卖果汁、冰淇淋及专做嬉皮士生意为特色。阿尔贝托和卡罗琳娜的啤酒，既卖给住在后街的当地人和周末游客，也卖给西面新搬来的人。对于那些想要在冬天涉水穿过泻湖的人来说，这里比阿伦贝皮中心和北部区域离卡拉努阿斯更近。最佳海水浴场也离阿伦贝皮南部最近。他的酒吧位置（以及他在外来者当中成功和可靠的名声）也给阿尔贝托带来了一份照看对街房子的工作，这座房子的主人是萨尔瓦多来的度夏游客。这份工作每月可以给他增加35美元的收入，这位度夏游客的水井和电泵还给阿尔贝托一家提供了清洗盘子和洗澡的干净水源。

卡罗琳娜和阿尔贝托在卖菜和杂货方面存在竞争。阿伦贝皮这个区域每三

家就有一家在做买卖。从农场收购柠檬、洋葱、西红柿、香草和其他农产品，再转卖给西面的人是卡罗琳娜的主意，但阿尔贝托批评她没有在面对竞争时表现得更有干劲。他抱怨她没听他的意见，多批些水果和蔬菜来转售。阿尔贝托为了证明她目光短浅，告诉我已经来了一个萨尔瓦多的男人，租了街对面的住处和北边几家街面房，开始卖便宜水果、蔬菜和杂货。结果是他们家的销量下滑。阿尔贝托很清楚，对方降价销售的做法，是为了把竞争者赶出竞争，继而再抬高价格，但他觉得他家的海景和酒水销售能够确保水果、蔬菜生意免受影响。不过他仍抱怨，要是卡罗琳娜几年前加大销售力度，他们就能与新来者的价格相抗衡，从而保住他们的优势。

阿尔贝托的故事说明，个体与家户在阿伦贝皮从闭塞渔村向经济分化的城市化社区转型过程中的成功适应。阿尔贝托和卡罗琳娜的经济发展，体现在他们的生活方式上。1964年大部分木架泥屋现在都成了瓦房。我第一次遇到阿尔贝托时，他只有一个房间粉刷过，地上是泥地。经过多年逐步完善，到1980年他有了舒服很多的单元房。随着朝大海方向扩展，他还添加了第三个卧室和一个卫生间。所有房间都新粉刷过，水泥地面，屋里一尘不染。除了冰箱、冷柜和立体音响，他们还有一台电熨斗、燃气炉和一台黑白电视机。这和1964年形成鲜明对比。那时卡罗琳娜还在一个简单的铁圈架上烧木头做饭，他们甚至连最便宜的晶体管收音机都买不起。

伴随着新的生活方式，阿尔贝托全家看上去要比1973年时的他们，对他们所取得的成功感到更适应。卡罗琳娜参加坎东布雷教的劲头不似以往。他们的二女儿已是成熟女人，还经常参与坎东布雷教，但她再也不会被恶灵缠身了。家里所有人的健康状况都有了改善。卡罗琳娜以前一直抱怨这病那病，但到1980年变得轻松许多。阿尔贝托在1977年已经戒烟，他把自己顽固的轻咳归因于长年来“一天一包雪茄”。尽管年届五十七岁，早已退出渔业，阿尔贝托还是保持着匀称适中的体形。他的听力明显下降，从1973年就困扰他的近视则继续让他犯愁。

阿尔贝托内心的自信有所增长。他把我介绍给每个他提到的移民朋友兼邻居时都会说：“你还记得我老板 [*patrão*] 吧？”阿尔贝托公开承认并澄清了多年前关于我们关系的流言。村民们总是怀疑他做我的固定报道人，是因为我给他钱，其实我根本没有，只是偶尔送他点礼物，分他点东西，直到1973年和1980

年正式雇他为田野报道人，我才付他报酬。阿尔贝托已经习惯了自己的成功，并觉得理所应当；他不再像以前那样被人嫉妒。所有阿伦贝皮人现在都对经济成功和炫耀性消费更为熟悉，这些生活方式上的变迁，常常是与外来者联系的结果。

1980年的一个下午，阿尔贝托和我坐在鱼铺附近，看着船只被拖到岸上以待修复，他指着一艘属于一个萨尔瓦多男人的渔船，和我开玩笑，“你会买那条船送我，对吧？”他的话，边上的邻居听得一清二楚。这和1960年的他简直有天壤之别，他那时总是抱怨村民们指责他从我这里拿钱告乡亲们的密，这让他很不舒服。1964年和1965年那两年，我总是猜想为什么阿尔贝托有时会在我们的每夜闲谈时不见踪影；后来我才得知，每次受到流言攻击，他都会躲开我两天。甚至是在1973年，阿尔贝托也避免直面村民们对我们关系的飞短流长。但到1980年他已在这方面有了很大自信。

本章讨论的四个人中，阿尔贝托在某些方面可能是最典型的。和曾经名声不佳的村妓朵拉、费南多和船长兼船主托梅相比，阿尔贝托不属于偏常或数量上不具统计意义的社会分类。三十年来他一直是个普普通通的渔民，和其他人一样打渔越来越少，并随着新出现的机会放弃了打渔。他的父母和祖父母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不是出生于阿伦贝皮，就是出生在西边几公里之内的地方。他的祖父母是阿伦贝皮最早的移居者之一。阿尔贝托记得曾祖母告诉他一个故事，说她自己的生活就像奴隶一样。阿尔贝托和其他三个人一样，在美国会被看做黑人，但他的肤色是四个人中最黑的。我的记录表明，他使用过对应自己的种族称呼包括：深黑色 (*moreno escuro*)、深色 (*escuro*)，以及偶尔提到的黑色 (*preto*)。

尽管阿尔贝托有着颇为典型的经济角色和地方身份，但他在很多方面都展现出自己的个性。他年轻时由于一次意外留下了轻微但很容易看出的残疾。阿尔贝托个性的另一面很快就对我显露无遗。那就是他对教育的热情。1960年代，他总是提及他与博学的德国神父（这位神父娶了一个女地主）的友谊。他把我带到这个神父在萨尔瓦多的公寓，我看到阿尔贝托确实和这位老人及其两个大学毕业的儿子关系非常亲密。

虽然阿尔贝托近乎文盲，在他的少年时代只受过当地仅有的有限学校教育，但他却很重视教育。他和卡罗琳娜负担了大女儿玛丽亚在伊塔庞的教育费用，

他们最小的女儿旺达正受惠于阿伦贝皮逐渐提高的学校质量。阿尔贝托总是告诉我，有个农场主家庭的成员已经成了一名高中老师；同时他也骄傲地说起另外一个地主所受的大学教育。

阿尔贝托知道我打算当一名大学教授。他很高兴我觉得阿伦贝皮值得研究，也非常乐意带我研究。奈尔斯和我发现他特别喜欢教授有关渔业的知识。他和我们俩一道制作海床地图，详述能找到不同鱼类的地带，为了让我们准确了解这些地带的名字，每次出海打渔时都把它们指给我们看。1973年他还检查了收入我博士论文中的海床图，批评我犯的错，并用铅笔更正了过来。

经历了像我在1973年到1980年之间的长期离开后，其他人类学家也许已经忘了自己当初借重的某位报道人的特殊才能和个性特质。1980年，我发现自己重又发现了阿尔贝托全部非凡的品质。阿尔贝托之所以是个优秀报道人，关键在于：他不知道某个问题时，会承认自己不知道。其他报道人会给我一个错误答案，阿尔贝托则会当晚或第二天出去，谨慎地了解问题。虽然（也许正因）他的视力和听力正在下降，阿尔贝托总是密切关注他的所见所闻。通过观察周遭事物，他建构起一套村庄生活的广阔知识，而且他的记性很好。我也被他估计和计算的准确性所震撼，因为别人就算知道的比他多，也不一定估算的比他准。准确、记忆、知识、专注，以及愿意承认不知道，是一个优秀报道人的品质所在。阿尔贝托是这些品质的集中体现。

最后要说的一点是：阿尔贝托认为村里的故事值得讲述，并想确认我是否把故事讲对了。阿尔贝托不像其他人那样，在我询问他们的社会时总是直板板地反问我（“美国有骆驼吗？”），他对我问的哪怕最天真的问题都会思忖一下，给予诚恳的回答。

回想起来，我觉得我与阿尔贝托的联系并非偶然，再也找不到像他那样与我心意相通的人了。我通过奈尔斯发现了阿尔贝托。另一方面，阿尔贝托也通过奈尔斯发现了我。阿尔贝托是充斥外来者的社区中土生土长的参与观察者，一个寻找学生的老师，也许注定要教会奈尔斯和我这样的学生去了解。所以，这本书反映了阿尔贝托和我为了实现同一目标而付出的共同努力——把阿伦贝皮的故事带给外面的世界。

村妓——一旦偏常消失，曾经偏常的人又会怎样

在我遇到阿尔贝托之前两年，我遇到了朵拉，她1937年生于阿伦贝皮。因为贝蒂比我更了解她，所以我在这里讨论的材料，多来自贝蒂的学识和她发表的一篇文章（Kottak, 1977）。朵拉是我们每次到访阿伦贝皮都会雇上的人，在我的印象中，她是一个充满活力、感情丰富、有很强家庭观念（直到1970年代她在这一点上还没有太大收获）的女人。朵拉不是一个像阿尔贝托那样的优秀报道人，甚至都算不上是一个很好的报道人。她总是对我们的问题感到不耐烦，打断我们的问题，明明是她做的事却说她不知道。她和阿尔贝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不喜欢流言；她通常不喜欢用他人肥皂剧般的生活细节来启发我们。当然，阿尔贝托也不会，但他总是会努力回答真实的问题。

但是，朵拉很喜欢走访他人；当我们计划在阿伦贝皮之外进行短途旅行时，她总是要求一起随行。1980年时，她仍记得1962年她和她那时年仅四岁的儿子（十三岁时被先天性心脏病夺去生命）和我们一起去卡马萨里的旅行。朵拉生的第一个儿子在那里第一次见到了他的父亲。朵拉之前和孩子的父亲在卡马萨里生活过几个月，那个男人是她在萨尔瓦多市当女仆时遇到的。因为那个男人虐待她，又搞上另一个女人，她就甩了他。

虽然朵拉一般不是个很情愿的报道人，而且总令访谈者受挫，但她还是经常为我们的工作提供便利：她会告知我们想与之交谈的人们，安排会面，陪伴我们，把我们介绍给陌生人。例如，1980年贝蒂告诉朵拉她非常想和修女及在卡拉努阿斯那里参加坎东布雷教的人们谈话，朵拉便一起陪着过去了。走访是她的乐趣，她喜欢听接待我们的主家回答问题。

在我们1980年到访期间，朵拉好几次宣布：“最近我早有预感，我们的美国朋友要来了。”相比阿尔贝托需要我们去满足他想要为人师的愿望，朵拉则有着不断的物质需求。她已失去了她曾拥有的唯一的房子。为了她正在增长的家庭，她想要一所新房子，一个属于她自己的家，她笃信我们会帮她实现这个愿望。这一愿望从开始一直贯穿到1980年我们的最后一次谈话，她坚持这一点，直到最终得到她想要的。执著是她的另一个特点，这也是为什么她总能帮我们安排好与很难联系的人们的会面。

从1960年代中期到1970年初，在朵拉开始和她的习惯法配偶（一个移居的普通渔民）同居时，她是十多个被视作村妓的村里妇女之一。1970年阿伦贝皮出现男性移民潮，大多数贴有这类污名化标签的妇女，都在移民中找到她们的婚姻伴侣，这一独特的歧视性分类随之失去意义。和少数几个被社会歧视性地贴上酒鬼（*bebados*）标签的酗酒者相比，村妓更可谓是当地讥讽的对象。其他村民更多把这些妇女的困境归结为她们自身问题，而不是经济和人口比例原因：正是男少女多造成丈夫难觅这一不可避免的事实。也就是说，乡村经济没有给农村妇女提供独立生存的出路，而适婚人口则存在女性过剩。

这些情况在1970年代有所改变：随着妇女工作前景的改善，很多男性移居阿伦贝皮，法律婚姻不再像以往那样多见。在这一背景下，村妓的偏常地位完全消失，虽然这个词有时在骂人时还会听到。接下来，关于朵拉是如何成为村妓，以及当这一偏常分类失去意义后对她产生何种影响的讨论，大都来自贝蒂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用符号互动论即标签理论解释了朵拉的案例。贝蒂用莱默特（Lemert, 1951）的八层次（*eightfold progression*）理论，分析了朵拉的偏常：从最初的偏常（与正常的第一次分离）到最终接受偏常的地位和角色。

朵拉最初的偏常：怀孕，发生在她二十岁的时候。需要指出的是，她的偏常并非性交，这是许多年轻妇女在私奔或结婚前常有的，但她们没有怀孕。这一明显的生理变化将朵拉从处女（*moça*）的分类中划除，促使她去寻找配偶。她在卡马萨里和情人住在一起，但他们的事实婚姻结合只维持了八个月；她带着还在襁褓中的儿子回到了阿伦贝皮。与村民们后来认为朵拉靠别人丈夫过活的想法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她确实努力工作，提高自身的经济和社会位置。她曾闯入阿伦贝皮以外的未知世界，她在那里受雇从事家政。她和许多其他当地女性一样，和一个未婚男子有了风流韵事——这个男人肤色较白，也比老家大多数男人富有。她期望自己能在社会地位和经济水平上有所提高。但就像大多数阿伦贝皮人对人生起伏的看法一样，运气也是朵拉后来境况的一个因素：一个未谙世事的年轻女人走出家门后，选择了一个错误的男人。

回到阿伦贝皮，朵拉搬入她祖母的木架泥屋，她还没有孩子的弟弟和弟媳两口子也住在那里。虽然这些人帮助朵拉照顾儿子，但她吸引男人的机会因为生仔已大大削减。年轻男人想找比朵拉年轻一点的女人，而且通常是不想要带着拖油瓶的。朵拉能够找到的伴侣都是一事无成的人。她第二个儿子（只活

了两年)的父亲是个酗酒者。这段露水姻缘后,朵拉又遇上一个男人,他是她1962年出生且活下来的大儿子的父亲。他是一个事业无成的渔民,这次结合还是没能维持下去。

朵拉还受到更严苛的惩罚和社会排斥,这些都是社会偏常者的常见经历。随着孩子们长大,她的需求也在增长。朵拉的弟媳开始有了孩子,扶养朵拉和孩子对她的兄弟来说负担越来越重。朵拉认识到她和她的孩子正在耗竭她兄弟(非船主船长)给自己买一艘船的积蓄。她采取各种方式,提高自己的独立性:她在像我们这些1960年代中期进入阿伦贝皮的少数外来者那里寻找工作。她在找男人方面越发主动,并争取得到他们的支持。她开始减少和她兄弟家庭的联系,而和像她这样未婚独居女人的联系越来越多。当船只夜晚返航,她跑去沙滩;在节日场合待到很晚;平时穿得花枝招展,与女性适宜的行为标准背道而驰。简言之,她的行为开始像村妓一样。

最后,她在1965年和一个已婚男人开始了她的第一次小三生涯。这个男人是个成功的船长兼船主,她最终为他生了两个孩子。其他村民开始把她看成侵犯合法妻子和家庭权利的第三者。为了便于同居(作为非正式多妻婚姻的第二个妻子)并缓解她弟弟家庭的压力,朵拉于1966年离开了家。在男伴的帮助下,她在阿伦贝皮北部搭建了一间木泥屋(她自己的第一个家)。这座小屋公然坐落在她男伴的主干家庭附近,这是一个朵拉之前从未住过的街坊。她经常被她情人的亲戚和住在附近的姻亲辱骂。当她和情人妻子打架时,她自己的亲戚不会站在她身边。朵拉的名声尽人皆知,遐迩闻名。村妓的标签更是滥施于她。“体面的妇女”告诉她们的小孩,不要和朵拉的小孩一起玩。

朵拉和她情人的关系逐渐恶化。当他为朵拉和孩子付出越来越少时,她开始为了钱和食物去“满足”男人。随着阿伦贝皮与外来者交往的条件有所改善,这样做越来越容易。而这些行为是她和她弟弟一块住时几乎不可能的。1970年左右,朵拉主要和其他村妓一类的成员交往。她成了村妓群体中的一名领导者:平息其他人之间的争端,运用她的能力帮助她们找到工作。(向这些女人开放的经济机会在1970年左右也有所增长。)在朵拉的支持和鼓励下,村妓们时不时地侵入男性领地,造访沙滩,在那里她们可以笑、开玩笑,在渔民和买鱼人身上找乐子。朵拉变得越来越出格,经常出现在一般不对乡村妇女开放的范围。她随心所欲地出入公共场所,进入商店和酒吧,自由地和外来者交往,包括观

光客和人类学家。

朵拉的村妓角色在 1973 年左右已经十分明晰，与之相应的偏常行为也得到进一步强化，而这正是村民们给她贴上的标签。朵拉的村妓地位，将她从社会参与的一般女性领域中排斥了出去：普通的家庭生活，充足的饮食，通过丈夫提高社会经济地位的可能性，身体健康的可能性，合法性，以及赋予她的孩子们继承权。这一排斥令朵拉极度痛苦，尤其是随着她的好几个孩子去世。尽管如此，偏常社会类别中的成员身份也是真实的，朵拉作为某种亚文化成员的角色，为她提供了补偿性的社会参与领域，而这通常是不向普通妇女敞开的。例如，朵拉和其他村妓一道，于 1970 年代中期开始积极参加坎东布雷教。

任何社会体系的成员之所以被视作偏常之人，是因为有一套与之对应的偏常角色标准，而村妓的角色在 1980 年正在阿伦贝皮消失。由于朵拉和一个移居渔民之间的事实婚姻已经维持了好几年，令她的社会地位有所提高，但是她的生活方式却没有显著改善。和 1980 年的其他普通渔民一样，朵拉的丈夫拿的是低薪。他的雇主是一个富有的店主兼当地创业者，朵拉从他那里提前预支每星期工资，并希望能撑到下一次发工资。朵拉把她的伴侣看做好男人。她忽略了他周末饮酒过量的事实，强调说他是他们两个小小孩（包括朵拉唯一的女儿）和前几次结合生下的三个男孩的好爸爸。

有了丈夫挣的钱，朵拉计划将她的木架泥墙、茅草泥屋变为一座砖房；但当她把小屋推倒，开建新房时，一个以前的邻居攫取了她的土地，圈上栅栏，声称是他的土地。朵拉对她能否打赢官司半信半疑。与此同时她不得不和她的另一个兄弟临时同住，她常常和他的妻子吵架。1980 年她家借住在她阿姨的小屋。

朵拉和她儿子生活在一间泥墙生虫的狭窄茅屋里，地面裸土，棕榈覆顶，上可漏光，蚊蚋窜舞。1980 年左右，朵拉对拥有一个阖家共居、儿女环绕、属于自己的家的愿望几近绝望。她对睡在隔壁她阿姨客厅里十八岁的大儿子尤感内疚。朵拉的儿子高中即将毕业，所以到下午才有课，他打算参军，攒点工作经验，找份体面工作。朵拉叹惜地说：“因为无事可做，他有时喜欢睡到很晚。他晚起时，我阿姨就骂他懒。我真不希望他被这么说。我想要一间我自己的房子，我儿子想睡多晚就睡多晚。我希望我男人和我的儿子们能有份体面工作。可现在渔民挣的连账单都还不起。”

“有时人们对我很好玩。他们用一种奇怪的眼光看我。我想这是因为我没

有自己的房子。但是我的儿子英俊、壮实，我对未来还抱有期望。”

朵拉指望她的儿子能结束她年复一年的贫穷，尤其是三个最大的男孩，分别是十四岁、十五岁和十八岁。他们的未来收入能帮助她在（1980年8月底我们帮她买的）一块地上建造房子。首付已交，但还要还月供。朵拉在我们到来几个月前，就已在她干亲（她二儿子的教母）在村广场新开的酒吧工作了。每周的薪水加上小费就够还她的按揭。

朵拉把她的希望押在亲属、押在她儿子们最终获得成功和她的干亲身上。尽管二儿子早夭，但她们密切的仪式性亲属关系已经维持了二十年，他的洗礼创造了这一关系。

回想起过去的苦难和排斥，朵拉说她不信任他人。她喜欢和她最初一起居住的弟弟、弟媳和他们的孩子一家，她的亲妹妹，一个同父异母妹妹，以及她的一些侄子和侄女。除了这些人，她宣称“她不和阿伦贝皮任何人接近”。1980年她每次离开小屋都锁门。“你不能相信别人不会把你的东西弄乱，”她解释道。

尽管朵拉不再是村妓，但她之前的状况还是留下了印记。她会想“人们待我好玩”，尽管她无法准确说出为什么。她感到与大多数其他村民没有往来。不过1980年，在她首次怀孕被看做偏常的二十三年之后，朵拉通过她的儿子们还是能够瞥见终年贫穷、简陋生活条件及社会隔离的尽头。朵拉对与所有孩子一起生活的新居的渴望，象征了她想要逃避所有这些灾厄的愿望，而今已经成为一个更为真实的希望。

外地人

1962年，我第一次遇到了1933年出生于巴伊亚市的费南多。他的妻子艾弗妮是朵拉唯一的亲妹妹（她们有两个兄弟）。费南多那时二十九岁；他十几岁时就来到阿伦贝皮，在相爱之前已和艾弗妮一起生活了六年。他的求爱始于六月圣约翰节，拍拖一年之后，他们决定私奔。一天晚上，艾弗妮回家收拾过行李，搬到了费南多为他未来家庭建造的房子。几个星期后，她陆续把她的其他财产都搬了过来。一年后，他们生下第一个孩子，一个女儿。到1980年他们已经有了十个孩子，在他们将近四分之一世纪的婚姻岁月中，艾弗妮流过六次

产。费南多没有受过正式教育，不识字，他记得他的孩子总数是十个，但却不得不扳着指头告诉我，十个孩子当中有几个女孩、有几个男孩。

费南多八岁时，从一个好似童话故事里恶毒继母的家中出走。费南多的母亲死后不久，他父亲又娶了一个妻子。当费南多看到继母把他弟弟的手放进火里，惩罚他拿了什么东西时，便决定离家出走。他绕过了萨尔瓦多，在伊塔庞被一个男人抓住，这个男人打了他八天，促使他逃得更远，一直跑到阿伦贝皮的行政中心阿布朗提斯。

回想起他的童年，费南多说得最多的是身体受到的虐待。一个阿布朗提斯的男人为他提供了四年食宿，曾因撒谎而打他。1942年，费南多十二岁时搬到阿伦贝皮，先后为两个生意人赶骡车。他们在中心广场的家里给他提供食宿。较之第二个老板（地主代理人普鲁登西奥），他更喜欢第一个，另一个外来者。费南多想起的另一次挨打，来自年老的学校老师，普鲁登西奥的妻子。

十八岁时费南多开始打渔。作为一个移民，他和船长或船员没有亲戚纽带，便和一个哈瓦来的男人一起打渔，这个人的船有时会去阿伦贝皮外海捕鱼。1960年费南多成为一艘帆船的船长兼合股船主（和一个当地女生意人合伙）。1960年中期他也像其他船长那样，为了完全所有权，解除了与不捕鱼船主的关系。“我不想为岸上啥都不干的人打渔，和她分成，我可啥都得干。而且也不是我一个人有这种感受。”

1960年中期，费南多是一个精力相当充沛且成功的船长兼船主。他遵循托梅这类人的行为模式。尽管如此，费南多一直都不像人家那样大胆、创新、富有事业心，这可以从他不错但又不甚突出的渔获中看出。费南多通过仪式性亲属关系弥补了他在亲属关系和法定婚姻等上与其他村民联系的不足，保持了稳定的船员团队。费南多经常打渔，享受着三十岁的良好健康。他随季节变化改变打渔策略，但他从来不会离其他人和传统确立的打渔模式太远。

这种跟随船队而不主导的模式一直持续到1970年代，费南多当时是最后退出渔民合作社的船长兼船主之一，这给了他一笔给船装马达的贷款。1980年，他是仅剩两个仍旧延续阿伦贝皮传统海岸白天打渔旧模式的人之一，其他人则进行夜间远距离冷藏捕鱼。1960年代中期我和村民一样，看到的是一个普通、受人尊敬、不爱争辩的好人形象的费南多。不过，我的感觉在1973年访问期间开始有所改变。

在我那一年所接触的阿伦贝皮人中，费南多对变迁的恐惧和抗拒似乎最强。其他社会科学家已经发现，外来者对外界的人和事总是表现出最强烈的厌恶。费南多提供了一个绝佳的例子（和我1973年对嬉皮士的反应一样）。费南多深夜拜访我们在阿伦贝皮南部租的消夏别墅，惶惶不安，竟带左轮手枪防身。就我所知，1960年代中期阿伦贝皮没人能拥有这样一件武器，而且枪支在1973年仍很罕见。费南多比我的其他朋友更爱反复提及，小偷和持枪歹徒肯定会猛攻“美国人的住所，因为他们觉得美国人有钱”。当然，这些都是外来者。“你根本没必要担心阿伦贝皮人。”费南多的恐惧强烈而有传染性，他的警告很快就让我气馁。太阳一下山，每一缕潜进我们孤单街区的车前灯都让我心有悸悸。“带把枪，”他说，“否则你就要被人干了。”有天晚上我们不在家，费南多想出一个从我们窗户向外扔爆竹的想法，目的是警告胆敢动念的梁上君子，屋里自有枪子儿欢迎。费南多在谴责其他嬉皮士之类外来者的极乐纵欲方面，也比其他村民表现得更加激烈。

费南多另一个不安的标志是，与过去的习惯相比，他开始过度饮酒。1960年代费南多很少喝卡莎萨，但在1973年拜访我们时，他不仅喝啤酒，还喝了满满几杯百加得朗姆酒。（我们可以对比阿尔贝托的喝酒习惯。1960年代，打一天渔回来的阿尔贝托，每晚至少会喝一小杯卡莎萨来“暖身”。他在1980年还保持着适量饮酒。相比之下，费南多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1973年阿伦贝皮的人们对很多变迁都感到不安：巴西钛业的污染，嬉皮士流浪者，大批喧闹外来者的周末造访，经济欣欣向荣，钱流涌动。阿尔贝托妻子的身心失调和他女儿无法控制的神灵附体，都表达了家庭的不安。她们两个都在坎东布雷教里寻找精神慰藉，费南多最后亦然，他总是向我提到渔民已经在指控某些使用黑巫术的船长。他暗示我：其他船长，包括托梅（他从未参加），正在参与坎东布雷教，这对他来讲，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某些人财富急剧增长的原因。费南多擅长为一个现实存在但不熟悉的进程（迅速商业化和经济繁荣）给出一种巫术解释，这在村民当中是出类拔萃的。

1973年8月离开阿伦贝皮时，我预见到费南多将会在酒精和坎东布雷教中继续寻求安慰。（我之所以这么认为，是因为他相信坎东布雷教与经济成功有关。我怀疑费南多为了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加富有，保护自己不受他人伤害，将会寻求最有效的巫术之道。）我的预感是正确的，不过很幸运只是一部分。其他

村民说，费南多在1973年到1976年间喝酒不那么凶了。虽然人们都觉得费南多喝得太多了，但他们从来不给他贴上“酗酒者”的标签。这个标签是留给那些零星工作、晃荡于酒吧周边、甚至早饭时间都在喝酒的人。费南多也在坎东布雷教里陷得越来越深，是里面唯一的船长兼船主。他最后成为卡拉努阿斯的圣父克利斯潘的主要仪式助手之一。

1980年我回到阿伦贝皮，看到费南多的行为已经稳定下来。他自身和他的生活方式都像1960年代中期那样轻松。他不再积极参与坎东布雷教，显然也不再是个酗酒者。他喝酒仅限于周日的啤酒，这也是阿伦贝皮大部分男人现在的惯习。

费南多在村民的评价中降了几个等级。有些人嘲笑他随性捕鱼，渔获寥寥。但船主和打渔的收入，一个仍住家里的儿子的巴西钛业工资，屋后一间砖房全年的租金（建于1970年代初，供观光客和嬉皮士租住），让费南多和他的家庭享受着愉悦的生活。

到1980年时，费南多和艾弗妮在阿伦贝皮变迁经济不同领域中所做的不算太大但又不乏智慧的投资，使费南多能退出1973年开始威胁他精神健康的紧张渔业工作。他和他船队的两个渔民从每周一到周五（上午八点到下午四点）悠闲的打渔工作中收获平平收益。费南多现在有时间和他的妻子、孩子及孙儿共处。他对外来者的敌意已经变得非常矛盾。有一个举动体现了他对变迁的接受，他通过六岁儿子的洗礼，获得了中产阶级干亲：一个定居萨尔瓦多的男人和他的女儿。费南多和艾弗妮把隔壁房子借给他们度周末，认识了他们。教父是个中年男人（他的工作需要跨国旅行），这种联系为费南多提供了与不同社会空间人群建立拟亲属关系的安全感。这一纽带让费南多感到，外在世界不再像过去那样充满神秘和威胁。

费南多和艾弗妮要求那个男人的女儿，而非他的妻子来做孩子的干亲，一开始让我觉得很奇怪。后来我才意识到，选择一个较年轻的女人，可以确保两个家庭间的联系维持得更加长久。

费南多继续把他和其他村民之间缺乏亲属纽带看做是个问题。他抱怨由于地下岩层很厚，他负担不起打井引水的费用。“只要我附近有一个亲戚，”他说，“我们就能分担费用。”尽管如此，费南多仍在通过他十个孩子的洗礼，并为其他十多个孩子做教父的方式，努力扩展他的（仪式性）亲属网络。

尽管费南多建立了仪式性亲属网络，经济宽裕，但他对外来者的怨怼和不安感仅是减少，远未消失。他对托梅经济下滑的解释（见下一节），证明了这一点。费南多告诉我，银行在托梅无力还贷时，剥夺了他的家宅。事实上，托梅后来证实阿尔贝托的报道不谬，托梅为偿还债务及船只维修开销，确实决定卖掉房子，再买一间小一点的。结果虽然一样，但费南多的解释表达了直接沦为外来力量牺牲品的感觉。

费南多的另一面是他不够准确。虽然我早在1980年之前就已确认，费南多在做报道人这方面的价值不如阿尔贝托，但我一直没有细想原因何在。

1980年，我问费南多、阿尔贝托，以及其他一些人同样的事实问题。阿尔贝托几乎总是对的，费南多却总是错，甚至在他应该在行的某些事情上，比如在柴油机耗油方面，身为船主的费南多估计的也要比实际低20%，而身为卖酒人的阿尔贝托则准确无误。费南多的不准确性，反映了他以一种不合实际、充满疑虑的态度看待世界的个性。

费南多吸引我们的还有他对外来者矛盾情绪的另一种表达：他既害怕外来者，又对后者着迷。像阿尔贝托和朵拉一样，当费南多开始适应了变迁，并享受着生活中适度而又稳定的流动后，他的精神也恢复了健康。到1980年，尽管仍有怀疑，但他再也不会非理性地害怕外来世界——那个让他过得还不错的世界。

我是人类学家，不是心理学家，所以我只能揣测费南多对外来者极端反应的原因。是因为他纠结于，有些他想抛开的人或事，又如影随行跟他来到阿伦贝皮吗？也许，费南多就像我们（在过去发现阿伦贝皮的其他外来者）一样，对自己立足的社区有着极强的占有欲。或是因为出身移民，他把最坏的动机归咎于其他外来者，实际上表达了他本身对自己所在社区的羡慕与嫉妒？1973年他对我们夸大危险，可能也掩盖了他想掠夺我们财富和生活方式的（无意识）愿望。或者他是把我们当做和他一样过去那些熟悉的外来者？他想象中人们要对我们做的，正是他担心会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吗？

毫无疑问，1970年早期和中期，面对快速的经济和社会变迁，费南多受到各种心理因素的影响。幸运的是，他最终调整了自己。他与许多个案和许多文化中的人们并无不同，把一种药（酒精）和一种新宗教（坎东布雷教）作为暂时的支撑。到1980年，这个外地人已经变得更加独立和可靠。外部的世界和

它的居民，虽然看起来仍然让人觉得有些奇怪，但已不再让人无法抗拒。

创新者

1964年到1973年，托梅是阿伦贝皮最成功的渔民。在外面从事了很长时间商业捕鱼后：先是在萨尔瓦多简短逗留，接着在里约待了七年，最后他于1961年回到了阿伦贝皮。1964年的托梅还在和一个不捕鱼的船主合股，船主是个店主，他的邻居，但到1965年他就解除了这一关系，拥有一艘自己的帆船。1964年，我们对阿伦贝皮所有家户的调查显示，托梅是渔民当中收入最高的。他的成功有赖于第四章里探讨的多种因素的结合。托梅在工作努力、甘冒适当风险、维持全体船员（主要建立在亲属基础上）的忠诚，以及尝试新的打渔策略等等这些方面上，远远超过其他船长兼船主。他的成功，使他在1960年代中期当选渔民协会主席。

托梅和1960年代大多数成功的渔民一样，还靠附近农业区小块农场的农产品增添收入。他的农场土地购于1964年，包括三百多棵椰子树苗，他估计七年后才能获得收成。土地也提供了各种各样的水果和蔬菜，大部分供给了他正在壮大的家庭。

到1973年，托梅的家庭已经扩大为五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和他自身的兄弟姊妹数目吻合），他的成功也更为显著。他是从合作社接受机动化贷款的第一批船长兼船主之一。他的例子，刺激其他村民加入并开始了捕鱼机动化。当托梅发现自己卖鱼比卖给合作社更能赚钱，他就成了第一个退出合作社的阿伦贝皮人。托梅的弟弟迪奥对他破坏合作社的行为很生气，但很快也随之而去。

托梅竭力从合作社抽身之时，又买了一艘带船舱的大船，这样做的还有两位不捕鱼船主。托梅开始冷藏捕鱼方式，这到1980年时已经成为阿伦贝皮渔业的主导模式。他总是寻找新岸，航行到比其他船长更远的捕鱼点。较大的船只使他能探索更北面的鱼群带。随着新模式的建立，其他两艘大船的船长（领薪）也随着托梅来到萨乌佩近海。

1973年7月，托梅已经成为年收入超过1.4万美元的企业家。他买了一辆厢式货车在伊塔庞出售自己的鱼，使得每公斤利润提高一半。他让最小的两个

弟弟用他的机帆船（改良的帆船）出海打渔，安置三重刺网（1973年广泛用于龙虾捕捞）。托梅的另一个创新性投资，是他在子女教育上的投资。最大的男孩已在外面读书。

虽然托梅是从贫穷中长大，但是他的智慧、创新、收入和教育计划，使人可以预见，他的孩子中，至少有一些会走向中产阶级。1973年8月的一个周日，我和托梅有过一次长谈，他意味深长而又不乏辛酸地讨论了他的动力和抱负。他的主要目标是，让他自己和他的家庭取得成功。他想要他的孩子们避免他童年时代记忆犹新的贫穷。托梅身为大儿子，十四岁就开始跟着父亲捕鱼，他父亲一辈子都是个本本分分的普通渔民。托梅的父母最后离异，父亲搬去和他们的干亲一起生活。（这里没有性关系因素。孩子的教父教母和父母之间有很强大的性禁忌。）母亲一个人生活，最后成为一个酗酒的乞丐。托梅说，他和四个兄弟及一个妹妹成长在一个贫穷村庄的赤贫之家。托梅1954年二十一岁时前往里约，决心创造一种迥然不同的命运。一次短暂回家，让他和一个同龄女人按照当地宗教婚礼喜结良缘。他在里约的孤单岁月中，给他的妻子、母亲和兄弟寄钱。1973年他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为他一生住在木架泥屋中的母亲盖座砖房。随着租房需求的出现，托梅当时还紧接着扩建了自己的住宅；扩建完后他就有了两座房子：后面的新房用来出租，前面的老房自家住。

在我最早调查阿伦贝皮的时候，托梅和我讲到了他在里约热内卢的经历。他认为，既然挣的钱最后买了房子和船，忍受多年他乡寂寞也就值了。1973年，他很高兴他的大儿子已经开始正式上学；他看起来也为弟弟们的成功而高兴。其中两个兄弟拥有船和三重刺网，另外两个仍在用托梅还能出海的老帆船。他的兄弟个个都很健壮，工作拼命，又互相帮助。他告诉我：“我不在乎别人怎么想我，因为我有兄弟和儿子可以指望。”

从我1973年所见的情形来看，我在下次访问时发现托梅和他的兄弟是阿伦贝皮最有钱的人，并不感到惊讶。1980年给我最大的震动是，看到了托梅真实的命运。我在回来当天从克劳迪娅餐厅的海景窗望出去，（通过名字）认出了托梅的大船，和其他半打船一起停靠在沙滩。餐厅老板告诉我，那艘船和其他大船中的另两艘是属于托梅的。“啊哈！”我想，“我预感对了。托梅拥有了整个船队。”

猜想那天他可能开着较新的帆船出海打渔去了，我就没有再理会。两天后

的晚上，我在沙滩上碰到他，当时他乘着瓦尔特的船打渔回来（朵拉的兄弟瓦尔特，是托梅妹妹习惯法婚姻的丈夫）。我和托梅打招呼，问他自己的船呢，他告诉我船要修理。直到最后我才知道托梅已经卖了三艘船中最破的一艘；另一艘已在沙滩上搁了九个月，第三艘船在1980年4月初就已停止捕鱼。我冥思苦想，为什么托梅没有修理他的船，哪怕一艘也好啊，为什么他像普通渔民一样工作？我对阿伦贝皮新经济中船主和渔民收入的两极分化了解越多，就越是对托梅的处境感兴趣。

时光追溯到1962年，我还记得托梅在北面矩形广场区的房子，是阿伦贝皮最好的房子之一。那时就已是水泥砖房，瓦片屋顶，房子正面贴着精美的葡萄牙瓷砖作为装饰。托梅甚至还增加了一个宽敞的厨房和卫生间，这在阿伦贝皮只有五六户人家才有。我还记得1973年他自豪地带着我去看他家房后新盖的出租屋。他信心十足地说：“等你下次来阿伦贝皮，就能租它了。”

1980年听说托梅不住在他家老房子时，我震惊了。后来我才得悉，他为了还债与平衡船只开销，把它卖给了度夏游客。他们全家搬到了后面用来出租的较小的房子。托梅给他妈妈盖的房子，在过去几个门不远，对着北面矩形广场区。不幸的是，她在那里住的时间很短。还是为了租房者，托梅和萨尔瓦多的人们签了长期租赁协议，给他们一年左右的租期，直到1981年中期。

在我得知托梅经济下滑的同时，我也听说了阿伦贝皮的新精英：不捕鱼的大船船主。托梅的兄弟，现在拥有五艘好船的迪尼奥，是他们当中的突出代表。大部分人都认为迪尼奥是村里最有钱的人，这曾是我想象中托梅的角色。托梅的其他兄弟也干得很好。其中一个拥有一艘船，另一个拥有一艘半船，最小的弟弟还是少年。所有人都说，托梅和他的兄弟一共拥有阿伦贝皮船队注册的二十七条船（好使和不好使的）中9.5艘。如果说我对他的家庭的预测并无问题，那么，为什么我在关于托梅的判断上会出错呢？

故事慢慢解开。费南多相信是一家萨尔瓦多的银行剥夺了托梅的家宅，他说托梅的处境正在恶化。费南多批评托梅之所以陷入困境：“他不修他的船，是因为没钱，他之所以没钱，是因为他摊子铺得太大。他从银行借了数不清的贷款，还也还不上。”

费南多把托梅的困境看做是自作自受，阿尔贝托则说到托梅的坏运气，他对比了打渔的不确定性和陆地上有薪水的雇工：“如果不走运的话，就连最成功

的船长也会失败。”阿尔贝托考虑到了马达失灵、冰块融合、饵料和资金断裂，以及出海时间等种种客观因素，但仍认为托梅失败的主要原因是“运气已离他而去”。托梅反复提到，他最大的压力，就是作为一名船主的责任。他描述了平衡船队忠诚和渔业生产力之间的关系、平衡陆上工业技术要求和渔业市场之间关系的难处：“我忙得从来没工夫休息。”

我在走访嬉皮村时，发现了托梅的故事中漏掉的一个线索。嬉皮士若奥告诉我，他从索尼娅那里租了房子，索尼娅也是个嬉皮士，和一个叫托梅的渔民在阿伦贝皮同居。他问我是否认识他。

回到阿伦贝皮，我向从来没有八卦爱好的阿尔贝托纠缠细节。我得知托梅并没有和他的妻子儿女一起住在北面矩形广场区，而是像费南多告诉我的，和嬉皮士索尼娅一起住在后街租来的住处。他们一起生活了两年。她怀了他的孩子，但是流产了。索尼娅过去是个酒鬼，喝酒引发的病差点要了她的命，现已戒酒。她看起来仍旧病恹恹的，需要昂贵的治疗。她能负担得起，一个男人说，因为她很富。

索尼娅后来几乎是吹嘘般地告诉我们，她来自一个富有的圣保罗家庭。她母亲反对她的嬉皮士生活方式，并专程赶到阿伦贝皮竭力拆散她和托梅现在的结合。索尼娅从她一个祖父母那里继承了财产，但当她成为嬉皮士后，她母亲切断了她的这一经济来源。尽管如此，索尼娅还是时不时地从她父母那里拿钱。她也从两个嬉皮士那里收房租。索尼娅曾向很多村民炫富，她向我们抱怨她无法适应托梅的生活方式。例如，她发现她很难像他那样在城市里走路或坐公交车：“我习惯打车。”托梅曾经受过索尼娅的母亲奚落，训斥她女儿怎会和“一个渔民”生活在一起。在索尼娅有关阿伦贝皮人的言论中，往往也显示出相似的鄙夷。

一些村民把托梅的经济下滑和他与索尼娅的往来联系在一起，但其他人则告诉我，他的麻烦出现在他们结合之前。他的问题在之前一年就已出现，当时托梅由于负担不起维修费用，将他的两条船从捕鱼中撤了下来。他现在正等他申请的一个政府资助的乡村信贷计划批准。他为他的两艘船申请了6700美元，准备买新的日本造马达。每个马达耗资2700美元，剩下的钱用来偿还未清贷款。托梅把他的贷款数额限定在无抵押贷款的最高额（约8000美元）之内。他不想拿他剩下两幢房子（分别价值11000、13000美元），或他两艘船（他分

别估价 4200、5800 美元) 来冒险。托梅向我指出, 尽管他目前问题缠身, 但仍拥有价值两亿克鲁赛罗 (3.3 万美元) 的财产——对于一个在 1964 年时 (加上来自打渔和种田所获食物) 一年还只能挣 1000 美元的人来说, 情况还不坏。

我问托梅: 要是贷款被拒怎么办? 他说可能会卖掉其中一条。与我讨论过托梅困境的阿尔贝托和我都认为, 考虑到船长兼船主的时间限制, 这个想法比再借一笔债要好。尽管托梅年届五十, 总是抱怨休息不足, 但他仍旧认为他是个精力充沛的男人。他是村里足球队年龄最大的成员。他提到有一次他的马达在近海出现故障: “我想让当中年轻点的人游到岸边求助, 但是没有一个能行。最后, 我穿上救生衣, 花了四十五分钟游到了岸边。” 每当索尼娅流露出对他在乡村信用社贷款的关切时, 托梅就宣称“我啥也不怕”。在过去的阿伦贝皮, 像托梅这么大岁数的男人, 早该计划从船长的角色中退役了。与之相比, 托梅相信他仍能胜任船长—渔民角色, 管理两艘船, 销售捕来的鱼。

他还没有想出一个现实的好计划, 在新的经济条件下, 清除债务, 从岗位抽身。在我看来,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卖一艘船, 用卖船的钱为另一艘船买一个马达。这样托梅就能以船长兼船主的身份在船上工作, 直到还清债务。当然, 托梅最后将不得不从渔业退休, 和他兄弟迪尼奥一样。那时他也许还能雇一个移民当船长。一开始阿尔贝托说托梅想要转运是不可能的事, 但当我建议卖一艘船时, 阿尔贝托承认这也许是个可行的办法。托梅也在脑子里保留着这个选择, 以防他没能得到贷款。

托梅对外来世界的反应, 和费南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托梅用起外来资源毫不惧色。他很轻松地就偿还了为他第一艘大船从银行借的小额贷款 (约 1700 美元)。我们 1973 年谈起的时候, 他刚刚拿到这笔贷款。一个信任托梅和他的抵押品的银行官员, 也鼓励他贷款购买厢式货车, 用到鱼类运输中。托梅的崩盘和 1973 年到 1980 年间过多的借贷有关。按照费南多的想法, 他已经自我过度扩张了。他的确也有点“坏运气”, 这个出身下层阶级、没有受过教育的男人, 确实受到外来者的肆意剥削。索尼娅曾说: “阿伦贝皮人不懂合约。” 这场与不道德贷款机构官员们接触的经历 (他们把他的还贷装进自己的口袋, 然后辩称他还款违约), 令托梅的信用下降。这些人对其他不少农民同样的所作所为, 令他们最后被捕, 托梅相信正义终会得到伸张。尽管出了这一意外, 他仍希望能得到贷款。然而, 由于现在托梅在当地有了违约的名声, 店主不愿借钱给他。

他的兄弟也不帮他。我就这件事问了托梅和其他很多人。托梅对迪尼奥尤其感到痛苦，他说迪尼奥对他早年退出合作社的事情仍旧心怀怨怼。托梅坚称他已为所有兄弟姊妹尽了长兄的责任。从里约回家之前，他已在那里为迪尼奥安排了一个很好的捕鱼工作。“比我的工作还好，”托梅说。迪尼奥和一个弟弟在阿伦贝皮北部一个村里看到一艘他们喜欢的航船，托梅陪着他们去看个究竟。他们发现价格比他们付得起的要高，托梅就写了张支票，付了差价。“迪尼奥有实力帮我。他只有一个孩子，有大把的钱，”托梅说。他对三个最小的兄弟指望不大，因为一个有一个大家庭，其他两个家庭还在发展。托梅又讲到迪尼奥还通过中介来买他的一艘船，出价远低于实际价值，不但伤人又添新辱。

对托梅的话，其他人是怎么想的呢？难道兄弟们不该相互拉一把吗？阿尔贝托认为，既然托梅的四个兄弟没有一个愿意帮他，问题一定出在托梅身上。朵拉甚至怀疑托梅所谓在兄弟们年轻时帮过他们的话。这些反应一开始让我觉得吃惊，因为我从之前的访问中了解到，托梅确实帮过他的兄弟。

最后我才想明白，其实有很多事情正发生在村民头脑中：来自地方传统基础上，对威胁到社会体系行为的回应。总是特立独行的托梅，过去是名优秀的创业者，现在有些一意孤行。他和嬉皮士的事实婚姻，考验着村民忍受的底线。村妓的标签虽然在1980年已经很少使用，但却用在了索尼娅身上。我指着索尼娅的房子，问一个妇女谁住在这里。

“索尼娅，一个嬉皮士。”

“她做什么工作？”

“我没看到她做什么，只是靠其他女人的男人过活。”

另外一个妇女，因为和一个有着合法婚姻的渔民有着相似的关系，曾被划分为村妓，她也严责托梅和索尼娅：“托梅的妻子因为他和索尼娅住在一起非常伤心。索尼娅管着那个房子。托梅除了出去打渔，一般都待在家里，他不再像从前那样打渔，因为他在家里做了本来都该是索尼娅干的事情，像洗盘子和其他家务事等等。托梅只想要他的‘小索尼娅’，”她学舌道，“她叫他‘我的小托梅’，对他大喊大叫不要把痰吐到地上。我不知道他看上他老婆或者索尼娅什么了。他老婆不但脑子缺根筋，长得也丑，就像索尼娅一样。托梅本能找个好女人。这两个女人都不咋的。”

考虑到1980年男性总体过剩，特别是男性嬉皮士过多，村民们把索尼娅的

行为视为一种极端自私的表现：“总是夸口自己富有，她从来就不像托梅的家庭一样需要托梅。”从当地公众观点来看，托梅抛妻舍子的行为是错的，尤其是为了一个社会边缘类别的成员这样去做。托梅的父亲也离开了他的母亲，但不是因为性关系。托梅的行为在大家看来更加糟糕。

例外的是，托梅对此有不同看法。他把他妻子描述成是个人老珠黄、无精打采、精神和身体都有病的女人。他的描述就像出自一个美国中年男子之口，抱怨他的婚姻缺乏激情，他的妻子没有活力，缺少吸引力，欲望消退。“她从来都不会让我像这样坐在地板上，”托梅提到。（我们坐在索尼娅外罩鲜亮的“嬉皮士垫”上，斜依着墙上的抱枕。）“我妻子会说那样坐在地上会让你感冒。我在这里感到很自在。在家里，我别想放松。”

托梅觉得妻子的两个兄弟（都是精神病）特别恶心：“他们来了，喝光了我的威士忌。”虽然托梅没有开始酗酒迹象，却也像费南多一样，比过去喝得多了。他告诉我他喜欢啤酒和威士忌，但就算是过去的好时光也有负担问题。托梅说他特烦他妻子和妹夫们的打架和大喊大叫：“我在冰冷的海上狭窄的船里出海好几天回到家，只想休息。我不想别人成天叫唤，还喝光我的威士忌。”

托梅对他的子女未来的希望也黯淡下来。托梅为他大儿子的教育投了一笔钱，可惜他并不是个好学生。他没有通过资格考试，正在找工作。第二个儿子有精神问题，“医生说是他母亲那边的家族遗传。”托梅痛苦地回忆道。

托梅时时挂在嘴边的“我需要休息”，是他对伴随成功接踵而来的过重社会义务的总结。阿伦贝皮的传统经济平均机制，与新经济的时间要求，以及托梅自身对外部资源的过度依赖结合在一起，使他陷入困境：“现在不工作的时候我通常都会待在家里，因为每次走在街上总是有人问我要钱。人们仍旧期待我给他们买啤酒，可现在该是他们给我买了。前几天一个住在嬉皮村的嬉皮士找我要钱。我对他说他现在应该借钱给我。”托梅痛恨村民们继续期待他的慷慨，却对他的资金匮乏、眼前需要帮助的问题视而不见，漠不关心。

托梅想要逃避来自婚姻、家庭、姻亲、村民，以及事实婚姻关系（没有长期的义务）中的不可承受之重。不仅如此，他选择一个嬉皮士配偶，走上了最彻底而严重的决裂之路。（我第一次听说托梅和索尼娅的事时，我对我的美国同事评论道，这比我听到托梅去法国学习结构主义还要让我震撼。）托梅在地方社会边缘的女嬉皮士（一个嬉皮士在阿伦贝皮住上足够长时间，就具有永久居民

的资格)那里找到了避难所。要不是索尼娅选择了一个已婚男人,她的名声还会好点。现在,索尼娅和托梅的结合,将他们两个人推向更远的社会边缘。

索尼娅选择托梅无疑是因为他强壮,有智慧,经济优越,雄心勃勃。托梅选择索尼娅,而不是最陌生的嬉皮士,则是为了找一个和他相似彼此相知的人。托梅有着中产阶级的渴望,而索尼娅就来自中产阶级。他们的肤色很相似。她看起来要比他妻子年轻,和他差不多。

我们研究一下家庭结构和模式也可以发现明显的原因,托梅找的这个女人很像他的母亲。索尼娅和他极度贫困又是孪生子之一的母亲一样,曾罹酗酒,也有一点社会性隔离。在我们的谈话中,他几次通过他子女和他兄弟姊妹(五个哥哥和一个妹妹)的类比,肯定了他父母的离异对他自己婚姻破裂的影响。他也略带嘲讽地告诉我们,索尼娅的父亲最近为了一个年轻女人离开了妻子;他明显是将其比作自己。

托梅和索尼娅的关系也说明,他愿意体验或经历外在世界。和来自巴西南部城市中产阶级嬉皮士一起生活,让托梅又创造了与不同社会领域的联系。不过这一次他似乎做了错误的选择,就像他欠下太多债务一样。索尼娅评论村民读不懂合约,以及她在托梅接受大的乡村信用贷款时流露的担心,表明她清醒地认识到阿伦贝皮人在和外部世界打交道过程中所面临的危险。托梅本该借助见多识广、富有同情心而又值得信赖的外来者的帮助,最好地利用外界资源。但索尼娅并不是这样的人。我们问她为什么不在托梅签协议时,对协议内容提出建议,她说自己不想掺和他生意上的事:“托梅想要做什么,就很确信;一旦做了决定,就很难改变他的想法。”

在托梅的生意和在地方社会的地位这两方面,索尼娅似乎都无能为力。托梅需要的是比索尼娅更了解外在世界事情运作的人。矛盾的是,让索尼娅这样一个中产阶级成员成为托梅的伴侣的理由(她想离开自己的背景和外部联系),也让她无法胜任托梅与外界机构沟通的责任。托梅需要的是能帮他处理外界事务的人,而不是从巴西国家文化中逃逸的人。更坦率地说,阿伦贝皮人需要的是外来者教会他们如何使用刀叉,而不是如何享受豆芽和健康食品。

1980年8月,托梅正在等待贷款的消息,这笔贷款既可能让他东山再起,也可能让他倾家荡产。如果贷款失败,他将不得不作出一个艰难的决定:卖掉一艘船,保证另一艘船能维持经济收入。托梅对我说,和船主的收入相比,日

常打渔收入菲薄，他说这话时还是站在他习惯的船长兼船主的立场上。这种看法并非高高在上，他还有重新再来的机会。

托梅和索尼娅计划，等他的船可以再次捕鱼，就搬到新租下的地方。他们目前的租处对冷藏柜来讲显得太小——如果他准备卖鱼，冷藏柜是必需的。他们正在寻找月租低于 125 美元的房子。一旦他和城里人的租约期满，他也许还会搬回以他和他母亲名字登记的房子里。

托梅的故事延续到 1980 年 8 月，他的故事说明了阿伦贝皮的过去如何影响着现在，以及不久的将来。经济平均机制仍旧如此。社会义务与成功相伴，深陷泥淖的托梅从偏常中寻找逃避。他通过一般人眼中反社会的行为，把自己与能提供帮助的亲属基础分离开来，而从另一方面看也避免了付出。在分析的最后我们要谈到，托梅从外来者那里得到的好处是有限的，不但不如人们想象的，而且实际也很少，远及不上他受到的损失，而他之所以会走到这一步，还因为他在教育、权力和其他中产阶级优势方面的缺陷。贫穷是古老阿伦贝皮经久不消的印记。她的贫穷今天已经嵌入国家阶级结构中，这绵延数辈的沉疴痼疾，不是靠追求成功的雄心壮志，或逃避中产阶级的逸民，就能轻易治愈的。

那时，更好吗？^[1]

“那时多好啊，对不对，康拉多？”一个和我同龄的当地女人（当地中学新任校长），回想起我初到阿伦贝皮的时光说道。她的家庭条件有了很大改善。1962 年，她的父亲经营着村里主要的店铺，和别人合伙拥有一艘收成不错的渔船，在阿伦贝皮几乎无人不晓。数十年来他的生意走了下坡路，因为当地村民都在萨尔瓦多、伊塔庞的杂货店，或是一个星期来一次的超市巴士买东西。十多家酒吧、旅馆和小商店也增加了竞争。

1980 年时，阿伦贝皮人对待变迁的看法存在明显差异。某些人，如阿尔贝托，只看到新阿伦贝皮好的一面。然而，对于大多数村民来说，新变化不再像我之前到访阿伦贝皮时那样让人兴奋新鲜。而在 1973 年，阿伦贝皮人好像完

[1] 本节是第一版的尾篇。



1980年康拉德·科塔克在后街做田野。村民们真诚地为我们此次重访所感动。我想他们把我们视为与本书主题对立的某种复杂象征。我们不仅是柏油路、嬉皮士、旅游和工业出现之前过去生活的遗迹。我们也同时象征着传统和变迁、过去和现在。（杰拉尔德·米拉尼克惠允使用）

全被新人群、新技术和新机遇所吸引，几乎无暇顾及我们这些熟悉的、不再让人兴奋的外来者。与之相比，1980年，很多村民怀旧般地说起过去的时光。不少人都对我们谈起，他们至今还记得1960年代我们开车搭载他们的事情。一个船长提到，他永远感激田野调查领队哈里斯送他妻子去萨尔瓦多的医院。村民也永远不会忘记1963年田野调查队副领队福尔曼载着一个孕妇奔向医院的路上，女婴在车里降生的事情。达利娅阿姨的儿子记得我有一次把他从路口村载到阿伦贝皮，现在阿伦贝皮最大的资本家迪尼奥，当年我也这么载过他，那天他结束了两年的商业捕鱼，从里约热内卢回来。

“你没有忘记阿伦贝皮，”一个村民对贝蒂说。

“你和康拉多总是经常回来。”很多村民真诚地为我们1980年的重访所感动。我想他们把我们看成是与本书主题对立的某种复杂象征。^[2]我们不仅是柏

[2] 即为“桃花源”梦惊醒前的永恒、纯粹的梦境。——译注

油路、嬉皮士、旅游和工业出现之前过去生活的遗迹。我们也同时象征着传统和变迁、过去和现在。虽然我们就是这场中产阶级和外国人侵入未经察觉的序曲，但我们早已为当地人所吸引，休戚与共，并因之而融入了他们更深层的社会历史当中。可以肯定，1980年我们仍是外来者，但这种长久的相知，让我们见证并成为过去阿伦贝皮的一部分。

1980年愉快的停留，让我难忍离别的伤感。星期天离开之前，我安排了周六下午和阿尔贝托一起工作，理清某些看法，询问最后的问题。我走入他的家门，期待像以往那样坐在他的露台谈话时，却恼火地发现一群喧闹的周末酒客，占据了我本来打算谈话的地方。我开着租来的汽车，拉上阿尔贝托、我儿子尼古拉斯，远远朝南开去，将最南边的消夏别墅和1973年我住过的街区抛在了身后。

我们坐在沙滩上谈话，随着海潮涌起不断后退，以免潮水溅到摊在我膝盖上的田野笔记本。8月底的暴风过后，大海比我以往看到的更加汹涌、浑浊。空气里有一股刺鼻的臭鸡蛋味。风暴卷起的海潮，把工厂废物带到比往常更加近岸。我在想：阿伦贝皮的旅游吸引力和渔业能够维持多久？污染最后会毁灭这个在我的生命中如此重要的地方吗？下次旧地重游，阿伦贝皮会变成什么样？船主会一直这么富裕吗？朵拉会建起她梦想中的房子吗？托梅会重获辉煌吗？落日的余晖透过巴西钛业冒出的烟雾，洒在布满硫化物的海面，将淡绿色的海水又染成了血红色，那些问题在我的脑海中一一闪过。

（《远逝的天堂》第一版完）

第十二章

整个世界都在向阿伦贝皮开放

全球化指的是，国家、地区和共同体，在以经济往来、大众媒体和现代运输体系为基础连接起来的世界体系内，越来越紧密的联系。阿伦贝皮对全球化的力量已不再陌生。这些外来力量包括：人类学田野调查队，嬉皮士，巴西钛业，它是跨国公司德国拜耳集团的一个分支机构。在之前的章节中，我们思考了这些外来力量的影响。本章我将集中讨论媒体对变迁中的阿伦贝皮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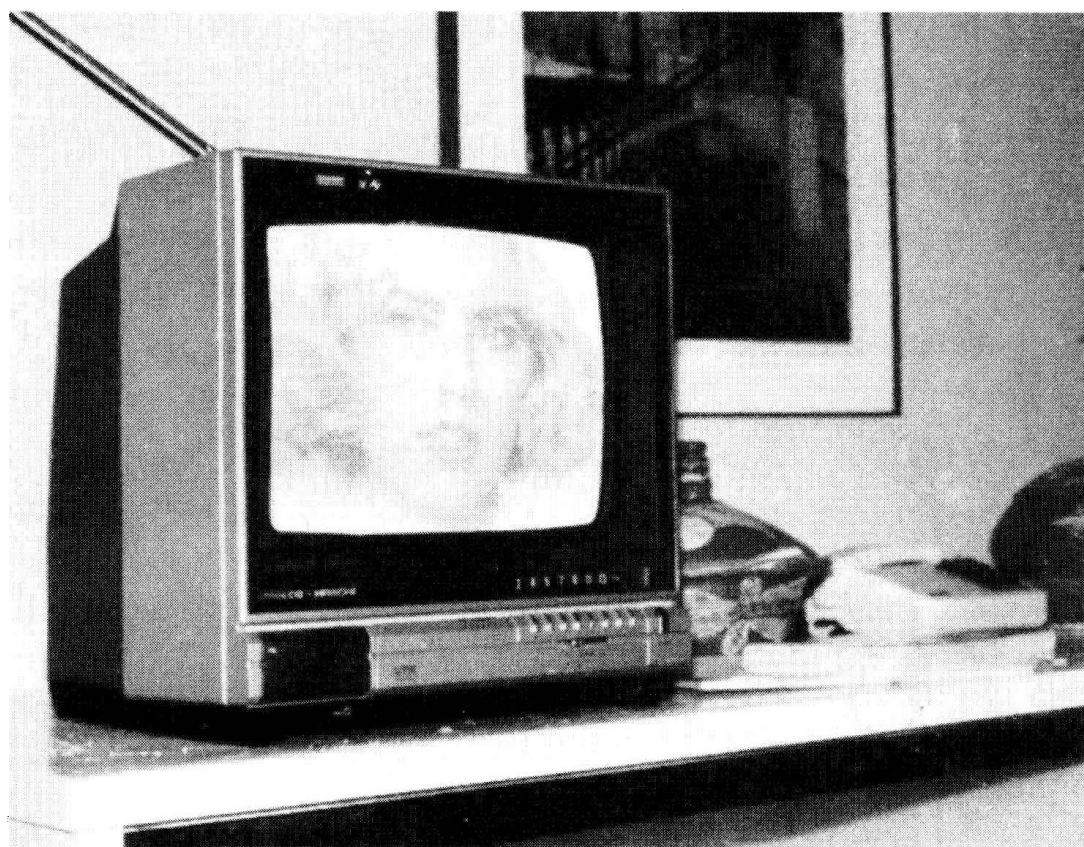
1980年的田野之旅过后（第七章到第十一章的基础），我拜访阿伦贝皮的次数有所增多。1982年到1987年间，我计划并指导了一个团队调查项目，这个项目每年都把我们（贝蒂、我和我们的孩子：朱丽叶和尼古拉斯）带回阿伦贝皮。1991年至1998年间，贝蒂，我，或者我的学生们，则为其他调查项目经常返回。（我最近一次拜访阿伦贝皮是在2004年，详见第十四章。）1980年代中期的项目，建立在我对大众媒体日渐增长的兴趣上，尤其是电视对地方文化和社会变迁的影响。（这一研究和发现参见1990年出版的拙著《黄金时段的社会：一项关于电视和文化的人类学分析》。）

电视是当今世界最强大的信息传播者、观点塑造者和社交中介之一。电视在转瞬之间传递着国内外的图像和信息。媒体推动了消费文化在全球的扩张，刺激了货币经济的参与（Hujanen, 1976）。电视已经成为堪与家庭、学校、伙伴、社群和教堂相竞争的一个主要社会中介（Comstock et al., 1978）。媒体在吸引公众关注全国问题和事件上，扮演着主要角色（Hirsch, 1979）。

国家与世界的联系

电视扩展了巴西人的视野，使其超越家庭和社群的边界，在家户和国家之间架起了一道桥梁。就日常层面而言，电视把异国景象和亲戚、朋友、邻居之外的人们带入家庭。电视介绍了别样的风土人情。让农村人瞥见了城市生活，让城里人看到了乡下人。鉴于巴西有大量文盲和闭塞的乡村，电视已经成为人们了解全球信息，建立与陌生人之间社会互动想象的首要来源。

阿伦贝皮的第一台电视，是一个本地女人 1973 年买的由电池提供能源的电视，这个女人名叫露米妮塔 (Luminata，与“照亮物” [the illuminated one] 不谋而合)，住在中心广场。1973 年逗留阿伦贝皮期间，我注意到（但并没有太



大多数阿伦贝皮人现在都有电视。不少甚至还有家庭电话。电视介绍了别处不同的风土人情，本章的题目就来自 1991 年一部电视连续剧《莎乐美》(Salome) 中的一句台词。(康拉德·科塔克摄)

留意),每晚聚在她窗边的人们,正在竭力解释当时照亮露米妮塔客厅里闪烁不定、模糊不清的黑白图像。电视真正对阿伦贝皮产生显著影响,要到村里通电之后,通电后村民们买了自己的电视,通过电视越来越多地了解到外界的事件和体系。我第一次注意到电视起到把外在信息带入阿伦贝皮的作用,是在1980年。我能在1960年代的背景下看待这一信息爆炸。那时阿伦贝皮人对了解外面世界的信息可谓如饥似渴。有限的媒体,教育的缺乏,文盲,贫穷,以及糟糕的交通,都加剧了他们与外界隔离的处境。

像成百上千之前由于隔离与教育缺乏而边缘化的其他巴西人一样,电气化的实现和电视机的到来,使阿伦贝皮人参与到全国性交流体系中。他们通过电视,可以频繁接触到外界信息、城市文化,以及国内外文化。1980年代,村民们反复告诉我,电视使人们长了见识。一个年轻男人一语道破:“有了电视,你足不出户就能了解整个世界。整个世界都在向阿伦贝皮开放。”

到了1980年中期左右,电视带来的直接结果便是,阿伦贝皮人有了更开阔的世界眼光。1984年我们做的简单调查显示,阿伦贝皮人认出照片上的迈克尔·杰克逊和认出教皇一样容易,比认出里根总统或巴西总统主要候选人的照片还要容易。不过,我们后来做的更细致的调查显示:虽然诸如杰克逊、麦当



贝蒂和尼克(1991年)沿着柏油路向南逛到椰子广场(北面矩形广场区)。阿伦贝皮已完全通电,有固定的巴士线路。(康拉德·科塔克摄)

娜和胡里奥·伊格莱西亚斯^[1]这样的国际明星在巴西家喻户晓，但巴西的电视实际上在推广民族文化方面要多于国际文化。

文化差异：电视和阅读

和巴西一样，电视也是北美国家最重要的大众媒体。然而，与巴西不同的是，电视在北美是很多已经风靡几十年的媒体之一。与电视在巴西的影响相比，人们接触时间更长和范围更广的平面媒体与广播，调节了电视在美国的影响。巴西从来就没有阅读传统，印刷出版业在19世纪之前都是非法的。

有关阅读的文化传统差异，在日常生活场景中处处可见。例如，很容易在巴西的沙滩上认出外国人（尤其是北美人）。他们是带着书的人。巴西人有时会把报纸带到沙滩上，但很少会带书，他们去那里是为了进行社交。台灯在巴西的旅馆房间和家庭中难得一见，也说明了阅读习惯上的文化差异。巴西人把书籍和印刷品看成是学校、正式教育和工作等公共世界的一部分，以及官僚国家的法规与文牍，他们把阅读看做与社交相背。因此，印刷物就从家居与家庭这些更亲密的世界中分离出来（见 DaMatta, 1987）。相比之下，收音机和电视，因其更易分享的特征，受到巴西家庭的欢迎。

巴西人认为电视或收音机具有社交性（下详），不像印刷物那样缺乏社交性。虽然收音机在1950年代巴西的大小城镇随处可见，但相对较晚才深入遥远的农村。小型晶体管收音机曾在1960年代早期的阿伦贝皮风靡一时，到1965年，便携式收音机成为通常的地位象征。男人们会拿着现钱在萨尔瓦多或里约买这些东西（如果他们有机会去那里从事商业性捕鱼的话）。托梅这样的男人为了炫耀他们的收音机，让别人能听到（即让大家都能听到），往往会带着他们的“消息盒”在村子里走来走去。他们把频道调到足球比赛、音乐和新闻，包括“美国之音”葡语广播。

阿伦贝皮人很少有机会阅读印刷品。村民识字率很低，学校老师只有四年级教育水平。虽然几乎没人能享受阅读的乐趣，但人们对偶尔从城里带回的画

[1] 胡里奥·伊格莱西亚斯 (Julio Iglesias)：西班牙情歌圣手，演唱风格融合拉丁热带风情、美国乡村歌曲，兼有加勒比海舞曲风格。也曾到访中国。——译注。

报却是看得津津有味，还有不少村民喜欢翻看地方民俗、歌谣册页。

从巴西印刷媒体的历史背景来看，大量文盲和对待阅读的文化态度，使大多数巴西人在电视到来之际，对媒体的认识还表现得非常落后。电视进入巴西家庭受到的竞争，远远小于美国。对大多数巴西人而言，电视是了解地方、国内、国际信息的主要渠道（很多时候甚至是唯一渠道）。尤其是对非精英来说，电视是村落通往全球化的主要入口。

研究电视

我在阿伦贝皮亲身观察到的信息爆炸，是我决定研究电视对乡村巴西人更广泛影响的一个原因。巴西对我们理解大众媒体的影响也有特殊意义，因为它有（也许现在仍是）世界上收看人数最多的商业电视网络（环球电视台[Globo]），主要播放它自己的产品。环球电视台的全国新闻和“肥皂剧”，即电视连续剧（更简单的叫法是连续剧[novelas]）最受欢迎。这些电视连续剧每星期向全国播放六个晚上，分三个时段，吸引了大量观众（1980年中期高达40%—95%）。这三个时段以六点片、七点片、八点片著称，实际播放时间分别是6:10、6:55和8:25。七点和八点的连续剧中间，有地方新闻和全国新闻隔开，吸引的观众量最大。

电视连续剧和美国肥皂剧的不同之处在于，每星期播放六次（而不是五次），而且是在晚上。另外一个不同是，巴西连续剧会拍完播放，美国肥皂剧则会拍摄多年。标准的连续剧有一百五十到一百八十集，持续六七个月。电视连续剧就像狄更斯的小说，先按既定长度（每月）分章节写好出版（小册子）^[2]，以连续剧的形式解决一系列冲突与问题，特点总是地位的逆转，尤其是向上流动。大多数连续剧的场景都设在城市，通常为里约热内卢或圣保罗。

虽然巴西也有其他（不太流行的）商业电视网，但环球电视台对播放的覆盖是北美任何电视网都不能企及的。它在1980年代中期，一直吸引着六千万到八千万夜间观众，约占巴西总人口的一半。环球电视台也把它的产品出口到

[2] 例如《大卫·科波菲尔》，就按十九个月每月三十二页排好，连载于1849年5月和1850年11月之间。



Florisca Tavares, 阿伦贝皮受过良好教育的新教师成员之一。她站在她位于卡拉努阿斯的房子前面, 靠近任教的学校。(康拉德·科塔克摄)

一百多个国家, 跨越拉美、欧洲、亚洲和非洲。

我计划并指导的电视调查项目(1983—1987), 包括巴西不同部分的四个点(最后是七个点)的田野工作。^[3] 我们的方法是, 比较(接触电视时间长短不一的)人们和地区, 收看电视的不同程度。我们使用一套统一程序, 在每个点搜集数据。除了民族志调查, 我们也使用两张打印的调查问卷(更确切地说是访谈大纲, 因为是访谈者而不是受访者写下答案)。我们1984年早期在里约扩充

[3] 国家博物馆社会人类学部, 里约热内卢联邦大学的一个学部, 合作参加了这项计划, 为康拉德·科塔克提供了机构协助, 提供田野研究员 Rosane Prado 和 Alberto Costa。当时任职于国家博物馆、现任教于圣母大学的 Roberto DaMatta 教授, 是我们和蔼的巴西联络人。

了这些大纲，同年7月将其发放到阿伦贝皮，进行试点研究。我们带着经过提炼、设计、打印好的大纲，在1985年6月到10月对阿伦贝皮进行了深入访谈。

收集到数据，我们就能评估收看电视长度、程度和很多其他变量之间的关系。^[4]我们访谈了很多几乎没看过电视的人们^[5]。我们选择一个亚马逊镇作为一个田野点的原因是，我们的调查开始时，这个市镇还没有碟型卫星天线。全镇只有十多台电视，依赖昂贵的天线接收来自首都非常微弱的信号。我们主要关注电视对人们关于世界的知识、态度、感知、情感和想象，以及电视在推动社会变迁和经济发展方面的影响。

[4] 我们的很多统计分析，使用了“多元回归”技术。用它来衡量在几种潜在预测变量对一个因变量分别（及共同）产生的影响。例如，预测心脏病风险（因变量）时，潜在预测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家族病史、体重、血压、血清总胆固醇、运动和抽烟。每个因子都有各自影响，一些因子对其他因子有影响。然而，携带很多风险因子（尤其是最显著因子）的人，比其他有较少预测因子的人，有更大风险会得心脏病。

我们对电视影响的研究，使用包括九个预测变量的一套标准，检查它们对很多因变量的影响。我们的九个预测变量是性别，年龄，肤色，阶级，教育，收入，宗教虔诚，在家看电视的时间长度和目前收看电视的水平。需要指出的是，我们的调查设计，让我们可以检验两个电视变量的预期值：目前收看电视的水平和在家看电视的时间长度。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我们的样本包括人们在家看电视的不同时间长度。相比之下，调查美国人，必须依据目前看电视的水平，作为电视影响的主要潜在预测变量。这是因为，除了与年龄相关的变量，看电视的长度几乎没有变化。大多数年龄在四十岁及以下的美国人，从来没有经历过没有电视的世界。

在美国，年龄有时作为电视累积效应的间接衡量标准。这一假设是电视影响老年人（高于四十岁）的时间比年轻人长。然而，这一方法很难区分看电视时间长度与其他年龄方面影响之间的差异。相比之下，我们在巴西的调查样本，包括收看电视不同时间长度的同龄人。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在家收看电视的年限与年龄段本身区分开。同样也可以把与累积效应相关的当前看电视习惯影响，和在家收看电视的长度相比较。我们评估了这些预测变量对许多因变量（例如，观念、态度和购买模式）的影响。

[5] 我们在每个调查点使用一整套统一的定量和定性程序搜集数据。我们使用两份打印的访谈大纲，做了超过一千八百份结构性访谈，涉及上百个变量。一份大纲针对家户（样本数 $n=847$ ），另一份针对个人（样本数 $n=1032$ ）。

跃跃欲试加入世界体系

就我们大多数人而言，很难全面了解电视的社会影响的范围，因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几乎没有遇到不与电视接触的人。因此，有关另一种文化的民族志，对我们了解这一点，有相当重要的作用：

人类学通过描摹其他文化模式，对本文化进行自我批判，瓦解我们司空见惯的事物，让我们重新检验自己那些想当然的想法。

(Marcus & Fisher, 1986, p.1)

多数北美人士从来不会有这个机会，通过个案前后比较，观察到电视所起到的两个巨大作用：(1) 激发对知识的好奇和渴望；(2) 提高认识外界社会并与之交流的技巧。在巴西，经常收看电视的观众，对外界有更全面的认识，能够了解和解释更多来自外界的信息。电视用全国统一的方式对待村民，让村民在遇到外来者时，更容易与他们打交道。下面我通过一个住在阿伦贝皮的女人，娜迪亚，来说明这些影响。

1984年6月，在我们对访谈大纲进行试运行（试点测试）期间，我访谈了我的隔壁邻居娜迪亚，她二十五岁左右，与媒体一点都没接触过。娜迪亚几乎不识字，生活中也没有电视相伴。她有一台收音机，大多数时候用来听音乐。娜迪亚和她为别墅看门的丈夫，在1981年搬到了阿伦贝皮。他们来自巴伊亚州一个遥远的乡村，那里比远离城市生活的阿伦贝皮还要与世隔绝。

虽然娜迪亚来到阿伦贝皮已经三年，但她还是处于与当地缺乏实质联系的生活当中。她只敢拜访她的一个邻居。甚至连购物，也要让她丈夫去办。娜迪亚觉得包括大多数阿伦贝皮人在内的陌生人都让她感到威胁。即使白天，她和她丈夫也不让他们的三个小男孩在街上玩耍，以免与邻居引起什么麻烦。

虽然娜迪亚和陌生人谈话有困难，她还是答应回答我的问题。但当我访谈她时，询问问题的过程让我越来越有负罪感。问及她的朋友和家庭时，娜迪亚回应犹豫，泪流满面。她说她没有朋友，她想她妈妈、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娜迪亚渴望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如果她中了乐透彩票，就盖座房子（更好地抚养她的小孩）。她对里约或圣保罗知之甚少，也很难想象那里的生活。

娜迪亚给了我一个糟糕的报道人印象，她还不习惯或者说是没兴趣和陌生人谈话。访谈就像拔牙，对我们两个人来说，都是一次非常不愉快的经历。娜迪亚的某些行为无疑反映了她的个性、性别和阶级位置。作为下层劳工阶级的一员，她和精英毫无联系，尤其是男人。她的经验使我不断怀疑，自己为什么会想和她谈话超过一分钟——尤其是想要引出她的观点。那年我无论何时遇到她，她都是低眉顺眼，躲避视线，压低声音，谦卑恭顺，这是大多数贫穷的巴伊亚农村人（尤其是妇女）在和他们认为的高级社会打交道时所习惯的举止。所谓高级社会，对娜迪亚来说，几乎意味着她所遇到的每一个人。

不过，我们有理由认为，娜迪亚的某些行为，是因为她缺乏与媒体接触的经历。1985年6月，也就是那次灾难般访谈后第二年，我回到阿伦贝皮做正式访谈。与此同时，娜迪亚家中添了一台黑白电视机，他们全家经常能看电视。我注意到，娜迪亚的举止发生了一些变化。她不再像1984年那样害羞和内向。她现在经常拜访邻居们，和贝蒂聊天，当我们谈话时看着我的眼睛，工作的时候唱歌，有时也开开玩笑。当我再次访谈她时，她表现出和别人一样的回应。

这些变化对贝蒂和我而言是显而易见的，但对娜迪亚和每天看见她的人们来说，她是在渐变，而且这些变化与电视没有任何明显关系。虽然娜迪亚会说1985年她快乐多了，她感到在家更快乐，她也不能得出结论说是电视改变了她的生活（我们的问题之一）。但是，我想那正是她身上所发生的。

电视使村民得以熟悉城市和全国的规范。使他们在和陌生人、在和来自社会较高等级的人们打交道时，更加自愿，更加确定。很多北美人做了错误的“常识”猜想，认为电视使人们隔离。跨文化证据说明，实际情况恰恰相反，电视非但没有使娜迪亚与社会隔断，反而提高了她的社交技巧。

为了进一步阐明电视的效果，可以我和奥尔加的遭遇为例，她是1985年夏天我在阿伦贝皮访谈的第一个人。奥尔加是个在我1960年代认识时就已五十五岁的妇女，她很高兴再次看到我。和娜迪亚不同，她热切地和我谈话，回答我的问题。但让我吃惊的是，在这样热烈的欢迎之后，她像娜迪亚去年一样让我的访谈变得十分困难。

奥尔加和阿伦贝皮中心地区的女儿和孙子住在一起。她从来没有过一台电视，也很少去邻居家看电视，但她热心参与坎东布雷教和其他节日。奥尔加让我想起1960年代我已知道的很多上年纪的未婚女人（那时被分类为村妓）。她

的热情反衬了已婚妇女过于拘谨的行为。

当我访谈奥尔加时，她毫无娜迪亚的羞涩。但对于大多数村民（尤其是那些收看电视的人们）都能轻松回答的问题，她都无法回答。

她是怎么看待同性恋关系的？

“很好，”奥尔加说，显然，她虽也有可能很熟悉同性恋行为的例子，但她从未听说过这个术语。

我问她是否同意“朋友的朋友也是朋友？”

“当然了。朋友们是好的。”

“你在街上、家里、学校学到的，哪个最重要？”

“是的，从学校学到的是重要的。”

“比从街上学到的更重要吗？”

“是的，从街上学到的非常重要。”

“比你从家庭学到的更重要吗？”

“哦，是的，从家庭学到的非常重要。”

“这三个当中哪个最重要？”

“它们很重要，好吧。没错。”

从这和其他相似的早期访谈来看，我们的田野工作队很快就留意起“奥尔加类的报道人”。这是我们对一类人的称呼，他们毫不熟悉我们的调查信息收集过程，在回答选择性问题和大多数村民都能“自然”作答的问题上存在困难。奥尔加类型总是那些很少收看电视的人。

另外一个很有意思但却相当不同的例子是保罗，他是个相当富有却不识字的渔民，保罗喜欢看他的大彩电，喜欢听立体声。癖好归癖好，保罗仍要花时间管理渔船，偶尔指挥渔船，维持他三个妻子和两个家庭的生计。（他是阿伦贝皮闻名的多妻者。）他从电视上得到有关外部世界的大部分信息。他是个新闻迷，比大多数村民都要更了解政治时事。（保罗可能比大多数美国中产阶级还要了解时事。）作为一个外在体系的热衷参与者，保罗担心因为他从未学过读写，可能无法在以后的选举中投票。

另外一个电视迷是杰米，即我们在第八章讨论过的巴西钛业的工人朋友，我们以前的送水男孩，他识字且受过较好教育。杰米说他经常买书（包括他骄傲地向我展示的一本百科全书），以便更多了解他从电视报道上看过的事情。

杰米恰恰证明了我们的观点，驳斥了看电视有害阅读的“常识”假设。我们发现实际情况刚好相反：在巴西，看电视能大幅提高对印刷媒体的使用。^[6]

看电视既表达也促进了对信息更为普遍的渴求。电视上的信息吸引了村民，激发了好奇，让很多人阅读更多。随着读写能力提高、接触印刷品的渠道增长，在巴西，最爱看电视的人，也成为那些最渴望书籍、杂志和报纸的人。

图像、态度与渴望

巴西电视主要的城市背景，将城市带入了乡村，把大都市带到了小城镇。里约和圣保罗这样人口过密、污染严重和充斥暴力的大都市生活，和乡村、城镇、小城市的生活截然不同。环球电视台的连续剧，带来了城市的魅力与复杂景象。摄像机镜头偏爱里约和圣保罗的自然魅力和建筑魅力，忽略了它们更肮脏的一面。相比之下，同样受欢迎的新闻节目，则提供了更为负面的图像，尤其是犯罪方面。

由于电视传递了矛盾的图像，让我们暂时无法弄清人们对城市生活景象的看法。^[7]例如，看电视模式对于我们的问题：“你愿意你的孩子们生活在大城市吗？”^[8]就给出答案。巴西农村人，尤其是阿伦贝皮人，对里约的看法（大多数连续剧的场景）要比对圣保罗的看法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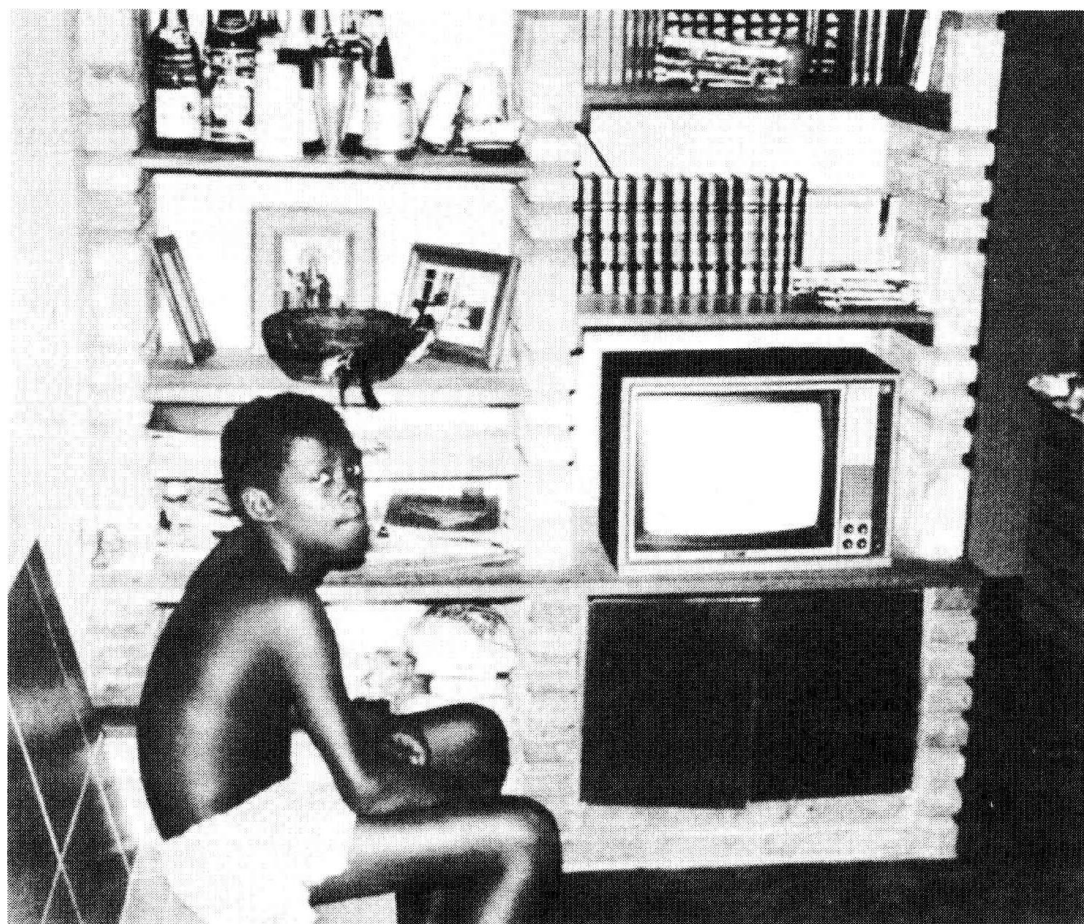
商业性电视（在美国、巴西和其他地方）偏爱那些引领诱人生活方式的人们。电视中的富有家庭展现了他们的生活，鼓励消费文化。片中人物一定能买得起片中赞助的产品。电视把产品信息直接带给乡村人民，新的消费模式在发

[6] 家庭藏书数量和日常看电视时间之间有很强的统计相关性。在我们的整个样本中，看电视和读写能力（个人的读写能力，一家之主的读写能力，家庭藏书数量及相关方面），在较低收入和较高收入人群中，有很强的相关性。

在全部样本中，当前看电视的小时数在影响我们阅读指数（基于答卷人是否定期阅读书籍，加上杂志和报纸）的唯一预测变量中（排在影响力更大的教育之后）居第二。

[7] 我们询问的一些问题包括：你怎么想象你在里约、圣保罗、州府的生活？你愿意去参观每个城市吗？你愿住在这三个当中任意一个城市吗？这三个城市你最喜欢/最不喜欢住在哪个城市？你希望你的子女住在这些城市吗？

[8] （较深）肤色，性别（往往是男性），以及（较年轻的）年龄会回答愿意。



Marcio 想要成为一名专业足球运动员，他已加入一个在萨尔瓦多的训练营。他也是名优秀学生。可以从 Marcio 家看到，看电视在巴西乡村激发了更大的阅读兴趣。（在低一点的架子上甚至能看到一本生态学小册子。）（康拉德·科塔克摄）

型、饮食和穿衣打扮方面都显现出来。

我们提的一个问题意在引出消费文化的信息：如果你中了彩票，你会拿这些钱做什么？大多数村民都说他们会将其存入储蓄账户。我们也问人们是否会开设储蓄账户、何时会开，因为电视经常建议这一选择。阿伦贝皮在 1960 年代中期还没有一个人有储蓄账户，但在二十年后很多人都有了。了解村民的看电视水平，可以使我们非常准确地预测其是否有储蓄账户。^[9]（更好的道路和公交

[9] 对于“你有储蓄账户吗？”在与回答说有的人相关的七个预测变量中，目前看电视的小时数居第二。

服务也增加了去银行的通路，便利的交通使得储户更易参与消费经济。）

电视激励了想要向上流动的愿望。“提高生活”(*Subir na vida*)是连续剧中普通的表达。大多数连续剧都是灰姑娘式的故事：一个来自较低地位(有时是乡村)家庭的女孩或男孩，和来自较富有(总是城市)家庭的某个人结婚。巴西电视中跨阶级的友谊和浪漫，把阶级A(上流阶级)、B(中产阶级)和有时是C(上层工人)的成员联系起来。^[10]极少有工人阶级的角色和来自上流或中产阶级上层的某个人之间擦出浪漫的火花。阶级D(从事较低等工作，失业的穷人)成员，和他们贫穷、不适合上镜头的生活，在娱乐节目中出现更少。就连电视连续剧的幻想世界也认为，这种人几乎没有机会通过和精英通婚“提高生活”。

我们最清晰的调查结果之一^[11]是，巴西电视启蒙了对社会问题，尤其是关于性和性别角色的自由主义观念。更爱看电视的观众观念更自由，其程度令人惊讶——在诸如家庭是否是女人的归属；如果丈夫收入丰厚，妻子是否应该工作；怀孕时是否应该工作；是否应该离开她们不再爱的丈夫，去酒吧追寻她们喜欢的男人；男人是否应该做饭、洗衣服；父母是否该和他们的孩子们谈论性，这些问题上的选择不似传统。所有这些问题引出了受电视影响的答案，这些答案显示，巴西电视中基于城市现代化现实的性别角色观念，确实不像阿伦贝皮这样的社区那么传统。

[10] IBOPE(巴西公共观点统计研究机构)建立了一个实用的社会阶级尺度来评估观众的购买力。它的分类包括A(上层阶级)，B1(中产阶级上层)，B2(中产阶级中层)，B3(中产阶级下层)，C(工人阶级上层)，D(工人阶级底层和没有主要收入的人们)。这一尺度建立在除去某些基本开销之后，家户剩余收入的比例和总量基础上。这些必需品包含食物，公共设施(包括电话)，学校教育支出，衣服，交通和个人卫生花费，医疗服务和家政服务。需要指出的是，IBOPE使用巴西文化标准来定义中产阶级的范围。例如，巴西大多数中产阶级认为家政服务(一个佣人或厨子)是必需开支。(美国人的对应项应该是洗衣机。)

IBOPE把所有这些细目加在一起得出开销总量，从总收入中扣除全部开销。剩余收入除以总收入，得出可供商品消费收入占总体收入(即可自由支配收入)比率。IBOPE使用这一收入比率把人们划为不同的社会阶级。该组织也关注实际的总收入。IBOPE发现某些非常贫困人口必须千方百计节省基本开销，但仍无钱购买电视兜售的物品。

[11] 在我们“自由的社会态度”指数中，预测变量的分数从高到低依次是：受教育年头，在家看电视年头，性别(女性)，日常看电视小时数，宗教虔诚(负相关)和家庭收入。



尽管性一性别观念更加自由，当地妇女仍旧承担着所有洗衣家务。照片中是她们在阿伦贝皮北边的泻湖洗衣服，这里同样是她们接受社会化的地方。（康拉德·科塔克摄）

我们看到的这些结果是显著影响，还是仅仅相关呢？也就是说，巴西电视是让人们更加自由，还是让已经自由的人们，为了强化观念，收看更多的电视？他们想从电视和城市精英的世界中，为他们自己在更传统城镇中缺失或压抑的生活，寻求更多的道德选择吗？

我的结论是，自由化既与看电视存在联系，也算是看电视的影响。我们发现，自由主义社会观点和当前收看电视的小时数之间有显著联系。巴西小镇上倾向自由主义的人，之所以比更传统村民看电视更多，也许是为了验证被地方环境所压抑的个人见解。虽然调查证实长时间观看电视会对这类看法产生影响，但我们发现，多年在家看电视和自由主义社会观念之间有着显著联系。

笃爱电视的人似乎天性上更倾向自由主义观念。久而久之，电视连续剧的内容每天进入家庭，强化了这些观念。随着村民从（全国性）节目中找到了他们日常生活中非正统（地方性）观念的合法性，受到电视鼓励和强化的态度便在村民中传播开去。越来越多的城镇民众接触到非传统的观念，并开始把它们视为正常。

节日、地方文化和世界体系

我们也发现，电视增加了全国与国际大型庆典的普及。这些庆典包括圣诞节和嘉年华，与之对应的节日是巴西人的狂欢节（Mardi Gras）。主要地方节日公认的重要性，在较长收看电视的人们当中出现惊人的下降，基督教和圣诞节的庆祝则大为增加。^[12]

虽然电视帮助嘉年华超越了它的传统中心（里约热内卢和萨尔瓦多），向其他城市扩散，不过当地对嘉年华电视图像的反应，并不仅是对外在刺激的简单或统一回应。当地民众对嘉年华的反应，既不是照单全收，也不是生硬模仿，而是多样化的方式。他们的反应包括所谓刺激性传播（*stimulus diffusion*）与创造性对立（*creative opposition*）过程。城镇民众会改变他们的传统地方节日，有时去适应（刺激性传播），有时去避免（创造性对立）嘉年华景象。

刺激性传播比通过简单模仿的直接借用要更为常见。也就是说，地方群体对嘉年华本身并不在意，但是他们把嘉年华的元素和主题加入他们的地方庆祝中。这些模仿电视所展示嘉年华庆典的地方庆祝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有了规模性增长。

当地的回应也可能是消极乃至排斥的，比如在阿伦贝皮，嘉年华就从来不明显得非常重要。这也许是因为嘉年华与主要地方节日在日期上十分接近，如在二月份举行的纪念圣弗朗西斯的节日。现在，很多阿伦贝皮人不仅抗拒嘉年华，而且对主要地方节日的排斥也在与日俱增。村民们憎恨圣弗朗西斯已经成为“外来者”的事情。每年二月份，它都会吸引成千上万名游客前来观看。商业利益和外来者已经攫取了圣弗朗西斯的节日。

其结果是，很多阿伦贝皮人现在说他们更喜欢也更愿意参与，6月纪念圣约翰、圣彼得和圣安东尼的节日。和圣弗朗西斯的节日相比，这些节日在1960年代不过是小事。村民们现在怀着新的活力和热情来庆祝这些节日，以此回应外来者和他们真实的及电视播放中的外来庆典。

对另一项传统活动而言，外来的注意力产生了更喜人的地方反应。电视的

[12] 在家看电视的长度，是地方庆典影响较小的关键预测变量。正如预测变量所示，统计也证实在家长时间收看电视，确实增加了狂欢节的重要性。



照片中的渔民 Aurino Alves (Zuca) 和他的小女儿在电视台新拍的查干察（渔民舞剧）中出任主演。（康拉德·科塔克摄）

覆盖激发了村民对一年一度传统查干察表演的更大参与。这是渔民演的再现葡萄牙人发现巴西的舞蹈剧。阿伦贝皮人于 1985 年首次到萨尔瓦多市区，为电视台表演查干察。查干察是一项很多巴伊亚州城镇都有的以剧目为特征的传统表演的一部分。我们可以在这里看到，电视对地方群体表达自我、传播亚文化所起到的潜在作用。

这些是电视影响阿伦贝皮（及巴西乡村其他地方）当地生活的许多方式之一。我应该强调的是，电视的影响并不是当地社会对不可抗拒的外来刺激所表现出的简单自动反应。电视观众并不是媒体冲击的消极受害者。相反，他们用各种方式，将新出现的观念和消息，结合到他们自身的生活中。他们通过看电视，检验观念，发展爱好，或是找到地方环境阻止乃至谴责的问题的答案。人

们用电视来慰藉挫折，建立或提高自我形象，计划活动，规划社会交往，设计生活方向。当然电视观众与电视之间的互动，有时也会导致出现不切实际的计划、虚妄的奢求、失望和挫折。不管怎样，电视的影响过程并不是像“万能的主角打僵尸，僵尸被打爆”那么简单的一件事。

仅仅是表演者

在阿伦贝皮继续进行的调查中不断涌现出的新信息，展现了社会变迁的力量和个人史的延伸。故事不断延续，问题终获解决。

我们在阿伦贝皮进行的电视项目调查，主要集中在1984年夏天和1985年。1985年，为了在阿伦贝皮做正式访谈，两个新调查员加入了贝蒂和我的团队。一个是纽约城市大学亨特学院调查方法专业的研究生，巴西人伊兰尼·埃斯科拉诺。另一个是佛罗里达大学人类学专业研究生佩尼·麦基，之前他在巴西有过多年调查经历。

有了新人，念旧人？1982年到1985年间，阿尔贝托一如既往地帮助我们，看望我们，但肺癌逐渐耗尽了他的元气，最终于1987年离开人世。朵拉则于1985年初突然去世，她被酒后驾车肇事逃逸的司机撞倒。等到我们的电视调查结束，加上我们最好的两个朋友离去，我们对阿伦贝皮的拜访就短促多了。我们为朵拉和阿尔贝托的去世难过，不再像过去那样热衷逗留。

阿尔贝托曾是1960年代村民中不多的烟民之一，1970年代烟瘾加剧。他在1980年左右已经戒烟（和我一样），但是那年和1982年我都注意到他的干咳。阿尔贝托最后咨询萨瓦尔多的医生，1983年做了肺癌手术。1984年7月，他看起来恢复得相当不错，但是1985年咳得更厉害。1986年更加衰弱，他的家人觉得他可能不久于人世。卡罗琳娜打算在他去世后搬走，搬去她在鱼湖村的房子，她女儿玛丽亚和“丈夫”伊万从1985年开始就住在那里。

1987年2月，在我安阿伯尔的办公桌前，我接到了伊兰尼打来的电话。她当时为电视项目核准一些信息在阿伦贝皮逗留。伊兰尼从当地旅馆打电话告诉我，阿尔贝托昨天夜里去世了。她前天还拜访了他，她尤其想让我知道，他去世前还说起了我们的友谊。



朵拉在这条街上建起了她梦想已久的房子，这是鱼湖村四条街道之一。（康拉德·科塔克摄）

由于1987年8月回去做一个短访，我发现阿尔贝托的家人卖了他在后街的房子。卡罗琳娜搬往鱼湖村，和玛丽亚、伊万及她的孙子住在一起。伊万和玛丽亚在前院经营一间酒吧，就像卡罗琳娜和阿尔贝托在阿伦贝皮操持的那间酒吧。

我们用了好几年时间来接受阿尔贝托的去世，但是朵拉的死讯却令人震惊。我们为电视项目在1984年7月和8月做预调查时，还总是看到朵拉。我还记得对她检验过我们的访谈大纲。我问某人是怎么“提升生活”的（目的是评估她对电视连续剧常用行话的熟悉程度），朵拉用她典型的戏谑方式，爬上了客厅的一把椅子。

那年和朵拉说再见的场景至今仍历历在目。贝蒂、孩子们和我一边钻进我们租的汽车，一边快乐地保证：只要基金一到位，一年后就会再回来。“到明年，”我们带着北美人特有的自信承诺道。（钱能搞定任何事。）“到明年哦，”朵拉答道，“老天保佑，”跟着她又说了一遍：“老天保佑。”

那次邂逅永远不再有。朵拉极其丰富的人生再也不会滋养我们的生活了。1985年春，我收到了阿尔贝托给我写来的第一封也是唯一一封信，从他稚拙的字迹中解读出隐含其中的讯息：“我很抱歉地告诉你，朵拉过世了。”她是怎么

死的，他没有说。

我们7月回到阿伦贝皮，从朵拉的妹妹、费南多的妻子那里得知了细节。肇事逃逸司机是一个城里来的周末酒客，他撞倒了朵拉。当时是一个星期天晚上，朵拉从阿伦贝皮村镇中心她干亲（二儿子教母）经营的酒吧打完工，正在步行回家。朵拉现在住在鱼湖村，正准备在一块好地皮上盖起她梦想的家园。她被撞的时候，正等她六岁的女儿在路边小便。没想到一霎时人就没了。

在我们的帮助下，加上她在酒吧的工作，以及周末和夏天饮酒狂欢客人的小费，朵拉攒够了新家所需要的花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同样是周末饮酒的方式——表现为致她于死地的醉驾杀手（一直没被送上法庭）——却也引发了朵拉的死。

虽然阿尔贝托和朵拉都从新经济中受益，但他们两个也都是发展的牺牲品。阿伦贝皮的传统烟斗和嚼烟草习惯，不会造成阿尔贝托的肺癌，而酒后驾车在过去的阿伦贝皮几乎是一种微不足道的威胁。



家庭主妇 Irene Tavares 在她的客厅。（康拉德·科塔克摄）

相比之下，托梅和费南多就要幸运多了。第十一章的预言没有应验，让我非常高兴，托梅和索尼娅的联姻最终还是帮助了他。索尼娅的父亲决定带着他年轻的情妇在阿伦贝皮安度晚年，把托梅当做他的个人退休账户使唤。索尼娅的爸爸给他上了年纪但依旧精力充沛的“女婿”买了一条簇新的渔船，让托梅去萨尔瓦多捕鱼。渔业收益为住在阿伦贝皮村镇中心的托梅和索尼娅提供了较好的生活，老岳父则在嬉皮村的椰子树下尽情享受嬉戏和海风。

费南多的境况几乎没有改变。他保持着我在1980年看到的那种适度的生活方式。费南多偶尔也去打渔，但大多数时候都是把他的小船租给别人，包括消夏游客和带游客出海打渔的村民。费南多和他的妻子也从他们的大家庭中有所收获。他的子女不少都已长大，一些还受过良好教育。一个儿子在巴西钛业上班，另一个儿子也快要去那里上班。最出色的是，他的三儿子是个大学生。

生活还在继续

因为我的调查，我们全家在1973年、1980年，以及1982年至1987年每年一次，都会回到阿伦贝皮，阿伦贝皮对我的孩子朱丽叶（1968年出生）和尼古拉斯（1971年出生）的生活同样也很重要。朱丽叶记得她的五岁生日，就在1973年8月我们离开阿伦贝皮之前，我们邀请村里的小孩、他们的父母和我们的朋友到我们的别墅共庆生日。朱丽叶还记得她和阿尔贝托最小的女儿旺达的友谊，旺达十五岁就怀孕让她惊讶不已。

可能是因为我们和阿尔贝托共处的时间相当之多，尼克和他的关系非常亲近。当我出去访谈其他人时，阿尔贝托有时还会帮我负责照管尼克。这位老师发现了一个新学生。阿尔贝托把1960年代他和奈尔斯、我建立的交往模式用到了尼克身上。他想要教尼克打渔。

尼克的运动能力，尤其是他的跑步能力，给阿尔贝托留下深刻印象。一天他和尼克打赌，他不可能在一个小时内跑到卡拉努阿斯（路程约一英里远），把那里的房子数一遍，然后跑回来。当阿尔贝托和我还在他后街房子的门廊上谈话时，尼克已经完成了他的任务，这让阿尔贝托又惊讶又赞叹。（卡拉努阿斯有一百多座房子。）

1988年尼克申请哥伦比亚大学时，学校让他写篇“影响你生活的成长环境或经验”的作文，尼克写到了阿尔贝托，这一点也没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尼克允许我在这里引用那篇作文的部分内容。

追忆阿尔贝托（作者：尼古拉斯·查尔斯·科塔克）

算起我到巴西来的那么多次，我在那个国家渡过了我生命中一段重要的时光，这段时光的一半是在里约热内卢（我妈妈[是本地巴西人]在那里有一个大家庭），另一半是在阿伦贝皮（位于东北海岸的一个村庄）度过的。那个小渔村到1987年2月时，还是一个对我非常特别的人的家，他叫阿尔贝托。渔民阿尔贝托1964年成了我爸爸的报道人和朋友，当时我爸爸正在为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在那里做文化人类学研究。爸爸做完论文，继续在那里进行研究，借此我就在很多年里（分别是1973年、1980年、1982年、1983年、1984年、1985年、1987年）在阿伦贝皮度过了很多岁月。两岁时，全村人都知道我是康拉德和贝蒂（我妈妈的昵称）的白肤金发的儿子。阿尔贝托是最喜欢我的村民。一种独特的父子关系就这样开始了。

阿尔贝托的妻子卡罗琳娜，先后生了十三个孩子，但因贫穷、营养不足和当地卫生条件所限，只有三个活下来，其他孩子很小的时候就都夭折了。活下来的三个孩子都是女儿，我相信这也就是为什么阿尔贝托对我这么好的原因。我就是他从未有过的儿子。

记得有一次，阿尔贝托和我沿着刚刚铺好的道路散步。一辆汽车从后面开过来，我感到他残废的手紧紧抓住我的胳膊，把我远远从路上拖开。他看起来吓坏了，也许是因为他已经看过那么多年轻的生命离去。在我两岁时，阿尔贝托喜欢带我去沙滩，在那里他会为我抓一只白色的小螃蟹，然后在我前面放开。我就会在螃蟹后面一边追一边喊“siri, siri”。siri就是“小螃蟹”，这是我最初学到的词汇之一，那年夏天及后来，阿尔贝托又教会了我更多的事情。他总是让我把一个单词说上好几遍，直到我掌握了正确的发音。当我长大一些，他告诉我他打渔经历的故事，包括他在港口使用雷管打渔不小心炸掉三个手指。他告诉我能逮到各种各样水生物的最佳地点。他总是不断教给我新事物。

我十三岁生日那天，他给我带来晚餐美食：一只大龙虾，这承载了他对我最大的关爱。他宣称这是自己像以前带我一块儿去的时候那样在暗礁下逮到的，但我知道这不是真的，因为暗礁几乎已不再有龙虾藏身，而且阿尔贝托自从做了肺癌手术，已不可能再像从前那样敏捷地在暗礁搜寻龙虾。虽然他从来没有承认过，但我知道，事实上，他是用自己不丰的收入，为我买了这份不菲的礼物。

1987年2月，我得悉阿尔贝托死于肺癌，寥寥数年已将他折磨得奄奄一息。次年夏天，我满怀悲伤，最后一次拜访了他的妻子、女儿和孙子们。“*A vida continue*”（生活还在继续），他的女儿安慰道，我知道她是对的。阿尔贝托是我和父亲共享的记忆，事实上这把我们彼此拉得更近，这种感情在我们的一生中都无法磨灭。在我的成长过程中，能与这位智慧而又温馨的巴西渔民亲密相处，是我人生中永远无法忘怀的经历之一，这也就是我为什么选择它作为这篇作文主题的原因。

第十三章

下一代

1987年之后，我们直到1991年6月才回到阿伦贝皮。^[1]贝蒂、尼克和我为了“巴西生态保护意识的出现”这一新研究项目回到这里。尼克当时十九岁，是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系学生，和我1962年第一次到阿伦贝皮做田野工作时的情况一模一样。他和我一起来做一些民族志，并为新研究会用到的访谈大纲（调查问卷）做试点调查。我的女儿朱丽叶，当时正在瑞士，以医学学生身份在世界卫生组织进行夏季交流。

这个新项目和电视调研一样，由巴西和美国学者组成的一支团队共同执行。这一次我们也是在巴西不同地区做田野比较研究。上次我们已经选择了接触电视不同时间长度的城镇。这次我们的田野点面临不同类别和程度的环境威胁，如水和大气污染、放射性污染和滥伐森林。我们研究环保意识的性质、范围和原因，以及可行的补救行动。我们认为当地民众如果意识不到环境污染的危害，就不会采取环境保护行动（就算人们意识到风险的存在，也不一定就会涌现出环保组织和行为）。

1991年，巴西正在准备1992年即将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UNCED）。巴西人民的环保意识已经迅速提高，但是环保意识最强的

[1] 1991年我去阿伦贝皮的田野考察，得到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通过国际地球科学信息网络中心（CIESIN）对密歇根大学的资助。1992年到1994年的生态意识项目得到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的资助。

仍然是国家的中南部，尤其是城市。越来越多关于环境问题的报道已经传播到像阿伦贝皮这样的地方，但是，尽管已有差不多三十年的大气和水污染，这里的环境危机意识仍然停留在最初阶段。另外一个紧迫的威胁是来自阿伦贝皮镇政府所在地的保罗石化总厂（Pólo）造成的地区性水污染。自1965年来，卡马萨里成倍扩张，成为一座石化魔都。有毒污水现在已经渗入当地的小溪、河流乃至沿海水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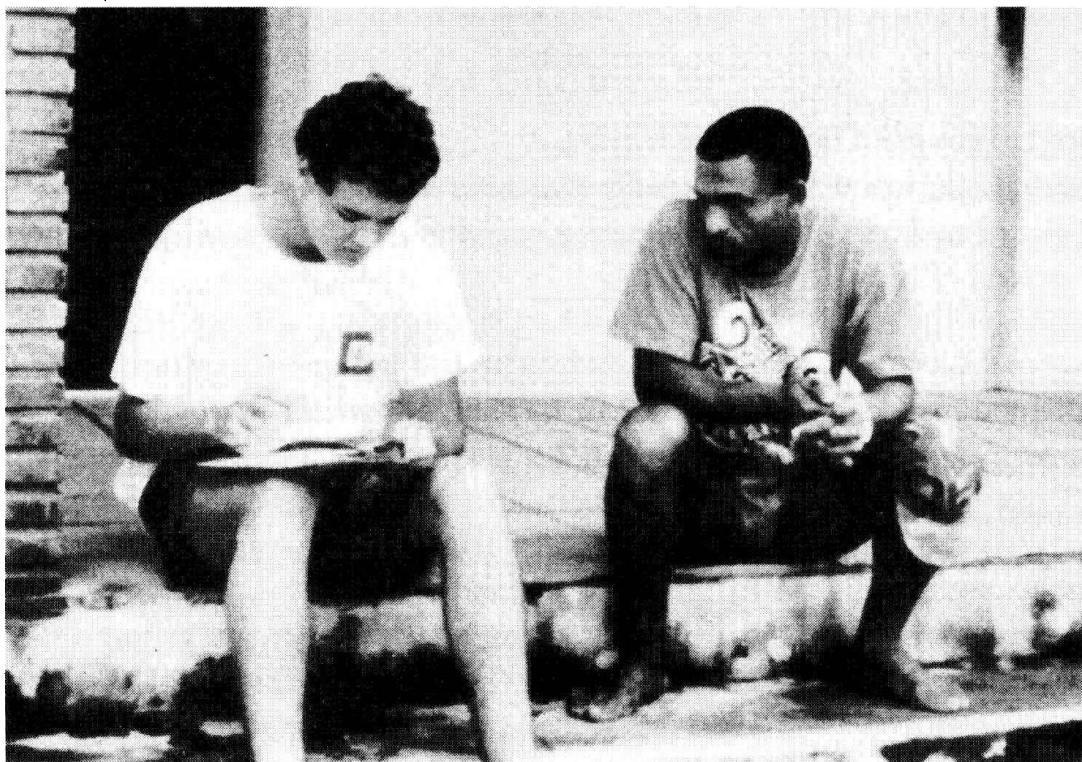
住在阿伦贝皮和卡马萨里政府所在地的人们，仍然遭受着工业污染的威胁。来自萨尔瓦多的记者，已经好几次报道了对海洋、河流及泻湖的威胁。尽管许多村民观看了这些电视报道，但是当地民众的环保意识并没有随着风险的增加而提高。

阿伦贝皮并未自动吸收或接受来自世界体系的经验教训，也没有认识到生态的潜在益处。我们在第十二章了解到地方反抗是如何影响像狂欢节这类节日的传播的。人们出于深嵌当地文化与经济之中的原因，还可能会抵制世界体系提供的另一种经济可持续发展模式的生态价值，环境保护论也常常与当地民众对就业需求的认识发生冲突。我们的访谈表明，大多数阿伦贝皮人都是只考虑巴西钛业给他们村镇带来的好处，即使他们也意识到了巴西钛业引发的环境问题。

如果说需要什么补救措施的话，就是需要关注环境问题，但是巴西下层阶级的环保意识还非常薄弱。比如，许多阿伦贝皮人常常从电视上听到生态一词，但他们觉得这与亚马逊、国际会议、印第安小偷、摇滚歌星一样，而不是像空气和水污染这类地方问题。

我对阿伦贝皮较低环境风险观念水平的认识，可以追溯到我1985年在沙滩上走过一段很长的路。就在村庄北边，每隔几公里，就会看到一些海鸥的尸体，总共有几百只。我看着那些鸟儿疲弱地滑翔到沙滩上，在降落的地方很快死去。我又震惊又好奇，觉得这应该与石油泄漏或汞中毒有关。但是几乎没有村民在意。当我去寻求原因时，人们只是淡淡地说：“那些鸟儿病了。”

巴西民众（尤其是那些在城市受过教育的人）的生态意识，在1980年代中期开始发展起来。成长的一个原因是，经过二十多年军事统治，民主公共辩论再次回归。从那时起，媒体对生态威胁的报道增长，提高了民众对环境污染的风险认识。尤其重要的是一次放射性事故的发生。事故于1987年9月发生在巴西中部戈亚斯州的戈亚尼亚市。拾荒者们在一家废弃诊所找到一台诊断机，



下一代的两个成员——尼克访谈 Francisco Nascimento。(康拉德·科塔克摄)

将其卖给收废旧金属的人，后者打开了它。里面有个装了铯 137 粉末的胶囊也被打开了。废品商的朋友和家人触摸了发出磷光剂味道的粉末。他们把放射性铯当做有魔力可以治病的药物，把粉末擦到身上。1987 年，受辐射的人（最后超过一百人）开始显露出辐射病的征兆，直到这时这一切才为人所知。

继戈亚尼亚之后，全国其他地方也都爆出了生态危机。1991 年左右，大多数巴西人都知道了焚烧亚马逊热带雨林，道路建设、淘金（使用有毒的水银）的影响，以及其他世界体系对土著人群和土地的侵入。媒体也报道了石油泄漏、水银渗入河流、工业污染、糟糕的废物处理的风险，以及具有环保意识的劳工领袖奇科·蒙德斯^[2]被杀。

1991 年，巴西聚集了当时的科学家、政府、环保主义者和公众都在思考的一系列问题。在这一背景下，我们的新调查聚焦于与生态风险相关的地方认识

[2] 奇科·蒙德斯(Chico Mendes)：1988 年，因挽救亚马逊河流域的热带雨林不被采伐而被枪杀。——译注

和行为。我们探索的众多问题包括：普通巴西人是如何意识到环境风险的？风险认识是怎样与减少环境及健康威胁的行动联系在一起的？

1991年在阿伦贝皮逗留期间，为了给后来“地方对环境风险认识”（1992—1994）的系统调查打好基础，我们还为在阿伦贝皮和其他社区使用的访谈大纲做了进一步试点调查。这些问卷调查了人们关于自然、进步、经济发展、风险和环境的看法。

尼克完成了大部分试点调查。在他的帮助下，我们完成了好几个正式访谈（每个访谈持续一两个小时）。我们和当地人就包括生态和污染在内的很多问题做了非正式访谈，让我们了解了自上次访问以来当地发生的新闻。

变迁在继续

1991年6月一个并不晴朗的日子，我们抵达阿伦贝皮。我们像1980年到阿伦贝皮的第一天那样（见第七章），去了克劳迪娅的餐厅。餐厅人满为患，我们在外面酒吧区域面对老港的地方找了一个位置坐下。紧挨着克劳迪娅酒吧的南面，是船只靠岸的地方。

餐厅酒吧老板克劳迪娅的女儿艾德丽，帮我们更新了地方新闻。1980年她提到的第一个名字就是托梅，他在1980年代中期复兴，现在又衰落了。1989年，托梅的大船一次出海长达十天，在他返回港口快要到阿伦贝皮时严重受损。现在它就躺在克劳迪娅酒吧附近的沙滩上，散了架。这一幕让我想起离经叛道的劳伦蒂诺遭弃的船，这条船1960年代被砍了烧火。传统的平均机制似乎仍在起作用。把自己从当地社会隔离开来的人们并不会因此获利。

几天后，我们看到托梅的妻子索尼娅，这位昔日的女嬉皮在他们北面矩形广场区的家门外哭泣。当时是星期天晚上，下着雨。索尼娅披着大围巾站在那里，等她丈夫从极其漫长的一天出海归来。托梅为了接上前天的安排，凌晨三点就出了家门。我们知道他本不打算停留太久，因为他邀请了我们来吃中午饭。他自己连早饭都还没吃。

星期天刚下午时，索尼娅就经过我们的房子捎信说托梅还没回来，她希望他能快点回来。我们临时改变计划，安排和他们一起吃晚饭而不是午饭。



Francisco dos Santos 在本书首版中找到他 1960 年代的照片很高兴。(康拉德·科塔克摄)

托梅是一个人驾着他的老式无马达小帆船出海的。他现在做网捞，主要是捕龙虾。前一天他还告诉我他大船失事，缺乏资金修理的事。在这之前是（他有一定信用额度的）银行破产。托梅宁愿指挥自己的小船，也不愿像普通渔民那样为像他仍拥有三艘大船的兄弟迪尼奥这种人干活。托梅说他已经厌倦了把日子耗在出海，以及打渔、管理和雇佣的责任上。

托梅现在从他以往的职责中解脱出来，从捕捞龙虾中获取了充足的收入（“我再也不用和任何人分摊了”）。托梅没有给他的小船买一个马达，而是买了台很好的冷藏柜，储藏他的龙虾以便卖给度夏游客。不过他的确希望很快能实现机动化。装一个马达将会让他的工作速度更快，更省力，也更稳当，要知道，一个人驾船打渔是种很艰苦的工作。

托梅对他的境况似乎自得其乐，但其他人则取笑他。“托梅‘船长’来了，”当我们望着托梅在礁石间毕力前行时，一个年轻男人评论道。“倒霉苦逼的男人。他以前有条什么都不缺、连彩电都有的船，现在却连个马达都没有。没人

想和他一块打渔，他太苦逼了。”

在大多数村民眼里，托梅孤身一人打渔是“疯了”。“一个人去那里会掉进水里淹死。渔网捕鱼有可能被渔网缠住淹死。他会被鱼鳍刺伤，失去知觉，然后淹死，”费南多一一枚举，这世上永远不缺的就是对坏事的想象力。

在我看来，索尼娅没理由不担忧托梅。外面下着大雨，加上托梅只身一人在暴风骤雨的大海上驾着一叶小舟，怎不教人心悸。

贝蒂评论说，这本书里的研究个案，似乎总与好运无缘。

索尼娅想叫人出去找托梅。我们沿着几个门走到费南多家。他很关心托梅，但现在晚上，惊涛骇浪，况且费南多自己没有船。我问托梅的兄弟和儿子，他们所有人都有船。索尼娅说她已经和他的兄弟谈过了，但是每个人都喝醉了。

“我们去找迪尼奥吧，”贝蒂建议道，“也许他会有些主意。”索尼娅上了我们的车，我们驱车向迪尼奥在主广场的房子开去。大门紧闭，四周黑洞洞的。“跟我来，康拉多，”索尼娅说，“迪尼奥的老婆喜欢大喊大叫；如果你不在，她会说我的。”我们敲了好几次门，这个女人才出来。“迪尼奥睡了，我也不想叫醒他。现在太黑了，什么路都看不见。如果明天托梅还是没回来，到时候再去找时间绰绰有余。他知道怎么开船。我打赌风向是反的，他决定在哈瓦靠岸。”

“我们给哈瓦那边打个电话吧，”我提出。我知道阿尔贝托的一个兄弟住在那里，也许他那里有电话。索尼娅跑到阿尔贝托母亲的房子里要到了电话号码，从旅馆打过去。她和一个住在哈瓦的男的讲话，他“认识托梅和他的船，每天都看到托梅在那里撒网”。但那天他没有看见他。

由于没有听到任何能减缓焦虑的消息，索尼娅出发去找托梅的儿子，叫他去他爸爸。我们出去叫一贯警惕的镇长豪尔赫，让他去看看有没有那种能管事的海岸巡逻队。（让我们惊讶的是，阿伦贝皮确实还有一个当地海岸巡逻队代表。）

我们和豪尔赫正说着话，突然传来一个好消息：托梅回来了。什么事情绊住了他？他要解开网线：一刮暴风雨，网线必然会给缠住。风向确实是反的。但托梅并没有在哈瓦靠岸；就在迪尼奥的老婆在她门口跟索尼娅大喊大叫的时候，他已在阿伦贝皮下了锚。

那天晚上，我们比以往更生动地体验到，没有马达一个人打渔的危险。

我在讲这个不断延续的故事时，给我留下的最深刻印象就是社会隔离。在

外来者和度夏游客中有很多朋友、待人和气的索尼娅，仍旧隔离在阿伦贝皮本地人之外。托梅经过一系列选择和行为，也倾向于外来者而不是地方社会体系。因此，地方社会也以其对待离经叛道者一贯的反应对待他们，哪怕他们是当地村民中最出色的人。

* * * * *

我在第六章已经指出，1973 年左右乃至之前，阿伦贝皮 1980 年代（包括我们在 2004 年最近访问中看到的）主要变化的舞台已经搭好。变迁的规模继续扩大，程度的加深有甚于类别的增加。

因此，政府进一步进入地方生活。村民认为市政府带来的大都是好处，包括一个更大的新医疗站，配有好几个医师和一个社工。1991 年左右阿伦贝皮有了垃圾收集、市政清洁和邮政服务。经过地方政府的努力，村镇看起来比以前好多了。中心广场（现在名为圣弗朗西斯广场，因为那边有守护圣人的小教堂）和北面矩形广场区（现在的椰子广场）两个地方都铺了路。醒目的桌子和茅草的顶棚，让主广场颇有点公园的味道。

阿伦贝皮人积极地看待当地生活。我们问起阿伦贝皮的生活是不是比过去好的时候，几乎每个人都说是的。我们问起人们是否会喜欢住在大城市，几乎每个人都说不。当我们问起当地生活和大城市相比是好还是坏时，村里的每个人都更喜欢阿伦贝皮。

当地继续在大兴土木。鱼湖村的四条长街（两边都出现了新房子），有了很多和阿伦贝皮一模一样的房子。一个清晰的变化是，阿伦贝皮的社会领域分离为两个社区。先前的阿伦贝皮正在日益成为一个另类者和外来客的村镇，大多数本地阿伦贝皮人现在更喜欢生活在鱼湖村。卡拉努阿斯仍旧肮脏破败，偶尔洪水泛滥，保持着由度夏游客、本地村民和边缘移民组成的涣散混合体。这里没有出现任何鱼湖村那种明显的社区精神。

对于阿伦贝皮的儿女们，鱼湖村已经成为邻里的选择。毫无疑问，这表达了对社区被外来者占据的地方反抗。我们看到几点鱼湖村社区认同的迹象。一个驻节阿布朗提斯的德国神父，在新建的教堂里举行日常弥撒。（他在不同的日子里在阿伦贝皮主持弥撒。）鱼湖村的民众甚至选择了他们自己的保护神康西卡奥（Conceicao，生育女神 [Our Lady of Conception]）。他们正在计划纪念她的年度节日，以此替代阿伦贝皮已遭异化的圣弗朗西斯庆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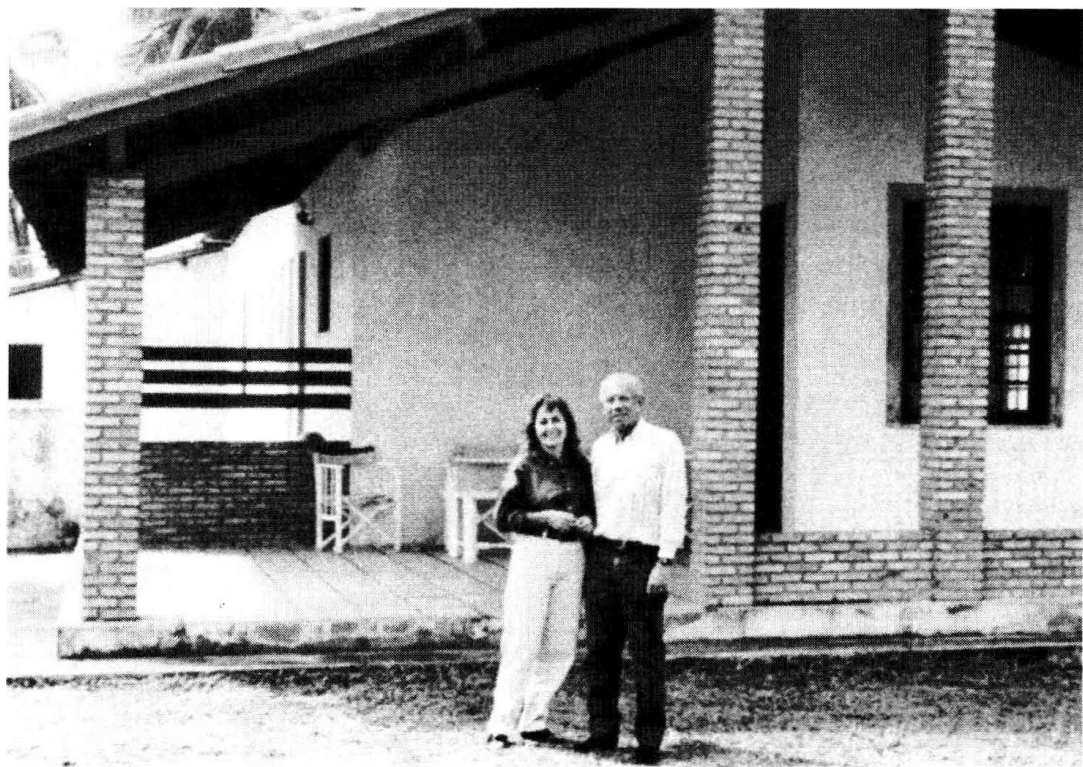
Francisco Nascimento, 一个学校门卫兼临时泥瓦匠, 为他亲手给母亲建造的坟墓而骄傲。坟墓和墓碑是阿伦贝皮出现的另一个新特征。(康拉德·科塔克摄)

阿尔贝托能干勤劳的“女婿”伊万, 用朵拉儿子奇科的话说, 已经成为鱼湖村的“首领”。伊万和玛丽亚经营着一家兴旺的酒吧兼饭馆(卡罗琳娜的房子在后面), 赚的钱够他们买辆汽车。伊万动员邻里参与地方事务, 包括鱼湖村1991年举行的圣约翰庆祝仪式。

1962年我们第一次看到的圣约翰庆典前夜和当天(6月23—24日)的仪式活动, 已经有了巨大发展。村民们仍给客人们提供玉米布丁糊糊, 煮花生, 烤玉米棒, 用卡莎萨调成的甜酒。人们仍在街上跳舞, 但传统的篝火现在几乎每家每户前面都有布置。阿伦贝皮的人们(包括度夏游客潮)在主村庆祝, 鱼湖村的人们则举行另一个可以与其媲美的节日。

职业分化加剧的势头也在延续。更多的当地男孩都在巴西钛业上班而不是当渔民, 虽然当下工厂的解雇潮, 加强了人们对失业问题的认识。随着建筑业保持旺盛势头, 搞建筑也成为工作之选。

工业污染问题依旧没有解决。市政府终于关注到卡马萨里的保罗石化总厂



阿伦贝皮传统地主家的成员 Ester 和 Jaime Coelho Pinto，在他们的夏季别墅前合影。（康拉德·科塔克摄）

引起的河流、海洋污染。阿伦贝皮北面几公里外，正在建设一条管道系统，将保罗石化的废水通过处理设备导入大西洋。（处理中心，简称 CETREL，位于卡马萨里和阿伦贝皮西北部几公里的海岸之间。）管道会把这些废水运到九里外的大海。一些村民害怕有毒废物会被冲到阿伦贝皮，因为主要的洋流是朝南的。其他人则认为九里已经很远，废水不会回流。市政官员们争论说，新系统要比目前把废水倾入贾库佩河安全得多（它在阿伦贝皮以北不到十公里处流入大西洋）。

在巴西钛业对阿伦贝皮的威胁逐渐消退之时，保罗石化滋生的污染仍是一个不断增长的威胁。巴西钛业的烟囱仍在污染空气，但是大风会把烟雾吹到阿伦贝皮西南部的内陆。坚实的管道把巴西钛业生产的硫化物残留，运到阿伦贝皮南部海域。随着海潮向南推进，对哈瓦的威胁要远远大于阿伦贝皮。

1980年，我一直怀疑污染是否会最终毁灭阿伦贝皮旅游业的吸引力、渔业和它的环境。我到1991年仍旧没有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2004年左右（见下

一章), 污染的威胁似已有所减轻。阿伦贝皮美丽依旧, 游客和度夏游客继续不断涌来。1991年, 村民们继续在巴西钛业找工作, 在污染的水里打渔。很多(也许是大多数)当地人, 都没有感觉到污染对鱼类或人类健康的威胁。但也有少数村民(包括托梅)注意到海床结构(巴西钛业管道附近的岩床上是硫化物泥浆)和捕获的鱼类的变化。一些渔民已经看到灼伤和畸形的鱼, 其他人则提到捕捞量下降。

当地的生态意识在1991年觉醒。联邦环境机构(IBAMA)现在雇了两个地方机构。一个机构称重捕获的鱼类, 另一个机构监控掠夺性捕捞, 例如, 反季龙虾捕捞和炸鱼。嬉皮村附近建起了一个海龟栖息地保护区, 加上它本身作为历史保护建筑, 禁止汽车通行。

下一代

正是因为重访, 我们才看到了非经重访所不能知、不会发现的事情。在变迁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延续和持久。斗转星移, 生活(保持未变的)永驻。当人类学家跨越几代人研究一个田野点时, 就能揭示那些经久不变的模式与关联。人们与生活模式在新的一代延续。人类学家、报道人和朋友之间建立的纽带, 绵绵不绝, 不断更新。

费南多和托梅两人都已年近六十, 他们用极大的热情欢迎我们, 但1991年带领我们调查的大多是新一代。我们老朋友的孩子都已长大成人, 有了他们自己的子孙。最热烈的欢迎来自朵拉两岁大的孙女, 她是朵拉大儿子奇科的第一个孩子。小女孩也用了朵拉的名字, 继承了朵拉丰富的性格。

新一代对待我们的方式令我感动。朵拉的儿子奇科, 费南多的儿子莱德, 阿尔贝托的女儿玛丽亚, 像他们的父母那样帮助我们。莱德是一个有环保意识的巴西钛业工人, 为了我们的试点研究, 帮助尼克区别各种社会分类成员, 以便访谈。奇科扮演了朵拉当年的角色, 为我们提供帮助, 安排好多访谈。

1992年夏天, 我们重访阿伦贝皮主要从事生态研究工作, 标志着我们第一次来到阿伦贝皮之行的第三十周年。交通和交流的进步, 让人类学家更加轻松地保持了和田野地点的持续联系。我现在觉得, 在我剩下的人生中, 我还会继

续回来，在阿伦贝皮找到新的研究挑战。我甚至能够想象我的孙辈们和阿尔贝托、朵拉、费南多的后代重新开始新的关系。阿尔贝托和朵拉应该会很高兴知道，新一代可能会延续合作，维系这一历时性研究。

第十四章

2004 年的阿伦贝皮

我们最近一次访问阿伦贝皮是 2003 年 10—11 月及 2004 年的 1 月。我从 1996 年到 2003 年担任密歇根大学人类学系主任（任职最后有一年假期）。由于工作和其他职责的缘故，加上我的研究点转向美国，让我和贝蒂一别阿伦贝皮就是九年，这是我们最长的一段离开。2003 年我准备去巴西旅行时，还担心事情也许变化太大，让我对那里感到生疏。幸运的是，这一担心没有发生。通过在那里工作或访问的学生，以及巴西的朋友和同事，甚至通过互联网，我得以跟上巴西，尤其是阿伦贝皮的发展。

大多数发生在阿伦贝皮内部或周边的变迁，证明变迁程度的加深有甚于类别的增加。也就是说，新出现的很多事情在这之前就已存在，并非猛然出现的新事物。一件新鲜事是在哈瓦附近的椰子公路上设立了一个收费站；每次驱车从萨尔瓦多到阿伦贝皮或者更远的地方，大概要花费一美元多一点。城市化和全球化过程，正在把萨尔瓦多和世界与阿伦贝皮拉得更近。哈瓦村设立了比利时领事馆。巴西钛业已经卖给一家美国公司。阿伦贝皮有了国有布拉德斯科银行的分行。高速公路的一边远远立着一个新卫星城：棚屋镇。

阿伦贝皮从乡村变为市镇。现在几乎已经是巴西第三大城市萨尔瓦多的郊区。椰子公路是州与州之间运行的高速公路。尼克和我打赌什么时候第一家麦当劳会在阿伦贝皮开业。虽然在去阿伦贝皮的路上靠近机场处已有一家麦当劳，但本地还没有。我上次乘机飞越阿伦贝皮上空时，它看起来就像一个小城市。



椰子公路西边的井村新街坊的年轻定居者。这处棚屋区同样以“极尽简陋”（*Corre Nu*）著称。没有土地的穷人“占据”此地，盖起简陋的居所，希望最终能在他们现在占有的土地上建造更坚固的房子。（克里斯多夫·奥利里惠允使用）

伸展的空地已被阿伦贝皮和萨尔瓦多机场之间的建筑物填入。鱼湖村则向北扩展到与嬉皮村平行。一个新的小村庄（*Vilarejo*）已在鱼湖村南部出现，就在通往阿伦贝皮的公路的另一边。

高速公路以西，一个名叫温泉镇或井村的定居点，开始规划建设。这个庞杂而肮脏的地方，不久就成了一个建筑大杂烩（让人联想起城市贫民区或棚屋镇），无地的穷人在这里搭建简陋的房子，坚持要求（按照某些市政当局提供的个案看）最终能在他们占有的土地上盖起更坚固的房子。2003年我对井村的一次访问表明，当地居民丝毫没有任何邻里或社区精神的感受；这一点和鱼湖村形成鲜明对比，后者主要是阿伦贝皮人定居，表现了一种强烈的地方自豪感，这点就反映在社区事务中。相反，井村的大多数定居者都来自外地，并不太了解他们的邻居。更严重的是，土地争端在阿伦贝皮边缘有所增长，导致1998年一群无地者的头领被杀，因为他们强占了嬉皮村北部区域。

尽管警力有所增加，但恐惧（尤其因犯罪而存在）也在持续增长。井村有



2004年1月，阿伦贝皮闹市的警察。值得注意的是，他们身后是布拉德斯科银行。（康拉德·科塔克摄）

个警察局，离阿伦贝皮和巴西钛业之间高速公路常驻巡逻点不远。在阿伦贝皮本地有时甚至能看到持枪的警察。某些人说深夜走在阿伦贝皮很危险。意外频发，小孩和老人在经过椰子公路时遇害。不过也有更为积极的变化。随着阿伦贝皮和鱼湖村设立了私立和公立学校，包括私立幼儿园，教育水平继续提高。超过二十个阿伦贝皮人的子女现在进入萨尔瓦多市和近郊的大学。阿伦贝皮和

其卫星村的很多街道，已经筑路或是铺了石子路。中心广场的老教堂已经重建。足球场安了灯，椰子广场设有一个社区中心舞厅。

自从我在1960年代以田野调查队兼村民的身份进入这个人类学世界，阿伦贝皮已经成为一个历时性田野点，数代研究者能够掌控变迁和发展的各个方面。许多其他人类学者与贝蒂、尼克（2002年拿到了他的人类学博士学位）还有我一道，已经发现了这些变迁，并对正在进行的阿伦贝皮研究作出了贡献。巴西和美国的调查员在1980年代（关于电视的影响）和1990年代（关于生态意识和环境风险的认识）与我们并肩从事调查项目。密歇根大学的研究生在他们研究阿伦贝皮的各种课题时，以我们在阿伦贝皮的调查为基本信息。1990年，密歇根大学研究生道格·琼斯在阿伦贝皮为博士论文在做生物文化（biocultural）调查，把阿伦贝皮（和巴伊亚市）当做田野点，调查身体的魅力标准和种族分类的变化（Jones, 1996）。1997年，珍妮特完成了阿伦贝皮的计划生育和女性生育策略变化的研究。她的博士论文（Dunn, 2000）考察了与现代化有关的各个方面之间的关系，包括电视图像、信息渠道及减小的家庭规模。克里斯多夫·奥利里1997年夏天第一次调查阿伦贝皮，他当时帮助珍妮特的项目进行访谈。后来他调查了阿伦贝皮宗教变迁中一个显著的方面：新教的成长。奥利里在他的博士论文（O'Leary, 2002）中，对阿伦贝皮和巴伊亚州另一个村镇之间饮食和营养的变化做了比较研究。

阿伦贝皮就这样成为各种各样田野工作者（像历时研究团队成员一样）的一个田野点。更晚近的研究人员能通过过去建立的联系，把研究落在之前发现的基础上，增加对变迁力量的认识，了解当地人在他们遭遇的环境面前协调和处理的方式。我想这种学术应该是一种共同的事业。我们过去搜集的信息正在为新一代所用。因此，珍妮特能够利用我们在1964年到1980年中期做的访谈大纲，和她在1996年和1997年搜集的信息进行比较。为了掌握态度的变化，并理解电视和计划生育之间的关系，珍妮特重新访谈了1980年我们访问过的很多女性。奥利里在比较阿伦贝皮和另一个城镇食物习惯和营养状况的过程中，同样使用了我们在1964年访谈大纲中涉及的饮食信息。

像阿伦贝皮这样经过历时研究被多种研究者考察过的田野点，有着非同一般的学术价值。当代变迁的力量极其复杂，令单个民族志学者——那种单枪匹马、筚路蓝缕，在有限的时间内，把他或她的田野点看做相对孤立、隔离的地



孩子们簇拥着密歇根大学的研究生奥利里，阿伦贝皮，1997年。（克里斯多夫·奥利里惠允使用）

方的研究者——难以全盘理解。民族志工作者不会再把他或她的田野点（像曾经那样）想象成，某种原始或者自给自足的实例。“因为城市化、工业化和官僚化的发展……小的社群的隔离……正在急剧减少。”（Gallagher & Padfield, 1980, p.4）民族志工作者也不应再假设他或她对田野点，甚至对在那里搜集的数据有独一无二的（所有者的）权力。这一知识毕竟是在与当地建立友谊、合作和咨询关系的过程中生产出来的，很多人类学者现在把这些当地人称为文化顾问（*cultural consultants*），而不再称为报道人（*informants*）。经过再研究的人类学田野点越来越多。理想地说，后来的民族志工作者是在与他们的前辈合作，并把研究建立在前辈的工作基础上。与单一的民族志模式相比，跨越时间（如阿伦贝皮）和空间（如我们在不同巴西城镇的比较研究）的团队合作，对文化变迁和社会复杂性产生了更全面的理解。

阿帕杜莱（Appadurai, 1990, p.1）把当今世界称为“崭新的”“跨地方互

动体系”。不论是人类学家、移民、游客、朝圣者、改变宗教信仰者、劳工、生意人、开发中介、非政府组织(NGO)的雇员,或媒体影像,所有人都在移动中。他们已经延伸到阿伦贝皮。事实上,他们在这个关于变迁的故事中始终与阿伦贝皮同在。

人类学者对阿伦贝皮的访问已有四十多年,与其一同到来的是持续不断的移民者。他们既包括像费南多这样的普通人(现在减少了),也包括像嬉皮士一样古怪而更著名的人群,后者中的一些仍住在嬉皮村,这里已被当做历史遗迹。特别是有了自来水后,迁居阿伦贝皮的人更多了。来自萨尔瓦多和卡马萨里的城市居民现在造访暂居阿伦贝皮,不像度夏游客那样,而是最起码居住一年左右。一些人在阿伦贝皮定居,乘公交车通勤去萨尔瓦多等地工作;其他人则把阿伦贝皮选作他们以后退休养老之家。

包括新嬉皮士在内的外国游客,仍把嬉皮村奉为朝圣地。根据一个网站介绍,“阿伦贝皮的嬉皮村仍旧赞美嬉皮士运动的信条,例如,对人类天性的保留。水豚河、美丽的椰林、丰裕的沙滩,赋予它桃花源般的气息,突显了自由、和平与爱的理念。”此外,“与传统(非嬉皮士)社会决裂,在个人外表和生活方式方面仍旧保持明显差异”的人们,现在仍然生活在嬉皮村(<http://www.facom.ufba.br/prod/incomum/hippie.html>)。连接阿伦贝皮和嬉皮村之间的道路,自1993年通车以来,促进了游客的访问。随着追寻“人性和爱”而改变宗教信仰者一起到来的是那些信仰各种宗教的人们。阿伦贝皮和鱼湖村有了通灵者的集会。得克萨斯来的传教士,在鱼湖村和阿伦贝皮之间的道路上,帮助修建了一所浸信会教堂;另一些美国传教士已在鱼湖村生活。1960年代的阿伦贝皮仅有一个新教徒,而今当地的神召会(只是现在数个新教教派之一)已有超过一百二十五个成员,其中三分之二是女性。(变迁具有连续性,大家应该还记得这些女性以前都是属于地方宗教的。)

新教徒把他们自己归为信仰者(*crentes*),而在某些村民眼里,他们则是蔑视自身信仰体系的人。新教徒和其他阿伦贝皮人之间在生活方式上有明显差异。新教徒穿着正式,禁止在教会场合之外参加派对、酗酒和社交,把自己从日常的社会生活中分离出去。不过,好在他们仅占当地村民的一小部分。阿伦贝皮新教徒的成长,是巴西更普遍过程(尤其是在巴西东北部)的一个地方缩影。此项阿伦贝皮研究开始时,罗马天主教徒还占巴西人口的95%;如今这一数字



巴西钛业已经变成美礼联无机化学公司（总部在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康拉德·科塔克摄）

已下滑到 85% 以下。不过，巴西仍然有着世界上最大的罗马天主教人口。

几年前我接到一个男人从马里兰州巴尔的摩打来的电话，告知我他已为他的公司：美礼联无机化学公司 (Millennium Inorganic Chemicals)，收购了巴西钛业。受他邀请，我给他巴尔的摩公司的成员，包括来自巴西钛业（现已更名为美礼联无机化学公司）的巴西经理，讲述了阿伦贝皮的历史和地方文化。美国公司似乎比巴西钛业更关心地方环境保护，水污染在 2004 年甚至比十年前还要减轻很多（见 http://www.millenniumchem.com/Responsible+Care/Responsible+Care+Report/Responsible+Care+Report_Bahia_EN.htm）。

在巴西钛业（美礼联）工作和在阿伦贝皮从事渔业和建筑工业的劳工，仍旧是外来者，当地的主要商业现在似乎成了旅游业。椰子公路整个地区是旅游



普拉亚镇的星期天——曾经的小渔村，今天的旅游热点。（康拉德·科塔克摄）

业发展的主要核心。萨尔瓦多的国际机场为了接纳观光客流，进行了根本改建和调整。一个德国开发商选择了之前阿伦贝皮北部的渔村萨乌佩，建起一座南美最大的综合酒店。欧洲和萨尔瓦多现在有直达航班相连。德国和意大利的狂欢纵酒者一离开机场，就被豪华大巴或小货车风驰电掣般拉到萨乌佩或是普拉亚镇的一个海滩度假村。这两个从渔村演变而来的度假村，现在几乎均以迪斯尼模式为当地旅游业作出贡献。

在旅游业发展的同时，海岸也就有可能非工业化了。卡马萨里的石化业已经过时，接下来几年里就会关闭，这将结束阿伦贝皮北部的污染。上文提及现为美礼联无机化学公司的巴西钛业，正在为提高其自身生态形象而努力。2003年到2004年，在贝蒂和我两次拜访巴西期间，整个巴西生态意识的增强非常明显，



2004年1月在阿伦贝皮村中心的可乐餐厅。(康拉德·科塔克摄)

包括巴伊亚州的海岸。在嬉皮村附近，阿伦贝皮值得夸耀的不仅是致力保护海龟的塔马尔 (Tamar) 项目，还有把自己称做“生态避难所”的一张床和一顿早餐。在普拉亚镇无数的旅馆中，还有一家四星级生态度假村。

企业家们认为并认定，城市化进程最终会将阿伦贝皮和萨尔瓦多连在一起，他们沿着椰子高速公路建起了超市，在阿伦贝皮也开了一家。新旅馆已在阿伦贝皮开业，在有关旅行和观光的书籍和不少网站上 (2005年在 Google 上搜索阿伦贝皮约有八十多个网页) 都榜上有名。所有旅馆都由外地人经营。旅馆业为了迎合阿伦贝皮某些新定居者和游客的阶级地位，在标准上似乎有了一定提高。一家新旅馆已在后街开张。中心广场的阿伦贝皮酒店提供包括爵士乐在内的周末音乐。中心广场至少有三家兴旺的饭店，包括克劳迪娅的女儿艾德丽和她丈夫经营的克劳迪娅大众餐厅 (可乐餐厅)，以及由外来者经营的更高档的观海餐厅 (Mar Aberto)。不少房子现在都有二到三层楼。例如，可乐餐厅是两层结构。为了扩大餐厅规模，增加楼上的出租空间，艾德丽在 2003 年对餐厅进行了改造。椰子广场现在有了一个比萨店，顾客可以在那里点搭配奶酪、香肠、(罐装) 金枪鱼和西红柿酱的皮萨。阿伦贝皮市政绿化项目中有一项就是在广场北



阿伦贝皮的冲浪者，1997年。（克里斯多夫·奥利里惠允使用）

面种上几棵新的椰子树，使椰子广场名副其实。

冲浪爱好者齐聚阿伦贝皮，尽管当地浪涛汹涌。激烈的海浪拍打近海的崎岖岩石。外来者也带着从商店买来的鱼杆在海浪里钓鱼，垂钓近海的鲭鱼和鲷鱼。

政治和政客对阿伦贝皮的影响，比过去阿伦贝皮闭塞无利时大得多。城镇与居民的财富，随镇长的更迭而起落。在得道多助的镇长的领导下（阿伦贝皮人在1992年和1996年选举中对他力挺），市政服务兴旺发达，在社区中引入各种服务岗位，例如公立学校、医疗站、旅游局和市政信息分局。相反，一个失道寡助的镇长则忽视了阿伦贝皮的学校和医疗站建设。因为市政当局不付工资，公立学校被关闭了好几个星期。在这段时间，由于没有可靠的公立学校，村民设法促成，甚至创办了几所新私立学校，一些私立学校还是本地人开的。朵拉的儿子奇科放弃了他在阿伦贝皮学校警卫的工作，去普拉亚镇做了一份能按时

拿工资类似工作。

阿伦贝皮的财富和阿伦贝皮人的财产，也和政治一样起起落落。2003年到2004年，阿伦贝皮人和美国民众一样抱怨失业。我们最好的报道人阿尔贝托、朵拉、费南多和托梅的孩子，都很少从事渔业。某些妇女从事旅游业或当老师，大多数男人在做建筑业或干临时工。费南多之前在巴西钛业工作的儿子，丢了工作。渔船队现在主要由移民担任（前几章已有叙述），保持了长距离捕鱼的规模和模式。第十一章描摹的四个“另类者”中，2004年活下来的只有托梅，年近七十的他依旧精力充沛，还踢足球，并仍在用网捕龙虾。他的嬉皮妻子索尼娅去世后，他又添新缘。

1992年以来，阿伦贝皮的生态旅游，包括了致力于海龟保护的塔马尔项目站。（普拉亚镇有一个更早也更著名的保护站。）主要由本地人担任工作人员的阿伦贝皮海龟保护站，位于通往嬉皮村的道路上。（塔马尔项目站和嬉皮村两地现都通电。）包括世界野生动物基金（WWF）在内关注野生动物保护的NGO组织成员，也在项目站工作。除了保护濒危的海龟，塔马尔项目还吸引了观光客。它有展示海龟的水池，以及出售为该项目做宣传的T恤和各种商品的礼品



塔马尔项目，左右两边是海龟水池。（康拉德·科塔克摄）

店。这是沿着巴伊亚州海岸位于传统海龟栖息地的几个塔马尔项目站之一（见 <http://www.ongba.org.br/org/tamar/bases.htm>）。

媒体影像对阿伦贝皮变化所起的作用是第十二章的主题。当我们完成电视调查时，1980年代以来的变化又有进一步发展。有几户人家已经安装了体现阿伦贝皮高档消费的碟型卫星电视天线，并添置了录像机。很多家庭都有了带遥控器的彩色电视。巴西政府利用电视（包括电视连续剧内容）作为深入国家每个角落的宣传工具。因此，政府为了准备最近的人口普查，说服环球电视台，在流行的电视连续剧中对人口普查的接受者进行特写，为他们的工作提供一定解释。当珍妮特为给她接下来的“电视和其他现代化力量对计划生育的影响”项目做访谈准备，在阿伦贝皮进行人口调查时，好几个熟悉电视连续剧的阿伦贝皮人都问她是否在为人口普查局工作。

全球化与地方性

商业、技术和媒体在世界各地增加了人们对影像和商品的渴望。大多数国家都已向全球消费文化开放，包括阿伦贝皮人在内，几乎每个生活在当下的人都无法置身其外。阿伦贝皮人和其他上百万民众一样，已经完成了从一个更偏重生计的经济到依托货币的经济转型。不仅他们为钱工作，他们的地方环境、产品和景观也已为世界资本主义所利用。阿伦贝皮的沙滩和椰子树，可以为因特网上的每个人或是亲历此地的背包客所见。世代在巴伊亚州沙滩上产卵的海龟，现在成为海报和T恤的商标，旨在吸引游客，鼓励野生动物保护。嬉皮村的居民要么在村里，要么在萨尔瓦多的旅游市场上，把他们自己做的T恤和其他产品卖给游客。之前提到，2005年在Google上搜索出现的近八十多个涉及阿伦贝皮的网站，很多都带有商业动机。

我们应该如何描述和评价席卷阿伦贝皮的全球化进程呢？阿伦贝皮人自己也不确定。某些社会批评家把人群、技术、商业、信息和意识形态的当前大潮，当做文化帝国主义的压路机，地方文化在它的路上沦为牺牲品。然而，这一消极看法忽视了人类在与外界力量交往时会有选择性地作出各种行为。阿伦贝皮人也像其他成千上万当代乡民一样，努力应对外部景象和信息的洪流，对这些



2004年1月，阿伦贝皮闹市的街头小贩，贝蒂在那里买东西。（康拉德·科塔克摄）

外部信息加以自己的修正、诠释、加工、抵抗、挑战或排斥。本书考察了制约（贫穷、平均机制等）、机遇（运气）和个人创新在阿伦贝皮转型过程中的作用。我们在这个关于巴西社区对全球化开放的研究个案中，看到了文化传播和社会变迁的创造性过程，在这个转型过程中，适应变迁的个体扮演了重要角色。

第十五章

社会变迁和全球化的比较

本书讲述了阿伦贝皮四十多年间发生的故事。书中也讲述了那些见证并参与阿伦贝皮变迁过程的人们（村民、人类学家和其他外来者）的故事。我的人类学生涯始于阿伦贝皮，那时我还是个初出茅庐的民族志工作者。我在研究生期间回去过两次，并以那里的田野工作为基础拿到了博士学位。但是我的故事远不止阿伦贝皮。我有幸在世界上三个地方做过民族志调查：巴西，马达加斯加和美国。最近我才转向美国文化模式方面的研究，这让我有机会在拙著《黄金时段的社会：一项关于电视和文化的人类学分析》(Kottak, 1990) 中比较电视在巴西和美国的的不同影响。我对美国的调查，还在我目前所属密歇根大学“日常生活民族志中心”进行的“媒体、家庭和工作”项目中继续进行。^[1]

我坚信人类学在比较科学 (comparative science) 方面的价值。人类学致力于践行“通过认识他者的文化，让我们更好地理解自己”这一信条。我们通过认识有着极大差异的信仰和实践，质疑我们自己信仰和实践的“合理性”。如果我们在很多国家都有很好的朋友和令人尊敬的同事，就很难滋生民族中心主义。正因我生活在海外，我才更好地理解北美。

我在马达加斯加的田野工作（观察另一场变迁过程），对我产生了同阿伦贝皮田野一样深远的影响。然而，影响我研究的马尔加什 (Malagasy) 村民的，

[1] “日常生活民族志”中心由美国阿尔弗雷德·斯隆基金会 (Alfred P. Sloan Foundation) 赞助。我在媒体、家庭和工作项目中的合作伙伴是 Lara Descartes 博士。

是另一类不同的变迁。（“马尔加什”是一个用来指代马达加斯加语言和文化的形容词。）由于本书讲述的是一个关于变迁的故事，我打算通过我对阿伦贝皮和马达加斯加贝齐寮人^[2]的观察比较——我想把新版（第四版）的结论置于一个更大的变迁背景下进行讨论——来展现全球化进程对一个热带小村庄的影响。贝齐寮人属于马达加斯加划分的二十个族群当中人口排第三位的人群。他们是生活在马达加斯加中南部高地上的农民，生计以水稻和其他作物灌溉种植为主，也有畜牧业。

1966年10月我在伊瓦图的贝齐寮人村庄开始调查（Kottak, 1980），在马达加斯加做了十四个月的田野工作。比我在阿伦贝皮停留的任何一个田野阶段都要长很多，我在阿伦贝皮大多数田野点只能维持大约三个月。然而，我们对伊瓦图的回访要少之又少、短而又短（1981年、1990年）。我在阿伦贝皮是系统性的历时研究，而对伊瓦图的回访，则都是因为对马达加斯加其他研究兴趣所附带的。

我在阿伦贝皮的工作，一开始与其说是一项以问题为中心的民族志研究，毋宁说是一个本科生的经历。我的阿伦贝皮调查之所以一直得到延续，是因为我在那里观察到了变迁过程。相反，我在贝齐寮人的调查，一开始就是以问题为导向。我来到马达加斯加的目的在于研究水稻种植增长（比如，因为灌溉）所导致的社会、经济影响，这包括农业集约化对社会分层和国家组织出现所起到的影响。我通过文献调查和对三个不同地区、不同经济水平的贝齐寮村庄（包括伊瓦图）的比较研究，解开了这个问题。调查焦点是马达加斯加出现的社会经济分层。我的民族志策略只能是**间接的**：用不同村落的田野研究，代表转型过程中的不同历史阶段。而我在阿伦贝皮的调查虽然不是从核心问题开始，但无心插柳的是，我却在阿伦贝皮直接观察到了分层出现（这恰恰是我在马达加斯加关注的焦点）这一重要的社会变迁过程（不像马达加斯加需要间接观察）。

阿伦贝皮和伊瓦图的变迁程度截然不同，一如它们分属两个迥然不同的国家。巴西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地位重要的第三世界国家，虽然用世界体系术语来说，属于“半边缘”国家，但其国民生产总值（GNP）位居世界第十。马达加斯加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中是一个非常贫穷、明显边缘化的国家。从社

[2] 见第一章译注。

会经济学角度来看，巴西是世界上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马达加斯加的财富分配则要更为平等。巴西是一个持续增长的工业城市国家，跨国公司和企业占据主导。而马达加斯加虽然经历了法国殖民史（1896—1960年），但却保留了农业国特征：以建立在稻米种植和畜牧业基础上的农民经济为主。

在全球化、国家和区域化过程的推波助澜下，阿伦贝皮经历了可与早期国家中心形成相匹敌的结构变迁过程，对于早期国家中心而言，这一过程可能需要上千年的转变。相比之下，尽管出现了人口增长、移民和农业集约化过程，伊瓦图的社会形态还是多少保持了1966年到1967年间的原状。

1980年到1981年：不同变迁过程掠影

我第一次回到伊瓦图是在1981年2月，离我初到那里已隔十四载。巧的是，这次回访刚好是在我1980年8月重访阿伦贝皮后几个月。这两次重访相距不远，只有半年之差，使我得以把注意力集中到变迁的不同种类和程度对人类学家所研究人群和地区的影响上。阿伦贝皮和伊瓦图之间变迁规模的对比一目了然。1980年左右，阿伦贝皮坚实地巩固了其在世界政治经济中的位置。通过大众媒体和与外来者的直接接触，阿伦贝皮参与了文化交换的全球化过程。阿伦贝皮急剧的社会与经济转型，就是本书的主题。

伊瓦图与阿伦贝皮的区别在于，它在1967年到1981年间几乎没有改变。我在1966年到1967年认识的大多数老人都还活着（值得一提的是，有三个都在八十岁以上）。一些人去世，更多人出生。青少年和儿童已经长大成人并先后成家。但村庄看起来还是与过去一模一样。丰产的当地稻米经济仍在蓬勃发展，村民们期盼1981年4月能有一个大丰收。

与明确加入现代世界体系的阿伦贝皮的区别还在于，伊瓦图在1981年似乎变得比以往更加隔绝。在马达加斯加这个发展中国家，公路系统恶化，我抵达伊瓦图可以说困难重重。一个新任的马尔加什总统（迪迪安·拉齐拉卡）和一个亲苏联政府，替代了菲利贝尔·齐拉纳纳总统和名义上社会主义的亲法国后殖民政府。虽然伊瓦图与国家之间的联系比以往更逊，但世界力量在马达加斯加其他地方却是显而易见。苏联米格战斗机飞行员与他们的妻子下榻在塔那

那利佛的希尔顿酒店（塔那那利佛是马达加斯加首都）。在边远农村地区，也许会遇到苏联的技术人员、卡车和装备。但伊瓦图——世界政治格局的局外人——看起来依然如故。

这还是我第一次从个人角度去理解两种变迁之间的差异：我所谓的**结构性变迁**（形式的变迁）与简单的历史性变迁（个人的改变）的对比。在这一意义上，**历史**是和个体相连的。在一个稳定的社会体系中，人们经由出生与死亡或移居，出入这个世上。这是个人，个体上的变化，而不是系统基本形式的变迁。第二种变迁（**结构性变迁**）需要更广阔的视角。这是稳定的社会体系变成不稳定的过程。一种社会系统会在结构或形式上发生变化。结构性转型一词指的就是这样一种全方位的变迁。

总结阿伦贝皮的转型

阿伦贝皮经历了结构性转型，伊瓦图只是经历了历史变迁。现在我可以对前面十几章描述的阿伦贝皮的转型做一小结。1960年代，从萨尔瓦多到阿伦贝皮的旅程要乘四驱机车在沙土路上颠簸三个小时。当时村子人口是七百五十人，共有一百六十户人家。大多数男人靠捕鱼谋生、赚钱，阿伦贝皮最固定的访客是萨尔瓦多来的鱼贩。船队还没有机动化。渔民航行到附近的大陆坡打渔，最擅长捕获洄游鱼类。

阿伦贝皮的市场经济只占一小部分，对社会分化影响甚少。除了打渔，村民们种植并出售椰子，经营小店，出售家里生产的低价产品。女人很少有赚钱机会。地方社会弥漫着重男轻女的氛围。阿伦贝皮的人口结构显示，在青年的年龄层中，男性多于女性。这一性别不均的现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对女童的忽视，和女孩生存机会较低。

虽然存在明显的性别分层，但主导阿伦贝皮的社会经济平等观念，反映了当地每个人都属于全国下层社会的事实。“我们这里都是平等的，”村民说，“没人当真有钱。”帆船和渔具对于任何勤奋的渔民而言都不算昂贵，都可以获得。一艘装备齐全的渔船花费，相当于四百公斤鱼的市场售价。由于很少有船能维持十年，所以很少有船是继承下来的。地产收入不高，也挣不到现金，并通过

继承分割得越来越小。任何有志向的村民都能找到土地种植椰子树，椰子构成阿伦贝皮的第二大出口物品。

在我离开八年于1973年访问阿伦贝皮时，这些特征都还在变化中。到我1980年再度返回时，主要的根本转型已很明显。三种经济变迁使阿伦贝皮更加强烈地嵌入了巴西和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中：

1. 渔业的变化，从风力变为机械动力。
2. 沥青公路的铺设和旅游业的兴起，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
3. 附近工厂的建设，导致阿伦贝皮水域的化工污染。

以上这些主要变迁，推动阿伦贝皮社会分层的发展。1980年左右，财富分化越来越明显。最穷的村民越来越穷，富裕者则巨富。最显著的变化莫过于捕鱼业。渔民一天劳动捕获的鱼量不及1960年代，而船主却获得了他们之前所获利润的十倍。

有了政府机构提供的小规模渔业开发贷款，阿伦贝皮人在1970年早期已经开始对渔船进行机动化改造。该机构往往贷款给成功的船长、船主和拥有土地权的创业者。然而，年轻有为、本来在过去最终能买到自己船只的渔民，却因缺乏足够担保而无法得到贷款。现在也不可能（像过去一样）通过他们自己辛勤捕鱼，积累足够资金，购买一艘（有马达的）渔船。

从机动化渔业中获得的利润，再投入花费更大的渔业技术，包括购买更大更贵的船只。随着财富价值的增长，船主获得的份额也在增加。这一不断增长的地方财富分化非常剧烈，致使过去的均衡机制已然失效。渔业中的社会关系变得愈发松弛，经济关系更占主导。船主从过去的合作伙伴变身为老板。阿伦贝皮人受到传统平等观念影响，怨恨这些变化。尽管很多当地渔民都停止打渔，但涌入的移民填补了这一空隙。

阿伦贝皮与外界的成功接轨，公路的铺设功劳最大。公路最初是由雄心勃勃的地主计划修建的，目的是增进旅游业，提高土地价值。公路因化工厂老板的资助提前完工，与1969年到1971年间国际嬉皮士散居潮恰好同时。从那以后，来自巴伊亚州的游客大潮加入了嬉皮士的潮流，对阿伦贝皮的财产价值和租金上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隔离局面的终结，改变了阿伦贝皮整个经济，在改变自然状况和渔业地位

的同时，也带来了职业的多样化。在 1970 年代全国大发展的时代，阿伦贝皮的经济发生分化。渔业衰落，不再是当地主要行业。很多年轻人在附近一家由跨国公司投建的二氧化钛工厂（巴西钛业）工作。1980 年左右，全村 14% 的男性和 31% 的女性通过商业获得收入。他们中很多人都服务于随着公路开通而发展起来的周末和夏季旅游业。

1960 年代到 1980 年代之间最显著的对比，就是人们对外部服务和外界制度的日渐熟稔。这反映了全国在交通和交流方面的进步，以及政府为提高卫生、教育和社会保障方面的不断努力。由于前往附近萨尔瓦多交通状况的改善，村民们得以从 1970 年代全面发展的全国项目中受益。政府在村民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变得越来越重要。

新经济在扩大普遍社会经济分层的同时，也缩小了性别上的分层。它给妇女提供了在销售、服务和出租方面挣钱的新机会。随着女人和男人获得资源的途径变得更加平等，女性的地位也有所提高。和渔民一样，有经济收入的女性得到从政府领取养老金的权利。女性对男性的依赖逐渐变小。

经济变得越来越复杂，地方社会结构也是如此。阿伦贝皮现在被社会阶级、职业、邻里、祖籍地和宗教（天主教、基要主义者和非洲—巴西坎东布雷教）区分开来。这种趋势朝着社会分化更加明显、更加复杂的方向发展。很多因素都让这个曾经相当同质化和平均主义的社区产生了新的分化。例如，搬到新卫星村和周边的人们，不再被当成是阿伦贝皮人。对村民而言，职业的多样化也意味着不同的行为和交往方式。形形色色的外来者在当地生活中扮演着一般的角色。

阿伦贝皮的社会变迁过程，为我们观察一个平均主义或简单分级社会向社会阶层化社会的转变，提供了线索。这种转变不仅出现在阿伦贝皮，而且是结构性转型过程中的普遍现象，其原因在于，以往与具体个人有关的特征，现在成为不同社会群体的标志。例如，1960 年代，虽然相当一部分村民存在心理问题，但他们只被当成异类。其他村民不知道怎样对待他们，怎样解释他们的行为，只好对他们视而不见。换句话说，“精神病人”这一类别在 1960 年代还未普及。但到 1980 年代，精神病的一般行为特征，已为社会分类所默认。

宗教认知领域同样如此，个人特殊的感知与天赋在过去的阿伦贝皮并不受社会重视。但到 1980 年情况发生了变化。比如，1965 年时，没人会在意某个女人宣称能在黑暗角落看见别人看不见的面孔，并会神灵附体。但在 1980 年，

她和其他有着类似能力的人在坎东布雷教中找到了位置。

到1980年，另一项个体特质发展为社会分类，这与社会经济分层及财富关系等级的分离，有着密切关系。虽然阿伦贝皮在1960年代中期有相对富裕的居民，但是村民总是坚持认为村里没有真正的富人。相比之下，1980年“富人”亦成为一个明确的社会标签。

对社会转型感兴趣的人类学家，倾向于把他们关于跨代际、大规模社会变迁过程的理论，建立在考古记录或历史文献的基础上。然而，有关变迁过程的历时性民族志研究也很有价值，例如阿伦贝皮所经历的。许多个人经验、态度和行为方面更加细微而渐进的变迁，需要经年积累，才能最终表现为结构性转型，而在阿伦贝皮这样一个变迁迅速而剧烈的地方，则能让我们观察到活生生的变迁。

1973年左右的阿伦贝皮，结构性变迁的舞台已经搭好，在1980年代已能见到质的变化，并在此后不断增强。阿伦贝皮现在的变迁是规模和程度上的，而非类别上的变迁。也就是说，正在进行的是量变，例如，更多人、更多外来者和更多新教徒、房屋增加，还没有出现新的质变。目前的阿伦贝皮正在经历的变迁，与其说是进一步的结构变迁，不如说是历史变迁。

1990年代早期：马达加斯加的转型和后现代性

转到马达加斯加，我在贝齐寮地区的第一个田野点伊瓦图发生了什么变化？在人口增长的推动和世界货币经济日渐增长的渗透下，变迁在1990年我重访伊瓦图时，比1981年更加显著。人口快速增长的影响在伊瓦图和整个马达加斯加非常明显：全国增长率是每年3%。马达加斯加的人口在1966年和1991年之间翻了一倍：从六百万增长到一千二百万。

人口压力的一个后果是农业集约化。在伊瓦图，农民过去在他们的稻田里只耕作水稻，现在每年收完水稻，还要在同一块地里种第二季。这一模式在整个高地都很明显。1990年另一个影响伊瓦图的变动是，政治秩序崩溃。法律权力的式微，让人回想起前殖民时期贝齐寮地区薄弱的国家控制。加速这一社会失序的原因是，当地不断融入世界货币经济体系。

偷牛成为一种日益增长的威胁。偷牛贼（有时来自邻村）正在危害原先安

居本乡的村民。一些农户家庭就在他们的稻田边睡觉，不仅害怕偷牛，而且害怕庄稼还未成熟就被人偷割。一些偷来的牛被赶到海边，运往附近岛屿。最特别的是，偷牛贼当中有一些是还受过相对较好教育、学习很长时间、足以和外来者沟通自如的年轻人，然而他们却找不到正式工作，又不想像他们的父辈那样去稻田干活。正规教育体系已使他们熟悉外面的制度和规范，包括对现金的需求。并不只是伊瓦图一地如此，包括它所在的区域，都已被与日俱增的金钱追求所改变。

我在1990年访问贝齐寮地区时，亲眼目睹了当地人民追逐金钱的又一幕骇人情景。我们在伊瓦图乡政府附近，遇到一群男人出售一些在当地稻田中偶然发现的宝石：碧玺。在街道拐角处，我们看到了一幕令人吃惊的景象：几十个村民正在毁掘一座古代遗址，翻挖一大片稻田，寻找碧玺，这可谓是金钱对当地生计经济侵蚀的确凿证据。

和整个贝齐寮人的家乡一样，伊瓦图的人口在数量和密度上的增长推动了移民发展。一名祖籍伊瓦图现居首都（塔那那利佛）的妇女评论道，现在伊瓦图有一半人的子女都住在首都。尽管她说的话有点夸大，但对伊瓦图当地后裔的人口普查，有力地证明很多人都移入了城市。

她的看法向很多人类学家点明了，他们的研究对象从地方社区转向散居的原因：这个地区的后代已经扩散到许多地方。人类学家越来越多地跟随我们研究的这些村庄的后代们，从农村迁移到城市乃至跨越国境。尽管有些地方像伊瓦图的村民们可能还没有发生结构变迁，但他们的后代，他们的散居者，正在加入一个全新、多样而多元的社会体系中。

散居的结果，让人类学家越来越体验到，我所称的世界体系中的后现代时期。后现代性描述了我们的时代和景况：当今世界瞬息万变，人们要在移动中学会根据地点和情境变化，调和多元化的认同。从最普遍的意义上讲，后现代指的是既有规范（规则或标准）、分类、区别和边界的模糊与崩析。“后现代”一词源自后现代主义——建筑学中一种起源于1970年代，继承现代主义的风格和运动。后现代建筑拒绝现代主义的规则、几何秩序和严肃的主题。从这一源头来看，后现代性描述了一个传统标准、差异、群体、边界和认同正在开放、延伸和离析的世界。

我最鲜活的后现代体验，可以将发端追溯到马达加斯加的安巴腊沃市。

1966年到1967年，贝蒂和我在位于贝齐寮地区南部的镇上租了一间小房子。我们从伊瓦图和其他两个村庄田野点回来时，偶尔会在那里过周末。

1966年时，马达加斯加已从法国那里获得了独立，但它的城镇中仍有外国人，提醒其被殖民的过去。除了我们以外，安巴腊沃至少有十二个世界体系的代表，包括一个印度布商、中国杂货店主和几个法国人。一个法国顾问在那里帮助当地发展烟草业，两个法国和平部队的年轻人在学校教书。其中一个人叫诺埃尔，是初中校长。他住在当地一个显赫家庭（世代生活在这里的家人是我们在伊瓦图的保护人）的对街。因为诺埃尔总是鄙夷地说起马达加斯加人，所以当我看到他向这个家庭的一个年轻女人求婚时，不由大吃一惊。她是利昂的妹妹丽诺尔，利昂是名学校老师，也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贝蒂和我于1967年12月离开安巴腊沃。诺埃尔和世界体系的其他代表还在不同时期继续在那里逗留。

每次重返马达加斯加，都让我领略到后现代一幕：在各种地方意想不到的情境中，遭遇流动中的人群和产品。1967年之后，我再次访问马达加斯加是在1981年2月。我的工作让我前往阿劳特拉湖（马达加斯加最大的湖泊）这一新地区，我对当地昂贵灌溉项目失败的社会和文化原因非常有兴趣。在阿劳特拉湖附近，我别无选择只有住在睡莲酒店。我和一群妓女，一个马拉加斯加同事（地理学教授），一个美国世界银行职员和一个也许终生派驻这个穷乡僻壤的（代替西伯利亚，我们开玩笑地说）俄国技术员同享这个酒店。早餐我喝了杯橘子汁（店里唯一的罐装饮料），看着一只老鼠穿过餐厅。

我下一次访问马达加斯加是1990年。这一次我去那里是为了帮助发展一个听着像以“保护马达加斯加丰富生物多样性”为宗旨的保护项目。当我遇到诺埃尔和丽诺尔（1967年我见证了他们的求婚）二十二岁的女儿艾米莉时，后现代一幕又发生了。艾米莉的一个阿姨带她来见住在安巴腊沃酒店的我，当时艾米莉正在参加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组织的一个项目。

艾米莉正要走访她打算学习市场营销的几个美国城市。我再次遇到她就是几个月后在佛罗里达的盖恩斯维尔市（美国佛罗里达州北部一座城市），当时她正在那里的圣达菲社区学院学习一门课程。我们在一家墨西哥饭馆吃午饭时，艾米莉卖给我一些她从马达加斯加带来的木质工艺品。她让我和贝蒂帮她销售马达加斯加的其他手工制品。最后，她问起我们有关她素未谋面的父亲。她告诉我们她寄了好几封信到法国，但是诺埃尔从来就没有回过信。

虽然伊瓦图还没有发生结构性转型，但它的后裔现在已经生活在许多国家。（它的散居者覆盖的地理范围远胜阿伦贝皮，后者仅限于巴西，主要都在巴伊亚州内。）参与到这个更大范围体系之中的，不是伊瓦图自身，而是它的散居者。殖民主义的孩子艾米莉，有两个阿姨在法国（嫁给了法国人），另一个阿姨在德国（做外交官）。她的家庭成员尽管在当地赫赫有名但却并不特别富有，他们已经先后旅行到俄国、加拿大、美国、法国、德国和西非等地。

历时性研究和比较研究的范围

通过历时性民族志研究，我们能够观察到结构性转型、历史和离散的形成。这一长时段研究也阐明了：地方变迁的许多方面，有着更多全球性的原因和影响。研究者可以通过与阿伦贝皮或伊瓦图这样研究社区的长期交往，从环境风险认识、电视影响和移民这些研究课题中，呈现当代变迁力量的影响。文化人类学之所以是一门对文化进行深入理解的人文学科，是因为它从致力于比较广阔世界文化多样的民族志中，获得了这种深度视野。文化与社区因此能在共时或历时层面进行比较，并都能产生有价值的解答。它们可以增进我们对人类思考、信仰、行为和变迁等方面所存在的差异和共通之处的理解。

附 录

附录 1 1964 年, 阿伦贝皮家户预算排序

排名	家户职业构成 *	家户全年预算 (单位: 1000 克鲁赛罗) †
118	1 位女性赚钱养家	58
117	普通渔民	72
116	1 位女性赚钱养家	73
115	1 位女性赚钱养家	86
114	1 位女性赚钱养家	87
113	1 位女性赚钱养家	98
112	1 位女性赚钱养家	108
111	2 位女性赚钱养家	161
110	佃农、2 位女性赚钱养家	166
109	渔民、1 位女性赚钱养家	169
108	1 位女性赚钱养家	180
107	船长、1 位女性赚钱养家	184
106	渔民、1 位女性赚钱养家	195
105	退休渔民、有赡养	197
104	泥瓦匠、3 位女性赚钱养家	218
103	女性赚钱养家、有赡养	219
102	泥瓦匠、接产妇	221
101	1 位女性赚钱养家	221
100	渔民	234
99	2 位渔民	236
98	有赡养	239
97	1 位女性赚钱养家	252
96	船长、渔民、1 位女性赚钱养家	254

排名	家户职业构成 *	家户全年预算 (单位: 1000 克鲁赛罗) †
95	拖网所有者	268
94	渔民	278
93	渔民、1 位女性赚钱养家	282
92	理发师、2 位女性赚钱养家	286
91	渔民	295
90	渔民、1 位女性赚钱养家	300
89	船长—合股人、渔民、兼职渔民	309
88	船长—合股人、码头装卸工、2 位女性赚钱养家	312
87	渔民	316
86	船长—合股人、渔民	317
85	渔民、1 位女性赚钱养家	322
84	渔民兼船主、3 位女性赚钱养家	333
83	船长—合股人、1 位女性赚钱养家	335
82	船长—合股人	336
81	2 位渔民	342
80	渔民、1 位女性赚钱养家	343
79	渔民、农场主	348
78	渔民、1 位女性赚钱养家	359
77	船长—合股人	362
76	2 位渔民、渔船捻缝工	372
75	2 位渔民、2 位女性赚钱养家	373
74	渔民	374
73	理发师、店主	375
72	2 位女性赚钱养家、地主	377
71	渔民、1 位女性赚钱养家	394
70	店主、1 位女性赚钱养家、牧场主	404
69	渔民、1 位女性赚钱养家	405
68	渔民、2 位女性赚钱养家	418
67	3 位女性赚钱养家、有赡养	418
66	渔民、1 位女性赚钱养家	418
65	店主	420
64	船长、1 位女性赚钱养家	420
63	渔民	421

排名	家户职业构成 *	家户全年预算 (单位: 1000 克鲁赛罗) †
62	渔民、1 位女性赚钱养家	423
61	渔民	430
60	渔民—兼职船长	431
59	渔民、佃农	435
58	店主	435
57	渔民、1 位女性赚钱养家	440
56	泥瓦匠、2 位渔民、2 位女性赚钱养家	441
55	渔民	446
54	船长—合股人、3 位女性赚钱养家	452
53	渔民	453
52	渔民、2 位兼职渔民、1 位女性赚钱养家	457
51	船长—合股人, 渔民	461
50	渔民、1 位女性赚钱养家	462
49	船长—农场合股人、1 位女性赚钱养家	465
48	2 位渔民	470
47	2 位渔民、渔船捻缝工、1 位女性赚钱养家	478
46	2 位渔民、老师、泥瓦匠	484
45	鱼贩—兼自耕农、1 位女性赚钱养家	489
44	船长	495
43	渔民、店主	496
42	3 位渔民、泥瓦匠	498
41	渔民—兼摘椰子工人	502
40	船长兼船主、不捕鱼船主—兼木匠—椰子 贩—鱼贩	503
39	船长—合股人	503
38	船长兼船主	503
37	船长—合股人, 农场主	515
36	3 位渔民、兼职渔民	520
35	船长、2 位女性赚钱养家	529
34	2 位渔民	533
33	鱼贩—兼地主、有赡养	544
32	渔民、1 位女性赚钱养家	547
31	船长—合股人—兼农场主	553
30	渔民—合股人—椰子贩	555

排名	家户职业构成 *	家户全年预算 (单位: 1000 克鲁赛罗) †
29	船长—合股人	560
28	渔民—兼职船长、渔民	562
27	船长—合股人、渔民—合股人	564
26	2 位渔民、木匠	570
25	3 位渔民	573
24	渔民	577
23	自耕农—商人	580
22	鱼贩—不捕鱼船主	582
21	店主	597
20	渔民、2 位女性赚钱养家、有赡养	603
19	船长—合股人	605
18	巴西石油工人	606
17	渔民	608
16	店主—自耕农	640
15	鱼贩、船主、1 位女性赚钱养家	650
14	渔民—合股人—兼理发师	664
13	船长、店主、牛仔、渔民	665
12	船长—合股人—兼牛仔—自耕农	673
11	巴西石油工人—合股人	680
10	2 位巴西石油工人、木匠、渔民	697
9	船长—合股人—兼自耕农	708
8	造船匠、渔民	713
7	渔民、商人—兼地主—鱼贩	783
6	驻港船长、渔民	792
5	渔民、商人—兼地主—鱼贩	846
4	船长、鱼贩、地主	884
3	店主、船主、地主	1049
2	店主、船主、地主	1125
1	店主、船主—兼地主—自耕农—椰子贩— 鱼贩—粮贩	1201
	预算平均值	435
	预算中位数	439

* 由破折号连接的职业表明一个人身兼数职。顿号分隔的职业表明,同一家户中不同个人的职业。

† 数字来自 1964 年 8 月,1500 (旧币) 克鲁赛罗 = 1 美元。

附录 2 1964、1973、1980 年阿伦贝皮男性主要职业分布百分比

职业类型	<u>1964</u> <i>N=173</i> *	<u>1973</u> <i>N=231</i> *	<u>1980</u> <i>N=230</i> †
渔业相关	74.0	53.2	40.4
建筑业、地产业	5.2	14.7	16.1
零工	2.8	2.6	3.0
商业、餐饮、酒吧	11.0	8.7	13.5
嬉皮士工作	0.0	2.6	2.6
工厂工人	1.7	11.3	17.0
城市打工	1.7	3.9	4.3
地方行政	1.2	1.7	2.6
农业	2.3	1.3	0.0
总计	99.9	100.0	99.9

* 来自对全部家户成年男性职业的普查。

† 1980 年的百分比来自当年获得的两个样本数据的平均值：(1) 对阿伦贝皮南部六十一间有人住的房子所作的职业调查；(2) 对 1973 年样本中还健在、工作并生活在阿伦贝皮的一百五十七名男性当前职业的信息。

附录 3 1972 年阿伦贝皮渔民合作社十位成员的鱼类销售情况

月份	售出总量 (公斤)	每公斤收益 (新克鲁赛罗)*	占月均捕获量的百分比
1	3550	2.2	77
2	8750	2.6	190
3	3575	2.8	78
4	5600	2.7	121
5	6575	2.5	142
6	4375	2.6	95
7	5725	3.2	124
8	3550	3.1	77
9	2600	3.5	56
10	2700	3.5	59
11	2400	3.3	52
12	5950	3.3	129
总计	55350		
月平均	4600	2.9	

* 2.2 新克鲁赛罗 = 2200 旧克鲁赛罗。1973 年 7 月, 6.1 新克鲁赛罗 = 1 美元。

附录 4 1973 年男性渔民在 1980 年时的职业*

	人数	占工作男性 (百分比)	占 1973 年所有渔民 (百分比)
工作			
渔业相关	51	71.8	48.6
建筑业、地产业	2	2.8	1.9
零工	1	1.4	1.0
商业、餐饮、酒吧	8	11.3	7.6
工厂工人	7	9.9	6.7
城市打工	1	1.4	1.0
地方行政	1	1.4	1.0
农业	0	0.0	0.0
小计	71	100.0	67.6
不工作			
退休、残疾	14		13.3
生病、酗酒	5		4.8
搬走	3		2.9
去世	12		11.4
总计	105		100.2

* 依据阿伦贝皮和卡拉努阿斯的农户普查。

附录 5 1980 年阿伦贝皮和卡拉努阿斯婚姻关系与 1964 年阿伦贝皮及 1973 年卡拉努阿斯在主要职业构成上的对比

	习惯法婚姻		正式婚姻		总数
	数目	百分比	数目	百分比	
阿伦贝皮和卡拉努阿斯 1980					
普通渔民	39	76.5	12	23.5	51
船长	22	57.9	8	42.1	19
巴西钛业工人*	18	60.0	12	40.0	30
不捕鱼船主	7	46.7	8	53.3	15
总计	75	65.2	40	34.8[†]	115
阿伦贝皮 1964					
较富的人	22	37.9	36	62.1	58
较穷的人	36	69.2	16	30.8	52
总计	58	52.7	52	47.3[‡]	110
卡拉努阿斯 1973					
所有居民	33	91.7	3	8.3	36

* 由于 1980 年时巴西钛业工人年龄低于船长平均年龄,可以预见他们正式婚姻的比率最终将超过船长。

† 1980 年时,财富与正式婚姻的相关系数(θ)是 0.25。平均财富按升序排列是普通渔民、船长、巴西钛业工人和船主。

‡ 1964 年时,财富与正式婚姻的相关系数(θ)是 0.31。

附录 6 1973 年与 1980 年阿伦贝皮男女工作比例

	1973 [*]			1980 [†]		
	男性	女性	总计	男性	女性	总计
渔业相关	53.2	0.0	41.6	37.1	0.0	26.5
建筑业、地产业	14.7	1.5	11.8	20.5	0.0	14.7
零工	2.6	49.2	12.8	4.1	51.7	17.6
商业、餐饮、酒吧	8.7	24.6	12.2	16.4	31.0	20.6
嬉皮士工作	2.6	3.1	2.7	8.2	10.3	8.8
工厂工人	11.3	0.0	8.8	8.2	0.0	5.9
城市打工	3.9	6.2	4.4	2.7	6.9	3.9
地方行政	1.7	4.6	2.4	2.7	0.0	2.0
农业	1.3	10.8	3.4	0.0	0.0	0.0
总计	100.0	100.0	100.1	99.9	99.9	100.0
样本规模	231	65	296	73	29	102

* 依据阿伦贝皮和卡拉努阿斯的农户普查。

† 数据只包括阿伦贝皮南部调查区域;关于 1980 年成年男性工作更完整的样本见附录 2。

参考文献

- Appadurai, Arjun
1990 "Disjuncture and Difference in the Global Cultural Economy." *Public Culture* 2(2): 1–24.
- Barry, H., M. K. Bacon, and I. L. Child
1959 "Relation of Child Training to Subsistence Economy."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61:51–63.
- Becker, Howard S.
1963 *Outsiders*. New York: Free Press.
- Brown, Diana
1979 "Umbanda and Class Relations in Brazil." In *Brazil: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ed. Maxine L. Margolis and William E. Cart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p.270–304.
- Burns, E. Bradford
1980 *A History of Brazil*, 2d e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Chagnon, Napoleon
1977 *Yanomamo: The Fierce People*, 2d ed.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 Comitas, Lambros
1962 "Fishermen and Cooperation in Rural Jamaica." Ph.D. disserta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Ann Arbor, MI: Xerox University Microfilm.
- Comstock, George, Steven Chaffee, Natan Katzman, Maxwell McCombs, and Donald Roberts
1978 *Television and Human Behavio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DaMatta, Roberto
1987 *A Casa e a Rua*, 2d ed. Rio de Janeiro: Guanabara.
- Dickens, Charles
1962 (orig. 1850) *David Copperfield*. New York: Signet Classics, New American Library.
- Dunn, Janet Stouffer
2000 "The Impact of Media on Reproductive Behavior in Northeastern Brazil."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Ann Arbor, MI: Xerox University Microfilms.
- Economist, The* (London)
1979 "Oh! Brazil: A Survey." August 4, 1979.
- Eldredge, Niles
1963 "Some Technological Aspects of the Fishing Industry of a Town on the Northeast Coast of Brazil." New York: Columbia-Cornell-Harvard-Illinois Summer Field Studies Program in Anthropology. (Program Files, Columbia University.)
- Farrell, Ronald A., and Victoria Lynn Swigert, eds.
1975 *Social Deviance*. Philadelphia: Lippincott.
- Forman, Shepard
1967 "Cognition and the Catch: The Location of Fishing Spots in a Brazilian Coastal Village."

- Ethnology* 6:417–26.
- 1970 *The Raft Fishermen: Tradition and Change in the Brazilian Peasant Econom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1975 *The Brazilian Peasant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Foster, George M.
1965 “Peasant Society and the Image of Limited Good.”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67:293–315.
- Freeman, Linton
1965 *Elementary Applied Statistics for Students in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New York: Wiley.
- Fried, Morton
1960 “On the Evolution of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the State.” In *Culture in History*, ed. S. Diamon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p.713–31.
- Gallagher, Art, Jr., and Harland Fadfield
1980 “Theory of the Dying Community.” In *The Dying Community*, ed. Art Gallagher Jr. and Harland Padfield. Albuquerque: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 pp.1–22.
- Gross, Daniel R.
1973 “Factionalism and Local Level Politics in Rural Brazil.” *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29:123–44.
- Gross, Rose Lee
1964 “Local Politics and Administration: Camacari, Bahia, Brazil.” New York: Columbia-Cornell-Harvard-Illinois Summer Field Studies Program in Anthropology. (Program Files, Columbia University.)
- Harding, Susan
1975 “Women and Words in a Spanish Village.” In *Toward an Anthropology of Women*, ed. Rayna Reiter.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pp.283–308.
- Harris, Marvin
1974 *Cows, Pigs, Wars, and Witches*. New York: Random House.
- Harris, Marvin, and Conrad Kottak
1963 “The Structural Significance of Brazilian Racial Categories.” *Sociologia* 25:203–9.
- Havinghurst, Robert, and J. Roberto Moreira
1965 *Society and Education in Brazil*.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 Hirsch, Paul M.
1979 “The Role of Television and Popular Culture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In *Television: The Critical View*, ed. Horace Newcomb.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249–79.
- Hujanen, T.
1976 *Immigrant Broadcasting and Migration Control in Western Europe*. Tampere, Finland: Institute of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Tampere.
- Johnson, Allen
1971 *Sharecroppers of the Sertão: Economics and Dependence on a Brazilian Plantation*.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Jones, Doug
1996 *Physical Attractiveness and the Theory of Sexual Selection: Results from Five Population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Museum of Anthropology, Anthropological Papers, no. 90.
- Kottak, Conrad Phillip
1966 “The Structure of Equality in a Brazilian Fishing Community.” Ph.D. disserta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Ann Arbor, MI: Xerox University Microfilms.
1967a “Kinship and Class in Brazil.” *Ethnology* 6:427–43.

- 1967b "Race Relations in a Bahian Fishing Village." *Luso-Brazilian Review* 4:35–52.
- 1980 *The Past in the Present: History, Ecology, and Cultural Variation in Highland Madagascar*.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1990 *Prime-Time Society: An Anthropological Analysis of Television and Culture*. Belmont, CA: Wadsworth.
- Kottak, Isabel Wagley
1977 "A Village Prostitute in Northeastern Brazil." *Michigan Discussions in Anthropology* 2:245–52.
- Labov, William
1972 *Sociolinguistic Patterns*.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 Lemert, Edwin M.
1951 *Social Pathology: A Systematic Approach to the Theory of Sociopathic Behavior*. New York: McGraw-Hill.
- Lévi-Strauss, Claude
1967 *Structural Anthropology*. New York: Basic Books.
- Malinowski, Bronislaw
1961 (orig. 1922) *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 New York: Dutton.
- Marcus, George E., and Michael M. J. Fisher
1986 *Anthropology as Cultural Critique. An Experimental Moment in the Human Scienc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Mintz, Sidney, and Eric R. Wolf
1950 "An Analysis of Ritual Co-Parenthood (*Compadrazgo*)." *Southwestern Journal of Anthropology* 6:341–68.
- O'Leary, Christopher M.
2002 "Class Formation, Diet a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in Two Brazilian Fishing Communities."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Ann Arbor, MI: Xerox University Microfilms.
- Redfield, Robert
1948 *The Folk Culture of Yucata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0 *Peasant Society and Culture and the Little Communi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Reiter, Rayna
1975 "Men and Women in the South of France: Public and Private Domains." In *Toward an Anthropology of Women*, ed. Rayna Reiter.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pp.252–82.
- Sahlins, Marshall D.
1972 *Stone Age Economics*. Chicago: Aldine.
- Tolkien, J. R. R.
1965 *The Lord of the Rings. Part III: The Return of the King*. New York: Ballantine.
- Wagley, Charles W.
1963 *Introduction to Brazil*.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Wagley, Charles W., ed.
1952 *Race and Class in Rural Brazil*. Paris: UNESCO.
- Weber, Max
1958 (orig. 1920)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New York: Scribner's.
- Wolf, Eric R.
1955 "Types of Latin American Peasantry."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57:452.

关于作者

康拉德·菲利普·科塔克 (Conrad Phillip Kottak, 1942—), 1963 年获哥伦比亚大学本科学位, 1966 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 密歇根大学人类学系教授、系主任 (1996—2006), 1968 年任教于该校。1991 年, 因其多年来的教学工作, 受到大学及密歇根州政府表彰。1992 年, 荣获密歇根大学文学、科学与艺术学院杰出教学奖。1999 年, 美国人类学会 (AAA) 授予其 AAA/ 梅菲尔德奖, 表彰其在人类学研究生教学方面作出的卓越贡献。2005 年荣膺美国人文与科学学院院士。2008 年荣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

科塔克教授曾在巴西 (始于 1962 年)、马达加斯加 (始于 1966 年) 和美国进行民族志田野调查。他主要研究地方文化与更大体系的整合 (及抗拒整合) 过程。这一方向将他早期对非洲和马达加斯加生态与国家形成方面的研究, 与新近关于全球化变迁、国家与跨国文化及大众媒体的研究联系到了一起。

科塔克著名的个案研究《远逝的天堂》(本书) 第四版, 以他在巴西巴伊亚州阿伦贝皮的研究为基础, 于 2005 年由麦格劳-希尔出版社出版。从 1980 年代制定的研究计划开始, 科塔克将民族志与“电视对巴西人行为的影响”这一课题的研究调查结合起来。这项研究构成科塔克《黄金时段的社会: 一项关于电视和文化的人类学分析》(*Prime-Time Society: An Anthropology Analysis of Television and Culture* [Wadsworth, 1990]) 一书的核心: 关于电视在巴西和美国的性质及影响的比较研究。

科塔克的其他著作包括《今日如昔: 马达加斯加高地的历史、生态与文化多样性》(*The Past in the Present: History, Ecology and Cultural Variation in*

Highland Madagascar [1980]), 《美国文化研究: 人类学学生指南》(*Researching American Culture: A Guide for Student Anthropologists* [1982]) (两书都由密歇根大学出版社出版), 及《马达加斯加: 社会与历史》(*Madagascar: Society and History* [1986]) (加利福尼亚学术出版社)。他的最新版教材(第十一版)《人类学: 探索人类多样性》(*Anthropology: The Exploration of Human Diversity*)与《文化人类学》由麦格劳-希尔出版社2005年出版, 同期出版的还有他的《体质人类学与考古学》(第二版)。他同时也是《人类之镜: 文化人类学简介》(4th ed., McGraw-Hill, 2005)与《人类之窗: 文化人类学简介》(1st ed., McGraw-Hill, 2005)的作者。他还与 Kathryn A. Kozaitis 合编了《和而不同: 北美主流社会的多样性与文化多元主义》(*On Being Different: Diversity and Multiculturalism in the North American Mainstream*, 2nd ed., McGraw-Hill, 2003)。

科塔克的文章主要发表在《美国人类学家》、《人类学研究学刊》、《美国民族学家》、《民族学》《人类的组织》(*Human Organization*)和《葡语-巴西人评论》(*Luso-Brazilian Review*)等学术期刊上。他也为更大众化的刊物, 如《社会学刊》(*Transaction/SOCIETY*)、《自然史》(*Natural History*)、《当代心理学》(*Psychology Today*)和《普通人类学》(*General Anthropology*)等撰稿。

在最近的研究中, 科塔克与同事一道考察了巴西生态意识的萌芽, 马达加斯加的森林滥伐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社会背景, 以及公众对巴西东北部地区经济发展计划的参与。科塔克教授从1999年起就加入密歇根大学阿尔弗雷德·P. 斯隆基金资助的“日常生活民族志中心”。他在该中心进行了一项名为“中西部城镇中产阶级的媒体、家庭与工作”的研究计划, 考察中产阶级家庭如何利用各种媒体, 规划、制定和评估他们的选择与策略, 来满足他们在工作 and 家庭中遇到的各种需求。

科塔克欢迎广大学者与学生对本书多加指正, 不吝赐教。请致电邮, 地址如下: ckottak@umich.edu.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远逝的天堂 一个巴西小社区的全球化 第4版

作者=(美)科塔克著;张经纬,向瑛瑛,马丹丹译

页数=263

SS号=12943922

出版日期=2012.03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第一部分 变迁的故事

第一章 前世：六十年代

第二章 今生：通往1980年的道路

第二部分 桃花源

第三章 平等结构

第四章 渔民精神

第五章 更大的池塘

第三部分 悸动桃花源

第六章 褐色的阿伦贝皮

第四部分 现实

第七章 梦想之地的新一轮新日

第八章 不在捕鱼，就在巴西钛业上班

第九章 政府的网络

第十章 社会差异与社会分化的原因

第十一章 外来者的社区

第十二章 整个世界向阿伦贝皮开放

第十三章 下一代

第十四章 2004年的阿伦贝皮

第十五章 社会变迁和全球化的比较

附录

参考书目

关于作者